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重释与批判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

张劲松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重释与批判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

张劲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释与批判: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张劲松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511-8

I. ①重… II. ①张… III. ①鲍德里亚(1929~
200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625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重释与批判: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

张劲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39,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11-8/B·990

定价 45.00 元

序

张劲松的博士学位论文《重释与批判——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被列入“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出版，很为他高兴。在论文送审与答辩时，专家们给予了很多肯定的评价，令他深受鼓舞；而专家们的建议，也让他看到了努力的方向。论文的部分内容公开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现在这篇产生于哲学学科后起发展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博士论文，经作者作了局部修改后获得资助出版，真是可喜可贺，相信本书的面世将会受到圈内读者的欢迎。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以新奇、多元的理论视角描绘了当代社会的种种状况，对前人的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和质疑，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媒介理论、文化艺术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乃至某种意义上深刻的影响。鲍德里亚的理论很复杂，早期较多关注消费社会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期集中于对媒介理论和高科技世界的探讨，晚期又写了不少游记和国际评论。鲍德里亚的思想前后有很大变化，其研究领域和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令人眼花缭乱，很难归纳整理、找出个头绪来。当张劲松决定选择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时，他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符

号、象征交换等方面的思想引发了诸多的研究,由此产生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若想做到不人云亦云,而是说出自己的见解,就要下一番工夫,独辟蹊径。

张劲松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其中的甘苦,我是了解的。对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勇于探索、求实求精的治学精神和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能力,我由衷地高兴。他提供评阅和答辩的学位论文及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的这本著作所达到的水平,超出了我的预期。

张劲松的这本著作从崭新的视角重新梳理鲍德里亚前后期理论,将“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作为贯穿鲍德里亚整个理论的核心概念,从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早期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中,鲍德里亚认为符号、影像主导下的消费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现实”:人的消费需要因社会外部力量的强化和压制而形成,从而失去了与人的自然属性的关联;物品作为消费对象被剥离了实体性指涉,转化为一种符号或符码。在媒介批判理论中,鲍德里亚把媒介看作是拟真机器,媒介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令媒介场景、信息符码充斥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像、拟像与现实间的界限内爆了,现实生活转化为超现实。在到美国旅行后,鲍德里亚把美国文化看成是一个“拟真的试验场”。表现美国文化的电影、屏幕和其他影像产生了如同自然界中沙漠一般的荒芜和冷漠,这是一个空洞的纯粹的超现实世界。本书通过对鲍德里亚不同时期的理论著作的剖析,揭示了“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在鲍德里亚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人们准确理解鲍德里亚的理论,应该是有帮助的。

鲍德里亚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作者称鲍德里亚是一位“后现代批判理论家”,并认为在对现代主义

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鲍德里亚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鲍德里亚的理论既表现出了批判精神,又显示出了某些理论上的软弱。而把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纳入社会理论,将它看作是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是一种很独特的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还要指出的是,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所在,作者从批判理论的视角讨论鲍德里亚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尚不多见。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工作,探究批判理论是如何实现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向的,并阐释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上述工作中,力求归纳出鲍德里亚相关思想的若干缺陷,比如在将批判理论由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在对文化、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技术决定论、价值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宿命策略等。而揭示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缺陷,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说,张劲松的学位论文选题是有难度的,是富有挑战性的。通过对较为丰富的国内外文献(包括鲍德里亚论著)的深入研究,论文提出的上述见解,读后令人感到新颖独特。作者在研究中,力求尽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合理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一方面认真思考、反复琢磨;另一方面又虚心请教师长,与周围学友开展有益的讨论。因此,本书给已阅读过的人们留下了逻辑比较严谨(表现为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视野相对开阔和行文流畅的深刻印象。

然而,由于本书研究的课题涉及领域比较广,一些研究又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因此,有些讨论不可避免地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

深化。比如,论文把“拟像”、“拟真”和“超现实”作为贯穿鲍德里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将之与鲍德里亚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联系起来,这是富有创造性的看法。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把拟像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间的关系说清楚,令人感到有充分的说服力,这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切入点的。另外,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也作了一定的讨论,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融入更多的后现代元素,必须转向符号的意指模式分析,才能更深刻地透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然而,可能是限于本书的篇幅,这种讨论的展开不够充分,令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好在作者还很年轻,并且还很勤奋;好在本书写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这也令读者产生一种希望:期待作者能在本书的基础上,扩展开来,超越自我,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能对本书中的一些看法作进一步打磨,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新成果,从而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我相信,读者的期待不会落空。

马钦荣

2013年2月

目 录

序	1
导言	1
一、鲍德里亚是谁?	2
二、“后现代主义牧师”	7
三、批判理论家	9
第一章 拟像、拟真与超现实——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的	
关键词	17
第一节 西方哲学史中的拟像概念	19
一、理念论中的虚假影像	19
二、“偶像的黄昏”	23
三、表征的危机	27
第二节 拟像与历史进程	36
一、仿造阶段	37
二、生产阶段	38
三、拟真阶段	39
第三节 后现代的“超现实”世界	40
一、“超现实”概念的缘起	41

二、超现实的技术生成	46
三、超现实的特征与本质	49
四、超现实概念的意义与局限	55
第二章 消费社会批判——一种后现代的视角	63
第一节 消费社会的符码体系	64
一、符号学方法的运用	64
二、功能性体系与符号体系	67
三、消费的定义	69
第二节 消费社会与超现实	71
一、媒介操控的“伪现实”	72
二、从生产到再生产	73
三、从物品到符号	75
四、制造“虚假需要”	78
第三节 消费社会、生活方式与经济危机	81
一、从生产者到消费者	82
二、满足手段：透支未来	84
三、消费社会理论与经济危机	86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解读	91
第一节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三重语境	92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94
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价值	95
三、象征交换的逻辑：解构交换价值	97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100
一、价值等式	100
二、价值的结构规律	103

第三节	意识形态批判:消费、符码与超现实·····	107
一、	消费:拜物逻辑的延续·····	108
二、	符码:抽象形式的统治·····	111
三、	超现实:意识形态终结之境?·····	117
第四章	“拟真机器”——媒介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话语·····	126
第一节	媒介批判理论的语境转换·····	127
一、	影像时代·····	127
二、	景观社会·····	128
三、	拟真世界·····	130
第二节	作为“拟真机器”的媒介·····	131
一、	媒介形成的超现实·····	132
二、	超现实的“内爆”机制·····	135
第三节	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	141
一、	意识形态操控体系·····	141
二、	媒介操控下主体的命运·····	145
第四节	媒介拟真的后果——“沉默的大多数”与“社会性 的终结”·····	149
一、	“沉默的大多数”·····	149
二、	“社会性的终结”·····	154
三、	简评与批判·····	157
第五章	“拟真试验场”——政治与文化批判中的后现代 概念·····	166
第一节	代议制对公众意志的拟真·····	167
一、	表征与民主·····	167

二、民意测验:公众意志的拟真	170
三、两党垄断的民主选举	172
第二节 “海湾战争发生过吗?”——战争与霸权主义	175
一、高科技的战争拟真	176
二、战争的媒介剧场	178
三、海湾战争的真实性	180
四、海湾战争与霸权主义	183
第三节 超现实的美国文化	188
一、超现实的美国	188
二、地理与文化的沙漠	193
三、欧洲现代性的超越	195
四、文化批判的后现代视角	200
第六章 批判理论的溯源与转向:从马克思到后现代主义 ...	208
第一节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210
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特征	210
二、理性形而上学批判	213
三、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15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221
一、从启蒙精神到工具理性	222
二、大众文化批判	224
三、技术理性批判	227
四、基于文化和技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29
第三节 何谓“后现代转向”	232
一、后现代社会面貌	233
二、后现代主义范式	238

第七章 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基于鲍德里亚理论的	
一种阐述	250
第一节 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251
第二节 现代主义批判	255
一、反本质主义	255
二、消解主体	260
三、拒斥历史进步观	268
第三节 经济哲学批判的后现代路径	272
一、从生产过程到消费活动	274
二、从物化到拟像化	277
三、从生产方式到意指模式	280
第四节 后现代批判理论的局限	286
一、技术决定论	286
二、虚无主义	290
三、宿命策略	293
结语 多元、激进而软弱的后现代批判理论	303
一、多元的视角	303
二、激进的立场	306
三、软弱的批判	308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22

导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话语风行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时,鲍德里亚^[1]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中心人物之一。许多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团体、学术刊物和理论研讨都纷纷将鲍德里亚当作一个热门话题和焦点人物,对其研究成果和理论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鲍德里亚的追随者称赞他是后现代时期的“守护神”和超级理论家,是形成“后现代场景”的一种强大动力。随着研究热潮的兴起,鲍德里亚的思想也迅速地进入到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媒介理论、艺术等学科,并对这些领域的传统观念和思想体系形成了根本性的挑战。不仅如此,这种影响也超越了学术研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当中。从 1999 年起,一系列描述超现实^[2]生活的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让鲍德里亚的思想进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和娱乐之中。电影的主创者沃卓斯基(Wachowski)兄弟自称是鲍德里亚的忠实读者并深谙其理论,在电影当中,《拟像^[3]与拟真^[4]》一书就隐喻地显现在屏幕上。鲍德里亚的思想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形成一种被称为“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的理论风潮。那么鲍德里亚到底是谁?他提出了什么样的

新奇理论?

一、鲍德里亚是谁?

这个问题也是英国《卫报》(*The Guardian*)1988年9月21日报道鲍德里亚事迹的标题,人们在阅读其理论的同时也对其经历和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鲍德里亚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Reims)的一个普通家庭,公立中学毕业后在本省的一所中学做了十年的德语老师。德语教学经历使鲍德里亚受益很大,他阅读了尼采(F. Nietzsche)、海德格尔(M. Heidegger)等人的著作,并将一些重要的德国文献翻译成法文。1968年鲍德里亚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法文版的翻译。年轻的鲍德里亚也积极地投身政治运动,参与创办了激进的《乌托邦》杂志,还言辞激烈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鲍德里亚站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方,积极为学生运动造势。鲍德里亚1966年9月开始在列斐伏尔(H. Lefebvre)的指导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社会学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而后进入南泰尔(Nanterre)大学(巴黎第十大学)担任助教。大学的生涯并不顺利,直到1986年辞职去往多芬(Dauphine)大学(巴黎第九大学)任教,鲍德里亚都未能成为一名教授。1990年在多芬大学退休后,他热衷于写作、旅行与摄影,并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举办了摄影展,2007年3月6日病逝于巴黎。

从1968年出版第一本著作《物体系》直到去世,鲍德里亚为读者奉献了20多部著作和200多篇文章,并以其高产量、高质量在当代社会思想家中享有盛誉。这些论题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社会学、技术哲学、媒介批判等,也包括了大量的游记、国际评论、个人随想等。鲍德里亚的理论论题宽泛而庞杂、视角独特而多

元,并且充满着各种断裂、矛盾。鲍德里亚认为自己一生都不停地处于断裂之中,先是与身为平民的父母决裂,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人;然后与老师列斐伏尔决裂,走上了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之路;“我一直处于一种真实的决裂状态之中:同大学的决裂,甚至同我一直涉足其中的政治领域决裂,然而我也一直同政治保持着某种距离”^[5]。

不仅生活处于不断的断裂之中,而且鲍德里亚的理论主题也一直在转向、变换。在对鲍德里亚理论的分期上,凯尔纳(D. Kellner,亦译为“科尔纳”)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赞同。他认为在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里,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被融合在一起,用来探析我们日常生活的物品和符号体系。这时期的著作包括《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而《生产之镜》(1973)是一个转折点,在书中鲍德里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系统的攻击,并由此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在70年代中期,鲍德里亚离开了现代社会的问题群,开始构造他的后现代社会形态。这个时期是短暂的,著作也只有《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和《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中》(1978)。第三个时期始于1979年发表的《诱惑》,这个奇特的文体代表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他在80年代的“形而上学转向”,主要的论著包括《诱惑》(1979)、《拟像与拟真》(1981)、《宿命策略》(1983)等。后期鲍德里亚是进入90年代之后,他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观察者,出版了《冷记忆》系列(1990—2000)、《恶的透明》(1990)、《海湾战争不会发生》(1991)、《终结的幻相》(1992)、《完美的罪行》(1995)、《不可能的交换》(1999)、《艺术的同谋》(2005)等。作为鲍德里亚理论研究的权威专家之一,凯尔纳的划分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然而以时间(1973、1979、

1990)作为划分的断点,难免将不同类型和不同论题的文本混同在一起,如《完美的罪行》虽然发表在1995年,但讨论的却是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可以归入80年代的学术类型;《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中》虽然是第二个时期的著作,却研究的是媒介技术下的主体命运,亦是第三时期讨论的重要论题;而游记《美国》(1987)按此标准就无法准确定位了。因此按照时间顺序的区分,虽然清晰明了却主题混乱。

国内学界对鲍德里亚不同理论类型的认识深受凯尔纳的影响,分别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两分法将鲍德里亚思想整体以1976年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阶段,“在早期,鲍德里亚基本上是以一个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它的符号学批判,并逐渐地证明了自己的象征交换的立场”^[6]。而晚期则不再讨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所关注的问题,而大量讨论诱惑、拟真等问题。这种划分的方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讨论鲍德里亚的思想,它反映了国内在对鲍德里亚研究伊始侧重于对早期理论的研究。而对后期(1976年之后)的理论划分比较笼统,缺乏统一的依据和深入的分析。更为细致区分的三阶段理论,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并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第二阶段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思潮,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较为尖锐的批评,此时的鲍德里亚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第三阶段是同一切现有思潮决裂,最后同现实本身决裂,走向了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这构成了鲍德里亚后来的主要论题”^[7]。不难看出这种划分方法只是把上述分法的早期(1976年之前)再分为两个阶段,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

后马克思思潮的过程。这种划分方法得到国内许多学者的认同,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对鲍德里亚思想进行归类,从而指出了其认同、背叛和远离马克思主义论题域的三个阶段。这种方法既符合了时间的发展进程又具备理论的逻辑关联,然而却同样在对第三阶段的研究上仍然过于笼统,仍然立足于鲍德里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话题之外的理论不加区分地归为一类。

实际上,如果以研究论域为依据来区分鲍德里亚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出鲍德里亚理论有三种类型的问题域,即马克思主义论域、后现代主义论域和后期的多元化论域。从1968年到1973年《生产之镜》的出版,鲍德里亚主要围绕着生产、消费、拜物教、异化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话题而展开的。这个时期的鲍德里亚著作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来进行阅读,他对消费的剖析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一种补充,而对于文化和符号的重视也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要素。不管是诠释、扩展和补充,还是批判、质疑和颠覆,此时的鲍德里亚都处于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之内,“我们处在一个貌似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我认为很难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确实对我的理论产生了影响。从一开始,通过生产而进行的分析就与礼物消费和耗费的人类学分析结合在一起,此后生产的分析被放弃了。至于政治经济学,我研究它是为了解构它。事实上我起初是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但几乎同时我就开始质疑、动摇,并在前进的道路上越来越远离它”^[8]。

后现代主义论域时期始于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鲍德里亚在书中提出了研究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着重强调了象征交换、拟像和拟真、“沉默的大多数”、“内爆”和

宿命策略等概念,断言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着历史分界线,并深入地阐述了后现代的超现实世界、主体的消失、历史的终结等诸多话题,从而在后现代理论界声名鹊起并广受关注。其中,在《象征交换与死亡》、《拟像与拟真》(1981)中,鲍德里亚展开了拟像概念的研究和拟真世界的阐述;在《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中》中讨论了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后果;在《恶的透明》、《宿命策略》和《完美的罪行》中描述了技术宰制下的后现代社会景象等等。这些概念和理论表明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也宣告了鲍德里亚告别了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对于波德里亚而言,现代社会是围绕着商品的生产 and 消费组织起来的,而后现代社会则是围绕着仿真以及形象与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的,这标志着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由仿真控制的新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9]。

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论域之后,后期鲍德里亚走向了更为多元、宽泛而杂多的理论领域。在《美国》和《冷记忆》系列书中,鲍德里亚记录的是他自70年代以来游历美国和欧洲时的日记或感想,其中充满了隐喻、印象流、思辨话语、诗性思维以及旅行中的人与物。在《海湾战争不会发生》以及关于恐怖主义的评论中,鲍德里亚用新奇的视角分析了国际重大事件。不难看出,此时的文本已经不再有深刻的理论观点和体系,缺乏单一的研究对象而去追赶流行时尚话题。从行文风格来看,从早期的理论论述走向了散乱的、碎片式的写作形式,更多以格言、警句、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挥洒不羁的写作方式、游离不定的论述领域,时髦的词汇和独特而怪异的论调,再加上对先锋理论的吸纳和运用,使他在艺术、媒介、文化等领域引起广泛的关注,此时期的文本可以看成是后现代理论的一种运用和发挥。

二、“后现代主义牧师”

凯尔纳在多本研究著作中都宣称鲍德里亚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是“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他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有关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10]。的确,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各个领域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认同。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都肯定了鲍德里亚思想对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影响。瑞泽尔(J. Ritzer)认为他“明确和肯定地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毕竟,他的著作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并且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内对后现代主义者产生过影响”^[11]。多德(N. Dodd)认为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宣布了社会的死亡,从而“把对现代社会的拒绝发展成更广泛地抛弃社会理论本身”^[12],由于明确抛弃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特征,可见他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鲍德里亚的理论同样引起了媒介文化研究的强烈反响,英国学者史蒂文森(N. Stevenson)把鲍德里亚的理论比喻成暴风雪的来临,“对时下已有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最为精辟的后现代批评”^[13]。波斯特(M. Poster)指出鲍德里亚理论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下媒介理论的变革性意义。拟真的逻辑框架形成了从单向的第一媒介时代向双向互动、去中心化的第二媒介时代的过渡^[14]。可以看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牧师”^[15],鲍德里亚的思想已经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鲍德里亚的理论之所以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首先在于它描述一个崭新的后现代社会面貌,在其中深刻地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观念。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拟真的时代,它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超现实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本身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拟像、符码和模型开始构造现实

本身,并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波德里亚的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的范畴合并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状况,这种状况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模式来表达并回应当代的新鲜事物”^[16]。如果后现代是一个由没有原本、没有指涉的拟像所形成的世界,那么现实就失去了客观基础,在此之上构建的上帝、真理、历史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也就轰然倒塌了。其次,在由高科技主宰的后现代世界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被反转了,主体在客体的统治和操控下消失了。在现代主义的话语中,主体试图探究客体的本质面貌,并运用科学和知识来管理、支配客体以服务于主体的需要。然而,随着人类自身越来越多被技术(DNA、克隆、数码信息等)所生成,同时客体世界日益强大并形成一个自主运行、脱离人类控制的体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被颠覆了,客体已经取代了主体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一种新的“客体策略”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于是在后现代世界里,主体遭受到新的奴役和异化并走向消亡,“主体,这个现代哲学的宠儿,就在波德里亚形而上学的设想和客体的胜利中被打败了,对一向为现代哲学框架的主体客体辩证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终结”^[17]。最后,鲍德里亚也为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论”大声疾呼。在符码统治的拟真世界里,商品的价值规律被符号的结构规律所替代,价值的确定性转变为符码的不确定性,这一转变过程导致了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能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18]。鲍德里亚强调了大众媒介在后现代社会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媒介的过度渗透重塑了个体

经验和社会形态,大众被挤压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消解了所有信息的意义,从而形成了“社会性的终结”。在科技发达的后现代社会里,历史发展的轨道进入到拟真的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经验和价值,在那里,线性、进步而持续的历史和时间观念受到强烈的否定,于是历史的发展走向了终结。一系列的终结论表明鲍德里亚强烈地怀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历史观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激进地消除这些理论中的固有假设和内在指涉,最终将它们作为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而给予猛烈地抨击。

尽管鲍德里亚本人一度坚称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因为我们无法对目前发生的一切加以定义,无法准确地表述当前社会的状况,于是“人们便选用了—个空洞的术语来说明。因此,后现代主义—定意义上并不存在。如果以此解释,我显然并不代表这种空无……它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承认在这方面曾有所论述”^[19]。然而自我的否定并不能掩饰其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紧密关联,尽管鲍德里亚并不认同后现代理论或真正地使用过“后现代”—词,但他的理论特征、概念模式和话语实践都清晰地展现了其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既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烈批判,又有着消解主体、反对宏大叙事的倾向,“对规划了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主题,博德里亚均作出了某种贡献。博德里亚对意识形态、真理、表征、严肃性和主体的解放的排斥,具有与后现代主义昭然的一脉相承之处”^[20]。

三、批判理论家

哈桑(I. Hassan)在考察后现代理论时,将鲍德里亚归入政治哲学家行列,其影响力名列马尔库塞(H. Marcuse)之后,但位居哈

贝马斯(J. Habermas)之前。不管这样的排名是否具有合理性,但至少表明在哈桑眼里,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在理论上有着某种关联。他们的思想中都有一种深刻的批判意识,而批判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然,由于所处的时代差异以及理论背景的不同,他们的批判视角也有所差异。鲍德里亚早期的消费社会理论包含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对此大部分研究者存在着共识。甘恩(M. Gane)在其专门介绍鲍德里亚思想的著作《鲍德里亚:批判理论与宿命理论》一书中,把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理解为从激进的批判理论向悲观的宿命理论转化的过程,而这一发展历史都贯穿着符号、象征和拟真的主线,“作为一个想要保持革命性批判价值的人,鲍德里亚力图把建立在象征秩序之上的策略,与那些主导的拟真文化实现最大程度的反讽性结合”^[21]。

许多学者认为在《生产之镜》之后,鲍德里亚开始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并由此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了反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内的不少学者将鲍德里亚的思想归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鲍德里亚代表了后马克思主义形成路径的代表之一,即“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22]。如果“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包含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关联,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补充甚至批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以此来对鲍德里亚进行理论定位,会出现人物思想的内在矛盾,即一个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另一个是走向批判、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而产生了整体思想的断裂和冲突。

此外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名称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势必为这一理论的后续延伸形态的界定增加了难度。因此在批判理论的视野中把握鲍德里亚的理论,更能体现思想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事实上,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鲍德里亚整体思想,或者是后期思想中对批判精神的延续。鲍德里亚的“理论始终是批判性的:他的前期理论是对所谓的‘客体’(‘客体系统’或‘消费社会’)的批判,而他的后期理论则是对主体(知识分子所自封的‘主体’)的批判性之批判”^[23]。即使是中后期重点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鲍德里亚的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表面上看,鲍德里亚的思想似乎表现出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其实质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24]。因此不管鲍德里亚的理论表现形式多么多样、新奇,他的理论姿态是始终如一的,即始终与当代社会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批判性介入,始终关注着资本统治的新形态和人的生存困境,这为我们将鲍德里亚划归于批判理论的行列提供了依据。

理论界普遍接受凯尔纳的观点,即认为鲍德里亚早期著作以符号学的方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1989年凯尔纳出版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更远》一书,第一次全景式介绍早期鲍德里亚的思想。他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了鲍德里亚早期思想中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延续和补充,并最终走向了背离和对立。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要把他的精力集中在生产和劳动过程的分析方面,而鲍德里亚早期对于符号体系和消费社会的批判性研究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供有益的补充。他的符号学视角使人们可以洞悉单一的物品如何构成一个物品体系,并把个体整合到消费社会的需求体系之中。这种理论“属于在批判社会学的框架内所作的尝试”,目的在于把列斐伏

尔(H. Lefèbvre)、德波(G. Debord)和情境主义者所引发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同社会符号学结合在一起^[25]。不难看出,鲍德里亚早期思想延续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并把视角从生产过程转向了消费领域,将符号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融合在一起,从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即便是在后现代论域和多元化论域的中后期理论,他的理论立场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角从经济生活的分析转向了媒介、政治、文化等领域,强调了上层建筑中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但他仍然在关注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仍然在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积弊进行着揭露和批判。

尽管立场和方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视角远离了作为决定要素的经济基础,然而笔者还是认为中后期鲍德里亚的理论旨趣仍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并力图寻找各种崭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策略。就此而言,鲍德里亚仍然属于批判理论的一分子,仍然体现着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结合的可能之路。鲍德里亚中后期以“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概念为核心的后现代理论,成为其整体批判理论的强力锐器和独特视角,具体表现为:

第一,消费社会批判。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里,我们生活在“真实被否定”的世界里,历史、文化、思想“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臆象”^[26]。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巨大的拟真进程”结合了符码的元素,产生了一种全面取代现实的“新的现实”。消费的对象是由“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交换是在符号与符号之间进行而不是符号与实物之间,价值取决于各种符号间的差异和符码的结构。商品的价值不再有任何外在的参照物,

由此,需要、劳动、价值和货币等政治经济学范畴都与“现实”发生了断裂,只是作为一种符号被限制在意义的结构之中,最终导致了“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第二,媒介批判理论。鲍德里亚以后现代概念展开的媒介批判,在当代媒介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将媒介阐释为主要的拟真机器,这台机器大量产生出影像、符号和符码,从而形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后现代世界。媒介拟真压制、弱化并最终消解了大众,从而使得一切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都失去力量,最终导致了所谓的“社会性的终结”,“由于媒介和信息的‘非理性’暴力而造成的社会自身的分裂,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形成了原子化的、核子化的、分子化的大众,导致了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性迅速被带入终结”^[27]。

第三,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早期理论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借助于符号学方法揭示新的拜物教形式,从而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补充了符号和文化的维度。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鲍德里亚借助于能指/所指的结构分析将商品解构为符号体系中的符码,力图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融合成一体,从而质疑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并最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鲍德里亚后期理论通过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消除了意识形态的现实指涉,对当代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现象进行审视与批判。他将迪斯尼乐园和美国社会看成是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理论运用的具体对象,迪斯尼乐园被视为拟像的完美模型,美国被描述成一个拟真的试验场,它们代表了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缩影,在其中生动地上演着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展现了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概括和颂扬。在激进地解构和批判现代主义观念的同时,鲍德里亚附和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观点,又制造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

运用一系列崭新的后现代术语继续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审视和剖析,使鲍德里亚在西方批判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结合。凯尔纳评价道:“他中期讨论类象、超真实以及内爆的著作通常都很精彩,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类象和超真实转变的特征,而且这些范畴对于分析当代媒体和文化趋势非常有用”^[28]。波斯特认为鲍德里亚代表着批判理论一种新思路的开始,把批判理论与符号、拟真、超现实等概念相互结合,“已经使批判理论远远超越了生产模式的范围,并将批判理论带到了一个更为肥沃的理论领地”^[29]。莱昂(D. Lyon)同样高度评价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不止一位社会理论家从鲍德里亚的思想——虽然天启式的音量被调低了几度——中看到这种社会批判潜藏着丰厚的思想成果”^[30]。

从新奇、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是鲍德里亚整体思想的中心线索之一,这种理论取向从早期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一直延续到后期对技术、媒介、文化和政治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现代主义阵营中重要人物之一的鲍德里亚仍然在发展和拓宽着批判理论,仍然在带动并推进着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挖掘,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批判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的发展和延续。

注 释

[1] Jean Baudrillard,引文中亦译为“波德里亚”、“布西亚”、“博德里亚”、“鲍德利亚”等。

- [2] hypereality,引文中亦译为“超真实”、“超级真实”等。
- [3] simulacrum,引文中亦译为“拟象”、“仿像”、“类象”、“类像”等。
- [4] simulation,引文中亦译为“仿真”、“模拟”、“拟仿”、“模仿”等。
- [5] Mike Gan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Routledge, 1993, p. 19.
- [6] 张双利:《鲍德里亚:后现代的牧师》,载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0 页。
- [7]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0 页。
- [8] Mike Gan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20.
- [9]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 [10]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3 页。
- [11]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 页。
- [12] 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1 页。
- [13]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26 页。
- [14] 参见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页。
- [15] Mike Gan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21.
- [16]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2 页。
- [17] 同上书,第 22 页。
- [18]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 页。
- [19]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es*, p. 22.
- [20]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第 252—253 页。
- [21] Gane Mike, *Baudrillard: 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Routledge, 1991, p. 12.
- [22] 杨耕:《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与多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09 年第 9 期。
- [23] 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2 页。

- [24] 孔明安:《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吗?》,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
- [25]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5页。
- [26]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
- [27]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Semiotext, 2007, p. 51.
- [28]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85页。
- [29] 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118页。
- [30] 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第一章

拟像、拟真与超现实——鲍德里亚 后现代理论的关键词

拟像一词源自拉丁语 *semulacre*, 16 世纪晚期开始出现在英语中, 它被用来描述艺术领域中的雕塑或绘画作品对真实事物的再现, 其含义指: “1. 事物的影像。2. a. 具有欺骗性的替代物; b. 只是假装的”^[1]。拟像概念在此后的使用中渐渐被用来指称相对于原本 (*original*) 而无深度、无特质的影像。传统形而上学试图通过理念来把握和再现客观世界, 这种二元结构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亦译“再现”、“表象”) 结构被看成是普遍的认知模式, 而那些具有差异性、无原本的拟像一直被排除在认知结构之外。20 世纪的西方哲学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把关于知识的探究转向对语言意义的追寻, 从而揭示了“表征的危机”, “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 怀疑这样所把握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 (*simulacrum*), 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可靠性”^[2]。法国思想家德勒兹 (*G. Deleuze*) 较早系统地阐述拟像概念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 鲍德里亚进一步以符号学的方法解读了拟像与历史进程, 勾画了一个由

拟像和符码包围的超现实世界,从而试图解构传统知识论的表征结构。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在鲍德里亚整体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毕晓普(R. Bishop)认为,“仿像作为波德里亚的最有名的理论概念,直接来自于他的长时间的对拟真和其诸多效能的研究。……对波德里亚来说,拟真是西方最有意义的概念之一,也是西方构造的最有意义的结构之一”^[3]。澳大利亚学者布特勒(R. Butler)1999年出版了《鲍德里亚:守护真实》一书,对鲍德里亚拟真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布特勒认为贯穿鲍德里亚整体思想的两条主线是拟真和诱惑,以及由两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双重化世界。他以拟真和诱惑这两个概念作为解读鲍德里亚整体理论体系的主要线索,而其中拟真概念是鲍德里亚理论至关重要的术语。在对拟真概念的理解上,其他研究者把拟真看成是一种幻相的形式,世界被影像所取代,所以我们经验到的不是原初性的事物,而是事物的复本。而布特勒却认为拟真不是要去除真实性,而是相反要实现真实性,使它成为真实^[4]。这意味着现实并没有在拟真中消失,现实只有以拟像化的形式才成为可能,现实变成了超现实。

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是鲍德里亚中后期思想的核心关键词,是其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探究和描述的主要线索,“‘拟象理论’无疑成为了‘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符码之一,同时亦成为了测度文化‘后现代性’的重要标准之一,从而也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内的中坚力量”^[5]。鲍德里亚的拟像一词既承自其导师列斐伏尔,也与德波的景观社会有关。拟像是围绕着世界的影像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它通常被看作是后现代社会通过大量复制和再生产出来的、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是一个“没有本

源、没有所指、没有根基”的“象”^[6]。鲍德里亚以拟像概念分析了从文艺复兴到现当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拟像发展的连续过程。这一进程的终点是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在这里,产品是由符码和模型不断地复制和再生产出来的,这就是拟真时代的超现实社会。拟真世界是拟像进程的结果,是对当代社会存在特征的一种断言。超现实概念是作为“真实”死亡之后的替代物出场的,它从根本上宣布了传统真实概念的解体。真实与超现实的转换意味着整个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第一节 西方哲学史中的拟像概念

拟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具有内在相似性的摹本表征着理念世界,虚假的影像由于对事物本质的歪曲和背离而遭到贬斥。尼采以权力意志颠覆了理念论,指证了拟像世界的真实性,然而他只是调换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固守着二元对立的表征模式,最终仍在一定意义上复活和完成了柏拉图主义。

一、理念论中的虚假影像

按照高宣扬先生的考察,拟像对应的希腊文词源 eidolon,“其原意一方面表示图像,另一方面又表示模拟。希腊原文来自两个词: eidos 和 eikon。前者指‘面向’和‘形式’,后者表示‘类似’或‘相像’”^[7]。实际上,这两个词都可以用来表示某物的一种形象,或是对某物进行的表征。柏拉图的理念”就包含着 eidos 之义,“看到的东”即形状,转义为灵魂所见的东西。在对理念进行表

征的过程中,柏拉图区分了与理念具有同一性的摹本和具有差异性的虚假影像。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事物的固有本质,具有绝对而永恒的真实性,自然界的具体事物是理念世界的表象(appearance),它通过对理念的分有和摹仿而存在。每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是分有它们的理念而来的,比如说衣服是美的、人是美的、画是美的,就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同一个理念——美。理念是绝对的、纯粹的,由其分有而来的事物是相对的,不完满的。理念是一种原本和模型(model),由分有而来的摹本(copy)是后生的、第二等级的产物。

具体事物还可以通过摹仿理念而存在。理念是事物的模型和范本,事物是理念的摹本,事物得以存在,是因为它摹仿了理念。柏拉图以“床”为例说明了事物对理念的摹仿,他区分了三种床:一种是由神创造的“床的理念”,是“一张本质的床,真正的床,床本身”;一种是工匠摹仿“床的理念”生产出具体的床,第三种是由艺术家摹仿具体的床而创作出来床的画像,“但它们都是影子,而不是实体和真相”^[8]。神创造了床及一切具体事物的本质,神是创造者;具体的床摹仿着床的理念,工匠是一个制造者,而画家远离了理念而以具体事物为描述对象,他是一个与本质隔着双重距离的模仿者。在知识的等级体系中,“床的理念”处于等级中的最高位置,是理念的知识或模型。由理念模型内在地生产出具体的床,这是一种“好的”摹本,它产生的即便不是知识,也是正确的意见。而在最后等级中,床的画像已经远离了作为事物本质的理念,“模仿术远离真相,而且这似乎正是它能制造一切的原因,因为它只触及或把握对象的一小部分,亦即触及对象的影像”^[9]。这是一种“坏的”摹本,它“注定带有贬义,它只是运用拟像而形成了相似性的外部的、无效用的结果”^[10]。

（一）摹本与拟像

柏拉图把理念作为第一原则来演绎具体事物,这种形而上学按照不同的等级来确定事物的位置,由此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等级体系。世上万事万物尽管形态各异、千奇百怪,但都只是理念的表征和本质的外现。理念的先在同一性(identity)保证了摹本的真实性,而分有者只有与理念相似或模仿理念时才有可能是真实的、合理的。这种同一性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相符,而且也是事物与理念在内在的、纯理智上的一致。与此相反,拟像的摹仿只是纯粹外在和偶然的,是人的感官如视觉、触觉等产生的效果。摹本是理念最切近的分有者,在模型的同一致性和摹本的相似性的保障下具有真实性。拟像是最低等级的分有和模仿,它意味着与理念的差异与背离,是一种虚假的影像。由此柏拉图把表象世界的“影像—偶像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摹本—形象,另一方面是拟像—幻影”^[11]。

拟像由于对理念的真实性形成威胁,它成为“一种已经剥离了相似性的妖魔般的影像”。对于理念—摹本—拟像,柏拉图要“摹本战胜拟像、压制拟像,使它完全沉没,防止它浮出水面”^[12]。由此在知识—苏格拉底—智者的关系中,柏拉图尊崇作为知识化身的苏格拉底,反对作为拟像存在的智者。在“床的理念”—具体的床—床的画像三者关系中,床的画像因其虚假和歪曲而受到贬斥,模仿而成的影像“既不可能拥有真知,也不可能拥有正确的意见”^[13]。

（二）驱除拟像

柏拉图把认知的外部对象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相当于可见世界,另一个部分相当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着实物和影像。实物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然物和全部人造物,影像首先指的是阴影,其次是水面和平面上反射出来的倒影。与存在秩序相对应的是人的认知结构,认识能力有四个方面,即理性、理智、信念

和想象,对应的认识对象有可知世界理念、数理对象和可见世界的具体事物和影像。理性和理智所认识的是超感性世界,形成了知识。信念和想象的认识对象是可见世界,它们是意见的来源。在可见世界里,信念通过感官认识具体事物而形成常识,而想象所认识的是由具体事物映照而成的影像,是层次最低的认识对象。在德勒兹看来,柏拉图的知识体系从作为原本的理念出发,把认识对象规划为不同分有者的等级秩序,在第二等级的分有者之后,还有第三等级、第四等级……的分有者。“在一个无限下降的过程之后,最终形成的只是一个拟像”^[14]。从理念中产生了摹本,再从摹本中产生出拟像。拟像是摹本的摹本,是无限褪色的影像。

相对应于知识等级体系,人的认识也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部分。在人的感性认识中,所有艺术形式(诗、舞蹈、表演艺术、电影等)的认识对象是“水中的影子或影像”,它们被囚禁在阴影和倒影的地牢里,没有一丝看见真理的可能性。可以看出,拟像概念已经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初现雏形,它是对具体事物的模仿而最终形成的一种虚假影像。拟像借助于感官而得到认知,从而注定是不确定和偶然的。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哲学家渴望的是真理和实在的全部知识,他们面对的是事物的本质形式,而不是拟像的世界。真正的哲学家不会借助感官去观察事物,而艺术家则是依赖于感官的体验,这种感官却只对应于灵魂中低劣的部分。最终,拟像在知识体系中受到贬斥,艺术家被逐出城邦。柏拉图坚持理念模型的同—性,强调了摹本与模型的一致性,拒斥拟像的差异性。由此柏拉图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哲学认识到自身是一个以理念为原本,生发出无数摹本—影像的表征世界。以同—性和相似性为基础的摹本表征着作为本质的理念世界,而具有差异性的拟像被排斥在外。以理念为世界万物的根基,并作为具体事物的存

在标准,这一思想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西方哲学的发展。

二、“偶像的黄昏”

宗教在创始之初就出现了上帝的拟像。犹太教区分了圣灵世界与世俗世界,物质现实作为一种影像,是圣灵世界的一种“好的”、映像式的摹本。而在教徒心中,画像、雕像等 eidolon(即拟像)逐渐取代了神灵,人们通过拟像来想象、沉思神灵的存在。这是一种邪恶的行为,是影像“妖魔”附身的结果。中世纪的整个基督教都与上帝影像的人化有关联。当时的基督教试图用拟像来取代上帝的存在,“崇拜圣像的拜占廷人都是狡猾的人,他们自称为了至高无上的荣光而代表上帝,可是他们却在影像中模拟上帝,以此掩盖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在每一幅影像的后面,上帝早已消失”^[15]。在上帝拟像化的过程中,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出来的,反过来人却也只能通过“上帝的形象”来了解自己的内在本质。德勒兹以早期的基督教传说阐述了神灵向拟像的转化。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赋予人类以理性、自由、智慧与永生。然而人类始祖亚当却违背教规,为了恶的目的而偷吃禁果,从而犯下原罪,人类从此只保留了外在影像却丢失了内在的相似性,“我们变成了拟像。我们失去了道德性存在而进入了审美性存在”^[16]。

近代哲学想要探寻思维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从而能够达到一种永恒真理。然而虚假的影像既萦绕于理性主体,又影响着有限的感觉经验,它们以怀疑论的面貌困扰着近代哲学对客观真理的寻求。笛卡儿设想了万能的理性主体,然而感官所提供的影像与外部事物是否相一致是无法证实的。感官所形成的影像是不确定、偶然的,而只有“我思”才是唯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思”要

求上帝来驱除感官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但是上帝只是一个拟像化的神,主体最终再次陷入拟像的偶然性和非同一性之中。经验论把我们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都归于感觉经验,然而休谟同样对外界事物在感官中产生的影像进行质疑。在休谟看来,人们总是假设感官所呈现出的那些影像就是外界的事物,然而事实上影像只是事物的一种表象。除了借助于感官在我们思维之中形成影像之外,任何事物都无法呈现于我们的心中。笛卡儿把对外界事物认知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求助于万能的上帝,休谟则尖锐地指出根本不存在上帝这样的保证者,理性的根源是无法认知和无法确证的。理性指向的外部现实最终将消失,只在记忆中留下对原本进行模仿的摹本。

尼采认为,基督教和近代哲学实质上都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因为不管是上帝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承诺了某种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因此西方两千多年的文明都是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神话的基础之上,并把这套神话作为自己的最高根据或终极目标。然而柏拉图主义神话的历史恰恰是一个“错误的历史”,一个“‘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17]的历史。

(一) 权力意志

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再到笛卡儿的主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些理论体系都构造了一个“超感性的世界”。尼采指出超感性的概念以抽象的精神压制具体的、鲜活的感官。尼采不无嘲讽地说形而上学“吞食感官,终则留下当当作响的骨”,即“哲学范畴、公式和措辞”。于是“几千年以来,哲学家所处理的一切,是概念木乃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活着逃离他们的魔爪”^[18]。形而上学对“真实世界”的孜孜以求,其背后深藏的是对权力的尊崇,是强求同一性并力图支配事物的权力意志。理念的

同一性遮蔽了主体的差异性,造成了对生命的否定和贬抑,要颠覆理念世界的至上地位,必须重新张扬生命感官的价值。尼采把展现人的生命力量的权力意志视为人的自然本质,视为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权力意志是在身体及其全部活动中爆发出的生命的肯定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它是导致世界生成最本质的因素,是事物存在最内在的根基。作为富有激情、感性和创造力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权力意志以事物的生成、运动和变化来否定凝固、永恒和静止的理念世界,它颠覆了理念、摹本和拟像之间的关系,完成了拟像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关系的反转。由感官生成的拟像世界现在拥有了自身的实在性,而彼岸世界的理念是否存在却是不可证明的,“认为‘此岸’世界是虚假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无法证明的”。柏拉图眼里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它纯粹是一种道德—视觉假象,因而,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世界”^[19]。

在尼采看来,以克服“谬误”、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哲学具有虚幻的本性。传统的形而上学轻视身体感官,视虚假的拟像为人类精神的瘟疫,因为它们是多变而不确定的,艺术也因其明显的虚构性而遭贬斥。而尼采认为,恰恰是拟像体现了存在之变易和不确定的本质,是通向“真实世界”的道路。因此,他断言艺术比哲学、道德和宗教更具有价值,并宣称以悲剧为代表的真正艺术展示了“我们的真理”。

(二) 解构同一性

传统形而上学强调在千姿百态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不变的、超验的本质,对超验世界的再现或表征形成了我们的感性世界,形成了理念之外的万事万物。超感性世界的同一性构成了“真实世界”的基础,而与理念存在着差异的拟像却成为一种幻影,被归入到“非

存在”的虚无之中。旧形而上学坚持同一性的表征原则,从而把世界分割成真实与虚假、本质与表象、上帝与恶魔的二元对立体系。

在尼采看来,坚持同一性的表征体系形成的“真实”其实是一种“伪造的真实”,是由理性、逻辑、概念虚构而成的真实。这种“伪造的真实”通过逻辑化的语言消除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虚构了事物的自身同一性。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要用一种永恒的本质来指称具体的对象是荒谬的。同一性哲学首先虚构了一个“纯粹、无欲、无痛、无时的认知主体”,这种具有理性的抽象主体表现为笛卡儿的“我思”和康德(I. Kant)的“统觉”。而尼采认为主体从来不是先在的、恒定的存在,他强调差异原则来对抗“自我”同一性的思想,事物本身绝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一种不断生成和变化着的差异。差异是自在的、本源的、自足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同一性是从差异性中衍生出来,是次要和从属的原则。具有差异性的拟像世界如黑暗中的光一样,虽然是一种非同一性的存在,却仍然照亮世间万物。

要打破同一性的表征结构,就必须强调拟像世界的差异性、可变性和多样性。柏拉图把理念世界称之为“真实世界”,与之相对立的是由感官主宰的“假象世界”。而在尼采看来,“距真实存在者越远,它就越纯、越美、越好”^[20],这意味着一种尺度的颠倒:在柏拉图那里仿佛处于低级位置、远离理念的拟像,现在必须被移到高级的位置上。拟像不再是一种无限下降的摹本,“它潜藏着一种肯定性的力量,能够否定原本与摹本、模型及其生产”^[21]。拟像的权力必须被选择、强化或重复,从而提升为“最高的肯定性权力”。对于艺术家来说,“表象不再是意味着对世界真相的否定”,而是一种选择、矫正、双重化和确证,从而真相即是表象,它“意味着实现权力,提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力”^[22]。

尼采以拟像世界颠覆了理念世界,他认为“现代思想是从表征的失败中诞生的,同时伴随同一性的丧失以及被表征的同一性压制下的所有力量的释放。现代世界是一个拟像的世界”^[23]。“要颠覆柏拉图主义就要提升拟像的地位,确认它对摹本和图像的权利”^[24],拟像和幻影凌驾于原本和影像之上,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失去了绝对的、超验的保证。这就是“偶像的黄昏”,偶像的终结就是拟像的黎明。由此尼采开启了“一条肯定感性领域因而也肯定非感性的精神世界的道路”^[25],一条重新建立感性和非感性之间等级秩序的道路。权力意志作为整个世界的本原性内核,生长、涌现出无数表面、外观、外表,即纯粹表象的拟像世界。虽然尼采颠覆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位置,他却却一直保留着真实世界和虚假世界的区分。在这里尼采落入了柏拉图的窠臼,他再一次把世界一分为二,开启了一种重新复原柏拉图主义的可能。对理念世界进行颠覆的同时也是复活甚至是完成了柏拉图主义。

三、表征的危机

表征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自古希腊起就引起哲学家的关注,“表征的问题贯穿于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整个哲学史”^[26]。Representation^[27]作为动词形态,它通常指“以一物代表另一物”的行为,通常被译为“表征”或“再现”,含有“相似”甚至“模仿”之意。艾布拉姆斯(Abrams)借用镜子和灯的比喻来生动地说明“表征”一词。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如果是“镜子”,那么心灵只是通过模仿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而“灯”则表明人的心灵不只是机械地映照外部世界,心灵的光芒还能照耀它所感知的事物^[28]。这一形象的比喻描述了表征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即从被动的、消极的映像工具,逐渐被一种活跃的、具有创造力的心灵的形象所取代。传统哲

学的二元模式预设了一个原本和中心,整个世界都是它的再现和延伸,表现为诸如理念与具体事物、理性与感性、心灵与自然等之间刻板的映像关系。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心灵的形象逐渐演变为词语、影像、符号、文本等多种形式。通过它们来观照外部现实,从而强烈地攻击以理念、理性和语词为中心的抽象统治,以各种方式消解二元对立的表征体系。

(一) 表征之路

希腊哲学追求思维逻辑与外在感性世界的同一,并把思维本身的客观必然性作为哲学的最高目标。这种模式将思维(精神)与存在(思维的外部)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并且在二者之间预设了一条天然的鸿沟。正是思维与存在之间这种无法逾越的距离,使得思维的功能就是要努力确保其本身能够表征或反映客观的外部世界。对外部世界的表征成为哲学的任务,也是一种经久不变的真理学说。哲学的任务在于追求具有必然性的真理,对于真理的探索本质上是以“思维形象”不断地表征客观世界。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经历“认识论转折”的西方哲学把认识过程看成是一种“表征的汇聚”(assemblage of representations):“去认识,就是去准确再现心以外的事物;因而去理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性质,就是去理解心灵在其中得以构成这些再现表象的方式”^[29]。认识就是主体以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等)去把握外在的客观世界。主体的心灵是一面可以映照外在世界的镜子,人类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自身的镜像式本质准确的映照周围的世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只有当客观的物质世界以某种形式被映像到人的理性主体之中时,人才有可能进行思维活动,这种思维的映像其实就是一种“再现活动”或“表征活动”。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传统哲学的

核心概念如“思维”、“意识”、“经验”等越来越被转变为实证科学的术语,形而上学的概念失去了神秘的色彩而成为可确证、可以量化的分析对象,从而促成了 20 世纪第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语言学转向”。以往哲学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主体的工具,被用来表达和表征自我的思想。在语言哲学的视野里,经验的可靠性、理性的认知能力以及二者的同一性问题都只是作为“语言逻辑分析”的结果,要准确地寻求和把握客观世界的真理就必须借助于语言的描述。“哲学首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任务,即意义分析……意义理论寻求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它是一切哲学的基础,而非如笛卡尔误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认识论”^[30]。语言学意义上的表征是各种概念和事物、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实际存在的事物,又能通过想象、虚构、符号来描述世界。“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它有两个相关的意义,其一是指表征某物即描述或摹状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在我们头脑和感官中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二是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31]。这种表征概念是与语言、文化中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和语言中的意义不在于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当中,也不在语言的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关于人类知识性质和范围等哲学问题现在被转化为有关意义生产的论述,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成为表征体系新的主人,语言的逻辑之真取代了客观世界之真成为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 表征的危机: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语言哲学促成 20 世纪哲学的深刻变革,它不仅讨论语言作为世界表征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问题,而且对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整个人类知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回溯整个哲学史的发展,表征危

机深层次地体现在对二元结构同一性的长久追问中,体现在表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上,“当今批判及文化理论的诸多重大发展,都是与表征危机联系在一起。词语、命题、思想和图像都是表征,它们表明了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如 X 代表 Y)。但一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必然以所表征事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把表征理解为对预先存在的现实的反映,将会误入歧途”^[32]。

海德格尔彰显了语言的存在论意义,并试图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分立体系。他将“言说”界定为“此在”(Dasein)的一种主要结构形式,而此在是一种“敞开状态”。此在的这种界定,把原先的那种二元对立消解了:人向世界开放,世界同时向人显露。从语词意义出发,传统认识论的真理问题被转化为存在问题来研究,“在最源始的意义上,真理乃是此在的展开状态”^[33]。语言从原先作为真理再现的媒介,跃居到一种“此在”的地位,呈现在人的面前。语言、诗、逻各斯被看成是与“存在”(Sein)并行而生、相互替换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认为,我们的语言、思想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按照语言的游戏规则进行的。如果我们试图追问它们的本质或真理,就将会陷入无止境的还原论泥沼之中。因此,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类似”取代了追求普遍本质和真理的传统哲学观念。无论是“语言是存在之家”命题,还是“语言游戏说”,都从语言学的立场批判了以逻辑和科学为基础的认识论体系。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渗透到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科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F. Saussure)完成了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样,索绪尔是改变了人们认识语言 and 知识方式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重新思考,对当代大

多数理论和哲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34]，他关于语言和符号的理论对当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的语言观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表现为声音或书写记号；所指是能指所表达的概念，是符号形式指称的意义。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具有任意性，因为我们说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35]。例如，在英语中，dog 这个声音指涉的是一种动物“狗”，而在西班牙语中，perro 这个声音指涉的也是“狗”。这些特殊声音与实际动物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其意义是由能指所处的整个语言系统所决定的。语言的意义不是由能指与所指之间严密的逻辑关联而产生，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是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符号的意义可以完全脱离所指，进而失去外部的指涉物。意义完全是由符号的能指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红”只能通过与“蓝”、“绿”等的对比才能清晰地表明它所指的意义；“存在”只在通过与“非存在”、“理念”、“上帝”等对比时才能表明其含义。由此对于符号意义的寻求不是探究它的所指和外部指涉物，而只能是一个以新的能指去取代旧能指的过程，最终意义的形成变成了能指之间的循环游戏。传统哲学以语言符号表征客观世界并生成意义的二元结构被打破了，从本质上来说，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意义也是滑动的、可变的。“传统形而上学视语言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使这面镜子不可回复地破碎了，换句话说，使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36]。

对于表征体系的挑战，存在主义的路径把语言看成存在之家，

表征的二元结构被融合为一体,而结构主义则把表征对象转移到语言结构内部,意义由符号结构的差异而形成,符号的差异性原则成为后现代主义对抗同一性原则的重要利器。在德勒兹看来,同一性是传统形而上学表征体系最重要的原则,“同一性的首要作用就在它界定了表征的世界”^[37]。柏拉图主义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表征哲学”,即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理念的表征,都是摹本或者拟像。近代哲学努力达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主体的自我同一性被延伸到整个外在的世界。遵循同一性原则的表征哲学,把每一种存在都看作是表征的产物,将客观世界的万千差异都还原为某个不动的“一”(理念、概念、语词等)。然而,近代科学的发展日益表明心灵并非一个镜像式的认识中介,它的感官认知受到了物质环境的影响,它的认识能力受到了偶然性、差异性的支配(如不同的自然条件、工具和主观的情绪、气质等)。因此,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绝对同一性只是一个神话,“它编织出来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有一种正确的观察和表征现实的方法。因此,与之对抗的方法就是:差异、他者、更替”^[38]。在德勒兹看来,设想在现实与表征之间只有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解方式是极其荒谬的,要打破同一性的表征结构,要推翻柏拉图主义、消解同一性的表征体系,就要使拟像拥有自己的权力。拟像不是理念的简单映像,它摆脱了同一性的束缚,却能实现真实的效果,“它是一种更加令人迷惑、头晕目眩的东西:相同、完全相似、酷似(丝毫不差)、面目极相似的(the doppe-langer)、具有绝妙的欺骗本领以至于人们难以分辨出骗子(诡辩家、撒旦、卢奇菲罗(Lucifer))和‘真实’(苏格拉底、上帝、基督)之间区别的光明天使”^[39]。拟像不是一个被贬低、被驱逐的影像,它同样具有相似性且面目更具有迷惑性;它不是依附于绝对的理念,而应该是具有自治能力的独立存在,能创造出一个存在差异、失去

原本的拟真世界取代二元对立的表征体系。拟像概念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的认知方式,“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简单的符号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关于‘拟像’的文化”^[40]。

(三) 表征与拟真

“后现代主义在从艺术到心理学的每一领域都碰到了表象危机,而且到处都在预告着‘表象秩序的终结’”^[41]。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表征体系在每一个领域中声名狼藉,作为表征秩序的代议制民主是异化的,表征艺术是无聊的,表征文学因对语言的任意操纵而变得庸俗,表征的历史是骗人的等等。后现代主义认为表征在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学和认识论上都是独断的,因为它意味着征服和统治。一些根本性的事物如观念、符号、上帝、宇宙、正义等是无法通过表征而实现的,因为它们依赖于某些荒谬的假定,假定了世界存在着终极的实在(real),“假定了某个摹本的有效性,而那个摹本只不过是一个模拟物(即拟像,笔者注),一个摹本的摹本,一个不存在原型的摹本”^[42]。而在鲍德里亚看来,作为表征根基的“实在”或原型是不存在的,它们只是人为制造的、没有原本的拟像,由此他以符号意指关系的任意性和差异性试图消解传统的表征结构。鲍德里亚把虚构的影像看成了反映并构建现实世界的主导因素,影像对现实的反映经历了四个阶段:

1. 影像是深度现实的反映;
2. 影像遮蔽了深度现实并使现实去本质化;
3. 影像遮蔽了现实的缺失;
4. 影像不再与任何现实发生关联,它是一个纯粹的拟像。

第一阶段可以认为是理念、理性和语言的表征阶段,影像与现实处于严格的对应关系,是“神圣秩序的完美表象”,影像、符号真实而准确地表征着现实事物。第二阶段是“邪恶的表象,表征着罪

恶秩序的现实”。影像和符号以虚假、歪曲的形式反映着现实,这是虚假的意识形态阶段,它通过制造种种虚假的表象阻止人们看到他们所遭受到的异化和剥削,屏蔽着真实的社会境况和社会关系。第三阶段是“魔法般秩序的表象”,现实消失了,只有影像取代了真实,这一阶段产生的就是拟像。虔诚的教徒敬仰上帝,然而上帝消失了,而留下的是教堂里的影像,人们变成了对上帝拟像的顶礼膜拜,“在内心深处,上帝从未出现,出现的只是拟像,甚至上帝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它自身的拟像”^[43]。拟像的产生可以看成是符号被解构的后果,能指脱离所指而成为自主的领域,能指之间的相互指涉取代了所指和外部指涉物,从而使符号成为一种拟像的存在。在第四阶段里,影像成为一个纯粹自主的拟像,它主导并生成了现实生活,这就是拟真的生活世界。此时符号不再表征任何现实,能指形成了一个与任何现实都不发生关联的、纯粹的拟像世界。符号的自我指涉可以再造出一种新的现实,我们进入了拟真的世界,“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44]。从反映、遮蔽现实到无所指涉、再造现实,符号的功能经历了关键性的转折。前一种是处于表征结构的符号,它是对深度现实的表征和遮蔽,它“意味着真理和巫术的神学”。而后一种符号结构的转换则开创了拟像和拟真的时代,符号的指涉消失了,“在这里,不再有自我确证的上帝,不再有末日审判来辨别真理与错误、真实与人造物”^[45]。鲍德里亚的拟像概念首先强调了与理念世界的差异性,是摹本的摹本,是感官的虚假影像。其次拟像是符号意指结构变化的结果,它消除了能指与所指、符号与外部指涉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号的意义、价值失去与所指和指涉物之间的关联,而只是来自于能指之间差异和对比。第三,拟像揭示了一种无原本的影像,它没有深层的

本质,没有内在的指涉,而完全是一种没深度、非本质的存在。

传统形而上学的表征结构坚持同一性原则,而把具有差异性的拟像看作“想象的幻影”,而归入到“非存在”的虚无之中,现实存在本身包含的那种无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完全磨灭了。后现代主义提升拟像以贬抑理念,强调差异以对抗同一,“主张表象总是不确定的,因为对被表象物的规定必然地取决于正在被表象之物和每一个他物之间的差异”^[46]。在鲍德里亚看来,表征结构设定所有的符号、语词和图像都对应着稳定的所指,它们在同一性原则的保证下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意义系统,“一个符号具有意义的深度,一个符号可以用来交换意义……符号与现实是等价的,即使是在理想的意义上”,“所有的西方信仰和正道都陷于这种表征的游戏中:即符号能够指向意义的深度,符号可以取代意义,而且这种交换是由上帝来保证的”^[47]。由此,表征被自然化和永恒化了,“这一自然化的过程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表征模式——即现实主义——的一贯支持。现实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一个文本或影像作品的形成过程,从而使得我们认为表征反映了世界,为认知一个可靠的世界打开了神秘之门”^[48]。表征将现实假设为先验的、给定的和不变的,从而造成了“对历史的抑制,对变化之可能性的抑制,对表征之所由产生和消费的特定文化语境的抑制”^[49]。最终,由于坚持现实的永恒不变,否定客观世界是人类特定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使现实主义的方法明显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表征是维护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手段:世界观要通过文化形成,并通过文化使自身合法化,进而约束它的接受者。当现实主义控制了表征这一人工制品之后,世界观的主要目标,就是以稳定意识形态的名义宣称自己是对世界客观而清晰的描绘”^[50]。

在鲍德里亚的中后期理论中,拟真与表征这两个术语是相互

对立的。在他考察拟像的发展过程中,其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完全自主的拟真世界。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拟真世界,数字技术、控制论科学、媒介传播等领域中那些具有差异的、无原本、无指涉(non-referential)的拟像不断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由拟真而产生的超现实世界消除或颠倒了真理与谬误、真实与虚假、原本与摹本之间的界限,无穷的差异和多样化对同一性的表征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鲍德里亚用拟真概念来描述不再由表征逻辑所统治的新的社会形态,在那里,拟像通过数字化、控制论而转化为超现实的世界。鲍德里亚描述的超现实世界“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表征与文化表征的问题……表征并非与‘事实’泾渭分明,更无对‘真实’的掩藏或扭曲,表征就是**事实本身**”^[51]。当语言不再指向一个稳定的意义,当一个独立的客体世界被编码和模型所定义时,表征体系已经被超越了。这样一来,任何一种想要揭示隐藏在拟像之下的现实的企图,都注定只是一个浪漫的幻想。

第二节 拟像与历史进程

在“拟真的秩序”一文中,鲍德里亚以历史的观点考察了拟像概念的谱系。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历史嬗变过程被勾勒为仿造(counterfeit)、生产和拟真三个阶段。这一崭新视角重新描述了西方现代世界的演化路径,同时也以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传统的表征体系向拟真世界的转化。按照张一兵先生的说法,这是鲍德里亚“原创性逻辑构境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用以重新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图景的全新理论筑模”^[52]。

“仿象的三个等级平行于价值规律的变化,它们从文艺复兴开始相继而来:

—仿造是从文化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

—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

—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

第一级仿像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像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像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53]。

一、仿造阶段

仿造阶段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工业革命时期,这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冲破封建秩序的束缚而发展起来的历史阶段。在封建社会和种姓社会里,到处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每一个物品作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被限定在等级体系之中,代表着特定的等级和品位。随着宗教特权和中世纪神学价值观的丧失,符号开始独立于自然之物并可以任意地模仿。由于仿造品的出现,代表社会地位的各种能指以替代品、模仿品的形式不断地繁衍,能指与所指之间对称关系走向终结,符号与社会所指之间紧密关联开始消除。仿造品破除了能指的神圣性和唯一性,把符号从严格一一对应的等级秩序中解放出来,“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符号从受限制的秩序中过渡到按需要进行生产,仿造品就是一种拟像的生产,“现代符号正是在‘自然’的仿像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54]。新兴的资产阶级想要以自己的意志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用符号制造术和仿造工艺来再生产出新的物品,从而使物品摆脱固有的意义指涉,进而消解旧的社会等级秩序。这种对建筑物、物品或艺术的拟像生产,代表着开创一种新世界的可能。

拟像并非仅仅是符号的游戏,它还代表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鲍德里亚举例说,耶稣教会力图通过上帝的拟像来控制 and 重

塑新的世界,而法国的雕塑家们用钢筋混凝土制造出仿造品。仿造品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现代世界与中世纪、封建社会决裂,它更是旨在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可控制的权力系统:“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伪造中,而不是在生产之中,证实了普遍控制和普遍霸权的相同设想,证实了一种社会纲领,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已经在这里深深地起作用了”^[55]。在表征体系主导的现代社会里,资产阶级已经通过仿造品在构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目标在于对社会的霸权和统治。在仿造物身上已经预示着社会控制的可能性,“仿造影响的只是实体和形式,还没有影响关系和结构,但它在这一层面上已经瞄准了对社会的控制,这个社会在一种逃离死亡的合成实体中被平定,被塑造:一种不可摧毁的假象将保证权力的永恒……这是一种政治和精神霸权的设想”^[56]。仿造的盛行不仅使能指(物品)与所指(社会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始消解,而且也意味着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产生。

二、生产阶段

工业革命的到来开启了拟像的第二阶段,此时产品通过大量的、无差别的复制被制造出来。随着工业机器的广泛运用,人们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中摆脱出来,转而把自然当作支配的对象。符号不再参照自然的法则,而是开始受制于市场的交换法则,受到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再生产成为工业时代的主导形式,此时的生产不再遵循“价值的自然法则”,而是被“价值的商业规律”即等价交换所制约。

生产阶段的再生产与仿造阶段的生产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再生产是系列的重复。再生产是“同一物品的连续重复”,是同一件物品纯粹的复制和繁衍。古典阶段的生产具有个体性,生产出

来的是独一无二的原本,而再生产出来的是原本的复制品,是被看作是由两个或 n 个相同客体构成的系列中的等同部分。物品的生产不再需要作为仿造对象的原本,原本与摹本之间是一种等价物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型与仿造的关系,既不再是类比,也不再是反映,而是等价关系,是无差异关系”^[57]。其次,系列的再生产导致了原本与摹本之间的差异消失了,这也是工业生产时代的重要特征。在系列生产中,原本的独特性、唯一性消失了,物品之间的关系是等价关系,是无差异关系。工业时代不再需要原本的唯一性,再生产“来源于技术,它们只在工业仿像的维度中才有意义”^[58]。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流水线生产。流水线的系列生产造成了模型和系列之间差异的消失,“在系列中,物体成为相互的无限仿像,而且生产物体的人也是如此。只有消除原型参照,才能带来普遍的等价法则,即生产的可能性本身”^[59]。失去原本的再生产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丢弃了仿造的对象,甚至与现实都不再有任何关联。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运用符号的结构在解读工业时代的生产过程,当再生产成为一种无限的复制过程,原本消失了,留下了摹本的无穷繁殖;所指解构了,留下了能指之间的游戏。

三、 拟真阶段

以拟像概念解读西方社会历史进程,鲍德里亚认为前现代社会处于仿造阶段,生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活动,而拟真无疑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从表征与拟真的关系来看,在仿造阶段里,物品在同一性的基础上表征着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在生产阶段,符号的不断扩张和延伸,作为表征物的能指开始脱离外部指涉物,无限的再生产使原本的消失成为可能;而在拟真时代,符号的外部指涉物消失了,以同一性为基础的表征结构被彻底消解了,我们进

入了以模型和符码为生成原则的拟真时代。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价值由生产过程所创造,劳动力的生产是价值的源泉,生产与价值、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仍然处于紧密的相互指涉之中。尽管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但他始终在能指与所指的框架里考察语言,强调符号的指涉系统对意义的重要作用,因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和索绪尔都“处在符号和真实的辩证法的黄金时期,这同时也是资本和价值的‘古典’时期”^[60]。而在拟真阶段,商品的价值规律被“价值的结构规律”所取代,生产是通过模型制造和编码功能而进行的,作为表征中介的语言、符号、影像等可以独立存在并自主运行,它们形成了封闭的价值体系,主宰着物品的存在和现实的生活世界。在鲍德里亚那里,拟真是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通道,在计算机、生物技术、信息方式、媒介、模型控制等高科技领域,拟真的符码和模型取代了生产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61],通过拟真而建构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第三节 后现代的“超现实”世界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对消费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已经从鲍德里亚的文本中消失了,而以拟像、拟真与超现实等概念为核心的后现代理论成为了他讨论的中心内容。在鲍德里亚看来,拟真是后现代社会面貌的主要特征,它借助模型和符码构建现实的经验结构,从而导致模型与实在、拟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了,拟真时代的现实生活被超现实所取代。超现实“是后现代

性的典型运作机制。在超级真实的领域内,仿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毁于‘内爆’,‘真实界’与‘想像界’也在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坍塌”^[62]。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是鲍德里亚中后期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他用于描述后现代社会的标志性话语。

一、“超现实”概念的缘起

“超现实”概念的最初含义与 20 世纪出现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63]思潮紧密相关。超现实主义的内容不仅限于文学,也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而且也涉及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社会问题,对传统艺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

超现实主义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费瑟斯通(M. Featherstone)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用生活之物或从生活中截取片段而形成其作品,实际上开始了艺术与日常生活边界的消除,从而开启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大门。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消解了经典艺术在审美和精神上的崇高性,另一方面又将生活中的平凡事物提升到艺术层次,从而使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看成是单调乏味、机械重复的过程,由此批判理论呼吁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审美化的生活复归。费瑟斯通通过考察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本身就表明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指向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分界的消失。他把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称之为“审美呈现”,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消除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其次,在价值关系上,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对抗性关

系消失了,人们按照艺术作品来规划自身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理念和样式越来越被转化为艺术作品。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突出地表现为符号和图像渗透入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费瑟斯通认为,要深入地解读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拜读鲍德里亚的论著,特别是他的《拟真》与《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中》这两本书。鲍德里亚这些论著的主题都在阐述着拟像对现实的遮蔽和取代的过程。鲍德里亚构建了一个由拟像构成的超现实世界,在那里,拟像成为主导原则,现实被重新塑造,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世界,“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64]。

如果说艺术理论阐述了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那么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则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媒介传播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他看来,“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65]。由此,鲍德里亚认为现实与艺术的融合,使我们进入一种超现实状态。真实与虚构、艺术与生活、美与丑、好与坏、所指与能指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由技术、媒介拟真所生产出来的拟像覆盖了整个现实世界,它取代了商品和影像而成为新的审美客体。

艺术形式扩散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为一种美学符号。审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而是扩展并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鲍德里亚说,“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级现实主义的。从前,超现

现实主义的秘密已经是最平庸的现实也可能成为超现实,但这仅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时刻,而且这些时刻仍然属于艺术和想象的范围。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66]。在鲍德里亚那里,超现实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后果,是由拟像取代真实,由符号、影像重构现实世界的一种崭新的日常生活形态。从这种视角出发,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无疑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最典型的体现,在那里拟真的空间成为构建城市、街道和社区的重要手法,钢板和铁架组成的一座座宏伟的展馆,图片、光线和影像在讲述一个个光鲜亮丽的城市空间,色彩斑斓的艺术作品搭构起了完全的生活世界,这俨然是一座后现代的艺术城堡,“后现代城市更多的是影像的城市,是文化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城市;它既是文化的消费中心又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中心……城市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与闲暇活动本身,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仿真趋势的影响”^[67]。

(二) 影像堆积的景观社会

日常生活审美化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来审视了新的社会现实,而德波所描绘的景观社会则从媒介影像对社会的影响这一角度来展现技术笼罩下的新生活场景。德波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本身就表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种表象。他敏锐地觉察到从现代社会“商品的堆积”转向后现代社会“景观的庞大堆聚”,而促使这种转变的就是电视、电影和出版业等媒介为主体的景观产业的兴起。工业时代的商品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于“媒介时代”的景观生产方式。

随着媒介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景观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

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68]。景观是消费社会主要的运作和操控机器,也是当代社会对主体进行麻痹的“鸦片”,同时它也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现实。景观构建了一个影像堆积而成的人造“第二自然”,它以无形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意识,改变着现实的面貌。詹姆逊(F. Jameson,亦译为“杰姆逊”、“詹明信”)认为,“在德波这本书中,商品和文化的关系得到更为明确的阐述:他宣布商品的最终形式最后证明只是形象本身,这样,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被转化为无数的类像,假像,所消费的是形象而不是物品”^[69]。

深受鲍德里亚思想影响的凯尔纳也阐述了媒介景观对当代美国社会主宰和控制。在美国人的生活里,“媒介景观已侵入到经验的每一个领域,从经济到文化,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和战争。进一步,景观文化还渗进新的赛博空间领域,这些新领域将促发出未来世界的多媒体景观和网络化的娱信社会”^[70]。景观生产与赛博空间、信息技术的紧密结合,成为超现实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影像与现实关系的四个阶段中,超现实形成于最后的拟真阶段,在那里影像不再与任何现实发生关联。这期间媒介是形成拟真的重要手段,电视的普及、电脑的盛行、互联网的兴起,各种影像生产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构成了新的景观,从而更为激进而彻底地消解了艺术、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使得超现实状况应运而生。

(三) 语言、符码对现实的重构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主体—语言—现实”三元关系论取代了传统哲学的“主体—现实”的二元关系论。这一理论转变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与客观现实之间失去了直接的关联,

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隔离带——语言。语言改变了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把握,进而直接构建了人类所能认知的新现实。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有形的‘现实’……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语言学的建构”^[71]。“现实”观念的语言学建构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鲍德里亚中后期思想关注媒介与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失去源本、无所指涉、虚假的拟像构成了对传统“现实”概念的强烈质疑。在今天,各种形式的拟像充斥于人类生活中,模型与符码被大量地复制,成为了超现实构成的主要元素。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具有自主性的技术和文化领域中模型和符码,从而导致艺术与生活、虚构与真实之间界限的消失,“所有领域的现实都已被一种新的现实取而代之。这种新现实完全是在符码元素的组合之中产生的”^[72]。

超现实概念由于对“现实”的质疑和重构,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最鲜明的、最具代表性的术语之一。莱昂认为,对于现实的理解和重构成为了后现代理论与传统理论最重要的区别。“后现代争论最基本的主题之一是围绕着现实性、或者现实性的缺失、或者多元现实性而展开”^[73]。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断言“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宣告了那些恒久不变的现实的瓦解。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则预示了后现代流动不羁的现实,而鲍德里亚则重构了一种“超现实”作为对后现代世界的生动描述。在詹姆逊看来,鲍德里亚的超现实理论既形成了对传统“现实”的挑战,又是后现代主义最具有批判力量的理论资源。他说:“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的复制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的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类像。所以,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正是在这里有着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最核心的道德、心理和

政治的批判力量”^[74]。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景观社会的出现,只是强调了艺术和媒介对现实的重大冲击,那么鲍德里亚则是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和媒介影像的支撑下重构了一个崭新的现实,这一现实是后现代世界的醒目标志,也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彻底断裂的分水岭,“通过拟真,他意指在电视、计算机赛博空间和虚拟现实中的‘拟真’现实的文化再现模式。在组织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有用性与他所确信的作为后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拟真之间,波德里亚的区分提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断裂,其断裂程度如同现代和前现代社会之间一样巨大”^[75]。

二、超现实的技术生成

超现实是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描述的基本视角,也是其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鲍德里亚不仅在消费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开始运用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概念,而且通过引入高科技的术语,在媒介与文化批判领域展开对这些概念的陈述。

拟真原是技术领域的术语,用来表现对系统或过程的再现或仿制。拟真技术一般利用模型(model,亦译为“模式”)再现实际系统中发生的本质过程。由此,作为拟真重要手段的模型,在鲍德里亚构建的拟真世界里具有本体的意义。甘恩认为“唯一一点与决定拟真秩序相联系的是‘模型’本身,它独立于任何出自有用世界的功能或目的。这是一个结构的价值规律的世界,主导性的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单一的大众生产。这里,模型替代了‘真实’、指涉,并成为‘指涉的能指’:由此内在差异的调节在客体中被再生产”^[76]。在鲍德里亚看来,拟真的世界是以模型先在为特征的。拟真是拟像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在那里现实的事物是从“模型的生成核心散射出来的”,“不再有第一级中那种对原型的仿造,也不

再有第二级中那种纯粹的系列：这里只有一些模式，所有形式都通过差异调节而出自这些模式”^[77]。在拟真进代，模型成为现实世界形成的重要来源和本质基础，它建构了后现代的生活境况，“我们处在拟真的逻辑之中，这里事实逻辑和理性法则没有任何关系。拟真是以**模型先行**特征的，模型几乎可以脱离事实——模型最先出现，它的运行就像炸弹的轨道，构成了事件形成的真正重力场”^[78]。

凯尔纳曾经批评鲍德里亚并没有对他的核心用语“符码”进行精确的定义，事实上如果纵观鲍德里亚整体理论，尤其是后期关于高科技领域术语的运用，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鲍德里亚是从生物技术和信息科学领域移用了符码一词，并把它作为拟真理论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基洛斯克(G. Genosko)指出，“在其最一般的含义上，符码是一种将各种稳定不变的术语集结合成信息的规则系统”^[79]。我们认为，模型是由符码调制并生成的，所有的模型最终都可以被还原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符码。符码是模型的最小单位，是超现实世界形成的母体，此时的现实就是“产生于细胞、母体、贮存器、控制模型的微型化——而且它能从这些当中被无限地再生产出来。……这种超现实是从没有空气的超空间中的混合模型中的一种发散性合成产生出来的”^[80]。随着人工符号系统、二元对立系统和组合逻辑演算中符码的出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被技术拟真和符码的自我指涉所形成的新现实所替代。技术的符码在各领域中广泛地运用，促成了一种新的现实的产生，这是在“通讯、自动化和系统理论方面发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直接生产出来的符号系统，并不是简单地**隐藏**(conconceal)现实，而是从大众传媒的特殊模型和方法、政治过程、遗传学、数字技术(cybernetics)中制造出现实来”^[81]，超现实就是高科技的符码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

DNA 是二元符码的第一种形式。20 世纪 50 年代, DNA 双螺旋结构被阐明, 揭开了生命科学的新篇章, 开创了科学技术的新时代。生物科学的研究表明, 地球上已知的所有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大部分是由 DNA 和 RNA 构成的, 他们的结构中包含着所有的生命信息并且一代代地复制和传递。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 也为鲍德里亚提供了形成拟真世界的模型之一。他认为 DNA 是拟真世界的先知, 在基因符码中拟像的起源找到了其完整的形式, “今天很清楚, 遗传密码应该被看成是所有符号网络的基础, 因此应该被看成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所使用的一切其他信号系统的原型”^[82]。鲍德里亚认为, DNA 是一种“预先程序化”的模型先行, 辩证法在这里失去作用了, 现在支配生命的是基因符码的非连续决定论, 目的论不再处于进化的终点, 而是预先被输入了符码。符码成为了超现实形成的关键法则, 它的各种元素排列、组合而形成了超现实世界。

二元符码的另一种形式是计算机存储器的符号操作, 是以“0”和“1”组合而成的数字性。电子计算机处理的信息都是仅用“0”和“1”的二进制编码进行表示和存储的。二进制的符码是数字化信息的最小单位, 这些符码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 它就像人体内的 DNA 一样, 通过 0/1 数字的编码和组合可以生成包括文字、符号、声音、图像等信息。在拟真阶段, 客体不仅仅通过机械技术而被生产, 而且也通过二元编码的可复制性而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拟真“是根据一种二元模式建立在客体可复制性的基础上。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电脑读取的数字编码, 数字编码将所有的问题和答案、所有的现实都转换成了 0 和 1 之间的一种二元对立”^[83]。不难看出, 通过对符码与拟真二者关系的阐述, 鲍德里亚的话语已经从符号学转向了生物与信息技术的控制论。符码的意义不仅停留

于符号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也深入遗传学、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之中。凯尔纳认为,鲍德里亚“运用了一系列理论话语和观点来阐明在当代世界中客体和境况的突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他大量地运用控制论的话语,并提出了新的后现代境况的控制论模式。这个话语中充满着大量的科学比喻(例如,黑洞、不规则破碎、DNA以及计算机术语),体现了对于当前世界的一种高科技的控制论的观点”^[84]。控制论不仅是一种关于信息和交流模式的理论,它更是把所有的生命——不管是动物、人类还是机器——都视为信息处置的机制。由此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取代了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而成为当今时代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中心纽带。在鲍德里亚中后期思想中,他“不仅将信息理论描绘成了交往的主导模式,他还将关于遗传性的假定和信息理论相结合植入到他对于当代文化的解读当中”^[85]。

三、超现实的特征与本质

希腊语中前缀“hyper”指的是“超过、过度、上方、过多”。超现实意味着一种比真实更为真实、比美者还要更美的事物。由拟真而成的超现实世界是一个按照模型和符码产生出来的真实,它是拟像历史进程的结果,“在这里自然世界和它所有的指涉物已经普遍地被技术和自我指涉符号所替代”^[86],由脱离了原本和现实的模型所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超现实的社会状况。在那里,符号、影像、符码和模型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它们具有独立的自主性,不再指向外部的任何客观现实,最终的结果是传统“现实”的死亡,而随之而来的是“超现实”时代的到来。鲍德里亚的超现实“在今天是幻觉的面目出现的,但也许再过几十年它们就会像大理石纪念碑那样可靠。技术的发展日益将现实从传统的可靠性和确定性的

观念中分离出来,这种状况无疑会持续下去”^[87]。

(一) 超现实的特征

第一,强调空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着思想家们开始关注空间在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纷纷从时空的转换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列斐伏尔始终把空间当作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指出新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都市空间的生产。詹姆逊也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现代本质上就是一种空间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物都空间化”^[88]。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里,资本的全球扩张使社会空间剧烈变化,全球化的、网络化的、多维的后现代空间取代了传统的城市、民族空间而成为新时代的主角。詹姆逊把这种后现代空间看成是传统思维无法准确理解的“超空间”。传统空间是具有一定结构和秩序并有明确定位的范畴,人们在其中能感受到事物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而后现代“超空间”则失去了组织性和结构性,人们身处其中却丧失定位能力,人的时间意识也丧失殆尽。

罗斯(M. Rose)认为,詹姆逊的“超空间”深受鲍德里亚超现实概念的影响,他认为詹姆逊“使用的词语‘超级空间’似乎可能更接近鲍德里亚的‘超级现实’概念”^[89],超现实是一个充斥着拟像和符码的空间,一个纯粹表象的空间。的确,超现实概念是与空间领域紧密联系的,1983年鲍德里亚在题为《超现实时代》的后现代论文集中写道:“心理上和精神上投射出的存在……从现在起被投射到了现实上,根本没有任何隐喻的意味,它们进入了一种绝对的空间,这空间同样也是拟形(即拟像,笔者注)的空间”^[90]。詹姆逊认为,超现实世界中的拟像逻辑乃是以空间而非时间为感知基础的,

这对传统“历史时间”的经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91]。在超现实的空间中，我们无法以感官系统来认知周边的一切，也不能准确把握自身在总体环境中的位置。社会空间和主体体验已经被技术所“座架”，被千篇一律地机械化和虚拟化，这是由技术所产生的新的后现代世界：“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92]。

第二，平面的无深度。鲍德里亚所阐述的拟像世界是一个没有原本和外部指涉物的后现代世界，由拟像产生的超现实也意味着平面而无深度，拟像“通过伪装其自身的存在，挑战客观性、真理和现实；而这种超现实中复制形成的‘现实’，则似乎较现实本身更加真实。根据超现实的逻辑，只有仿像而根本没有‘现实’”^[93]。在超现实世界里，能指与所指失去了关联，由影像、能指形成了一个自主的领域，由此导致社会生活中现实感的消失。所指的消失，使得拟像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指涉关系，这也意味着超现实是一种平面的、无深度的、浅薄的存现方式。在詹姆逊看来，这种平面的无深度首先体现在是空间深度的消失，超现实是一个无中心的、零散的、碎片化的世界；其次是时间深度的消失，时间消融在空间中，历史意识被淹没了，“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94]；最后是阐释深度的消失，在辩证法、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符号学四种阐释模式之后，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符号的能指/所指之

间的对应关系,以失去原本的拟像来构建新的现实世界。

在詹姆逊看来,现代主义所运用的是“摹仿法”(parody),其目的是实现对理性、价值等的把握和表征,而后现代主义的拟像所运用的方法是“拼凑”(pastiche)法,远离了作为表征对象的一切实体,“拼凑是一种空心的摹仿——一尊被挖掉眼睛的雕塑”^[95]。深度的消失使批判的距离被遗弃了,随着超现实的到来,文化的自主性消失,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96]。费瑟斯通也指出,詹姆逊对于后现代的描述受到了鲍德里亚的影响,超现实世界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与影像流动的无深度的文化中……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以美学化的幻觉看着无穷无尽的符号之流”^[97]。

第三,可控性。超现实以技术的高度发达为基础,并大量地运用了当代控制论的话语。在超现实的生成过程中,模型和符码的支配作用不仅仅局限在拟真的实验室,而且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鲍德里亚早期理论从消费行为的角度考察了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那么在关注技术发展的中后期思想中,他把信息理论看成当代社会交往的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交往被还原为一种信息交换,而信息是由一系列可以简化为0/1的二元字节所组成。这种二元符码不仅仅与语言学、符号学相关联,更是一种生物遗传学和控制论的话语,从而使交往从一种意义的交换转化为单向的信息传输,而信息的传输却完全受到系统的控制。在符码控制论的基础上,交往从意义的沟通转向了信息的控制。不难看出,鲍德里亚中后期思想的重点从消费社会的符号学分析转向了由控制论主导的超现实世界的阐述,也是从

拟像的第二阶段(生产阶段)到第三阶段(拟真阶段)的转变。这种理论试图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成不再单纯依赖于物质生产和交换,而更多借助于信息符码的传递。符码的传输和控制成为社会运行和控制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一个“新资本主义控制论的秩序”。

(二) 拟真的本质:符码的形而上学

鲍德里亚将拟像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仿造阶段的特征是摹本与原本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生产阶段的系列再生产逐渐消除了摹本与原本之间的同一性,而在拟真阶段,原本消失了,存在的是符码生成的、没有原本的超现实。拟真借助于符码而形成,它本质上是一种没有原本、失去指涉的创造物。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还是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体,抑或当代语言哲学的逻辑之真,它们构建的真实世界都消失在鲍德里亚的超现实之中,并且能够通过生物技术的DNA和信息科学的二元数字而重新合成。莱布尼茨在神秘而优美的0/1二进制系统中看到了宇宙创世的原初图景。而鲍德里亚把这种二进制具体化为生物学的DNA和计算机中的符码操作,这种二元编码成为高科技时代新的造物主。在超现实的世界里,“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死亡的讽喻,但它也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变得巩固,变成一种为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98]。传统形而上学的表征结构不复存在了,理念与表象、符号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消失了,作为表征对象的上帝、自然、意义、人等也不再是真实的,存在的只有没有原本的各种模型和符码。

拟真世界的深层根源是没有原本的符码,由此形成一种新的

“非决定论和符码的形而上学”。鲍德里亚认为：“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像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向力量和张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结构和二元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非决定论和代码的形而上学”^[99]。对应于拟像的三个历史阶段，仿造阶段是存在与表象的二元对立，生产阶段是寻求确定性的真理和语言的形而上学。而拟真时代则是一种符码的形而上学，它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变革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从最小的选言单位(问/答粒子)到那些管理着经济、政治、世界同存共处的巨大轮换系统的宏观层面，母型都没有变化：永远是0/1，永远是二元格律划分，它以目前系统的亚稳或动态平衡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那些统治着我们的仿真过程的核心”^[100]。一切社会现实、历史的辩证发展都可以在拟真的模型中找到它的雏形，“一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在生物化学中具体化，支配这一社会秩序的是某种遗传密码、巨型分子计算以及用自己的操作网络连通社会的‘计划编码预算系统’”^[101]。超现实是二元符码的复制品和衍生物，在这里符码成为了拟真和超现实的本源性存在，由此鲍德里亚再次落入了二元表征的结构之中，在试图消解旧形而上学的同时，却重新构建了新的“符码的形而上学”。可见，鲍德里亚“对形而上学和‘真实’概念进行后结构主义批判之后，又出现了向形而上学的回归，这是巨大的反讽。事实上，鲍德里亚提供了一个哲学史上最具有讽刺性的形而上学”^[102]。

超现实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面貌，它强调技术与媒介等因素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这些要素延伸了人类的生活空间，改变了社会的生存状况和运行方式。然而应该看到，超现实世界的形成是以物质现实为基础的，超现实离不开现存的生活世界。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物质生产实践在整个社会生

活中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由它形成客观的物质现实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首先,超现实世界所依赖的技术环境本身是物质性的。不管符码和影像如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然而这些超现实终归要借助于信息网络的各种设备,要依赖于电脑、因特网、电话线等等诸多电子设备。因特网作为一个广延物体,无论其构型是多么复杂,它仍由各种物质客体——电脑、电话线、通讯卫星和电缆线所构成。其次,物质现实是超现实世界赖以形成的源头,为超现实准备了必要的主体条件和物质内容。超现实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和样式,它的出现并不是与物质现实的一种割裂,而是始终以物质现实作为前提和基础,超现实的存在和延续不能脱离物质现实。事实上,超现实本身就是物质现实的摹写、复制和超越,超现实世界的各种属性都来源于物质现实生活,它是对物质现实的转录和反映。最后,就其本质而言,超现实对物质现实的超越和重塑无非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人脑延伸而形成的结果。超现实展现了物质现实的一种新的属性和特征,而这些特征本质上仍然依赖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扩展和延伸。

四、超现实概念的意义与局限

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描绘了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新面貌,着重关注了媒介和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消解了传统哲学表征体系的二元分立,因此它成为“解释大众传媒和西方认识论传统的危机同步增长而产生的诸多现象的一种理论。也就是说,超现实之所以是对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抨击,恰恰因为它植根于客观的、科学的现实,以及对这种现实主观的、虚幻的模仿二者之间的分化之上”^[103]。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一直努力消解客观

与主观、理念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分立,而超现实概念强调了符号、符码和模型在塑造现实世界的首要作用,试图消解表征之外的非同一性,“消除了现实和幻象之间人为的界线。没有这种界线,也就没有必要调节与原初事物相对立的仿像,现实也就没有必要在一种理性主义话语当中确证其自身”^[104]。

首先,“超现实”反映了技术革新对于社会的深刻影响。由数字信息技术和生物 DNA 技术所构造的新的经验事实广泛地渗透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新的拟真产品对传统观念形成了尖锐的质疑。虚拟世界、人造物、合成物、拟像物与现实事物无法区分,超现实比现实更为真实、更加生动。从而,“技术的发展不断表明,我们的日常存在大都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电脑模拟的影像、虚幻的经验和互动形式(倾向于取代那种面对面接触的现实)交织在一起”^[105]。超现实成为高技术影响下人类新的生活现状,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力图呈现的新的社会现实。

其次,“超现实”一词关注着经济基础中生产方式的变化。超现实世界的形成表明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转向以信息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商品社会向符号社会的过渡。在超现实世界里,真实与虚假、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从而“各种文化产品、形象、表现方式、甚至感觉和心理结构都已成为经济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再可能将经济或生产领域与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106]。马克思所划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已经融合在超现实的世界里,物质基础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被消除。

再次,“超现实”概念集中地体现了当代媒介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性后果。大众媒介是 20 世纪晚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之一,在媒介包围下的当代社会,我们受制于媒介所营造的、被符

码操控的“超现实”世界,超现实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状况。鲍德里亚把媒介看成是超现实世界形成的主要机器,超现实境况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并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社会控制模型”。基于媒介在超现实形成中的作用,鲍德里亚甚至荒诞地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因为战争的进程是在媒介大量参与、引导下展开并在镜头中呈现出来的。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不仅改变着现实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的认知和意识。

最后,超现实既是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又是鲍德里亚展开其批判理论的历史场景。他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分析中,“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表层外观和生态境况是超现实的,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是通过模型再生产出来,并被组织起来进入模型和符码的系统中”^[107],从而使超现实概念成为批判理论运用和展开的独特视角与主要线索。

在结合了技术、文化、经济等多元要素的后现代描述中,鲍德里亚用“超现实”概念来阐述当代西方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后现代理论中别具一格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从新的视角阐述后现代世界,并试图对大众媒体、信息系统等这些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之性质的新型统治方式进行理论阐述。在电子信息、互联网、电视屏幕、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作用下,“我们的秩序已经完全改变了:从人行道到交通、从汽车到荧屏,从拱廊到你的遐思,从停滞到飞速。你的后现代移动/内在的凝视定格在内心变幻无常的场景上——一个超现实的奇观社会”。在超现实的世界里,“物质世界与虚构世界的统一,荧屏空间与街道空间的统一,是我们只有现在才遭遇的后现代状况的一部分”^[108]。超现实体现了虚构与物质世界的融合,展示

了后现代的“超空间”、“时空压缩”的特点,更为立体和多维地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从而为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提供了现实基础。

然而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分析的崭新视角,超现实概念强调了模型和符码在技术领域中的本源性作用,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物质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由于超现实的形成依赖于高科技的各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沦为一种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此外,这一概念也夸大了媒介和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事实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仍然依赖于最简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衣食住行等仍然构成了人类生存最本质的现实;而在物质的生产过程中,尽管模型、符码等技术手段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的劳动依旧是价值生产的唯一来源,机器、厂房仍然是离不开的物质现实。超现实只是准确地描述了高科技影响下现代生活的一个新特征,它既不能代表真实生活的全部,更不能成为指称社会面貌特征的惟一用语。

注 释

- [1] 《牛津英语图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73 页。
- [2]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75 页。
- [3] 毕晓普:《波德里亚、死亡与冷战理论》,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戴阿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 页。
- [4] 参见 Rex Butler, *Jean Baudrillard: The Defence of the Real*, Sage, 1999, p. 17。
- [5] 刘悦笛:《导读:鲍德里亚的思想谱系》,载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 [6]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第 267 页。
- [7] 高宣扬:《让·波德里亚论“拟像”和消费社会》,载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

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557—558 页。

- [8]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614—615 页。
- [9] 同上书, 第 617 页。
- [10]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58.
- [11] Ibid., p. 256.
- [12]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p. 257.
- [13]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王晓朝译, 第 623 页。
- [14]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p. 255.
- [15] 博德里亚尔:《完美罪行》, 王为民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9 页。
- [16]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p. 257.
- [17] 尼采:《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李超杰译,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第 29 页。
- [18] 同上书, 第 21 页。
- [19] 同上书, 第 27 页。
- [20] 海德格尔:《尼采》, 孙周兴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69 页。
- [21]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p. 262.
- [22]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 周颖、刘玉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50 页。
- [23]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ii.
- [24]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p. 262.
- [25] 海德格尔:《尼采》, 第 231 页。
- [26]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 章燕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17 页。
- [27] “Representation”一词在引文中也译为“表现”、“表象”、“呈现”、“再现”等。
- [28]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 张卫东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0 页。
- [29]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 李幼蒸译,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1 页。
- [30] 同上书, 第 229—230 页。
- [31] 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徐亮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6 页。
- [32]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 第 40 页。
- [3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等译,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第 268 页。

- [34]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446 页。
- [3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刘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2 页。
- [36]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第 40—41 页。
- [37]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p. xii.
- [38]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 47 页。
- [39]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451 页。
- [40]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0 页。
- [41] 罗斯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0 页。
- [42] 同上。
- [43]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4.
- [44] 博德里亚尔:《完美罪行》,第 8 页。
- [45]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6.
- [46] 罗斯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第 144 页。
- [47]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5.
- [48]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 41 页。
- [49] 同上。
- [50] 同上。
- [51]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 236 页。
- [52]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400 页。
- [53]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67 页。
- [54] 同上书,第 69 页。
- [55] 同上书,第 71 页。
- [56] 同上书,第 72 页。
- [57] 同上书,第 76 页。
- [58] 同上。
- [59] 同上。
- [60] 同上书,第 5 页。
- [61]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53 页。
- [62]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 230 页。

- [63] 鲍德里亚对“hyperrealism”和“surrealism”两个词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词中文翻译都是“超现实主义”。但两者着重点并不相同,“surrealism”主要指先锋艺术对现实的超越和剥离,而“hyperrealism”更强调高科技和媒介对现实的否定和重构。
- [64]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8 页。
- [65]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99 页。
- [66]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108 页。
- [67]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145 页。
- [68] 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 [69]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0 页。
- [70] 转引自金惠敏:《媒介的后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 页。
- [71] 纳托利:《后现代性导论》,杨道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 [72] 转引自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张鲲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335 页。
- [73] 莱昂:《后现代性》,第 15 页。
- [74]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 219—220 页。
- [75] 凯尔纳:《让·波德里亚(1929—2007)》,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1 页。
- [76] 转引自戴阿宝:《终结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3 页。
- [77]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78 页。
- [78]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16.
- [79] Gary Genosko, *Baudrillard and Sign: Signification Ablaze*, Routledge, 1994, p. 36.
- [80]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2.
- [81] 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 页。
- [82] 转引自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83 页。
- [83] 休恩梅克:《资本主义与编码:对波德里亚第三秩序拟像的批判》,载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32—233 页。
- [84]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8 页。

- [85] 索查克:《符号学、控制论与市场营销交往的狂热》,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29 页。
- [86]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7 页。
- [87]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 202 页。
- [88]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93 页。
- [89] 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张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 页。
- [90] 转引自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第 91 页。
- [91]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8 页。
- [92]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 292—293 页。
- [93]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228 页。
- [94]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 205 页。
- [95]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 453 页。
- [96] 同上书,第 505 页。
- [97] 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2 页。
- [98]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105 页。
- [99] 同上书,第 80 页。
- [100] 同上书,第 100 页。
- [101] 同上书,第 84 页。
- [102]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3.
- [103]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229 页。
- [104] 同上。
- [105]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 201 页。
- [106] 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论》,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2 页。
- [107]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3.
- [108] 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4 页。

第二章

消费社会批判——一种后现代的视角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化,促使西方社会科学对于崭新的社会面貌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理论家们创造了各种术语,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等概括时代的新特征。消费社会理论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学术思潮之一,它成为人们理解现代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重要话语系统。鲍德里亚是消费社会理论思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理论在新世纪的近十年里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曾经是哲学与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鲍德里亚前期三部主要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围绕着消费社会理论而展开,其中不仅大量地使用了符号学的方法,而且也开始运用和阐述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概念。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操控下的消费社会具有超现实的特征,影像和符码的组合和传播形成的一个脱离现实的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符号学解读中,失去指涉物的拟像同样运用于对商品、需要和价值等概念的解读中,商品失去了使用价值的内在指

涉而成为空洞的符号；需要与人的生理属性失去关联，成为社会的造物；使用价值脱离物品的自然属性，而开始指向社会地位和差异意义；价值不再由劳动生产所创造，而是由符码的编程和组合而产生。鲍德里亚从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概念重新理解消费社会，揭示一个被符号、影像所笼罩的新型社会形态，并在这一超现实的世界里阐述消费活动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鲍德里亚早期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崭新的时代话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消费社会的符码体系

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消费看作是从属于生产的一个环节，“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1]。在物品丰盛的当代社会里，消费取代了生产活动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法则，成为经济发展中巨大的动力引擎。人的消费活动不只是简单地对产品的占有和享受，而是通过消费展示出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主体以消费对象和活动来确认个人的身份，来展示并实现自己的价值。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被演化成“我买故我在”，主体通过消费这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实现自由、个性的理想，“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2]。消费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改变着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不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生产型社会，而是进入了物的时代，进入了消费社会。

一、符号学方法的运用

符号学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符号形态，把语言结构看成是

人们理解各种理论话语的主要模式。美国的皮尔士(C. Peirce)和瑞士的索绪尔是符号学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为符号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皮尔士着重关注符号与意义、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研究了符号结构和意指过程,其理论成果对逻辑语言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索绪尔则认为符号的意义是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功能,他认为符号不是一个具体的词语或对象,而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它们通过文化传统而被任意地编码到语言体系当中。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直接推动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源泉。

巴尔特(R. Barthes)被认为是把符号学引入社会文化实践分析的先驱,他“经常被视为符号学真正创始人。从这场讨论的观点来看,巴尔特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将索绪尔的观点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3]。巴尔特将符号学看作是意识形态批判最为根本的方法,并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称为“神话学”。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并对大众文化进行解码,巴尔特分析了时装、广告、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等各种“神话”是如何将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文化伪装成一种普遍的、自然的社会观念。神话学的作用就是将社会历史进程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现象,从而掩盖了社会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运用符号的结构,巴尔特解析了神话学的运作机制并构造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意指系统:

1. 能指	2. 所指	
3. 符号 I. 能指		II. 所指
III. 符号		

日常生活的言谈处于第一层次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相互关联。而符号又构成了第二层次的能指,在这一层次中符号(Ⅲ)才完成整个意识形态的意指过程。第一意指系统是“直接意指”,而第二意指系统为“含蓄意指”。以遍行全球的可口可乐饮料为例,它通常与果汁、绿茶、矿泉水等处于同一个饮料系统中,并且因为是一种口味特殊的碳酸饮料而获得差异性的意义。这是在表层意义中符号的作用,然而在更深层的符号系统中,如在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美国商业文化的意义系统中,可口可乐又指向“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甚至是“文化帝国主义”等含义。通过符号的多层意指,巴尔特论证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反,符号自身可以作为神话体系的一种能指,服务于更为复杂的神话体系。借助于符号能指/所指关系的多重转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被层层隐蔽了。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对符号的操控而形成的神话体系,只有通过符号的解码才能揭示大众文化中的符号运行机制和意识形态本质。

符号学的运用可以追溯到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经巴尔特对社会现象的成功分析,最终演变成一套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方法论系统。巴尔特对文化现象的符号学分析直接影响着鲍德里亚早期思想。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中的物品系统已经演变为一个符号系统,而消费是进入符号系统的唯一途径。因此,只有运用符号学的方法才能理解和揭示消费社会的本质,并由此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事实上,鲍德里亚本身就是巴尔特符号学课程的忠实听众。1962—1963年巴尔特在法国高等实践学院开设“当代符号意义组构系统目录:物的体系”的讨论课程,鲍德里亚就是参加讨论课的成员之一。鲍德里亚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在60年代,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就是巴尔特。我找到了巴

尔特,而且和他一起工作,立即发现更为有趣。……巴尔特提供了一个未经探索的处女地。从那时开始,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改变”^[4]。鲍德里亚的第一部作品《物体系》可以看成是对巴尔特作品《流行体系》的一种延续,他构建的所谓“物体系”就深受巴尔特思想的影响。在书中他也多次引用和发展巴尔特的思想,试图在消费的符号系统中揭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功能性体系与符号体系

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的物品体系是由技术和文化两重维度所构成。技术结构的变迁反映了物品日益功能化趋势,文化维度则是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等组合的结果。

(一) 功能性体系

古典时期的物品摆设附着着浓厚的家庭情感关系,物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并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例如家具的陈设表达着一个家庭的品位和历史,具有一定的风格和个性。而在现代家庭里,物品失去了原先的深度和象征意义,被抽象为同质的事物。物品不再承载任何历史和文化,它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功能性。物品之间完全是按照功能或技术的原则而组织和陈列起来的,这种组织方式被称为物的技术组织,由此形成的是物的技术世界。随着功能化时代的到来,物品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不再有直接关联,“在两者间插入一个可操弄的记号构成的抽象体系来完成这个联结:功能性”^[5]。不仅如此,物品的功能性逐渐脱离了自身单一的使用价值,而是依赖于整体的功能性体系,在社会的物品体系中才凸显其用途和价值,“‘功能化’丝毫不代表适应一个目的,而是代表适应一个体制或一个系统: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6]。物品只有借助于功能性体系的中介才能

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只有以全套或整体的形式才能被人们所认可和消费。功能性是对于物品实际功能的一种抽象,借助于此,整个社会稳定运行而人们之间相互关联,“被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系统和资产阶级的个体、物品、交换系统所支配的真实,在不断增强的紧张中,被由功能性理念所驱动的抽象系统所替代”^[7]。物品被抽象为一种功能,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被无形的、抽象的功能体系所主宰。

(二) 符号体系

如果说功能性体系代表着物品的技术结构,那么物品所处的氛围则展现出系统的文化维度,“回应系统化的技术性,正是系统化的文化性。而在物的层次,这个系统化的文化性,便是我们所称的气氛”^[8]。鲍德里亚以室内环境材料为例,在家居的各种材料当中,自然材料(如羊毛、棉花、丝绸、木头、金属等)逐渐被人工的合成材料(如化纤、玻璃、塑料等)所取代,自然材料与合成材料毫无差别地被使用,“作为文化记号而言,这些本身异质多元的材质已成为同质,它们也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具有严密一致性的系统。抽象化过程使得它们彼此之间的无限组合成为可能”^[9]。物品具有的文化氛围是对其功能性体系的一种超越,从而使物品具有作为文化意义和象征功能的价值。最终文化被整合到符号体系中,人们生活环境的气氛就是以整体的方式进入到符号体系中。物品体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不是来自于自然和技术,而是存在于一个由符号组成的文化体系之中。

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鲍德里亚阐述了当代社会里由物品所构成的符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品的功能性和意义不再由它们的用途来决定,而是由它们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所产生。索绪尔认为,在语言体系里符号的意义并非指向外部的现实世界,同样

在物品体系里功能和用途不再与使用者的自然需要相关联,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所规定,因此物品体系成为一个生成意义的符号体系。物品在符号体系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原有的自然性功能被文化—符号的外衣所遮蔽,它成为划分社会等级、表征阶级区分的手段。物品转化为符号并主导着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对我们来说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为我们时代贴上消费符号标签的,恰恰是这种原始层面被普遍重组为一种符号系统,而看起来这一系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有模式,也许就是从自然天性过渡到我们时代文化的那种特有模式”^[10]。

三、 消费的定义

随着物品转化为符号,消费的对象从物质性的实体转变成抽象的社会意义,由此鲍德里亚开始从符号学的视角重新对消费进行定义。

首先,消费是一个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物品的极大丰盛和需要的满足只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前提,它不是构建消费概念的充分条件。只有在物品的符号体系中,消费才能体现其真正的意义关系并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符号实践,消费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鲍德里亚认为在物品体系的符号操作中,消费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它是建立在对各个符码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这便是消费的结构”^[11]。例如在汽车品牌体系中,从奔驰、宝马、奥迪到国产的比亚迪、奇瑞等品牌,它们共同形成一个系列,每一个标识都是体系中的符码。消费者通过对符码的占有而确认了在体系中位置

并展现出社会地位的差异。消费实际上是对符码进行解读和接收的过程,是通过符码而确认自己的社会位置并进入到社会区分系统中的活动。可见,消费是

“1. 作为建立在在一个密码(即符码,笔者注)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实际消费行为能够在其中得以实现并具有应有的意义。在这里,消费是一种交流体系,而且是一种语言的等价物。……

2. 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物和符号在这里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顺序排列于密码之中,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12]。

其次,消费是当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方式,是一种新的交流体系。在符号体系中,消费是对符码的占有,是对意义的编码。人们通过消费彼此区分,并以符码为中介而相互交往。消费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道德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作为交流体系的消费行为不是一种对物品自然性的消耗,也不是自娱自乐式的独自占有,“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这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这一幻觉受到所有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13]。因此,消费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主动模式,它不仅仅表明了人与物品之间的占有和使用关系,而且也构建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次,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符号成为人们之间社会交往和生产关系新的中介体系。物品转化为体系中的符号,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生产关系的作用被消费关系所取代。马克思认为,物品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中介,需要、情感、文化、知

识和人自身所有力量可以通过生产过程被整合为商品。而在当今时代,所有的欲望、计划、激情和关系都被抽象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整个的人类经验还可以被抽象而放入符号系统,以便它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一非常重要的例子是广告、电视商场和电影。符号和图像王国便利了抽象关系的消费”^[14]。符号所标识的差异和区分的意义成为消费活动的目标,更成为形成社会关系、维系社会运行的基础,“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15]。作为消费对象的是关系的理念,是在符号体系中呈现出来符码的意义。消费作为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整合成一个可控制的完整体系。

第二节 消费社会与超现实

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是鲍德里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讨论的话题之一,然而在早期的消费社会理论中,他已经开始逐渐使用这些概念来说明当今时代的崭新特征。在符号、影像主导下的消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现实”,媒介“通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16]。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由技术主导的“模型范例”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拟真进程”,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现实”。在这种新的超现实时代中,商品的生产过程被演变为符号和拟像的再生产,物品成为符号体系中的一个符码,而消费者的需要被生产体系所操控并成为了一种“虚假的需要”。

一、媒介操控的“伪现实”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媒介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媒介笼罩下的当代社会,既不是现实也不是影像,而是一种拟真。媒介通过影像和符码的大量生产,制造了现实生活的替代场景,从而形成一种“伪现实”。我们生活在“真实被否定”的世界里,每一种媒介所传播的信息都经过剪辑和过滤,“文化,和‘新闻’中的伪事件一样,和广告中的伪物品一样,可以(很可能已经是这样了)根据媒介自身、根据一些参照规则被制造出来”^[17]。消费社会成为一个由媒介支配的世界,一个受符码的运作逻辑所主宰的空间。媒介对现实进行重新塑造并形成一个拟真世界,“透过臆象、透过炫耀的模拟(即拟真,笔者注)发挥着作用,这种模拟总是建立在一种对现实的幻想基础上的——现实在这里成了对本真的物化和颠倒”^[18]。

电视广告是当今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也是消费社会一种典型的拟像形式。电视广告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制作出大量的影像和符号,并使这些能指形式失去与所指的关联,成为一个自主指涉的能指链,例如,百事可乐=年轻=活力=受欢迎=时尚。影像的传播与信息的符码存在着内在的、即时的勾连关系,广告的传播功能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逻辑本身,这就是说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中,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19]。每一幅图画、每一则广告都是相互指涉的能指,它们强加给消费者一种一致性,并要求所有个体对它进行解码。由此广告失去了与现实的深度关联,“伪造了一种消费总体性”,通过信息符码的控制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手段,消费社会在平等的表面下掩盖着等级体系和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广告的功能由提供信

息、促进销售逐渐演变为对消费者的诱导和管理,在把人从匮乏、封闭、禁忌和焦虑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对人的欲望进行了日益严格的疏导和控制。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功能通过媒介的力量而产生了一个新的现实,一个伪现实:

“一切都是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无论何处,在真实的地点和场所之中,都有完全产自编码规则要素组合的一种‘新现实’的替代品。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发生了一种对实用控制科学研究的那些‘模拟范例’(即拟真模型,笔者注)形象的巨大模拟过程。……在大众传播中,这种程序攫取了**现实的力量**:后者因为由媒介本身物质化了的这种范例的**新现实**而被取消、被窃取”^[20]。

二、从生产到再生产

生产活动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哲学分析的具体场景,是社会批判理论展开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人和社会的历史性生存规定,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经济哲学的基础性话语,“生产”概念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诸多的批判和重构。列斐伏尔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或“生产主义”话语,要重新焕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活力,就必须以“日常生活批判”取代生产理性话语。延续着这一理论进路,鲍德里亚也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集中到“生产”概念上。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把劳动和生产当作任何社会中人类的一种普遍能力和本质规定,并把劳动的解放看成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基础。以劳动和生产为镜子去观照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以此作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这“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21]。由此鲍德里亚认定马克思以生产概念为基础对资本主义

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完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谋。

在鲍德里亚构造的后现代超现实世界里,再生产成为最基本的运作形式。从伪造阶段到生产阶段,摹本不再与原本一一对应,而是通过无限的系列和重复而再生产出拟像。由于原本被隐匿,而无指涉、无原本的拟像开始在当代社会盛行,从而导致了超现实的产生。“真实的定义是:它能够提供一种等价的表征。这个定义与科学相符,科学假定了一个等价的一般体系(传统的表征不是等价的,而是抄写、阐释和评论)。再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真实不仅能够被再生产,而且它永远处于再生产之中:超现实”^[22]。鲍德里亚将物品转化为意义表征的符号,将物质性的实体抽空为影像、符码,由此,再生产变成是对意义、符码、拟像等进行的复制和传播。本雅明(W. Benjamin)曾经指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复制手段和能力,使原本消失在复制品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导致了传统艺术观念的危机。鲍德里亚则将这一过程看成是当代社会的再生产,“本雅明第一次区分了再生产原则的运用。他认为再生产吸收了生产过程,改变了生产的目的,改变了产品和生产者的状态。他在艺术、电影和摄影中构建了再生产……但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生产都回到这里。这是再生产的层面——时尚、媒介、广告、信息和传播网络——这里马克思漫不经心地描述为资本的非本质部分,也就是在拟像和符码的领域内,形成了资本整体过程的统一性”^[23]。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复制而成为无限的系列,这是超现实时代的革命:再生产取代了生产。

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强调的是对生产的一种补充、延续,它们共同成为资本循环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说:“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

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24]。社会的运行需要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轮动,而这种再生产是不断地把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产的新要素。鲍德里亚虽然也使用“再生产”一词,然而它更多用来指当代新技术条件下对符号、符码和影像等进行不断复制和克隆,而整个资本的流通过程则被演化为无原本、无止境的机械复制和拟像衍生。鲍德里亚再生产理论的前提是商品被抽空了实体内容而转化为符号,其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实的消失和超现实时代的到来。

三、从物品到符号

拟像概念在消费社会中表现为由媒介所产生的臆象、虚构、伪造物、伪事件,物品变成一种“拟真的物”、“虚假的物”而退化为空洞的符号,消费的对象成为“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25],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 物品的审美化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仅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同时也影响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随着艺术与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艺术开始进入商品的生产之中,按詹姆逊的说法,就是“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26]。一切事物,即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到艺术的符号之中从而成为一种审美的存在。

日常物品在使用价值的经济效用之外被赋予了艺术和审美的属性,它体现在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拉什(S. Lash)

与厄里(J. Urry)考察了物品的审美化过程,他们认为附加于物品之上的符号有两种形式,“一种主要具有认知内容,因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物品;一种主要具有(最广义的)审美性内容,主要是后现代物品”^[27]。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成分(如知识产权、专利权等)越来越附加于商品之上,工业设计占物品价值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化本身的创造,物品的象征符号编码日增,其中设计成分的增长,必然造成在生产本身当中产生重要的审美成分”^[28],工业设计取代了劳动过程成为商品增值的重要环节。其次,在流通过程中,物品通常需要借助于品牌效应来增加市场价值,具有审美价值的各种传播形式(例如流行音乐、电影、杂志等)推动着物品的销售与消费。最后,在消费活动中,各种能指形式如影像、商标等只是指向符号自身,通过与其他符号的对比来显示其差异性。人们消费的是商品及其外部各种形象如名称、商标、形象、声誉、象征等,消费变成了对这些不同的能指形式的辨别和认同。无论是生产、流通还是消费,艺术都通过工业设计、广告和影像的传播而对物品价值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表明物品具有超越于自然属性之上的审美特质,“形象和制造物的空间实际上隐约类似于一种自然……这就是断定有一种物品的本质、一种永远不同于日常环境层次的、相对这一层次而言确实是一种超现实性的绝对现实性层次”^[29]。

(二) 物品的层次化:系列与模型

模型与系列的关系是拟像进程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的主题。随着工业时代再生产的普及,系列与模型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了。事实上,在《物体系》一书中,鲍德里亚已经开始讨论了作为消费对象的模型/系列之间的关系。模型的原意是指在工业生产中所依据的原型和标准品,而现在它被用来指称时尚、个性和品位。系列

是依据模型而再生产出来的,是对模型的摹仿和复制。在鲍德里亚看来,模型/系列之间的关系并不在于功能性方面,而在于超越于功能性之上的文化领域。在文化的符号体系中,模型为其他商品提供一种可供模仿的完美理念,代表了一种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从而诱导人们通过系列的生产和消费去追求、接近它,从而实现自由、个性化和差异化。当每个人的消费对象从系列上升到模型,向上一层级消费品趋近时,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文化的等级体系中,主动的选择变成一种被迫的行为,这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让我们做出的选择,“这是一个透过物品和信念的‘个性化’,想要更佳地整合个人的社会的一项基本意识形态概念”^[30],消费活动正是在这里发挥着对人的分类、强化和控制的功能。戈特迪特(M. Gottdiener)在模型/系列的关系中,看到了消费行为的拟真特征,“整体的一体化逻辑通过诸如整套厨具、房间模型和家居模型之类的模型而表现出来。商品化和消费主义意味着物品的机械化再生产。模型可以普及化任何社会情形。消费变成了一种对模型进行消费的行为。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拟真”^[31]。

(三) 物品的符码化

商品世界形成了具有差异意义的符号系统,在系统中的每一个具体物品作为社会分类和差异的象征,按照严格的顺序进行分层和排列,从而成为系统中具有差异性的符码。物品体系就像一个语言结构,决定着个别物品的意义和功能。单一的物品只是这个符号体系的一个要素和符码,是处于差异体系中的意义对象。符码是符号体系中每一个具有个性、差异、等级的单元,它们指向了社会地位和阶层区分,并构筑了“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物是一个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是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些都体现在物的诸多细节之中:形式、质料、色彩、耐

用性、空间的安置——简言之，物构建了符码”^[32]。这个构建的过程使物品转化为承载着社会意指（差异和区分）的符码，作为普遍性符号体系的一个分子，符码的价值取决于整个体系的分配，“物的功能体系，其系统一致性来自于各物品（及它们个个面向，色彩，形式等），在系统中失去自我个殊的价值，只拥有作为记号的一般性功能”^[33]。符码标明了商品符号价值的差别，确立起价值之间的等级关系，发挥着语言系统中的规则和结构的作用，“首先，现实之物变成符号：这是拟真的阶段。但是在接下来的阶段，符号再次变成物，但这不是真实之物：而是一个甚至比符号本身更加远离真实的物——艺术之物、表征之物：一种拜物教”^[34]。消费对象成为一种审美化的图像，成为符号体系中的一个符码。

在后现代社会里，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石的物品开始脱离了有用性和物质性，“脱离了其在历史中的位置，脱离了它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完全被放在一个美学乐趣和个人风格的真空中，使得这些物质对象具有生命的鲜活体验是因其不在场而受到人们注意的”^[35]。最终，社会生活中具体而鲜活的物品被转化成一个脱离社会情境、毫无生命的抽象符码。

四、制造“虚假需要”

需要是消费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是人类天然的内在规定性。人的需要层次和满足程度反映了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质力量通过需要的满足过程而得到确证。马尔库塞区分了人的“真实需要”（true need）与“虚假需要”（false need）。真实需要源自于个人本能的生理属性，而虚假需要则主要是由社会的外部压抑和诱导而产生，并通过商品、广告等方式将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转变为个人的需要。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掩盖、遮蔽人真实的、自然的需

要,引导、制造虚假需要成为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虚假需要是如何产生呢?马尔库塞认为压抑是一种社会常态,在生产落后阶段出现的是“基本压抑”,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了社会生产体系对人的“额外压抑”。“额外压抑”最重要的产生途径就是重新组织、建构人的需要,即制造“虚假需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不仅仅依赖于商品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而且还必须把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转变为个人的本能需要。“虚假需要”是发达工业社会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它使人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的世界里。一旦虚假需要取代真实的需要而支配着人的行为,意味着个人完全认同和融入到商品体系及相应的社会文化体制,从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判性,成为单向度的人。

需要不再来源于自身内在的生存和发展,而是被外部的商品体系生产和创造出来的,这是人的行为动机生成的根本转变。“以往,主动权被认为是在消费者手里,而且通过市场反映到生产企业那里。这里恰恰相反,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36]。虚假需要的产生主要来自两方面的作用力,一是外在的压制,主要来自于商品生产及销售的膨胀和扩张。马克思形象地描述了生产者通过丰富的商品世界诱使人的需要不断膨胀,生产者“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37],从而达到榨取利润的目的。在消费社会里,人的需要其实是生产的结果,消费欲望是由社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体系激发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广告起着主导作用,它的功能在把人从禁忌、焦虑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对人的欲望进行了日益严格的疏导和控制。现代社会中的“广告和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

济上融合起来了……对有效性的需求使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心理技术,一个专门用来制造人的程序”^[38]。由此人的需要能够被广告合成,被推销术催化并且被劝说者的巧妙操纵所创造。另一方面是虚假需要的内化过程。如果说上述情况是外部环境对需要的产生进行塑造的话,那么鲍德里亚进一步描述了物体系的心理内化和嵌入过程。物品体系犹如一个语言结构,各种物品被整合为这个意义结构中的要素。人的需要不再是面向单一物品的功能性,而是形成了“需要体系”。需要体系是物品体系在人心中的内在映射。在其中区分的逻辑形成了人心理上永恒的向上欲望。每一个需要的满足都同时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区分逻辑,从而使需要成为一种无法控制的变量,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变量,它决定着其他所有的变量。处于需求体系的人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它永远指向下一个目标,并总是在下一个目标的参照下确认自身的需要。

在鲍德里亚看来,试图在“虚假需要”的背后去寻找人的自然本质,还原出一个抽象的、自然的原始阶段来确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些都只是“一种天真的人类学的虚假建构”。他试图消解需要与人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联,而认为需要完全是社会符号体系的产物,它“不能再从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视域下被完整地界定了,即作为一种内在的、直觉的力量,一种自然的欲望,一种人类学的潜能。相反,需要最好应被界定为一种通过个人的内在逻辑体系推理得出的功能……换言之,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必需它们存在”^[39]。在消费社会里,需要不是来源于个体内在的生存和发展,而是被外部的商品体系生产、创造出来的,这是人的行为动机生成的根本转变。“需要并不是主体动机的表达,也不能表征主体的一种本真状态,它不过是主体在使用价值体系和交换价值体系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功能性还原”^[40]。需要失去了自己的原

初指涉——人自然的生理属性,成为资本操控下对人的动机的一种拟真,成为外部强化和压制的产物,“在这个过度现实的拟像社会中,不只是存在的现实被拟像所控制,就连不是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也可以包括在内。因为拟像原则不光是就存在事实而言,……它更深入到情欲之中”^[41]。

今天,当追求各种高档消费品成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目标,当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成为年轻一代人的狂欢盛宴时,资本正借助于广告、营销、媒介等力量完成了对需要的拟真,那些由外在力量诱导而产生的、脱离了人的自然属性的欲望正在转化为每个人的“真实”需要。当虚假需要通过外部操控而内化为每个人的本质需要时,资本力量对人的奴役和控制也正深入到意识结构之中。鲍德里亚深刻地指出了人类需要的意识形态根源,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需要的形而上学话语给予了强力批判。然而,鲍德里亚未能区分需要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彻底地否认了作为正常人的肉体、伦理和心理的需要,对需要的根本否定也成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话语。

第三节 消费社会、生活方式与经济危机

消费不仅仅是作为经济运行和资本增值的一个环节,更是一种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结构。生活方式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方式,它既是人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实现方式,又是把握人与社会之间本质联系的基本纽带之一。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对人的生活的基础性作用,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42]。在物质丰盛的消费社会里,作为社会

主导力量之一的消费活动影响并生成着人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虚假需要成为主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消费的对象也由物品转化为符号。不仅如此,消费社会的到来还促使人的社会角色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需要的满足手段和方式从积累过去转变为透支未来。

一、从生产者到消费者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社会角色是生产者。人以生产劳动来确证自身的存在,消费活动只是个人进行自身生产的一个要素。而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消费活动不再只是简单地对产品的占有和享受,而是通过消费展示出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消费社会的价值理念是:我消费,故我在;我消费,我就有意义;我消费得越多,我价值就越大。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制度中,消费被“异化”了,消费者在无形中成为了各种社会控制力量的俘虏,人被“驯化”成一名消费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特点在于对人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西方工业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把农业人口驯化成为工业劳动人口的基础上,消费社会把劳动人口驯化成为“消费者”是上述过程在 20 世纪的移位和延伸。“19 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 20 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43]。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转变过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社会符号体系的束缚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消费作为一个维护符号秩序和组织的系统,它造就了人的需要体系。消费只有在符号体系中才能充当社会的驯化机制。而驯化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成为了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点——一个“消费者”。在生产循环与符号

体系中,人的踪影消失了,只剩下了孤单的消费者。鲍德里亚揭示了各种消费手段作为驯化机制的隐蔽性——以自由选择、个性化的方式掩盖了其内在的强制性。各种销售手段以诱人的、中立的话语来掩盖真正的交换逻辑。商业力量通过媒体侵入到生活的第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性符码世界,控制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在自由和个性选择的表象下是消费者的软弱无力和无处可逃。消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操控的工具,最终的结果是把人“驯化”为消费者。

人的社会角色由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首先,消费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消费社会要求大众把消费作为一种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即支撑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对于消费系统来说,个体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向他要求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他在其个体消费努力中已经完全承担了这种社会责任”^[44]。消费成为一种“公民约束”,虽然不直接增加税收,但却能够有效地继承税收作为社会贡赋的作用。其次,消费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活动。消费行为的普遍化形成了一股客观的物质力量推动着生产循环和经济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消费力”(consumptivity)。消费者的需要及其满足都是一种社会劳动,从而消费变成新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消费者决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人:它自身是一个社会政治的人,是一种生产力”^[45]。现代社会通过消费完成人的自身的生产,并形成作为客观的物质力量的消费力,促进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最后,消费者角色的形成带来了人的内在维度的转换,由重生存转向重占有。弗洛姆(E. Fromm)认为,传统社会里劳动是一种重生存的生活方式,即以奉献、分享和牺牲为乐,这种意愿主要来自于与他人结为一体的社会性需要。而消费的盛行使另一种倾向——重

占有的生存方式被发展到了极致,“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46]。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形成了与他人相互依赖、相互奉献的社会关系,而在消费社会里人们通过消费活动把所有的人和物都变为自身的占有物,在不断的占有中获得安全感和价值认同。于是,重占有、好享乐成为消费时代人们新的伦理价值观。

二、 满足手段: 透支未来

消费者似乎成了社会的主导力量和英雄化身,消费欲望在经济系统的制造下无限膨胀。然而有限的收入如何满足无限的需求?过去的生活方式强调以劳动和储蓄作为现在和未来的保障。而现在人们通过“分期付款”、“信用卡”等信贷方式来满足过度的需要。以往积累过去、创造现在以保障未来,现在被以挥霍过去、透支未来以满足现时行乐的生活模式所取代。信贷是其中决定性的杠杆,贝尔(D. Bell)认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借助于三项社会发明:大批量生产、大规模市场及信贷融资,“分期付款购物的普及,这比其他任何社会手段都更有力地打破了以往新教徒对欠债的顾虑”^[47]。消费信贷给人们提供了手段,将他们消费昂贵商品的美梦变为可以即时实现的事实。简而言之,信贷造就了大众消费者。一部信贷发展史也是一部消费社会形成和扩张的历史。

在对物品体系的考察中,鲍德里亚从物的生命分析了信贷的产生。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物品以连续的方式把自己加速的节奏强行地笼罩在人们的头上,物品生存周期不断缩短,人必须用未来的劳动来满足当前的需要,信贷成为人们融入整个物品体系的必要途径。韦伯(M. Weber)把新教伦理看成是从教徒到职业者、劳动者的一项理性伦理训练,而现在消费信贷成为从生产者到

消费者的“一种训练程式”。信贷是推动消费者进行超额支出和精确计算的经济驯化系统，“信用是榨取储蓄并调节需求的一种训练程式——正如有偿劳动是榨取劳动力并增加生产的一种理性程式一样”^[48]。信贷与消费的相互作用最终的后果是，信贷成为消费社会一种新的经济伦理。这种伦理假定：信贷是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是公民的经济权利。随之而来的是，消费者被赋予了另一崭新的社会角色——债务人。消费者由于信贷不由自主地融入了经济体系的循环之中，他们利用信贷进行购买，社会才能够继续生产，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工作，获取收入来支付以前的贷款。整个社会体系在“消费—工作—偿还”这种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运动。信贷既是满足各种虚假需要的工具，又是消费者角色形成的推动力，它成为社会控制的策略和意识形态的诡计，是“具有魔术功能的社会的神话”。“债务的意义在于，它伴随欠账和负罪的经历一起反过来刺激消费以及这一循环的完成。于是，消费的循环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继续运转，为资本主义而工作”^[49]。信贷体制表面上促成了现代消费者从其财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实际上它建构了一个把关于自由的社会神话和残酷无情的经济压力相结合的机制。“信贷的策略，加上个人化的策略，使得物品拥有一种它们从未有过的社会——政治功能。我们不再生活于农奴式的时间，我们不再生活于耗损式的时间；这些强制都在信贷的向度中，变得抽象和扩大了”^[50]。

最后，人由于丧失了未来的自由而被异化了。这是一个新生的异化，是一种美丽的幻觉：社会通过消费信贷使每个人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但就其实质而言，个人是用透支的方式将自己的未来掏空并异化了。一方面，信贷给消费者带来的巨大的心理负担。沉重的债务给消费者造成了无限的精神危机，付款期限带来的焦

虑压迫着每一个人,社会的心理安全感由此越来越低。未来的时间压缩、挤占着当下的时间,人们为了现在的美好生活不得不紧张起来,生活的脚步和节奏变得快捷、紧凑和压抑。另一方面,信贷导致了消费透支行为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信用卡作为一种消费信贷手段是美国的创造,但为了满足资本主义体制的扩张,它把负债消费模式推行到整个世界。它不仅鼓励本国人民透支他们未来的收入,而且允许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步美国人的后尘——超出他们可支配的现金资源进行消费。在消费盛行的年代,“快餐店、信用卡以及其他新的消费手段出现了巨大扩张……人们可以说,它们就像癌症一样正向全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转移”^[51]。

三、消费社会理论与经济危机

2008年,由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危机曾经在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学者立足于技术层面分析,从金融衍生工具、监管体制、自由市场模式等方面讨论了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认为过度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各种内在结构性金融产品扩散和放大了风险,再加上政府监管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金融系统的视角只是从某一方面揭示了危机的直接原因。事实上,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求,许多的金融衍生工具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而形成的信用泡沫。然而透过经济制度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更是一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危机。从消费社会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角度去理解当下的经济危机,可以得到更多有意义的启发。

(一) 生活方式的改变

有效需求理论曾经是西方经济学应对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分析工具。创造有效需求一方面要刺激消费者,去制造各种

“虚假”需要。由于技术成熟、生产规模扩大和产量提高,少数精英阶层的高档消费物品逐渐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符号消费在美国被极力地推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汽车和住房,这种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是经济持续繁荣的保证,也是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有效药方。在上世纪末,为了扭转当时的经济颓势,美国政府制造和催生全体民众的“美国梦”,即把“居者有其屋”作为政府的工作目标。鼓励居民大规模地借贷和超前消费,政府不断下调利率并放宽信贷政策,由此形成了高房价和经济泡沫。此后,美国住房拥有率大幅飙升,覆盖所有地区、年龄段和种族群体,以及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拥有自己的“家”本来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在政策的激励下,住房“需求”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并得到满足。

创造有效需求的另一种工具就是消费信贷。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过剩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有效需求,在收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次级房贷等透支消费方式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消费者提前支付了自己的远期利益,将未来的支付能力提前变现用来满足当下的需求,即“寅吃卯粮”。这种预支未来、“花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成了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信贷来满足不断膨胀的需求,由此消费活动转化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力,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正是刺激有效需求所形成的消费力支撑了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有效需求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泡沫性的需求,它造成了美国全民负债,上世纪80年代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80%,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达到了98%,美国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刺激需求和消费信贷的支撑下,居民的有效需求不断地激发出来,成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消费者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购买的需求不断地制造、激发出来,生活变成了一种生产过程,举债度日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方式被异化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

(二) 生产过剩和资本本性

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危机做出的深刻判断。而推动着生产扩张并导致过剩的正是一只无形的手——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要无限制地逐利和赚取剩余价值,正是资本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的过剩。为了解决过剩的产品,资本不断地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由于屈从于资本增值的逻辑而不断地被异化。资本的扩张把人变成为一个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变成了经济机器运转的一个附属物。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内在推动力就是资本增值本性的要求。如果说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生产过程中人的异化现状,那么在当今西方社会,异化正从生产领域走向消费领域,在消费活动中人的意识、生活、观念被更加隐蔽地异化了。

在探讨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时,各个层面的研究给出了多种解决之道。在解决深层目的的层面上,许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运行的结合,用凯恩斯主义来限制新自由主义,通过制度驾驭资本、国家干预市场。在手段层面上则研究如何建立合理的生产方式和金融制度,实现市场的良性循环和金融秩序的有效运行。我们认为要倡导合理的生活方式才能避免或克服经济危机。首先要充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摒弃那种以利润为指向,把人视为工具的发展模式。其次在满足的手段上,要倡导崇尚节俭和量入为出的生活理念,适度地发展信贷规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传统黜奢崇俭、知足常乐的适当消费观

念,让西方人看到了一种可以避免危机的生活方式。

注 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 [2]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25 页。
- [3]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 42 页。
- [4]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20.
- [5] 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 页。
- [6] 同上书,第 72 页。
- [7] 毕晓普等:《波德里亚和邪恶精神》,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04 页。
- [8] 布希亚:《物体系》,第 48 页。
- [9] 同上书,第 41 页。
- [10]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61 页。
- [11] 同上。
- [12] 同上书,第 41 页。
- [13] 同上书,第 60 页。
- [14] 托尼·希:《拟真时代抵制意义:波德里亚的〈仿像与拟真〉》,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31 页。
- [15] 布希亚:《物体系》,第 224 页。
- [16]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12 页。
- [17] 同上书,第 88—89 页。
- [18] 同上书,第 145 页。
- [19] 同上书,第 116 页。
- [20] 同上书,第 117 页。
- [21]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
- [22] Mark Poster(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p. 145—146.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107 页。
- [23] Ibid., p. 138.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77 页。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28 页。
- [25]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15 页。

- [26]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 429 页。
- [27] 拉什、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2 页。
- [28] 同上书,第 82 页。
- [29]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07 页。
- [30] 布希亚:《物体系》,第 163 页。
- [31] Douglas Kellner(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1994, p. 35. 参见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49 页。
- [32]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 [33] 布希亚:《物体系》,第 73 页。
- [34] Jean Baudrillard, *Impossible Exchange*, Vero, 2001, p. 129.
- [35]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 页。
- [36]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52 页。
- [37]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0—121 页。
- [38]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 页。
- [39]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67 页。
- [40] 同上书,第 152 页。
- [41] 蔡铮云:《另类哲学:现代社会的后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1—132 页。
-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 页。
- [43]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64 页。
- [44] 同上书,第 67 页。
- [45] 同上。
- [46] 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2 页。
- [47]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7 页。
- [48]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63 页。
- [49] 托尼·希:《拟真时代抵制意义:波德里亚的〈仿像与拟真〉》,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30 页。
- [50] 布希亚:《物体系》,第 185 页。
- [51]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 321 页。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解读

鲍德里亚早期的三部著作(即《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当代消费社会的符号学分析,在马克思的生产过程之外强调了消费的重要作用,为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补充了文化和符号的因素。在这一理论分析中,鲍德里亚已经尝试运用拟像和拟真等后现代概念分析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消费、价值生产和交换等活动。从符号到拟像,鲍德里亚也逐渐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转向后期关注媒介和技术批判等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论域。然而在这一阶段,“人们已经可以将他描述成是一个像居伊·德博尔一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的规划是要保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同时又要对其进行补充,以解释受到了消费和大众媒介社会的产生影响的新的控制形式”^[1]。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家,鲍德里亚敏锐地察觉到符号、符码和拟像等后现代文化对于消费领域和价值生产的渗透,抓住了当代社会的崭新特征,并将文化作为一个要素带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当中。运用符号学和后现代话语对于各种经济活动和抽象概念进行解读和重构,为考察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当

代蕴意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继承着批判理论的立场并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节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三重语境

从符号学的视角解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商品概念一直是鲍德里亚早期思想的一个主题。无论是在对消费的批判,还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构建中,他都力图把分析的基础从商品转向符号,凸显当代社会中符号的重要作用。鲍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品是根据以下四种逻辑组织起来的:第一,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第二,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第三,符号价值的逻辑;第四,象征交换的逻辑。这四种逻辑相对应的原则分别是:有用性、等同性、差异性和不定性^[2]。物品最基本的自然属性是它的使用价值,即以自身的功效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功效被抽象化为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交换价值。然而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的物品不仅仅具有传统经济学所分析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具有体现人的社会地位差异的符号价值。物品的符号价值体现了消费者的个性、特征、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符号价值并非依照物品的生产成本或劳动价值进行衡量,而是由其所代表的差异化和社会意义来确定。鲍德里亚不仅为商品附加了符号价值,而且在商品的价值交换之外提出了象征交换,试图用象征交换逻辑来打破价值等价交换的强制性,恢复那种互惠的、非等价的交换模式,由此来破解旧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话语之外,鲍德里亚构建一种适用于一般人类学的价值转化方式:

使用价值:

1. 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

2. 使用价值—符号/交换价值

3. 使用价值—象征交换

经济交换价值：

4. 经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

5. 经济交换价值—符号/交换价值

6. 经济交换价值—象征交换

符号/交换价值：

7. 符号/交换价值—使用价值

8. 符号/交换价值—经济交换价值

9. 符号/交换价值—象征交换

象征交换：

10. 象征交换—使用价值

11. 象征交换—经济交换价值

12. 象征交换—符号/交换价值^[3]

鲍德里亚构造了四组十二条的关系用来说明价值转化关系。符号价值成为商品的一种新的基本要素和属性，而象征交换与价值交换一道构成了商品流通的重要中介。传统政治经济学把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看作是商品的基本要素，而现在符号价值和象征交换也参与到商品生产和流通之中。“对鲍德里亚而言，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还包含着一个语义学的革命，它不仅意味着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取代，而且最终意味着两者被符号价值所取代。这就导致能指在渐渐自主化，它可以接受操纵（譬如在广告中）而从一种稳定的关系自由地流向客体，并为自身建立起相互关联的意义之链”^[4]。由此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语境之外，还存在着符号政治经济学和象征交换逻辑。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第1条“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表明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最为基本的理论程式，即商品包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概念。马克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5]。使用价值在于它的具体功能和有用性，猪油的价值在于它是猪油，满足了人们的食欲，棉花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棉花，满足人们遮阳御寒的需要。物品的不同使用价值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就必须进行交换，通过交换把使用价值抽象为它的社会尺度——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保证了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流通，从而使商品能够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表现手段和外部形式，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并成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和基础。

“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阐述了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的过程，而第4条“经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则说明了消费的过程。在经过了流通和购买之后，交换价值以货币的形成表现出来，具体化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和工人的工资。资本家为了保证再生产的进行必须用货币购买原材料，由此进入生产的下一个循环。而工人也需要货币来购买生活资料，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交换价值最终转化为原材料或生活用品，进入了生产和消费领域，保证着劳动力的供给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鲍德里亚把上述两条看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是“一个通过使用价值将交换价值神圣化的领域，一个将商品/形式转变为物/形式的领域”^[6]。

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商品概念内在的双重要素,而随着物品转化为符号,必然要求构建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才能更准确地进行分析和说明。在鲍德里亚构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第2条和第7条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从商品向符号的转化。第2条“使用价值——符号/交换价值”即前文所述的物品向符号的转变过程,物品所体现的社会差异和文化意义越来越凌驾于实用性原则之上。例如半自动洗衣机/全自动洗衣机、普通电视/液晶电视等不同层次的技术产品,在使用价值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符号和社会地位的含义。第7条“符号/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则表明符号价值作为物品的新属性,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着“需要”的产生,即前文所述的虚假需要的形成过程。“社会等级、不同地位、特权阶级以及它们所支撑的文化都可以算作某种利益、一种个人的满足感,从而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7]。按照拉什和厄里的看法,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价值比交换价值更为抽象,是“拟像的拟像”,它把丰富的社会内容以更隐蔽、更无形的方式凝结到符号之中。“如果说交换价值已然是以可定量单价计价客体的价值可计算问题,或曰一般的效用,那么符号价值是某种‘什么都去(anything-goes)’的方式吸收于与客体有关的形象里,从而与那种计算可能性平分秋色了”^[8]。符号/交换价值消除了客体(商品、货币、资本)的物质基础,消除了这些客体之间的界限,把有用性、价值、社会差异和文化意义都糅合到一个更为抽象的符号价值当中。

第5条和第8条说明交换价值与符号/交换价值之间的关联。从商品到符号,从交换价值到符号/交换价值,“这一转变涉及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从一般等价规律下物质产品交换的抽象到符码规律下所有交换的操作的转变。与这个转变相对应

的,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所有的价值都转变为处于符码霸权之下的符号交换价值。比起剥削来,这种控制和支配结构更加微妙,更具极权主义”^[9]。第5条“经济交换价值—符号/交换价值”质疑了经济学理论对消费行为的理性预设。消费活动不只是受交换价值制约的理性经济行为,而且也有着炫耀、奢侈等非理性的因素。20世纪初,凡勃伦(T. Veblen)提出炫耀性消费概念,描述了资产阶级向普通民众炫耀财力、地位和身份而进行的“浪费性”消费,并把这种奢靡消费看成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上层的富有阶级通过把交换价值转化为符号价值,把财富转化为有形的消费品,从而展现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同时“是一个经济体系向符号体系转变的过程,并由此导致经济的权力转变为一种统治以及社会特权等级”^[10]。因此,符号/交换价值所彰显的阶级差异和权力地位成为消费活动的重要对象,也成为经济生活中影响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主导原则,“在经济秩序之中,剩余价值的积累及分配至关重要。在(文化的)符号秩序之中,对于花费的掌握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对在符码的控制下所发生的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转变的掌握是决定性的”^[11]。

一旦消费的对象被扩展到社会地位、等级差异等因素,符号价值日益成为抽象力量决定社会关系的形成,那么它反过来又会成为经济权力形成的重要基础。这就是第8条“符号/交换价值—经济交换价值”展现的内容,它指出通过占有特权商品、符号垄断和财富炫耀,上层阶级把符号价值转化为经济权力。符号价值既依赖于交换价值的积累和财富的占有,同时,它又可以转化成更多的社会特权和经济利益,从而进一步转化为交换价值。鲍德里亚认为第5条和第8条描述了符号/交换价值与经济交换价值之间的

循环过程,“经济交换价值—符号/交换价值”表明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权力是以价值的占有和剥削为基础,货币积累、资本增值成为了获取符号价值的重要保障;而“符号/交换价值—经济交换价值”则指出了在符号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文化’的统治则以不断相互衍生的符码的垄断为基础”^[12],通过符号价值的占有而形成经济权力,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本增值和社会统治。

符号价值日益兴起并进而取代使用价值成为了消费的主要对象,它正逐渐地决定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的形成,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不仅交换价值是一种抽象,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是资本主义需求体系的逻辑抽象。每一个物都被纳入到符号体系之中,使用价值从自然属性转向了其蕴含的社会意义,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当需求变成抽象体系的产物,使用价值就不能再被视为物品本身的固有功能,而是表达了主体、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定。如同马克思揭露了交换价值拜物教一样,鲍德里亚也试图揭示使用价值的拜物教。他认为使用价值拜物教更为深刻、更为神秘,使用价值“根植于人类学之中,根植于一种自然化的过程中,被视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原初指涉物”^[13]。使用价值拜物教以理想化的平等、和谐掩盖着深层的剥削与异化。

三、 象征交换的逻辑：解构交换价值

为了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性体系,鲍德里亚提出象征交换的形式,以此来反抗经济秩序的价值抽象和符号统治,“象征是鲍德里亚革命人类学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解毒药,它从试图驱除和消灭符号的视角向符号发起挑战”^[14]。作为与理性、等价的交换价值完全异质的模式,“象征交换是与价值领域完全割裂的另一个领域”^[15]。象征交换的出现,意味着所有的价值形式(物、商品

或符号)都必须被否定,“象征交换行为如无偿的礼物馈赠、节庆、毁坏和浪费等,提供了一种行为方式,比起马克思所拥护的那一类实践,它更为激进地颠覆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价值”^[16]。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交换与其他的价值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可逆的,因此图表中的部分原则是两两对应而成的:

第3条与第10条表明了对理性经济学中“消费”概念的颠覆。在理性经济学的语境里,消费是一个技术性的、中性的术语,它是人类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当物品转化为符号时,鲍德里亚也为消费的对象增加了地位、等级差异等社会文化内涵。消费由此成为社会分类和差异显现的过程,人们通过消费进入了一个全面编码的价值交换系统中。要走出经济学的理性规制,就要恢复消费一词所具有的“浪费”、“挥霍”、“耗费”之要义,即返回到原始社会的礼物互送和节庆活动之中。原始社会的宗教节日通常要耗用许多动物甚至人的生命作为“牺牲”奉献给神灵,这是一种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耗费和奉献活动。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完全忽视了物品的使用价值,也排斥了交换价值的约束,从而使商品进入了象征交换的领域。

第6条与第11条强调了象征交换中的非等价原则。鲍德里亚认为在物资匮乏的原始社会里,人的生存有一个最低的底线即“自然的需要”。这一“自然的需要”被马克思及其他经济学家们不加批判地当作经济学的人性基础。然而自然的需要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社会需求或虚假需求。以虚假需要为理论基础的经济交换其实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交换方式,而是在价值逻辑作用下以货币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鲍德里亚想要倡导的是被交换价值所遮蔽的、体现人的本质关联的象征交换。他认为原始的象征交换还未受到价值规

律的制约,还不是一种精确的、可量化、可计算的交换,体现出了人类原始交往的互惠性、非等价、可逆性的特点,犹如现代社会朋友之间的礼物馈赠、邻里亲朋的物物往来。通过彰显那种未受价值逻辑束缚的交换形式,鲍德里亚试图反抗理性的规划和逻辑的设定,回归到原始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情境,恢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本性的交往。

第9条与第12条则意味着象征交换的完成。在原始人类的节日庆典、夸富宴(potlatch)、礼物交换等活动中,到处都充满了象征交换的影子。然而随着以理性和价值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象征交换被破坏和消解了,物品被“抽象为有用性的价值、商业的价值、地位的价值。象征也成为了一种工具,或者是商品,或者是符号。各种各样的编码方式都可以进入其中,但它们所构建的形式只能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式”^[17]。要消解政治经济学价值逻辑的统治,要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就必须恢复非功能、非等价的象征交换。以象征交换取代符号/交换价值,从而能够打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循环”,“恢复象征交换本身——而不是价值(甚至不是使用价值)”^[18]。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经济权力被抽象化为交换价值和资本,而符号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经济权力是通过符号价值而显现和运作,因此,“只有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整体革命中,才能消解符号和价值,恢复象征性。符号应该被焚烧”^[19]!

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概念进行消解和重构的基础上,鲍德里亚指出必须打破仅仅通过交换价值和使用权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对于符号生产以及文化生产的分析不能作为与物质生产相对的、外在的、隐蔽的‘上层建筑’;这将成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符号政治经济学全面入侵了理论与实践的领域”^[20]。他试图建构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把符号结构分析运用到生产、交

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超越经济价值的劳动生产和理性计算,由此在整体范围内重新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鲍德里亚提出了一般政治经济学、符号政治经济学和象征交换逻辑三种理论语境,阐述了它们之间价值形式的转换,并从符号的结构出发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等式关系。符号价值是物品的新属性,而象征交换则表明了对交换价值的一种反叛。不仅如此,鲍德里亚也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消解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深度指涉,从而宣称“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一、价值等式

鲍德里亚提出象征交换逻辑与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对应关系:

$$\frac{\text{符号 / 交换价值}}{\text{象征交换}} = \frac{\text{经济交换价值}}{\text{使用价值}}$$

原始社会的夸富宴、礼物交换等象征形式被抽象化、理性化为当代社会的符号价值,这种价值形式通过艺术品拍卖、奢侈消费等行为来显现社会地位和等级差异。这一转化过程也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中得到说明,即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物品有用性被抽象为交换价值,被还原为均质而冰冷的货币。在这个等式中已经暗含着符号的二元结构,它或多或少已经采取了语言学的方式,或者更为一般地说,它就是一种符号学。“语言学似乎很小心地避免将自己的分析置于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之下。然而,这正是它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所说出的东西。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等同

关系早在先于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已经存在了”。符号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政治经济学相比，“它们在形式上的相同，而不是内容上的等同：符号的形式与商品的形式是相同的”^[21]。在价值形式的转化过程中，语言结构成为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桥梁，从而使得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成为可能。商品和符号的结构关联体现在第二个等式关系：

$$\frac{\text{交换价值}}{\text{使用价值}} = \frac{\text{能指}}{\text{所指}}$$

这一等式表明了一般政治经济学与符号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与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处于相同的抽象逻辑中，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表现手段和外部形式，与符号的能指一样是一种普遍而抽象的等同物。使用价值是符号结构中的所指，是交换价值指向的内容和对象，是交换价值的现实承担者。“一方面交换价值与能指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与所指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这种一致性关系（这一次达到了和谐统一）描述了一般政治经济学”^[22]。

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中，交换价值与能指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一种实现，所指和指涉物只是能指的一种实现。使用价值和所指“不过是被交换价值和能指的游戏所产生出来的拟真模型”^[23]，它们为后者提供了真实的、具体的保障，“商品的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形式上的同构性，其中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体系所调控，成为了后者‘自然主义’的保障。同样，符号的双重面孔（能指与所指，后来被人概括为能指/所指与指涉物）也隐藏着某种形式上的同构性，其中所指与指涉物，被同样的逻辑形式（即不过就是能指的逻辑形式）所左右，共同作为一种指涉物的化身——一种能指的‘实体性’

保障”^[24]。

当能指与所指、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处于紧密的结构关系时，它们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就否定、压抑或制约了象征交换。然而，“最为基础上的还原并不发生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或者能指与所指之间。它发生在整个价值体系与象征交换之间”^[25]。在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以象征交换为主导原则的理论体系，它体现在下面的第三个等式：

$$\frac{\text{经济交换价值}}{\text{使用价值}} = \frac{\text{能指}}{\text{所指}} / \text{象征交换}$$

即物质生产(商品形式)与符号生产(符号形式)形成了整个价值领域，而象征交换则是一个排斥价值抽象和等价交换的领域，与整个政治经济学话语处于对立之中。只有激进地颠覆各种价值还原和抽象，才能打破符号结构的束缚，建构一个以象征交换作为交流中介和沟通纽带的大写“一般政治经济学”：

一般政治经济学/象征交换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的逻辑架构和价值等式围绕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基本概念，以符号学的视角重新解读传统政治经济学，想要找出一条破解理性统治和价值逻辑的道路。通过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注入社会差异和文化意义，把商品转化为符号；通过强调非理性、非等价的交往来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交换关系。然而，他把对传统理念的变革希望寄托于原始社会，在前现代的语境中寻求破解现代性的理念体系，以未开化的社会形态来批评文明社会，使他的理论带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显得软弱而无说服力，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不能为实现理论变革指出一条科学的可行之道。

二、价值的结构规律

鲍德里亚从符号结构、象征交换等视角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批判性重构,然而在更为激进的立场上,他想要指证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之终结。在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复杂逻辑结构里,商品、价值和意义等概念由于符号指涉物的消失而被解构,等价交换原则受到了象征交换的强力挑战。通过对基本概念激进否定,鲍德里亚试图终结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这种终结首先来自于商品基本要素的深度指涉的消失。从符号学的观点看,马克思商品概念的二元要素是一种紧密的对应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做的分析: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系统的远景和目的性而起作用,前者说明了商品在消费中的具体操作(这是与符号指称的时刻相对应的时刻),后者涉及一切商品在等价法则下的相互可交换性(这是与符号结构组织的时刻相对应的时刻)——两种价值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自始至终都辩证地连接在一起,定义了由政治经济学管理的生产所具有的合理形态”^[26]。使用价值以有用性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要,交换价值作为社会抽象物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使用价值与人的需要、交换价值与物品的有用性之间存在严格的指涉关系。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需要是社会体系的产物,从来不存在作为使用价值人性预设的自然需要;而物品的有用性被转化为社会意义,它同样不能为交换价值提供实体保障。符号的指涉物被消解了,商品失去了深度指涉(需要、有用性)。物品被转化为纯粹的符号,由此成为抽象的、与生理需要完全脱离的东西,因此它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它是一个“纯粹的拟像”。

在消解了商品两种基本属性的深度指涉之后,鲍德里亚还进一步从技术的拟真出发,认为作为商品价值的来源——人类劳动

也开始失去作用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工业时代的劳动过程由于机械化程度不高,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取决于工人的体力劳动并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而获得。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通过机械化和科学技术而进行组织和设计,体力劳动让位于生产过程中的知识与技术管理,死劳动控制并剥削着活劳动,通过吸收活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在高度机械化和科学组织的现代生产中,活劳动日益被排挤出生产的中心地带。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正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进入到生产的循环中带来了 X 部分,即能产生剩余价值和整个资本过程的特定的额外——价值”^[27]。而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活劳动在商品生产中作用的日益减弱,价值概念的指涉对象——劳动力逐渐被淡化了。随着价值的这种深度指涉的消失,劳动力和需要概念只是交换价值的一种附属和结果,“任何一种方式中,交换价值以歪曲的、抽象的形式,制造出具体的产品、具体的消费以及具体的意指……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使用价值、指涉‘并不存在’。它们仅是由交换价值体系的发展生产出来的概念,并被投注到类的维度中”^[28]。

如果价值失去了抽象劳动力这个深度指涉,那么它来自哪里?鲍德里亚认为由于机械化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商品价值所指涉的人类抽象劳动力正在逐渐被遗忘,“价值的指涉失去作用,而让位于价值的结构运作。也就是说,随着指涉维度被消除,结构的维度开始自主运作,在指涉维度消失之后结构维度建立起来了”^[29]。与商品的符号化过程相对应的是,商品的价值规律逐渐被“价值的结构规律”所取代。价值失去了与有用性、人类劳动的指涉关联,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进入价值的拟真阶段。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符码在体系中的等级和地位,取决于符码

的组织、排列而成的结构，“这是符号的解放：它摆脱了以往必须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最终符号可以自由地进行结构性或组合性的运作，从而超越了先前的确定性等价法则”^[30]。价值的结构法则意味着由人类抽象劳动形成的、可以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开始失去作用，符号的确定性(determinant)被符码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所取代。无论是价值的生产还是交换，都失去了对应的指涉关系，所有的一切最终被拟真的符码所取代，物品和符号听从于符码的支配，生产和交换依赖于符码的指令。鲍德里亚断言：“‘符号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并在符号层次上得到验证的结果，而价值的结构形态则完全而彻底地使生产和政治经济学体系走向终结，就像它使表征体系和符号体系走向终结一样。所有这些都与符码一起转移到拟真世界之中。然而，不管是符号的‘古典’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字面的意义上都还在继续存在：它们开始了第二种生命，变成一种幽灵般的威慑原则。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31]。

通过指证“政治经济学的终结”，鲍德里亚一方面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消解了商品结构的指涉关联；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倾向，轻视人类劳动对价值形成的本源性作用，而把它归之于符码的运作和生成。从这种立场出发，再生产（如信息技术、交流和知识工业等等）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原则；劳动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高科技的符码成为价值的生成器。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无法成为理解、解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不再能够剖析新的社会“现实”。我们生活在拟真的超现实世界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都被符码和模型所控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整套话语和理论都无力充分解释和剖析这一崭新的社会现实，它走向了终结。

鲍德里亚从符号与经济生活的关联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新现象,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机制,将批判理论带入更为开阔而多元的理论视野。在资本增值逻辑的推动下,消费的需要被不断地激发和制造出来,商品的功能性被符号的社会意义所取代;资本逻辑的作用使得生产脱离了价值实体的指涉,在符码的组合和排列中形成新的符号价值;资本推动着货币褪去了劳动价值的稳固基础,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系统。在符号的操控下,资本经过对剩余价值复杂的分割过程,使商品的价格一步步地远离真实价值,导致作为其根本来源的人类劳动被层层符号表象所掩盖。后现代主义理论既为透视资本运作的新机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我们理解当今时代的符号经济运行产生了有益的启示。

然而在为资本批判提供崭新视角的同时,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商品、生产和价值等概念的解构或重释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首先,这种分析路径广泛地运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导致了过分夸大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凯尔纳认为:“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将消费等文化现象吸收到语言的模式当中,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将语言模式运用于日常生活的某些领域是不恰当的”^[32],因此,把语言结构和意义形成与商品属性、价值生产和货币流通进行简单的类比和移用是错误的。其次,后现代主义过分地依赖于符号学结构的分析,强调纯粹的形式、独立的能指而却忽视作为其根基的实体性内容,掏空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物质基础和感性现实,使符号和符码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要素,从而导致一种“符号学的唯心主义”^[33]。最终,由于过分地强调文化、媒介和技术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忽视了经济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并否定物质生产对上层建筑所具有

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后现代主义“发生了唯心论的偏离,从对唯物主义的强调,转向了对文化的强调”^[34]。此外,尽管在鲍德里亚的解读中有着层次分明的结构图式,却缺乏严密而认真的逻辑论证,表面上概念新颖、视角独特,实质上却从未形成一套严格的理论体系,而流于概念的堆积和拼凑。因此,在对传统理论进行补充和扩展的同时,符号学的解读也显示了其批判力的软弱与退化,“在社会理论中运用结构语言学也承担着某种代价:当语言学的形式主义被带进社会科学的时候,它就暗含着一种非历史化以及批判力量的削减”^[35],最终无力揭示被商品和符号所掩盖的内在本质,也就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理论高度。

第三节 意识形态批判:消费、符码与超现实

20世纪中叶以来,意识形态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鲍德里亚虽然并未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专门的著书立作,然而在他的整体理论中既涉及了消费、符号、媒介等要素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又隐含着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后现代主义终结论的对话和争论。鲍德里亚早期理论以符号学方法补充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揭示新的拜物教形式。然而过度地倚重于结构主义方法,使鲍德里亚开始批评马克思商品概念中需要和使用价值的自然化倾向,并借助于能指/所指的结构分析将商品解构为符号体系中的符码,从而背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出发点并质疑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鲍德里亚后期理论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立场,通过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消除了意识形态的现实指涉,附和了意识形态终

结论的观点。在激进地解构和批判现代主义观念的同时,又制造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鲍德里亚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概括和梳理,既有利于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全貌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以崭新的线索来解读鲍德里亚的思想脉络,更深入地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

一、消费:拜物逻辑的延续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批判奠基于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之上。通过生产过程不但产生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而且也形成了人的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由此马克思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不是从天国回到人间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社会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的……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的意识”^[36]。真实的社会矛盾、颠倒的社会现实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遮蔽和掩盖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聚,消费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日益突出,资本主义从早期的生产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新的社会面貌促使鲍德里亚将意识形态分析的焦点对准了当代社会人们最迷狂的行为——消费,因为“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37]。消费既是生产活动的一种理性延伸,同时也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首先,消费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维护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秩序。当今社会,物品构成了一个具有差异化的、不同等级

的体系,消费成为人与人之间新的“交流体系”、“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对物品的购买和使用是对其所代表的社会意义和地位阶层的一种占有和指认,“借助于物,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在某种序列中找寻他/她的位置,同时根据个人的发展努力地挤入这一序列之中。通过物,一个分层的社会出现了……它试图将每个人放置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上”^[38]。消费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它发挥着社会组织的功能,构筑了一个等级分明、体系严密的社会结构。消费者在对消费“欲求”的满足过程中,在对更高层次符号的追逐中,无意识地接受着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默默地屈服于消费的编码和区分,无奈地认同了资本增殖的逻辑、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现实统治的合法性。其次,消费扭曲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掩盖了现实的不平等。在物质丰盛的消费社会里,“增长=丰盛=民主”的理论程式被人们普遍接受,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了不同阶层人们的需要,消费让他们成功地体验到了“平等”,因为“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39]。由于使用价值对需要满足的无差异性,人们欣喜地以为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平等”在消费中实现了。政治生活上无法实现的民主在消费中得到了补偿,生产资料占有制上的不平等中在商品的使用中得到了抚慰。“消费意识形态呈现为对变革进行抑制的一种封锁、一种掩饰,就像民主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的一种补偿规则。由此,与占统治地位的神话相反,消费主义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是作为等级制度而发挥功能的,它恢复了真实的不平等来反抗现代平等主义的社会幻象”^[40]。消费意识形态以其完美的形式给我们塑造了平等、民主和幸福的幻觉,抹平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和现实生活的缺失。

鲍德里亚早期理论将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统治阶级用来掩盖真实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同时也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运用崭新的视角，鲍德里亚继续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是最为简单、最为抽象的商品，而鲍德里亚也通过“商品”这一神秘形式去揭示资本主义的虚假表相。甘恩认为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中，“对物品的分析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学任务，在新的社会矛盾中，这种分析使得物品认同成为社会整合的一种策略”^[41]。即便偏重于消费活动的分析，鲍德里亚依然延续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商品的神秘性并不在于它本身的物质性和有用性，而在于它的神秘形式，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劳动的抽象，因此，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并不存在于它的‘观念性’之中，即不存在于现实主义思想内容的形而上学之中，而是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42]。然而鲍德里亚并不满足于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他认为要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幻象，必须充分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必须从有形的物品转向具有能指/所指二元结构的形式——符号。在具有差异化的物体系之中，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被转化为符号。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隐藏着商品与符号的同质逻辑，即符号的构成要素（能指与所指）和商品的基本要素（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交换价值/用价值=能指/所指。于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符号的中心地带是商品逻辑，在商品的中心地带是符号结构”^[43]。因此，只有通过符号学的方法，在符号的能指/所指的结构分析中，才能破解意识形态的神话体系。

鲍德里亚将消费看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重要场所，是社会整合和统治的一种新模式。如果说马克思在商品的神

秘形式中剖析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那么鲍德里亚则力图透过符号的深层结构去挖掘潜藏的社会现实,资本逻辑及其产生的剥削和异化仍然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被资本管理和控制的消费社会和消费行为,只是用于保证资产阶级利润和权力的最大化。而且,鲍德里亚将消费行为和符号价值看作是资产阶级控制社会的一种方式”^[44]。据此,凯尔纳坚持认为早期鲍德里亚的理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种符号学补充。波斯特也肯定鲍德里亚符号学方法的积极意义,“马克思因为无法破解商品的符号学,因而变成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波德里亚的加入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使其可以适应高级资本主义的形势”^[45]。

二、符码：抽象形式的统治

早期鲍德里亚以消费意识形态的剖析延续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拜物逻辑的批判,然而在1973年发表的《生产之镜》一书中,鲍德里亚以激进的视角解构和批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并由此认定马克思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建立起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然而,“政治经济学作为孤立的科学正好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它想成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只是巩固了它的批判对象并使之成为孤立的抽象的存在”^[46]。

消费活动通过满足人的需要而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深入到消费活动的人类学基础——“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区分了需要的自然和社会双重维度。一方面,需要依赖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基础,它是一种内在的、直觉的力量,一种自然的欲望和人类学的潜能,体现着人的自主的、非异化的本质。

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是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主观投射,它是“一种通过个人的内在逻辑体系推理得出的功能”^[47]。然而鲍德里亚认为,人从来都不曾拥有基本的自然需要,因为生存的最低限度从来都不是由社会底层决定的,而往往是由高收入人群来决定。要孤立出一个抽象的、“自然的”落后阶段来确定和考察“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不可能的。正是设定了一个存在真实需要的主体,并通过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马克思将需要概念自然化了。由此鲍德里亚尖锐地批评马克思赋予主体和客体、需要与满足之间的内在自然性,为资本主义生产理性提供了坚固的人类学根据,从而无法摆脱资本精心阐述的意识形态幻象。而鲍德里亚想要揭示需要概念的社会性建构背后所隐藏的交换体系、符号体系和权力体系,需要的社会性生成正是由这些体系所引发的。在社会结构和物品体系的作用下,人的需要的产生是服从于生产的目的,作为一种消费力量而被再生产出来的,“需要体系必须强迫个体自由、快乐,这就如同生产体系中再生产的功能性要素以及权力关系对需要体系的强制要求一样”^[48]。通过区分需要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初级和高级层次,鲍德里亚批评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停留于需要的自然属性从而无法识破“资本的狡计”,因为“建构和保留一个个体属人的本质的领域,这一领域是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49]。而他则强调需要的社会结构成因和社会控制功能,并力图由此更深层次地揭示了消费意识形态背后潜在的人类学动机,进一步挖掘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深层动因。

在指责马克思将需要概念自然化的同时,鲍德里亚也质疑了马克思的交换价值(货币)拜物教批判,开始转向对使用价值拜物教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只具有质的差别,要满

足人的需要就必须转化成具有量的差别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因此它成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起点。然而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的商品概念中,“交换价值和能指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使用价值和需要只是交换价值的一种实现。所指(以及指涉物)只是能指的一种实现……它们不过是被交换价值和能指的游戏所产生出来的拟真模型”^[50]。需要和使用价值被代表抽象等价逻辑的交换价值体系所调控,成为了后者“自然主义”的保障。与坚持需要的社会性生成相对应的是,鲍德里亚认为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将一切事物转化成有用性,如同交换价值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一样,因此,“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是需求体系的抽象,掩盖在商品和产品所拥有的具体目的及其内在特性这一虚假外表之下”^[51]。随着消费社会中物品转变为符号,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领域从生产和交换过程延伸到了消费过程,交换价值隐藏的社会统治被转移到了使用价值拜物教之中。

由此,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仅仅停留于需要和使用价值的自然性层面,忽视了其形成的社会性因素。在他看来,当马克思试图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物的有用性直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奴役时,他未能走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层陷阱,反而认同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鲍德里亚通过凸显需要和使用价值概念形成的社会和文化动因,指出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商品)和交换过程(货币)中,而且延伸到了文化、符号和意义的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已经整个地存在于商品逻辑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之中,同时也存

在于符号的内在逻辑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之中”^[52]。

然而,过度地依赖于符号学的结构分析,使鲍德里亚开始远离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基础,甚至开始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从符号的视角对商品概念进行解构,鲍德里亚将商品转化为一种抽象形式和符码,从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立足点从商品转向了符号体系中的符码。他认为,在社会结构和符号体系的作用下,使用价值和需要都必须进入体系之中并被符码化。人的需要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和塑造,“需要仅仅是一种符码,能指的体系与任何指涉物无关……人类需要没有自然或生物学基础”^[53]。而商品要满足人们的社会性需要,就必须融入到符号体系中,“每一个物都被纳入到一般的抽象的等价符码之中,这一符码是物的理性、客观性及其意义——这一符码的获得需要与使用它的人,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分割开来才是可能的。物的功能性使其成为符码”^[54]。鲍德里亚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运作机制,符码是一种将物品和意义结合到功用、价值和声望的等级体系之中的规则,它控制着交换价值就像语言决定着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就像语言的规则和系统决定着意义,还原象征等价性,使交流成为可能,政治经济学的符码也决定着需要、功用和价值,这些是通过消费不同的商品和类型而实现的”^[55]。马克思揭穿了实体(物或者主体)的拜物教,然而今天的拜物教在于“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于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不只是上层建筑中被异化的意识,而是“存在于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56]。另一方面,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分界的前提下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而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分裂的任何一方,而是唯一一种贯穿于所有社会生产领域中的

形式。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来剖析意识、精神的产生,而意识形态被当成一种上层建筑用来表达或掩盖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意识形态呈现为一种宏大的主题、超验的价值(如爱国主义、道德、人道主义等),作为一种隐喻的力量整合着人们的意识。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并仅仅将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被物质生产决定的上层建筑,使他“几乎不能把握文化的和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除非在所指的层面上”,从而再一次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思维之中”^[57]。鲍德里亚则强调意识形态的过程将超越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是一个把物质实体还原和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即物质被抽空为符号,需要、使用价值被还原为体系中的符码,文化、意义简化为纯粹的能指,从而“意识形态在一个抽象的、还原的、一般等价的以及剥削的过程中,囊括了所有的生产,不管是物质的生产还是象征性的生产”^[58]。

借助于符号学的方法,鲍德里亚解构了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并着重阐述了需要、使用价值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维度,揭示意识形态的深层机制并将其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然而,在指责马克思将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自然化,从而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时,鲍德里亚也存在着对马克思理论的诸多误读,并显现出其自身理论的贫弱和肤浅之处。事实上,马克思同样坚持需要和使用价值形成是由特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财富、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也会随之迅速地增长。一所小房子可以满足工人最基本的居住需要,然而当旁边耸立起一所宫殿并且日益奢华,那么工人对于居住的需要也会不断地升级和扩大。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

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59]。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时,马克思也强调人们要通过生产活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0]。不仅如此,马克思在阐述商品的属性时,也强调了使用价值是由社会历史的实践和环境所塑造和引导的,“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61]。他以衣服为例,作为一种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其自然属性是由特定的生产目的、对象、手段和操作方式等决定的,取决于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此外,在《资本论》中关于机器的章节,马克思指出不同的机器和技术制造出不同的使用价值,这本身就代表着使用价值是一种社会 and 历史的建构,它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是不断变化的。将需要、使用价值进行自然主义阐释恰恰是马克思所要反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预先存在的自然性需要,这种人类学假设为资本生产和增值逻辑提供了理论支点。然而,鲍德里亚混淆了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了解马克思理论所包含的革命性批判,“构建了一个‘稻草人’般的马克思,然后极大地夸大了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使用价值的理论中所谓的自然主义倾向”^[62]。此外,由于片面地强调需要和使用价值的社会性构建,鲍德里亚完全取消了与资本逻辑相对立的消费实践和消费政治的可能,因为物品的功能不仅由资本所设定和生产,而且也取决于消费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使用,既是社会控制强加给个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满足了消费者个体发展的需要和提供了反抗既定社会秩序的可能。鲍德里亚“深刻地指出了资本对需要和使用

价值进行的理性化、组织和系统化,但却忽视或贬低了个体如何投入到斗争、反抗和替代性的文化实践之中,并且很快他就完全放弃了激进反抗的姿态”^[63]。他未能看到消费本身对于人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没有察觉到消费实践可能潜藏着革命和反抗的能量,在单一而片面地强调社会抽象形式的同时,鲍德里亚不自觉地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宣扬者。

三、超现实：意识形态终结之境？

在质疑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鲍德里亚的后期理论离开了消费社会和政治经济学语境,宣称生产的时代结束了,人类进入了“一个由彻底的符号制造术(semiurgy)、符号不断繁殖和传播而形成的新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拟真之中,在那里,影像、景观和符号的运作取代了生产逻辑和阶级冲突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构成要素”^[64]。

在鲍德里亚勾勒了影像与现实关系的四个阶段(见第一章)中,前两个阶段是传统认识论的观点,它们坚持主客体之间直接而真实的关系,认为影像和符号可以完全准确而客观的表征现实本身,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能够抵达真理,对现实的歪曲和篡改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鲍德里亚认为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通过符号来恢复现实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停留于第二个阶段,即意识形态是对于现实的歪曲或掩盖,其早期对于消费意识形态的分析也力图揭示潜藏的客观现实。而在后现代社会的拟真社会中,符号的能指/所指之间稳固的意指关系被打破了。基洛斯克指出,鲍德里亚所构造的超现实世界是符号理论失效的后果,“这种失效是由于指称性(referentiality)和真实世界/指称的约束的丧失。在价值的语言

学理论范围之内,从心理上的能指—所指关系产生的指涉的排除,标志着一个本体论根基的丧失”^[65]。

在拟真时代里,数字技术、控制论科学、媒介传播等领域中无原本、无指涉、无深度的拟像不断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不再指向自身之外的任何现实事物,符号转化为拟像,真实事物被拟真之物取代,“所有的现实都被符码和拟真的超现实所吸收。拟真原则取代了现实原则管理着社会生产”^[66]。现实被抽空了意义,符号被消解了外部指涉,其结果是真理、意识形态等宏大概念也失去了本质的根基,“如果现实已经被超现实取代,如果真理的概念必须与指涉的丧失一起被消解,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也不能被保留”^[67]。一旦现实成为没有任何根基的超现实,符号成为一个没有指涉的空洞能指,那么,要寻求意识形态背后的本质和真相也就成为一个可笑的谎言,因为“意识形态对应的只是符号对现实的背叛;拟真对应的是现实的短路以及现实被符号复制。意识形态分析的目的一般是重建客观过程;然而企图重建拟像之下的真理将永远是一个虚假命题”^[68]。在消除了符号背后的指涉、质疑所有概念潜在的本质之后,鲍德里亚同样消除了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现实,“不再有意识形态之类的事物,存在的只有拟像”^[69]。实际上,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中心人物之一,鲍德里亚不仅排斥诸如真理、意识形态、本质论等概念,而且也在超现实的语境中对辩证法、决定论和历史进步等观念提出了质疑。在符码和模型控制的拟真世界里,事物的生成取决于“预先程序化”的模型先行,辩证法在这里失去作用了,一切传统的价值标准,无论是道德、美学的还是实践的,都消失在超现实之中。反对进步的历史观,反对科学、真理和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鲍德里亚不仅坚决地捍卫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同时也

“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不再把它视为普遍的历史理念,尤其抛弃了意识形态概念,不再视之为足以用来分析后现代时代的工具”^[70]。

然而,意识形态会走向终结吗?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只要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没有终止,服务于这一基础的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实际上,一方面,在超现实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依旧无处不在。鲍德里亚把迪斯尼乐园看作是拟像世界的完美模型,它对现实生活的掩饰处于影像与现实关系的第三阶段,即影像遮蔽了现实的缺失,“迪斯尼作为影像出现是为了使我们相信其他地方才是真实的,而迪斯尼之外的整个洛杉矶和美国都是不再是真实的,它们属于超现实和拟真的世界。由此不再是对现实的虚假表征(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要掩盖现实不再是真实的事实,从而挽救现实性(reality)原则”^[71]。同样地,当媒体将水门事件称为“丑闻”时,人为制作的现实(即超现实)被揭露出来,然而人为制作边界之外的现实却被隐藏起来了。公众想要揭露丑闻来确认道德和政治的原则,然而“无论任何人想要重新复活这种公共道德(通过义愤、告发等)都是在自发地为资本的秩序服务……这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公式而已”^[72]。鲍德里亚在关于超现实的描述中,仍然运用着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力图透过新的社会表象去寻找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控制方式,而此时意识形态运作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波德里亚看来,被掩盖的不是一个内在的、扭曲的、颠倒的现实(用马克思的话说,现实矛盾);被掩盖的是,被当作现实来表现的不再是现实,而是超现实,是模型的复制……被掩盖的是现在本身已经解体这个事实”^[73]。超现实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终结,反而使它以更隐蔽、更具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在解构符号的现实指涉物、宣称意识形态终结的同

时,鲍德里亚企图变相地制造新的意识形态。超现实既表明了一种新的经验、新的形态,同样也成为了资本意志的衍生物,成为掩盖社会矛盾新的工具和手段。当鲍德里亚宣称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拟像、历史的发展走向终结时,它实际上表明了超现实使我们面对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没有确定性的事件,从而排除了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更新的可能,“因为一切均已完成,已经都已完美了,并且注定只能去无限地重复:同样事件的无何止的重复,这就是西方的后现代命运”^[74]。超现实世界进一步将现实社会的苦难、矛盾和冲突淡化并进行了技术的转换,从而使人们沉迷于各种高科技影像和人造世界之中,消除和削弱了大众的反抗和革命意志。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掩盖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矛盾,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辩护工具。“在技术革命不断加速、前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资本主义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激化的时刻,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更适合于维护整个体系了,因为它把混乱、令人困惑的变化以及无尽的碎片化说成是正常的和自然的社会状态”^[7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研究者,起先在某个理论立场上赞同或发展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后立足于自身的理论视角,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甚至走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鲍德里亚的意识形态理论无疑是这一理论进路的典型代表。他的早期理论立足于当代消费社会,揭示了被消费活动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剥削和奴役的社会关系。消费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制造了自由、民主和幸福的神话。鲍德里亚对于消费意识形态的阐述和剖析,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内在本质,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打开了崭新的理论空间,在新的理论背景下重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和阐释深度。然而由于过度地依赖于符号学的方法,使鲍德里亚误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忽略了马克思商品概念所蕴涵的深厚的社会维度,将符号结构简单地与商品要素等同起来,将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石从商品转向了抽象的符码。对于马克思经典理论的解构,使鲍德里亚开始远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迷恋于符号体系中的结构和符码,构筑一个失去社会现实根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最终失去了理论的批判锋芒而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附庸。在大力宣扬后现代主义论调的后期理论,鲍德里亚构造了一个高科技主宰的超现实世界,在那里不再有任何发展、变革和更新可能,从而历史走向了终结,意识形态不再存在。整体而深入地呈现鲍德里亚意识形态理论的全貌,厘清其不同阶段的理论特质,既能清晰地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延续和截然相异,又能准确地认清鲍德里亚理论的积极意义和真正本质,为辨别当代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话语奠定基础。

运用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鲍德里亚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运行机制。在消费过程中,虚假需要和符号体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人们在其中经历着新的异化和奴役;在符号政治经济学里,高科技的模型和符码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手段,符号的生产、循环和消费成为新时代经济生活的主导。从消费活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分析,使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仍然延续经济哲学的分析路径,力图从经济基础中揭示资本的本质。然而,在理论方法上鲍德里亚却夸大了科学技术、语言符号、文化意义等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进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从而开始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另

一方面,在反抗资本统治的方式上,鲍德里亚依恋于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强调那种互惠、循环和非理性的交换来破除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模式,放弃通过革命方式改变所有制关系来实现社会的革新,从而使他的理念带着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并最终导致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

注 释

- [1] 贝斯特:《现实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现实:波德里亚、德博尔和后现代理论》,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58 页。
- [2] 参见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15 页。
- [3] 同上书,第 115—116 页。
- [4] 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第 26 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4 页。
- [6]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17 页。
- [7] 同上书,第 118 页。
- [8] 拉什、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第 21 页。
- [9]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07 页。
- [10]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17 页。
- [11] 同上书,第 105 页。
- [12] 同上书,第 118 页。
- [13] 同上书,第 134 页。
- [14] Gary Genosko, *Baudrillard and Sign: Signification Ablaze*, p. 5.
- [15]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17 页。
- [16]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45.
- [17]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18 页。
- [18] 同上书,第 214 页。
- [19] 同上书,第 160 页。
- [20] 同上书,第 103 页。

- [21] 同上书,第 119—120 页。
- [22] 同上书,第 121 页。
- [23] 同上书,第 132 页。
- [24] 同上书,第 152—153 页。
- [25] 同上书,第 121—122 页。
- [26]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3—4 页。
- [27]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3 页。
- [28] 同上书,第 11 页。
- [29] Mark Poster(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 125.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4 页。
- [30] Ibid.
- [31] Ibid., p. 127.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6 页。
- [32]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30.
- [33] Ibid., p. 62.
- [34]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21 页。
- [35] 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05 页。
-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7—258 页。
- [37]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3 页。
- [38]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3 页。
- [39]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29 页。
- [40] Mike Gane, *Baudrillard: 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p. 78.
- [41] Ibid., p. 77.
- [42]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39 页。
- [43] Gary Genosko, “Jean Baudrillard’s Contributions to Semiotic and Struc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udrillard Studies*, Vol. 4(3), 2007. 见 <http://www.ubishops.ca/ baudrillardstudies/>.
- [44]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28.
- [45] 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09 页。
- [46]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36 页。

- [47]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67 页。
- [48] 同上书,第 70 页。
- [49] 同上书,第 66 页。
- [50] 同上书,第 132 页。
- [51] 同上书,第 125 页。
- [52] 同上书,第 139 页。
- [53] Tony Smith,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From Hegel to Analytical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 132.
- [54]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26 页。
- [55]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23.
- [56]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79 页。
- [57] 同上书,第 139—140 页。
- [58] 同上书,第 142 页。
-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0 页。
- [60] 同上书,第 79 页。
-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5 页。
- [62]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35.
- [63] Ibid., p. 39.
- [64] Ibid., pp. 61—62.
- [65] Gary Genosko, “Jean Baudrillard’s Contributions to Semiotic and Struc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udrillard Studies*, Vol. 4(3).
- [66] Mark Poster(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 120.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3 页。
- [67] Tony Smith,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From Hegel to Analytical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p. 126.
- [68]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27.
- [69] Mark Poster(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 120.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3 页。
- [70] 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2 页。

[71]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12.

[72] Ibid. , p. 14.

[73] 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 158 页。

[74]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73 页。

[75] 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 162 页。

第四章

“拟真机器”——媒介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话语

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使鲍德里亚在西方理论界声名鹊起,同时也引起了媒介批判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这些后现代主义概念是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理论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并“对时下已有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最为精辟的后现代批评”^[1]。这种新颖的视角使他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媒介研究领域广受追捧,被誉为“法国的麦克卢汉(M. McLuhan)”。史蒂文森认为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沿袭和发展了本雅明关于“这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的论断。借助于新的媒介技术,鲍德里亚认为现实就是通过电视、电视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的效果而产生的。拟真被认为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一种只发生在电视屏幕中的大众媒体“幻象”^[2]。波斯特也认为超现实是语言学通过电视广告而创造出来的,它“不只是存在于电视广告中,而且是二十世纪晚期的文化用以调动主体的手段”^[3]。大众媒介是20世纪晚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随着媒介对生活的渗透和重塑,超现实成为我们现实的生活状况。

鲍德里亚的媒介批判理论不仅聚焦于消费社会中媒介传播所形成的符号世界,而且也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展开其媒介批判理论。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媒介已经成为一台最重要的拟真机器,它生产着社会的超现实形态。不仅如此,媒介的拟真也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工具,它使大众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最终导致社会性的终结。鲍德里亚的媒介拟真理论既对当今时代的特征做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描述,同时也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领地,尤其是其对电子信息时代大众传媒进行的批判,为媒介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富有现实意义的视角。

第一节 媒介批判理论的语境转换

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的时代”。摄影、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面貌和个体的生存体验,它侵入到经济、文化、日常生活、国际战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媒介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生活的多样化,也为批判理论打开了新的理论领地。媒介批判理论关注当代媒介技术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如何实现对主体操控和统治从而带来新的异化。从媒介本身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我们把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反映和表征社会生活的影像时代,渗透并引导着现实生活的景观社会,最后是伪造、再生产现实生活的拟真世界。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媒介批判理论都力图揭示媒介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并聚焦于人类主体的命运和救赎。

一、影像时代

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标志着影像时代的到来,这一划时代的

技术发明,使得绘画、图像的制作摆脱了手工直接性,而进入了机械性的再现和复制。后来经过电影、电视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信息传递的内容包括了声音、文字、影像等,传递手段也日渐丰富、多元而即时。影像指真实世界中的事物,通过光的反射作用而在胶片感光剂、摄像管或电子晶体管中显影成像。这些动态、有声、互动的数字媒介超越了绘画、图像等“凝固的真实”,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影像技术的普及完全颠覆了印刷文字的信息传播形态,传播范围远远大于文字所带来的局限,从而开启了机器媒介形态的视觉文化,使人们进入了感官多元体验的世界。视觉文化实现了“视觉或者图像的转向”,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从口语、文字而转向了影像和互动画面。

影像的源头是事物自身的反光,是视觉工具把它定格吸收,通过光化学或光电反应而使之成影。因此影像能够纪录现实、揭示真实,把物质现实客观逼真地带入了二维影像世界。影像犹如一面镜子反映着社会的现实,它能够忠实再现客观现实,客观真实性是它最本质的特征之一。然而随着媒介对现实生活的不断渗透,影像的真实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即便是能够对物质现实进行复原的新闻摄影,也会因摄影镜头的剪裁取舍而打上拍摄者的主观烙印,更不用说拍摄方位,摄像机俯仰角的选择等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作者的审美倾向。现代数字摄影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更使得以“真实”“客观”为准则的媒介,开始失去原本而成为一种拟像,媒介推动着拟真和超现实时代的到来。

二、景观社会

如果说影像把现实生活转化为视觉形象,那么德波所描述的

是影像反过来渗透并控制现实生活的过程。在他看来,“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4]。在商品社会里,物或者商品统治人;而在景观社会,影像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从“商品的堆积”到“景观的庞大堆聚”的转变,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以电视、电影和出版业等媒介为主的景观产业的支配。工业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商品生产方式已经让位于“媒介时代”的景观生产方式;以往的商品因为有使用价值才能具有交换价值,而现在商品只有成为景观才能实现交换价值。

景观通过影像的传播构成了独特的表象世界,它是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最典型的视觉媒介或许就是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广告实际提供的东西同它许诺的未来之间存在一条鸿沟,用来填补鸿沟的不是行动或生活经验,而是充满魅力的幻想。这是最抽象、最容易骗人的视觉,它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当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从而产生有效的催眠作用,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向我们展示了触觉无法直接把握的事物,“人类的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5]。在视觉主导的世界里,景观的特有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等成为当代社会“主导性的生活模式”。

随着媒介时代的到来,景观生产成为当代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作为当今物品生产不可缺少的背景,作为制度基本原理的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塑造不断增长的影像对象的发达经济部门,景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6]。一切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离不开景观的展示和推广,甚至可以说没有景观,也就没有商品

的生产和交换。景观的生产和传播机构已经成为现今最重要和最具掌控力的经济部门,它正在取代商品生产而成为社会关系的新纽带。

三、拟真世界

当影像大量聚积、景观无处不在,当互联网、电子传媒、DNA等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时候,鲍德里亚认为我们进入了“拟真的时代”。随着技术的发展,影像不再与现实相对应,它伪造、篡改甚至扭曲了现实的存在,虚假的拟像取代了影像而成为媒介传播的主要原则。在影像与现实关系的第四阶段即拟真阶段里,影像完全失去了与现实的关联,从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拟像,它影响、控制并再生产一种新的现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完全消失了,它变成由模型和符码不断地生产出来的超现实。

从影像到拟真的过程,也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从一一对应关系到完全断裂的过程。在影像时代里,能指与所指有着稳定的指涉关系,而在后现代的拟真世界里,能指完全失去所指,符号的自我指涉可以再造出一种新的现实。现实在符号的自我指涉中被遗弃了,拟真不是“一种指涉性的存在或一个实体。它无需原本或现实,而通过模型生产出真实:一种超现实”^[7],超现实是由媒介形成的拟真时代最真实的写照。随着符号制造术的大肆扩散,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已经脱离了现实的映像本体,却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数字化的影像技术颠覆了传统的理念,它使得影像不再是来自客体自身的反光,而是来自于计算机内部的数字运算。如果说影像是客观现实的再现和记录,那么数字化的图像和视频技术通过电子合成已经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的原本,摆脱对表征对象的依赖和束缚,通过拟真而产生出一种比

现实更为逼真的超现实世界。超现实不再是虚幻和荒诞的,它比现实更为真实,真实与虚构、媒介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不分彼此了。这种超现实的影像、符号和符码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而且它们自身已经重构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波斯特把传送者极少而接收者众多的播放型阶段称为第一媒介时期,而现在我们进入了一种平等的、“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的第二媒介时期。在他看来,鲍德里亚提出拟真逻辑的框架,形成了向第二媒介时代的过渡。默克罗比(A. McRobbie)也高度肯定了超现实概念对于后现代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鲍德里亚对真实性的研究,使他找到了一个参照点,也发掘出了在大批量生产的物象的世界里存在着的一种真实,这对于研究大众传媒的新社会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8]。从影像、景观到拟真,媒介场景的发展改变了媒介本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从凝固的静态画面到双向互动、即时沟通的拟真场景;从单一的视听觉接受到全身心的快感体验;从被动、消极的传播对象变成主动、积极参与的传播主体。媒介的传播方式走出了影像和屏幕,改变了真实生活并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作为“拟真机器”的媒介

鲍德里亚认为媒介是最重要的拟真机器,“这台机器大量产生出影像、符号、代码,而这些构成了(超)现实的独立领域并最终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消除中起着重要作用”^[9]。大众媒介不断地再生产出各种影像、符号和屏幕场景,它们渗透并引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新技术,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扩散,形成了超现实的基础”^[10]。

一、媒介形成的超现实

(一) 现实的消失

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人类可以借助技术手段使现实的事物生动、逼真地再现在影像中。然而,过多地依赖于技术的生产和复制,也使得艺术品原真性、神秘性(即本雅明所谓的“灵韵”)逐渐消失了。在高科技的当代社会里,通过精确复制和系列化生产而出现了没有原本和指涉的拟像,它打破了原本与摹本之间的对立。“类象(即拟像,笔者注)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柏拉图害怕艺术会成为类象,因为如果你被各种类象包围,就像置身于一间装满玻璃的房子时,现实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切都是类像,那么原本也只不过是类象之一,与众没有任何的不同,这样,幻觉与现实便混淆起来了”^[11]。作为反映对象的现实事物被悬置、被消解了,一切都是拟像的存在,都是超真实的事物。鲍德里亚详细地阐述了拟像消解现实事物的几个阶段:(1)以细节解构现实,使其衰变为平面、线性和系列;(2)通过细节的重复游戏,用不确定的折射把现实反映彻底打碎;(3)在封闭的循环中无限制地分解系列,从而使谋杀原本成为唯一的诱惑;(4)寻找替代现实的形而上学符号作为模型,在符码的强制重复中回归模型本身。^[12]通过对细节的强化处理,拟像消除了事物的整体结构,在堆积、循环中拼贴出重复和系列,最后建构出模型,以此来作为超现实事物产生的支点。在拟像的不断复制和系列生产中,意义被消解了,“灵韵”被淹没了,“现实”在媒介的运作之中悄无声息地蒸发了。

鲍德里亚把美国通俗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A. Warhol)称为“绝对拟像的知名人物”,他的标志性作品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状况。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现实”是如何在影像的转换之间发生变化的,我们可以把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原作与沃霍尔在60年代的模

仿作并列起来看：



沃霍尔的模仿作将同一张头像排列在一起,通过颜色、亮度和色彩的对比变化,构成了一张新的复制品。在摄影原作中,梦露的脸上弥漫本雅明所说的“灵韵”。摄影者的高超技艺把影像与现实人物之间的相似性完美地呈现出来。她那勾人的眼神、性感的微笑和艳丽的身体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而衬托出来,体态与背景的深度变化可以看出作者逼真再现这种神韵的努力。与之对比,沃霍尔改编了画像,并把许多复本放在一起,每一个画像的细部都被模糊了,过去出现在体态与背景之间的深度对比也被平面化了。每一个单一的画像虽然是用不同的颜色画出来的,然而它们都是同质的重复。作为原本的摄影作品,其深度意义和灵韵在技术复制和细节衰变中消失了,原本与摹本之间的界限被夷平了。这里没有风格,也没有原作,有的只是一个拟像的系列化重复。这种“系列化重复”通过对观众视网膜的轮番轰炸,从而消解拟像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联。沃霍尔标志性的复本艺术被鲍德里亚看成是超越审美的新客体,是“一个纯视觉的产品……影像提高至纯粹用

没有一点变样的形象表现的结果,不再有超验性,但是有符号的潜在上升,这个符号已失去全部原来的意义,在虚空中闪耀着它全部的人造光辉”^[13]。凯尔纳把通俗艺术看成绘画领域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其中沃霍尔的艺术“是一种关于模拟物、双重想象、对再现的再现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要比他的先行者更抽象,即使他的创作对象看起来更‘真实’……‘真实’是一种超级真实、是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他从在社会世界中很难被发现其终极‘原初性’的存在着的印象中,创作出纯粹的图案”^[14]。拟像消除了艺术作品的原初性、真实性和独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拟像的盛行、原本的消失宣告了超现实时代的到来。

(二)“电视即世界”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开始在西方发达社会普及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介,成为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推动力之一。与摄影、收音机等传统的媒介不同,电视以艳丽、逼真的图像为当代人构建了一个拟像主导的超现实世界。鲍德里亚认为,在电视场景中“影像与现实共同作用,幻像(imaginary)与现实也必须共同作用。电视并没有把我们送回到现实中,它是处于超现实之中,这是一个超现实世界,而不是把我们送到另一个场景之中”^[15]。现实的事物转化为影像,然后通过光与影的组合、远近距离的转化,最终呈现在屏幕上的的是一个与现实事物完全脱节的拟像,“事物仿佛便不存在了,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现实感的消失,或者说是指涉物的消失”^[16]。由电视等新媒介手段形成的“超现实”实质上是一种荧屏和镜像之物,是用虚构或模仿的事物来代替现实的过程,“也就是将电子或数字化的影像、符号或景观替代‘真实生活’和在真实世界中的客体的过程。类象模型形成幻象,作为真实世界的替代它无所不

在以至于因此无法分辨真实和幻象。幻象的世界对于波德里亚来说恰如一个没有深度、来源或指涉物的后现代符号世界”^[17]。

电视不仅把事物剪辑成一种拟像,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拟真,一种以影像、拟像和符码重构超真实的媒介工具。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电视不是再现和反映生活,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拟真,是超现实的诞生地,媒介总是在扮演它们作为拟真和现实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声音和影像直接显现在屏幕中,电视内容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电视屏幕中的情境本身是真实的,只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不同秩序,即来自于超现实的人工剧场。另一方面,电视的情境又直接变成了现实生活的模型,它改变着生活的面貌。电视场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真实与虚构、屏幕与生活、现实与超现实被交织融合在一起。例如在风靡全国的各种电视征婚节目中,通过场景设计和情节安排,将邂逅、交谈、牵手等各个环节呈现在电视屏幕中。这种情境拟真的节目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年轻人征友、婚恋的新时尚。于是,在电视与生活之间,“不再有距离,不再有真空,不再有缺场:人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地进入荧屏、进入虚拟图像。人们进入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就步入了荧屏。人们过上自己的生活,如同穿上一件数字外衣”^[18]。电视所制造出来的景象,将比人们每天经历的现实世界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的场景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更刺激、更诱人,媒介的超现实改变着人们生活理念和日常形态。

二、超现实的“内爆”机制

在系统论里,内爆(implosion)是指“熵”的不断增加导致系统的无序和差异性、多样性的消失,最终使系统内部的各成分完全类同并归于沉寂。鲍德里亚对内爆一词的使用主要受到麦克卢汉的

影响。麦克卢汉认为由于媒介技术的急剧扩张和快速发展,网络世界、电子媒介和通讯系统等媒介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各种信息的生产、复制和传播塞满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信息的外爆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迅速地挤占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空间。在他看来,机械时代里人类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而在电子信息时代,技术拟真完成了对意识的延伸,内爆主要是指“身体的延伸”与“意识的延伸”之间界限的消失。

鲍德里亚使用内爆一词来描述一种内向型的生长,它表明了
在媒介作用下各种界限崩溃的过程。信息的大量繁殖和扩散,使得现代社会中本来泾渭分明、自成体系的阶级、性别、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隔和对立都瓦解了。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资本流通、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和国家疆界等不断扩张以及理论、价值和话语不断分化的外爆过程。那么,后现代社会则是由于事物自身要素的无限复制和增长,而导致所有的界限、差异和对立都消失的内爆进程。由于电子信息技术无与伦比的制造和流播功能,使得整个社会被媒介的信息所包围和笼罩,它不是单纯的意义传递者,它是在信息与意义、现实与超现实、媒介与大众之间引发内爆的场所,从而形成了一个媒介的超现实世界。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用一种消除了所有学科边界的后现代理论新模式将完全不同领域的材料和大众媒介与流行文化的例子合并在一起”^[19]。媒介引发的内爆使得现实被信息和媒介的拟真所取代,超现实开始统治人们的意识并成为认识事物的基础。

(一) 信息和意义的内爆

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是意义的生产者和承载者,它产生了意义并使之传播与循环。意义的生成使得人的交流成为可能,从而促进社会性(the social)的产生。鲍德里亚认为社会性是通过暴露在

媒介信息中的程度来衡量的。凡是不能在媒介中呈现和交流的，那么它就是非社会的或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在当代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世界”^[20]。信息的激增和膨胀形成一种“总体的熵”，由此鲍德里亚提出了新的假设：信息=熵。“熵”在信息论中是用来描述非确定性状态的一种量。熵越大，信息的不确定性就越强。信息的过度繁殖直接造成意义的衰减和事件的无序，造成对符号意指的直接破坏，从而吞噬了信息自身的内容和意义。“信息不是在产生交流，而是在交流的进行中被耗尽了自身；不是信息产生了意义，而是意义在行进中耗尽了自身。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巨大的拟真过程”^[21]。过度的信息导致了意义的矛盾和堵塞，使意义的传递和交流无法进行，“鲍德里亚宣称在媒介中符号与信息的激增，抵消和分解了所有的内容，从而导致了意义的消解，同时也是媒介与实现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在一个渗透着媒介信息的社会中，信息和意义通过‘内爆’而成为无意义的‘噪音’、没有内容或意义的纯粹结果”^[22]。

鲍德里亚认为，麦克卢汉断言“媒介即信息”不仅意味着信息的终结，也意味着媒介的终结。在媒介的操控下，所有社会生活都受到信息、意义的包围和主宰，被媒介重新阐释和塑造。现实生活借助于媒介而呈现，媒介本身也在形成一种超现实，这正是“内爆”的含义：“一极被吸收到另一极之中，意义的每一个差异系统的不同极之间形成了短路，相互区分的对立面被消除了，包括媒介和真实之间的区分也消除了，由此任何媒介、任何两极之间或从一极到另一极的辩证调和都不可能了”^[23]。信息与意义、媒介与社会之间内爆为一种含混的状态，这就是媒介操控下的超现实。

（二）现实与超现实的内爆

在现代社会里，媒介被看作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和表征着社会

现实。然而新技术时代的媒介以拟真的方式呈现出来,语言、符号和影像开始重构现实。媒介通过拼贴和再造生活场景和事件,在剧场和娱乐节目中再生产出大众的口味、兴趣,再生产出他们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借助于电视现场,人们进入荧屏和影像世界,媒介的拟真场景就是真实的生活。电视屏幕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消失了,电视即是生活,生活就是电视。随着媒介时代的到来,影像、拟像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了,生活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超现实。一方面,媒介的影像世界被当作现实的生活。人们已经无法分清电视场景与现实生活的区分,也无法判断影视演员与真实社会角色的界限。于是电视里医生的扮演者收到了上千封求医问药的信件,成功扮演律师和侦探的演员也收到了无数法律咨询和案件侦查的求助,肥皂剧中扮演流氓恶棍的演员要在保镖的护卫下公开露面。另一方面,媒介场景是从现实转向超现实的过渡地带,它作为一种典范和模型主导着我们的真实生活。娱乐节目中的谈话栏目、肥皂剧、动作/惊险画面、情景喜剧等都有固定的符码和模式,比如情景剧总是遵循固定的程式即矛盾冲突—矛盾解决—道德宣传或价值灌输。每一种类型的节目都遵守着统一的生产指令和严格的程序步骤。而在电视节目之外,人们越来越迷恋于影视作品所构建的超现实生活,并按照媒体事先编好的剧本、角色模型、时尚风格来设计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是以媒介场景为模型,并人为地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超现实。

媒介消解了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差异,把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有深度的现实世界变成一个平面的、一维的、表层的超现实,从而消解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界限。在媒介操控的生活世界里,家庭生活或场景、私人化的领域都变得可见和透明了。电视和互联网在实时播放着数不清的个人生活片

段,家庭生活中最隐私的东西实际上成了令公众狂喜的奇观。媒介传播利用屏幕和镜头取代了公众生活和私人空间,一切事件都在信息和传播的光线下变得透明和清晰可见。鲍德里亚以罗德家庭的电视直播生动地说明了媒介场景与真实生活之间界限的内爆。1971年,美国一家电视台对罗德家庭进行“真人秀”直播,经历七个月无间断的拍摄,三百多小时连续播放,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一样,电视节目把真实的家庭生活呈现在屏幕上。在这里,没有脚本或剧本,这是一个未加工的历史档案,“是最伟大的电视表演,是我们日常生活层面上可以与登陆月球事件相媲美”^[24]。真实与虚假、屏幕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了,这种既不真实也不虚假的双重生活吸引着两千万观众,它远胜于窥视别人的隐私所带来的快乐。这里我们看到的现实不再是过去的模样,它失去了距离并给予我们远景空间和深度视觉。近距离的聚焦、景象的扭曲、过度的透明,使得现实变成超现实。“事实上,电视才是罗德一家的现实状况,电视的生活才是现实的,因为电视提供的才是真实。现实不再是一种镜子般的映射,也不是呈现全景系统和凝视的远景现实,而是由试探和询问的测验、由触摸和穿透的激光、由保存你选择次序的电脑卡片、由控制你的选择组合的基因符码、由呈现你的感官世界的细胞所形成的操作性现实。这样的现实是电视媒介操控着罗德家庭所产生的”^[25]。这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没有深度的、公开的、影像的世界。在这里,一个内在性、主体性、具有深层指涉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充满诱惑、眩晕、同步和过分暴露的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后现代的媒介生活。

然而罗德家庭最终在电视直播中解体了。这是家庭的悲剧还是媒介拟真的最终结局?在鲍德里亚看来,对于罗德家庭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超现实的:一个典型的、理想化的美国家庭,住在加

利福尼亚,三个车库,五个孩子,稳定的社会和职业地位,衣着光鲜的家庭主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完美注定了它走向死亡。美式生活的理想化女主角,就像中世纪的祭司,她被选择出来并被赋予神圣意义,然后在媒介的火焰中死亡,一个现代性的宿命”^[26]。罗德家庭的命运,预示着在媒介拟真中大众的最终结局,大众成为由统计、测验等模型生产出来的超现实存在。

(三) 媒介与大众的内爆

恩泽斯伯格(Enzensberger)对于媒介技术的社会后果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历史上媒介第一次使大众参与到社会成为可能,并使大众自己掌握着参与的方法与手段。鲍德里亚指出了媒介所具有的消极后果,大众媒介是非中介和不及物的,“整个既存媒介都将自身建筑于这种界定之上:它们总是阻止回应,让所有相互交流成为不可能”^[27]。媒介包含着封闭的完整话语,它没有给信息的交互性和循环留下空间。由此传播变成信息单向传递的过程,大众接受所有信息,却从不反馈;大众不断地受到调查、测试,也从不反思。“在传播的原初逻辑中,大众是一个比其他媒介更为强大的媒介,大众作为媒介包围着吸收了其他媒介……大众和媒介都是单一的过程,大众即信息”^[28]。

在各种资讯、测验、调查的轰炸下,大众成为一个不透明的物体,只能通过光线频谱才能进行透视,而这个光线频谱就是统计和民意测验。大众的存在“不再是社会的,而只是统计学意义上,他们呈现的惟一模式就是民意测验。这是社会视野中的拟真,或者说在这样的视野里社会性已经消失了”^[29]。以信息为基础的统计学操作体系被看作是政治意志和公众意见的真实呈现,“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屈从于民意测验、信息、宣传、统计学;总是面对着事物先对我们的行为进行的统计学确认,并被对我们行动的这种折射

所吸收”^[30]。媒介操控下的大众成为一种虚幻的指涉,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已经不存在,而是表明对大众的表征已经不可能了。大众不再受到传统表征体系的束缚,而是落入到调查分析和数字预测的控制之中,从而被信息和统计所掌握。在媒介的拟真中,大众甚至不再被异化,因为异化必须有一个对立的他者,然而这里并不存在相异的他者。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服从于统计学的一致性,个体被吸收到透明而抽象的数字之中,这是比异化更为悲惨的结局。

第三节 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

对于大众媒介的批判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技术看成是文化工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有效工具。情境主义国际^[31]指出了景观借助媒介控制下的娱乐、消费、服务与休闲等行业,成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和情境主义者从文化批判角度理解当代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鲍德里亚则深入到媒介技术内部,立足于符号的结构关系来剖析当代媒介如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体系。

一、意识形态操控体系

(一) 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工具

随着技术的发展,影像通过复制、录像和数字技术而进行大量的系列生产。与传统的绘画相比,机械时代的影像作品失去了传统手工艺术的灵韵。艺术作品的惟一性被复制品的大量涌现所破坏,由稀少、独特、距离而产生的本真性、神秘性和永恒性消失了。本雅明关注媒介技术造成的影像作品的异化,并对机械复制时代

的艺术作品做出了深刻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如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诺(T. Adorno)、马尔库塞等人更关注媒介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批判理论最早对媒介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它成为了其他媒介批判流派的理论源头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工具。首先,媒介作为国家的“话筒”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功能是借助于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等各种媒介手段而实现的。文化工业借助媒介技术将大众整合为消费者,将影像、娱乐转变为真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次,媒介在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的增值逻辑和运行规律。媒介只是资本运行的一个部门,它为商品的销售推广而服务并满足资本无限增值的需求。借助于资本的魔力,大众媒介演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工具和利润中介。大众媒介表面上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所有的媒介都在履行着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它们的任务是把政治的权威声音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大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操控,“引起一些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从而使主体“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32]。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功能是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并将个体整合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框架中,“在当代社会中,所谓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位于休闲活动的中心,它们是社会化的重要力量,是政治现实的调节器,因此应该被看做当代社会中具有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效果的主要机构”^[33]。

(二) 景观:统治经济秩序的视觉映像

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文化工业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而情境主

义者则指出了视觉映像控制下的社会统治秩序。景观的生产主要通过广告与商业媒介控制下的娱乐、消费、服务与休闲等行业,在它们的作用下,各种影像遮蔽了社会统治的深层逻辑,让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显现为一种纯粹的表象。景观以隐蔽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使人们无意识地肯定和认同了社会的现存体系。“景观关系的那种拜物教的和纯然客观的表象,掩盖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特性:一种带有其必然规律性的第二自然对我们环境的统治”^[3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生产关系,德波用景观和观众的关系置换了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他认为以商品和货币为中心的传统工业社会已经转向了由视觉映像和景观所统治的新经济秩序。这正是景观理论的深刻之处,它透过景观的表象看到了媒介的虚幻景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在其中资本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更加隐蔽而深入了。

德波敏锐地指出,景观还通过支配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奴役,即对人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工人用于谋生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必然会增多用于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这正是劳动者获得解放的标志。而在德波看来,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已经从劳动时间转向生产之外的自由时间,从生产车间转向社会、家庭生活和私人空间。景观对于人的无意识心理控制和制造“虚假需要”,在消费活动、休闲娱乐等领域中悄然发生了。由此,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大大扩展了。正是由于景观能在一切闲暇时间中对人进行欲望驱动,才使物质生产更加远离人之真实需要,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景观通过欲望催眠像梦魇一样监护着现代社会,我们生活在福柯(M. Foucault)所描述的圆形监狱之中,无从

逃避更无以反抗。

(三) 拟真：符码的操控体系

鲍德里亚分析了雅各布森(A. Jakobson)提出的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

传递者—信息—接受者
(编码者—信息—解码者)

这里的总体模式是从传递者到接受者的单向过程，一方可以言说，而另一方却不能回应；一方有选择符码的权力，另一方则只是受限制而默认接受。传递者与接受者并不存在交互性(reciprocity)关系，它们也不能相互依赖而共同存在。这个单向的传递过程取决于作为桥梁的信息，而信息由各种符码所构造。符码的组合和传送保证了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流，从而成为媒介传播最本质、最基本的单元。虽然编码者和解码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符码的编制者却掌握着符号解释的惟一性。媒介的符码控制着意义的生产和阐释，从而重构了一个新的信息和事件，“大众传媒化消费中的意义转向、政治的非政治化、文化的非文化化、主体的非性化都是超越于对内容的‘肆意’重新诠释之上的。一切都是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无论何处、在真实的地点和场所之中，都有完全产自编码规则要素组合的一种‘新现实’的替代品”^[35]。符码变成了惟一的言说者，它操控着信息的意义，并通过结构的两极和信息阐释的惟一性来实现交换和再生产。符码对于交流体系的决定作用使得媒介成为“一个富有神话性的阐释系统，一个封闭的意指关系的模式体系”^[36]，这就是大众媒介的精髓所在。媒介传播的信息，既不是大众关心和受益的，也不是报纸、电视或广播所选择的，而是被一种符号/形式所重述的、在一种模式中被符码操控的内容。媒介成为最为细致、最为隐蔽的筛选、消解和审视机制，“这就

是媒介真正的抽象性。社会控制和权力体系就植根于此”^[37]。

符码重构了信息并改变了意义的传播和效应,而媒介的拟真模型则改变着现实的生活。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技术,更是一种模式化的控制机制。电视、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都是根据某种编码规则对事件和信息进行重新组合、诠释后再散播出去,从而将媒介自身最抽象、最严密的自主逻辑渗透到意义的建构当中。这种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技术的创新和运用,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它承载着的意识形态是,那个对已变成符号系统的世界进行解读的系统是万能的”^[38]。大众面对的是经过媒介的技术性过滤、剪辑和重新创造的意义。大众媒介借助影像、屏幕、符号等改变并主导着现实生活。媒介对于信息和现实的重构,推动着超现实概念走出艺术和想象而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并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社会控制模型”。个体被迫对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预先设计好的符码和模型做出回应,而这些回应都是事先被设计和被控制的。如果说马克思看到的社会控制力量主要包括法庭、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了大众媒介的霸权本质,福柯挖掘出社会操控人的一整套机制,从身体规训到空间管理、再到精神定性。而鲍德里亚则从日常生活的影像、符码和模型出发,阐述了拟真的世界如何影响和控制人的行为与精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拟真既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运行规则,也是以后现代视角进行社会批判的一个崭新而有效的工具。

二、媒介操控下主体的命运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文化是人的异化的重要原因。大众媒

介传播着统一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给现代人灌输特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从而造成人的生活千篇一律,工作程式化、娱乐模式化。在媒介齐一化的规训之后,大众所具有的思想丰富性和人性多样性开始失去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能力,失去了批判思维和反抗行为,最终不知不觉地沦为社会统治机制的附庸。这种统一化的结果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所必需的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媒介被看作科学技术的一种具体对象和主要代表,是技术的外化和代名词。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灌输和操纵手段,在制造虚假需求和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形成单向度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德波阐述了景观对人所造成的异化。景观通过休闲和消费、服务和娱乐等文化设施来散布它的麻醉剂,通过广告的诱惑和商业的媒介文化控制人的行为。景观是一种隐性的暴力,在无声的控制中达到了对人的深层奴役。大众预期越多,他生活就越差;他自己的需求越受到影像的主导,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越少。并且,景观悄无声息地消解了主体反抗和批判的能力,人不得不无意识地臣服于景观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从而无法看清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人的分离,“景观是一种将人类力量放逐到‘现世之外’,并使人们内在分离达到顶点的技术样式”^[39]。景观造成了人的分离一方面表现为财富的增长被异化为社会运动的惟一内驱力,人的存在反而成为疯狂追逐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个体被机器系统和劳动分工“碎片化”为某种姿势、动作并沦为机器的附属物,从而失去了个人的全面发展,“景观展示其所是:一种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基础的、受制于机器的独立劳动的、产生于一种日益精确地将劳动分工碎片化为姿势和

动作的自在发展的分离力量。于是,工作的目的就只是为了不断扩展的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力量不可能再重新统一起来”^[40]。德波并没有沿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而是使用一个生活化的概念:分离。景观社会是造成人的分离的现实社会基础。当然,分离无非是人的异化在景观社会中的崭新状态,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揭示资本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整个社会生活。可以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景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分离和疏远的实质性表达”^[41]。

媒介技术笼罩下主体的命运,一直都是批判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在消费社会和媒介拟真的话语中,鲍德里亚揭示了技术统治下人遭受到的异化和消解。首先,主体失去了丰富的个性而沦为媒介机器的附庸和延伸。广告作为意指方式的典型代表,以一种非表征的、非工具性的传播方式对主体进行重新构建。在消费领域里,广告通过符码的运作改变着主体的“真实需要”,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满足手段;在政治领域里,广告从根本上瓦解了大众的独立思维,削弱了他们辨别真伪、行使权利的能力。而面对媒介传播各种信息的包围和渗透,人越来越多地被资讯所填塞而成为信息的接收器和回收站。由于意义的过度轰炸,主体从能动思维的动物退化为储存信息的动物,并因超负荷的信息接收导致了信息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征。“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谈得更远一些,在电视和当代大众传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42]。媒体借助于多元的信息传播,将主流意识形态连接到人

的认知结构中,从而将主体的思想、体验、欲望和价值观都整合到同一的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之中。主体越来越成为媒介的隶属品和应声虫,失去了多样化的反思能力。

其次,在媒介机器的操控下,主体成为一种符码,消失在后现代的技术拟真之中。在波斯特看来,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是建构在印刷传播形式之上的,而电子媒介时代由于符号结构的不稳定性,主体变得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传统的认知结构把语言看成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而电子媒介的交流展现并放大了语言的自我指涉。语言结构消解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密关联,它反过来“指涉自己,颠覆了指涉性,因而作用于主体”。主体在技术和意义的符码中被重新建构,并被牢牢地镶嵌在体系之中。“波德里亚赋予‘代码’以一种权势,几乎要统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符号与代码给主体在等级制社会秩序中指定了位置,并将他们锁定在一套只能容许商品交换和符号交换的话语中”^[43]。在拟真的吸入装置、网络装置以及强制性的认同装置中,主体不仅消失了,而且消失就是它自身的策略。主体将自己变成无法穿透和毫无意义的平面屏幕,在DNA的符码中寻找着生命的源泉,在民意测验机制中呈现出自己的意愿。这既是主体消失的方式,也是他们逃避现实的惟一通道。现代主义哲学的传统范畴,如意志、表征、选择、自由、解放、知识和欲望等范畴,难以对当代的媒介、信息和主体进行有效的分析。因为这些范畴是依赖于这样的道德律:你必须认识你自己,你必须知道你的意志和欲望。然而在拟真时代里,主体被剥夺了“身体、欲望、机会和自由的权力”。符码重塑着我们的需要和欲望,进而重构着后现代的主体。这就是主体在拟真世界中的新境遇。鲍德里亚对于主体在拟真世界中的异化,既延续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继承着法兰

克福学派从启蒙主体出发对大众媒介的批判,又与后结构主义者关于主体在文字和符号中被延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第四节 媒介拟真的后果

——“沉默的大多数”与“社会性的终结”

立足于后现代的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概念,鲍德里亚质疑西方社会学中“社会性”(the social)一词的真切意义。在《冷记忆》一书中,他提到在日文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来翻译“social”,在巴西和伊斯兰教世界中也存在类似情况,由此可以推断“社会性”是近两百年来近代欧洲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特有概念^[44]。这一特定概念是西方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理论基础,“在社会学中,预设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社会和‘社会性’,由此可以进行量化研究、统计分析,也许事实根本不是如此”^[45]。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侵入,阶级、社会关系、社会性等概念在拟真的世界里内爆了,那些把个体、阶级或大众作为行动主体的传统政治、社会、阶级冲突、社会变革等理论都显得过时了。媒介和信息的加速生产在表面上产生了更多的社会性,而在本质上却使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失去效力。社会被媒介和信息所侵蚀,被大众所吸收,这一词语“被当作每一种话语的普遍性的不在场之托辞(alibi),从而它不再能分析任何事物,不再指认任何事物”^[46]。

一、“沉默的大多数”

鲍德里亚用一系列隐喻试图把握“大众”的特征,他把大众描述成“富有弹性的指意,不透明但平等的超验现实、虚无;作为统计意义上的水晶球”、一种“惰性”、“沉默”的力量,“无声的指涉物”,

“个体在真空中的集合体”等等^[47]。他认为大众一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而是政治话语操控的一个工具。社会学试图用更为细致的范畴来定义大众,如社会职业、阶级等级、文化分层等。然而这些划分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只是人为制造的概念(例如具有超自然的魔力的“mana”就曾是这样的概念),无法表达大众的本质。具体的社会群体同样无法指称大众一词,工人、农民或其他社会主体都不能准确、完整地代表大众。鲍德里亚说:“大众没有属性,没有谓语(predicate)、没有特质(quality)、没有指涉。这就是它的定义,或者是定义的绝对贫乏”^[48]。任何试图对“大众”进行定义和描述的努力都只是想把它转化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都是在表征的结构中以某种理念、概念、属性来呈现“大众”。旧有的定义是建立在两极之间分隔和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今天,大众是一个吸收和内爆的地方。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基础的“社会”已经内爆为大众,社会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领域,它丧失了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力。大众“既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真实,又是通过社会而产生的拟真;既是被社会所形成的,又一直存在最终被社会所吸收”^[49]。

大众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只有大众与社会之间信息传递及时、准确,他才能焕发激情地参与到社会当中,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和能量。然而,作为社会与大众之间信息传递的中介,媒介的干预改变了二者的这种直接互动。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传播的两级模式,即大众媒介—意见领袖—受众。然而一般受众对于层层中介后的信息并没有构建一种积极的接收结构,并没有对统一性的信息进行有效的解码。他们对信息进行拦截(第一层),然后进行转换(第二层),从而回收信息并使它们成为自身的循环。媒介曲解、误导了大众对社会的认知,

从而不能通过意义的传播来构建社会与大众的关联,无法以社会之名来表述大众的意愿,而只能通过统计学模型、民意测验、投票、调查等方式来完成对大众的拟真,“现在的投票、测验、公民选举、媒介都是一种设置(device),它们不再属于表征的维度,而是属于拟真的维度。他们不再是一种可见的指涉,而是一种模型”^[50]。大众接受了民意测验,但他们并没有表达自己;他们被测试,但并没有反省自身。随着意义交互的断裂,对于大众的表征已经成为不可能,只能通过民意测验、公共调查等方式并借助于统计学模型来完成对大众的拟真。大众意愿不再是社会、政治意志的表达,而是处于信息和统计等拟真模型的控制之下,“它不再是一个表达或表征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曾经不能表达和无法表达的社会的拟真。这就是他们沉默的意义”^[51]。

面对媒介的操控,大众失去了批判性、能动性和激进变革的动力。鲍德里亚认为,“批判性大众”一词是与外爆过程相关的,然而一旦信息的过量繁殖和意义的消解使大众迷失在社会之中时,批判性的阶段就被超越了。然而大众并非只是一味地消极、悲观,他们也在进行着反抗。这种反抗首先表现为大众的一种惰性(inert)。作为表征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地制造出意义和信息,然而它们受到了大众拒绝和排斥。大众吸收并消化了媒介传播的所有内容,却没有任何心理上或行动上的反应,它成为一种惰性的、中立化(neutral)的力量。大众“吸收了所有的社会能量,但并没有折射这种能量。它吸收了所有的符号和每一个意义,但不再反映它们。它吸收了所有的资讯并消化了它们”^[52]。鲍德里亚喜欢用科技的比喻来表达理论,他把大众比喻成“黑洞”,吸收所有的社会能量,冻结一切外来事物。天文学中的黑洞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任何物质一旦进入就无法逃脱,而现在大众就是“个体颗粒

在真空中的集合体,拒绝着社会和媒介驱动:它是一个不透明的星云,它注定要吸收所有周边的能量和光线,最终在自身的重量中崩溃。这是一个把社会吸入其中的黑洞”^[53]。大众是社会信息和能量的贮存器,它吸收了国家、历史、文化的所有意义。媒介的传播并没有改变大众,而是“信息使更多的‘社会领域’失效了,信息越来越多从而产生了惰性的的大众,使得传统的社会机构和媒介信息都无法渗透进来”^[54],大众以一种惰性的姿态拒绝了媒介的灌输和压制。

大众反抗的另一种形式是沉默。传统理论认为媒介作为一种控制和操纵的权力策略,迫使大众沉默与顺从;然而鲍德里亚认为,真实的情况是大众躲藏在媒介的背后,这是大众利用媒介而消失的策略。对于过量的信息,大众从来不进行激进的、否定的、颠覆性的回应,他们唯一的行动是沉默。沉默意味着不可能出现信息的反馈、回流、循环,意义只是单向度地传递。由此大众成为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一种虚幻的指涉”,任何借大众之名行事的策略都只是一个类似“皇帝新装”的童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不存在,而是说明对大众的表征已经不可能了。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表征沉默的大多数,这就是大众的报复。沉默并非一种消极、麻木的行为,而是一种“充满策略的反抗”,是一种“绝对的武器”。沉默并不表示大众的消极与悲观,反而是他们权力的标志。“沉默是一种权力,一种回应,沉默是通过迂回而产生在大规模的回应,沉默是一种策略。沉默不只是一种消极性,它恰恰是把意义、操控的宏大系统、政治和信息推向终结的手段”^[55]。对于媒介的包围和控制,过去的反抗方式强调通过对信息和意义的重新阐释和准确理解来进行。而现在大众已然变得惰性和沉默,并由此拒绝媒介的意义传播。通过这种策略,不是媒介压倒、控制大众,而是相反大

众包围、吸收了媒介与信息,大众成“一种比所有媒介更强有力的中介”,大众造成了电影从纪录片转向娱乐和虚构,迫使科学和技术为大众娱乐生产出诸如月亮飞船之类的景观,推动着国家机器提供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促进生产力的增长来满足大众的需要和消费。由此,产生了一个反讽和悖论,“正是社会以各种形式为大众生产出的惰性,使大众超越了它的逻辑和界限,并破坏了社会的整个体系”^[56]。

面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马克思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消除分化与差异,才能改变私有制对人的剥削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能够精确而全面地控制一切事物的完整体系,对它们进行颠覆和革命的策略几乎不可能了。大众面对无所不在的控制和权力,惟一的出路就是惰性、封闭和无限的沉默,鲍德里亚“完全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倾向,提出大众的力量在于他们对意义和参与的拒绝”^[57]。虽然鲍德里亚也一直寻找反抗媒介统治并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然而在变革的主体上,“沉默的大多数”一词表明了“由于拟真和抽象在冷战技艺中的影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指向政治主体的让位以及大众成为空洞的符号”^[58]。鲍德里亚以“大众”取代“阶级”概念,以大规模的、无差异的大众消解了阶级、种族等社会群体,因为社会大众“同任何历史的社会指涉物——阶级、国家、民族或无产阶级——都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它经常只不过是一个统计学的实体,其惟一的踪迹只是出现在社会调查或是民意测验中”^[59]。由此,鲍德里亚否定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分,最终消除作为社会变革最根本的经济因素,也否定了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反抗的形式上,他采用一种消极而被动的策略,不能从经济生产和社会制度中寻

找变革的根本路径,从而不能使理论转化为真正的革命实践。

二、“社会性的终结”

大众以惰性、沉默的方式拒绝着媒介的传播和意义的循环,从而对大众的象征被转换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拟真。以大众为主体的社会现在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表达大众的意志,由此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性概念受到了质疑,“这是它终结的符号:社会的能量被颠覆了,它的特性丧失了,它的历史品质和理念消失了,从而有助于一种结构形态的形成,在这种结构形态中不仅政治变成发散性(volatile),而且社会本身也不再有自己的名字”^[60]。在媒介和电子信息时代,社会形态逐渐电子化、虚拟化,个体之间通过电子线路、网络空间等各种技术媒介而形成交往,媒介和信息压制、弱化进而消解了大众,最终导致社会性的终结。“波德里亚暗示,当意义、阶级和差异内爆为无差异的‘黑洞’时,社会理论失去了它的对象,在社会集团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固有差异内爆了,并且具体的面对面的社会关系萎缩了,个体消失于拟真世界——媒介、电脑、虚拟现实本身。当激进的政治失去它的主体和力量时,社会理论本身就失去了它的对象”^[61]。

对于“社会性的终结”命题,鲍德里亚通过三个假设进行论证:

第一,“社会从根本上从没出现过”。社会“只是一个拟像的实体化”^[62],它从来不存在任何的“社会关系”。在鲍德里亚看来,社会性一词只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一种理性建构,它以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总体话语完成了对大众和一切存在物的拟真。如果社会只是一种拟真,那么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研究只是一种知识的游戏,只是假借对“社会”的阐述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对于努力构建社会概念的人来说,社会的存在只是一个错觉。社会总

体理念、社会的消耗和内卷、社会边界的突然崩溃,这些都非常突然且毫无理由,似乎社会作为一个精确定义、内涵严格的概念从未出现过。

第二,“社会确实出现过,而且它将越来越多地出现,社会遍布(invest)于所有事物之上”。传统观念把社会纳入到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与之相反,脱离了这一线性发展过程的一切事物都被排斥为残余(residue)。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既带来物质和精神的丰盛,同时也伴随着残余物、排泄物的堆积。我们既处在社会的文明之中,“同时处于不可降解的、不可毁坏的残余物之中,这些残余物随着社会的扩展而不断地堆积起来”。可以说,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残余物的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从1544年巴黎设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流浪者、精神病人的收容院,到19世纪延伸成国家救助,再到20世纪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看到社会在整个历史之中都在扩张着,它作为对剩余物的一种‘理性’控制,是剩余物的理性生产”^[63]。与不断增长的社会理性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共同体都变成了残余物的集合,“当残余物上升到了整个社会的维度,我们就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化(socialisation)”^[64]。

从对残余物管理的角度看,今天的社会呈现出它真正的面目:社会不再是一种冲突的政治结构,而是一种惠及广大民众的管理制度。社会作为个体与环境之间交换平衡的一种方式,它是物种功能性的生态系统和自我平衡的群落。社会是一种有助于解决生活困境的安全空间,为大众提供有品质的生活和全方位的保险。然而,社会作为一种整合机构,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和控制,受到了完全的规训和社会化。社会在对每一个个体进行归类整理,分别管理,“在生产理性的符号之下,社会首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幽禁(reclusion)空间,而在拟真和威慑的符号之下,

社会则变成了巨大的排异(preclusion)空间”^[65]。个体注定要在不断扩张的社会性中寻找他们的位置,而一旦追赶不上社会的步伐,个体就被认定为一种残余。然而当社会的进步剔除掉所有的剩余物之后,它本身也变成是剩余物,“当每一个人被社会化后会产生什么?那时社会机器会停止运行,运动的过程会被倒转,从而整个社会系统将变成剩余物”^[66]。一旦所有的个体都被社会化,残余物被消灭殆尽,那么社会也开始走向终结了。

第三,“社会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但现在已经不再出现了”。社会作为一种粘合性的空间和现实性的原则在历史上长久地存在过,这种现实性原则包括:社会关系及其生产、理性的抽象、历史的冲突和矛盾、社会的结构和风险等等。这些现实性原则是整个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权力、资本、劳动等意义产生的透视(perspective)空间。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层意义上的社会处于拟像的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的漫长历史时期,然而当社会进入拟像第三阶段即拟真时代时,社会就消失在信息时代由拟像和符码所形成的超现实之中,它开始走向了终结。

社会的真实存在是以理性契约为前提的,社会充满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与私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这种契约、辩证的社会性现在被交往(contact)所替代,社会的透视空间变成循环性、电子化的网络。鲍德里亚问道,在电子信息化的拟真时代里,洛杉矶的社会性体现在哪里?未来时代的洛杉矶一定是处于电视、电影、手机等虚拟的影像之中。拟真的交往是一种总体维度,是作为信息终端的个体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转换的超现实空间。那个具有深度指涉和内在逻辑的现实世界现在被转化了一个平面的、空洞的、模型化的技术世界,“只能在透视空间中存在的社会,将在拟真的空间中死亡”^[67]。拟真的空间使现实与网络、真实

生活与虚拟世界之间界限变得模糊,它既不是被转化成现实,也不是被抽象为理念,而是形成一种吸收和消解现实生活的超现实。如此一来,以现实为基础的社会在拟真中被吸收,转化为一种超现实的存在而走向终结。

鲍德里亚关于社会性终结的论证是建立在拟像、拟真与超现实理论的基础之上。如果社会从未出现,那么构建在其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就是一种谬误和幻觉。而假设社会曾经存在过,并且以它的强制力把一切事物都纳入到社会化管理之中,社会成为一个产生并控制残余物的理性机器。而一旦每一个个体都被社会化,随着残余物的消失,那么社会也将终结。事实上,鲍德里亚要向我们强调的是第三种意义上的终结,即在拟像的进程中考察社会性终结的论断。在拟像的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表征结构仍然发挥着作用,现实性原则依然有效,由此构建的社会关系发挥着主导作用。社会在不断地形成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然而这个过程是短暂的,随着拟像第三阶段即拟真阶段的到来,一方面,现实性原则被超现实的世界所取代,由媒介和信息技术所开始的交往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旧有的社会科学分析基础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媒介创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意指系统,大众成为由拟真模型产生出来的数据和符号,媒介压制、弱化并最终消解了大众,从而使得一切社会能量和社会关系都失去作用,“由于媒介和信息的‘非理性’暴力而造成的社会自身的分裂,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形成了原子化的、核子化的、分子化的大众,导致了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性迅速被带入终结”^[68]。

三、简评与批判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 Thatcher)在上世纪80年代曾宣

称：“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这一对“社会”范畴的遗弃得到了诸多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声援。利奥塔(J. Lyotard)认为社会已经分裂成为原子，“社会变为灵活的语言游戏网络”^[69]。吉登斯(A. Giddens)也曾指出：“尽管使用‘社会’已非常普遍，但‘社会’一词在社会学话语中是难以确定的。”^[70]鲍德里亚在描述了当代社会的超现实现象之后指认了“社会性的终结”。后现代理论家们之所以主张放弃“社会”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一词是一种抽象的、过时的、随意的话语构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概念抽象，并把这个概念强加于复杂多变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之上。

对“社会”范畴的质疑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延续的必然结果。从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并质疑了理性所设置的虚幻世界，到福柯提出“人之死”命题剖析了人文科学如何虚构了“人”这一客体对象，再到鲍德里亚声称“社会之死”，将现实消解在无原本、无指涉的超现实世界。这一后现代批判谱系质疑了由理性话语构建的上帝和人，最终揭示了社会本身也是理性话语的产物。鲍德里亚“社会性的终结”的命题首先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对主体命运深深的忧虑。如果说撒切尔夫人的断言反映了自由主义关于个体优于“社会”整体的论调，那么鲍德里亚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对大众力量的控制、削弱及至最终的消解，社会主体被压制成“沉默的大多数”，表现为惰性、消极、悲观并失去批判和反抗的能力，沦为统治机器的附庸，主体的消解必将导致“社会性的终结”。其次，这一命题也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实在论(social reality)的批判立场。实在论强调社会的外在客观性，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种制度和规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而鲍德里亚说，“我对实在论不感兴趣，我并没有谈论事物的真实灭绝，也没有谈论生命存在的

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消失”^[71]，而是要描述了整个现实世界被媒介渗透，被拟像、符码所包围成形成的超现实(hyperreal)世界。将实在消解成没有原本、没有指涉物的拟像，这是后现代主义固有的解释模式，即把社会还原为文化，将文化还原为语言，于是最终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意指游戏。“无论是社会，还是主体，都只不过是语言中任意制造出来的意义，而所谓‘现实’，其特点就是不确定，不稳定，不可能达成共享意义”^[72]。而一旦社会成为一种拟像和符码的存在，超现实取代了现实，那么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也就消失了。任何事物都是一种无序的、偶然的的存在，整个世界表现为极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鲍德里亚来说，现代社会理论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要寻求隐藏于社会真实深处的规律或结构。在超现实的世界里里，它所蕴含的表现规律已经消失”^[73]，最终导致了建立在实在论之上的社会性之终结。

鲍德里亚关于社会性终结的论述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肯定，特纳(C. Turner)赞赏鲍德里亚的观点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一种新的话语以探讨后现代性这一领域内的复杂问题”^[74]。爱泼斯坦(J. Epstein)认为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社会学，有力地解释了上世纪末发生的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变，“他详尽地阐述了后现代社会学可以发展的形式理论的方向。他的术语可以被看成是提供了一种框架，就好像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为早期社会学分析提供了框架一样”^[75]。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鲍德里亚社会理论存在的一些缺陷，首先表现为在社会研究方法中视角的狭隘。马克思将社会看成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它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而鲍德里亚夸大了拟真现象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程度，认为当下的社会已经被“拟像化”、成为一种超现实的存在。这种视角过多地强调了文化、技术对社

会形成的作用,而忽视了物质生产和人类活动对社会生成的本源
性意义,最终导致一种文化和技术决定论。其次从理论的性质看,
鲍德里亚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和反社会理论的色彩。在他
描述的后现代超现实世界里,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觉,在那里
“表征与实在之间的区别瓦解了,人现在生存于一个一切皆为‘拟
像’的世界。这就意味着,现在没有任何能够领会的世俗根基,可
供从个体和集体的不满中求得救赎,因为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乌托
邦,都已经证明只是幻象”^[76]。传统社会理论以社会现实为分析
对象,力图表征、反映现实或批判性地参与到现实中,而对此鲍德
里亚一一予以拒绝,逃回到一个远离生活的超现实世界。因此,鲍
德里亚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反社会理论的一种代表,他自己也承认:
“可以说我的观点是一种彻底的形而上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是
一个形而上学者,或许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肯定不是一个社会学
家。我所做的唯一的‘社会学’工作就是努力让社会终结,让社会
这个概念终结”^[77]。

追寻 20 世纪以来媒介批判理论的语境转换及其造成的理论
后果,可以更为清晰地审视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里媒介批
判理论的崭新特征和时代使命。批判理论语境的历史发展呼唤着
新型的理论视角和话语,从影像再现到景观的包围,再到由拟真所
产生的超现实世界,从二元对立的表征世界到由符码生成的拟真
世界,媒介批判理论也在经历着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融合
与转向。而鲍德里亚无疑是这一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极端
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之一。一方面,运用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概念
展开的媒介批判理论是鲍德里亚社会理论的中心论域之一,也是
对其概念运用最为成功、最为贴切的理论领域。媒介对当代社会
的影响和渗透使人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拟像和符码构成的超现实世

界里,媒介对现实的反映现在被翻转为媒介对现实的重造,媒介场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它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另一方面,鲍德里亚认为在拟真世界里主体消失在客体中,媒介技术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体的沉默和消失。主体被媒介所灌输和重塑,悄无声息而无从逃脱,最终迷失在信息和意义的海洋里,这成为当代人异化的新形态。在一定意义上,鲍德里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描述了个体是如何被统治机器和思想模式加以控制的,与此相比,波德里亚的研究可以被解读为是对物化和社会控制的更进一步的论述”^[78]。鲍德里亚的媒介批判理论同样在透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关注资本运行如何通过媒介进行着价值的剥削和转移。他从媒介视角对当代社会进行的剖析和审视是后现代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现代的视角拓展和延伸媒介批判理论,关注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主体命运的转变,有助于媒介理论在新时代中重新焕发生命活力,也对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及时代的变化趋势产生了有益的启示。

然而,在描绘了一幅崭新的后现代媒介图景的同时,鲍德里亚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欠缺。一方面,他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媒介对人类主体的统治和异化,然而却没能看到媒介技术对于主体发展的巨大作用。媒介的普及和传播拓宽了人类接触和认识世界的眼界和视野,为主体自身的发展和提升创造了有利的信息环境和技术支撑。实际上,网络链接、信息平台、互动电视等媒介正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主体形成和生存必不可少的技术环境,对主体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鲍德里亚仅仅悲观地看到媒介对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媒介在当代人类生活中扮演的积极作用,最终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

样走向了充满悲观论调的宿命策略。另一方面,鲍德里亚过分地夸大了媒介技术和文化对社会影响程度,他的理论“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受它们自身的建构性影响所决定”^[79]。尽管媒介深刻地影响和重塑着现代生活的面貌,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然而,在媒介世界之外,经济因素、政治力量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力量共同塑造了社会形态,媒介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鲍德里亚一味地强调媒介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而忽视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在把批判理论从物质生产转向文化、技术、意识形态的同时,鲍德里亚也悄然从唯物主义转向了唯心主义,走向了技术和文化决定论。

注 释

[1]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 226 页。

[2] 同上书,第 251 页。

[3] 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89 页。

[4] 德波:《景观社会》,第 3 页。

[5] 同上书,第 6 页。

[6] 同上书,第 5 页。

[7]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1.

[8]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第 8 页。

[9]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68.

[10]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228 页。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 218—219 页。

[12] 参见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106—107 页。

- [13] 博德里亚尔:《完美罪行》,第 75 页。
- [14]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229 页。
- [15]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69.
- [16]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 224 页。
- [17]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127 页。
- [18] 转引自毕晓普、凯尔纳:《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49 页。
- [19]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2 页。
- [20]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79.
- [21] Ibid., p. 80.
- [22]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68.
- [23]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83.
- [24] Ibid., p. 27.
- [25] Ibid., pp. 28—29.
- [26] Ibid., p. 28.
- [27]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68 页。
- [28]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pp. 63—64.
- [29] Ibid., p. 47.
- [30]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219 页。
- [31] 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 1957—1972 年存在于欧洲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关注日常生活的批判,倡导革命与社会变革,积极建构具体的生活情境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德波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 [3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 [33] 凯尔纳:《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载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4 页。
- [34] 德波:《景观社会》,第 7 页。
- [35]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17 页。
- [36]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74 页。
- [37] 同上书,第 168 页。
- [38]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14 页。
- [39] 德波:《景观社会》,第 7 页。

- [40] 同上书,第 8 页。
- [41] 同上书,第 99 页。
- [42]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14 页。
- [43] 转引自波斯特:《信息方式》,第 90 页。
- [44] 参见波德里亚:《冷记忆 1》,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2 页。
- [45]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81.
- [46]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p. 80.
- [47] Ibid., pp. 35—36.
- [48] Ibid., p. 37.
- [49] Rex Butler, *Jean Baudrillard: The Defence of the Real*, pp. 61—62.
- [50]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p. 48.
- [51] Ibid., pp. 48—49.
- [52] Ibid., p. 53.
- [53] Ibid., pp. 36—37.
- [54] Ibid., p. 51.
- [55]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87.
- [56]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pp. 65—66.
- [57]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 250 页。
- [58] 毕晓普:《波德里亚、死亡与冷战理论》,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46 页。
- [59] 卢克:《美学生产与文化政治学:波德里亚与当代艺术》,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91 页。
- [60]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p. 47.
- [61] 凯尔纳:《让·波德里亚(1929—2007)》,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6—17 页。
- [62]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p. 83.
- [63] Ibid., p. 85.
- [64] Ibid., p. 85.
- [65] Ibid., pp. 86—87.
- [66] Ibid., p. 86.
- [67] Ibid., p. 92.
- [68] Ibid., p. 51.

- [69]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第 65 页。
- [70] 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27 页。
- [71]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es*, p. 132.
- [72] 希林、梅勒:《社会学何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8 页。
- [73] 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第 184 页。
- [74] 转引自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第 190 页。
- [75] 爱泼斯坦等:《致命的形式:朝向一种媒介文化的(新)形式社会学理论》,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01 页。
- [76] 希林、梅勒:《社会学何为》,第 240 页。
- [77]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es*, p. 106.
- [78] 凯尔纳:《让·波德里亚(1929—2007)》,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7 页。
- [79]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5 页。

第五章

“拟真试验场”——政治与文化批判中的后现代概念

我们已经进入了“拟真时代”，这是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基本特征的断言。技术的符码和模型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决定因素，超现实成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拟像、拟真与超现实等概念同样是鲍德里亚对政治领域、军事战争和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重要工具。他把政治领域的民意调查看成是对公众意志的拟真，把民主选举看成是二元符码的权力垄断，从而揭露了民主政治的虚伪和独裁本质。在对海湾战争的评述中，鲍德里亚强调了军事拟真和媒介技术对战争的影响和主导，战争被描述成一种发生在屏幕、电视和影像中的超现实现象。超现实的战争进程既掩盖了战争的非正义和不人道，同时也成为了西方大国推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鲍德里亚把美国文化看成一个“拟真的试验场”，它更多地显现于电影、屏幕和影像之中，如同自然沙漠一样荒芜和冷漠。相对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没有深度、没有原本，而是一个空洞而纯粹的拟像。在对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剖析和批判中，鲍德里亚着重阐明了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以此阐述各种

政治和文化现象并从中揭示资本主义新的社会面貌和统治方式。在这里集中地体现了鲍德里亚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原本消失、指涉脱离中显示出后现代主义对于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消解,在强调客体世界的同时也意味着主体的退化和消失。

第一节 代议制对公众意志的拟真

表征(representation)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它于14世纪出现在英语词汇之中并被广泛运用于文艺理论,后来延伸和运用于政治领域,其基本语义是指在呈现、在场(present)之后“再度在场”。在构词上看,表征具有反映使不在场者再度(re)呈现之意。表征强调的是作为不在场的一种替代性出场,而且这种表征与其表征对象在本体论上具有平等地位及至等价同质性^[1]。在西方的思想史里,表征概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政治领域中的表征体现为一种民主的理念,它通过代议制民主来表征所有选民的意志;其次在道德领域中,“道德的善只能通过一种没有经验对象的纯粹法则的空白的陈述”;最后,严格意义上的表征概念是描述被表征事物的真理,它力图使表征对象再度呈现和表达,这一点构成了前两个领域的基础并给它们规定了条件^[2]。

一、表征与民主

在西方的代议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中,表征“是代表(delegation),在议院中某一个体代表着另一个体”^[3]。民主体制中的议员、民意代表、党派、工会组织等都声称代表了某种利益团体,在政治选举中为普通的民众主张权利。每个选民通过其代表参与公共管理,公众的意志通过作为选民代表的议员(repre-

sentative)而表达出来。要使选民的意志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来,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议员与选民之间具有直接与真实的联系,议员能够代表选民。惟有如此,表征出来的观点和意见才是真实的选民意志。然而,作为间接选举的典型制度,代议制在表征民众意志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困扰,从而使代议制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虚构的产物。首先,由于媒介在意义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普通民众的意愿在技术的操控下被扭曲和篡改,从而导致了代议民主制失去了真正的民意基础。其次,公共机构和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少数人的商议取代了公开的公共讨论。于是,代议制在政治生活中将普通民众排斥在民主制度之外,民众的意见被削减和压制并最终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民主假定了代表权,由于代表权的失败,所以民主也失败了。他们由此断定,民主仅仅是大众的聚集,而不同意见则再无可能。代表制强行取得意见上的一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民主制度控制着少数人和那些持异议者的意志”^[4]。

后现代主义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批评未免过于悲观,如果真如其所言,在公共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意愿无法通过代议制而表达,那么代议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民主的危机也会随之而来。虽然代议制民主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不能完全真实地代表民众的意志,它为统治阶级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一旦离开这种民主制度,现代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寻求更为合理的表征方式成为公共生活领域的重要论题。通过更为直接、广泛的民主形式,“提倡作为地方自治的直接民主——在那里,每个公民都可以参加政治讨论,因为这有助于小团体本身的发展”^[5],使得代议制民主更为完善和可靠。为了更好地解决政治表征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裂痕,哈贝马斯构建了公共领域的话语共识。他认为代议制

民主仅仅复述或维护了某些权威人物的个人意见,或者只是反映了选民、支持他们的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从而代议制变成各种利益的转换机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生活是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在这里所有公民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新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创立一个自主的公共场所,在其中主体间的沟通仍然是可行的。他们指出,这些场所不应该由利润和市场来控制,它们的功能不在于认同政府的合法性”^[6]。在公共生活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公共话题的讨论之中,都可以提出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意见和观点,在语言有效性的保证下形成主体之间的话语共识。个体通过自由地参与到公共对话和协商之中,通过意见交换和沟通,最终形成一种表征大多数人意见的共识。

然而,公共生活的话语共识真的能实现民众意志的客观表征吗?许多人对此仍然表示怀疑。首先,共识的形成假定了参与者承认各种语言游戏的普遍有效性,而实际上这些语言游戏是异质的,它们从属于不同的语言规则,因此,真实、有效而互动的沟通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没有成功的沟通,公共信息向参与者的传播以及整个话题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其次,在公共生活中个体利益也无法真实地得以表达。公共生活是现代性统治和压迫的一部分,其中的意见和观点交流仍然存在着强势话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讨论和协商的后果必然是某种观点获得通过,而另一些意见和观点则得到了压制和消除,由此形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某种话语统治权。因此,生活世界对于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替代实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构想,而如何使普通民众的意愿在民主制度下得到真实、客观的表征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话题。

二、民意测验：公众意志的拟真

西方代议民主制无法对民众意志进行真实表征的原因主要表现在选民参与意识淡薄、意志表达的非理性和技术操控等。鲍德里亚从当代社会技术发展对于民主制度的影响出发,阐述了政治领域中的拟真和超现实现象。民意测验(public opinion poll)是了解公众舆论趋向的一种重要途径,它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征询调查对象的意见、观点或想法,并以此进行分析和推论。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成为民意测验活动开展的重要运作平台,各种媒介不仅定期刊载各种民意测验结果,还与广播媒体和印刷媒体相结合,自行组织各种话题的民意测验来研究和报道社会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媒介传播的新闻内容能更正确地反映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而媒介也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民意测验途径。“民意调查与电视、电子传媒是相同性质的,而我们已经看到,电视和电子传媒本身也是一种永恒的问/答游戏,一种永恒的民意调查工具”^[7]。媒介的加入大大加强了民意测验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成为影响民意测验最重要的力量并且改变了民意测验的性质。民意测验不再只是对公众意志进行“镜相式”的反映,它更是在引导、重塑着公众意志。

鲍德里亚认为由媒介技术操控的民意测验和全民投票是政治领域的拟真形式。因为在那里答案事先就已经被设计,结果是从规定的选项中产生。由媒介选取的调查样本、设计的问卷模型本身就是对大众意志进行的过滤和剪辑。首先民意测验的选取对象“不是一些真实而自主的群体”,而是被选取出来的样本,是被社会和意识形态模型化的对象。事实上,所有测验样本的选取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带着测验机构的价值判断和主观偏好,“所有传媒都会用一连串的信息限定、切割接受者样本,而事实上,这些信息

是经过选择的问题”^[8]。

其次,在民意测验的过程中,任何信息和选项都是作为问/答二元分立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整个交流系统都从语言的复杂句法结构过渡到了问/答这种二元信号系统——不断‘测试’的系统”^[9]。在对公众意见进行的拟真过程中,答案是从问题中归纳出来的,结果是事先被谋划的。这是媒介所进行的意义单向传播,它不是对调查对象进行测试和反映,而是强制性地灌输了一种意义、一种选择。答案早已被模型化、被限定,交流的循环在意义的封闭中完成,“信息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告知,而是测试,最终是控制”,作为被调查对象的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总体使用近似于阅读,近似于选择性译码——我们在生活中主要不是使用者,而是阅读者和选择者,是阅读元件”^[10]。这种拟真的操作体系把所有的选择都还原为一种二元符码,一种是/否的回答,大众的意见被测验和统计所设计、所操纵。民意测验实际上阻碍了大众的真实表达,“公民投票阻碍了真正的讨论。从这些公民投票中产生出来的公众意见正是一种模拟,是一种超现实,一种比人们的信仰更为实在的超现实”^[11]。

民意测验和公民投票通过问/答的游戏,完成了大众意志的拟真,从而在科学性的外表下虚构了现实,形成了对公共领域和政治民主的操控。这是媒介技术主导下的民意测验给人带来新的异化,“自印刷文化衰落以来,个人意见形成的空间,已被通过民众而传递的诸种过程所吞没。这种阐述方式原发轫于麦克卢汉,其意思是我们再也没有能力确定是投票影响了民意还是民意影响了投票。从某种二元逻辑的角度来看,民意测验只是需要一种事先经过安排的回应”^[12]。如果说在视觉传播时代,感官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主体的反思尚有可能;而在触觉传播时代,我们与对象直接发生感官上的关联,距离与间隔消失了,反思和批判也

就不再可能。选民成为了测验机构意志灌输的对象,成为了选举机器的附庸,而沦为消极的、麻木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媒介拟真的作用下,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超现实的存在。媒介信息以问/答的二元符码重新生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公众舆论”,从而导致了以真实意志为基础的表征体制的终结:

“问/答这种二元图式的泛滥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它粉碎了一切话语,它超越了从此结束的黄金时代里那种能指与所指、代表与被代表的辩证法。这是那些具有功能性所指的物体的终结,这是那种‘有代表性’的代表将获得选票的舆论的终结,这是那种答案在回答的真实发问的终结(这尤其是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终结)。这种过程完全被打断了:真与假、真实与想象的矛盾过程在这种剪辑的超真实逻辑中被废除了”^[13]。

就像国民生产总值(GDP)是生产力的想象之镜一样,民意测验所产生也仅仅是公共舆论的拟像,它是没有本源、没有现实的指涉物。“‘公众舆论’显然是这些样本中最美的样本——它不是非真实的政治实体,而是超真实的政治实体,这种超级现实完全依赖剪辑和测试操纵而生存”^[14]。这是政治的超现实特征,它实现了问/答二元符码与民意测验游戏的完美结合,是与政治游戏具有等价关系的替代性映象。这种游戏以科学体系遮蔽了大众的真实意志,以操控者的话语取代于大众声音,把资本、权力的意志强加给了整个社会。因此鲍德里亚尖锐地指出:“民意调查的问题是它在整个社会实践范围内建立操作仿真的问题,是一切社会实体白血病化的问题:即用传媒的淋巴白细胞代替血液”^[15]。

三、 两党垄断的民主选举

二元符码是资本主义在拟真阶段的普遍法则,它不仅体现在

民意测验和公共选举当中,也作为一种隐喻用来分析社会和政治现象。在鲍德里亚看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楼是二元符码的象征,因为它的出现使一切高楼之间的竞争得以终结。在双子楼尚未出现的年代,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所有摩天大楼一直处于竞争性对峙之中,所有大楼在高度、风格、外观等方面相互对比和参照。而随着这两栋 110 层、415.14 米高楼的出现,其他的一切高楼都黯然失色了。这两座并立的塔式摩天楼不再与其他高楼比较,它们相互映衬与转换,并在相似性中成为无与匹敌的纽约最高峰。城市丛林之中的风格搭配、色彩对比、生态环境等建筑学意指内容在这里消失了,“从此只剩下关于数字二的封闭系列,仿佛建筑作为系统的反映,从此只来源于一种不变的遗传密码和一种最终的模式”^[16]。这种二元符码的对立与循环“意味着一切竞争的终结,一切原始参照的终结”,由此它成为一种垄断的符号,它排除了交换、竞争和流动,“假如只有一座大楼,垄断就可能没有得到体现,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垄断稳定在二元形式上。符号为了变得纯粹,必须在自身重叠:符号正是通过重叠,才能真正地结束自己所指称的东西”^[17]。

符码的二元垄断不仅指向城市高楼的建筑风格,也集中地体现在当代西方民主选举中的两党轮换。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两党轮流执政成为了代议制民主的纯粹形式和典型机制。表面上,两党制在选举中允许不同的党派之间相互竞争,保证不同阶层的选民能够自由表达政治意愿。通过公开投票的方式来取得执政权并相互监督,从而实现平等与民主。而这种两党制在本质上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垄断。在鲍德里亚看来,一元极权制是一种不稳定的形式,它无法保障公众舆论的反馈,无法保障政治这一集成电路上电流的通畅。任何一个政治系统想要长久生存下去,就必

须找到某种二元调节。“这完全不改变垄断：相反，权力只有使自己分解为一些等价的异体，只有使自己分裂为两部分而得到倍增，才是绝对的”^[18]。在二元符码的相互对立和共存中，政治的意见才能相互流通、相互转换而成为统治的意志，两极之间才能相互监督、共同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政党制度中的二元主体之间具有等价关系，“民主在政治秩序中落实了等价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两极的跷跷板游戏中得以完成，这种游戏虽然恢复了两极等价关系的活力，但通过这种极小的差距，让人可以捕获公众的共识，并且重新合拢代表制的循环”^[19]。政治领域的二元符码不仅体现为政治体制中的两党制，也体现了当时国际秩序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共同形成了对国际政治权力的垄断。“随着拟像逻辑对全部政治范围的支配，即使最根深蒂固的对立——例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也被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所取消。”^[20]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无论采取两党制、多党制、一党制或其他形式，其实质和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列宁在评价美国选举时曾深刻地指出：“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所谓‘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21]。立足于经济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两党制只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现其利益和统治的政治制度，它以虚假的政治民主掩盖着经济占有制的不平等。鲍德里亚在考察政治制度时忽视了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只是从技术的二元符码对两党制进行类比，并且认为两党制是政治权力垄断的完成阶段。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政党体系中，不管形式上是二元还是多元，它们都是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概念既揭示了

代议制民主对大众意志表征的虚伪性,也尖锐地批判了政党轮换制所掩盖的权力垄断和虚假民主。然而由于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迷恋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话语,使鲍德里亚对西方政治制度虚假性的揭露仅仅停留于表层现象和简单描述,未能透视制度背后深层的经济根源和利益本质,从而使得其批判理论显得肤浅而无力。

第二节 “海湾战争发生过吗?”——战争与霸权主义

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后现代概念也是鲍德里亚用来分析当代国际事件的一个重要视角。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由模型和拟真主导的战争正在成为军事威慑的重要形式之一。军事大国通过军事拟真和核威慑等方式来维护政治格局并实现世界的总体和平。军事拟真通过精确计算和电脑操作对事件和行动进行量化分析并进行预测和控制,它可以在广义上被定义为是对真实战争的一种延续。战争拟真和操控是冷战时期军事力量必不可少的平衡器,“拟真影响和控制其他空间的力量发展成为冷战世界整合的一个必需的部分,尤其是当战争游戏实际允许军事计划者通过多种核战争脚本来进行时”^[22]。鲍德里亚把核武器看成是“拟真的神化”,它成为当代国际秩序保持平衡最重要的约束机制之一。在冷战期间,军事大国把拥有核武器作为威慑对方的一种重要手段,迫使敌方因面临无法承受的报复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这种核威慑作为一种安全系统防止了任何事变的发生,它作为一种全球策略维护着世界的秩序与和平。真实的战争被拟真的威慑所取代和制止,它们实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世界秩序。

鲍德里亚运用后现代概念从崭新的视角透视当代社会的各种

现象,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新秩序提供有用的工具,在这其中最引人热议的就是他关于海湾战争^[23]的评论。1991年1月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干预之后,鲍德里亚发表了一篇题为《海湾战争不会发生》的评论,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而在战争开始之后,面对许多评论者的嘲笑,他又于2月6日发表了《海湾战争:真的发生了吗?》的文章,质疑战争的真实性。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又宣称战争从未发生。鲍德里亚这些耸人听闻的论断一方面是要说明高科技对战争性质的改变,计算机拟真等技术手段左右着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他强调了媒介对国际事件的影响与重塑,媒体的干预影响着战争的进程,战争成为媒介最鲜活的剧场,“海湾战争的讽刺意味就在于它的超真实性。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场不真实的战争,而是在这战争中,现实和欺骗间造的界限几乎难以分辨”^[24]。

一、高科技的战争拟真

军事领域向来是高新技术主要的发源地和试验场。技术的拟真模型在当代战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并成为主导战争进程的重要手段。军事拟真可以使我们对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对象进行监控,从行星到地球,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它们都可以利用远程电子技术进行扫描和记录。现实的事物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是借助屏幕、声音的拍摄和录入而呈现出来,由此构成了一个由军事拟真所形成的超现实。“拟真环境使资料、信息和购销的实时交换成为可能,如同所有的保障人员坐在同一个房间。拟真影响和控制其他空间的力量发展成为冷战世界整合的一个必需的部分……出于显在的原因,拟真在所有领域里长期、远程、不可预见的功能成为波德里亚集中分析的主要对象之一”^[25]。

专业的战地信息系统、图像系统、卫星监控等设备成为战争展开的微型场所,远距离的信息传送技术主宰着战争实施和推进,这意味着拟真战争与现实战争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在全息图(hologram)、互动媒体、感知头盔、数据手套和其他技术的支持下,战争的指挥和进程存在于一个三维的、由电脑控制的超现实空间之中。从最初的部队调遣到日常命令的下达,从最高级别的战略制定到最基层的战术运用,拟真的决策与指挥使战斗更加精确和有效。在海湾战争爆发的前两年,美国情报部门就发现伊拉克在为入侵科威特进行着电脑拟真和军事演习。当多国部队到达科威特城时,士兵们在伊军指挥部里发现了一个房间大小的城市模型,里面摆放着按精确比例制作的木船、建筑物、公路和各种军事设施。一些研究者指出,伊拉克部队从华盛顿一家军事咨询公司BDM Internation 购买了一种战争游戏软件,并把这种游戏模型运用到对伊朗的战争中。1990年美国广播公司《晚间热线》节目承认伊拉克军队在海湾战争中的行动是从美国购买的战争游戏软件的翻版。^[26]不仅伊拉克部队的行动是拟真模型的运用,而且多国部队也是利用最先进的拟真系统在指挥着战争进程,多国部队指挥官施瓦茨柯普夫将军(H. Schwarzkopf)透露,他每天所做出的战略部署全部通过电脑和高科技装备进行。事实上,美军在战争之前就曾利用扩展的防空拟真系统(EADSIM)对战争最初18个小时的空袭任务进行了预演,并在这种防御系统的指引下展开部署和行动。

鲍德里亚认为海湾战争是“产生于拟真,并由拟真先行”,它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交战双方进行的真枪实弹的战斗,而是一场发生在EADSIM军事拟真系统与BDM Internation战争游戏软件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海湾战争是军事拟真的一种延

伸和运用,“军事集结都是非真实的,犹如我们操弄测量仪器,虚拟地震一样。这不是一场剧烈的战争,也不是一场零度的战争,而是一种肺结核病般,渐进且微弱程度,只允许战争轻触,却不正面遭遇”^[27]。拟真的预测与指挥控制着战争的发展和进程,双方的交战、导弹的拦截、火力的攻击既是精确控制的现实场面,又是由拟像组成的超现实画面,战争“经由诈欺、超真实性、拟像,以及藉事实与影像之演出而进行吓阻之整套心理策略来进行掠夺,藉著以虚拟来预期真实、以虚拟时间来预期事件,以及藉著真实与虚拟之间的混淆而进行掠夺”^[28]。在拟真与现实的交融中,“我们已经不再处于从虚拟过渡到真实的逻辑,而是处于一种藉着虚拟以吓阻真实的超真实逻辑里”^[29]。

二、战争的媒介剧场

技术复制和影像传播增强了战争本身的超现实性。在整个海湾战争中,从打响第一枪到战争结束,从轰炸巴格达之夜到解放科威特城之时,战争的实际进程被多功能的摄像机全程追踪,并通过便携式卫星系统实时传输到全球各地。“这种纪实拍摄术大量地运用了最先进的视觉技术,却很矛盾地以最低质量的图像对现实进行了最高程度的表征。由于有着拟真性战争的保证,在对战争的表征中,图像中心主义(photocentrism)战胜了逻各斯中心主义”^[30]。借助于先进的影像制作设备,媒介传播构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每一个观众都及时了解战争的实况并深入体验战争的种种紧张、刺激与血腥。

大众跟随着电视等媒介记录和直播,身临其境般地进入到战争的超现实体验中。媒介成为战争进程的一部分,记者与士兵一起成为战争的主角,媒介的剧场与战争的现实整合为一体,“当观

众被运送到军事行动的现场亲眼目睹时,传输载体本身也变成了军事行动与新闻故事的一部分了”^[31]。媒介记录、剪辑甚至引导着战争的进程,前线战场的实况和声音被原原本本地传输到国内,战争的媒介景观和作战方式融合在一起。当战争轰轰烈烈展开时,数百万人在街道、广场和家里通过电视、收音机感受到了激烈的交战,犹如一个超大场馆中的演出与观众。所有重要的信息和事件被全景式地传输到观众面前,影像技术所捕捉的内容足以让人产生一种置身其中之感,“在家里接通电视,我们同时在巴格达的领空和沙特沙漠中的指挥和通讯掩体中,体验到纯战争的狂喜,它那荒谬的透明且无限的恐怖使即使是最精细制作的批评也失去效力”^[32]。电视的影像尽管有时会模糊而短暂,其可信度也不如观众亲眼目睹,但是它却是对战争最有效的表征与传播,它比无数的官方发言人、资深评论员的专题讲演更真实、更可靠、更有吸引力。波斯特把海湾战争看成是媒介拟真所形成的一种肥皂剧战争,剧中的主角是信息,剧本的深层理念就是霸权话语,在这一战争剧场中:

“你所获得的信息从最不起眼的细节都令你不得不心悦诚服,结果你彻底无疑地相信政府的政策和军方的效率,每当这样的時候,现实主义的强烈言辞却在你被带到弹着点的那一刻内爆成电脑游戏的超现实主义……电视图像越是想让观众相信它对现实的指涉,图像本身就越来越变成现实。这是电视的拟仿效应”^[33]。

借助于拟真的视角,鲍德里亚认为在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战争变成电影,电影成为了战争”。在他看来,导演科波拉(F. Coppola)采用了美国人发动越南战争的方式制作着电影,战争与电影都是过度、多余的意义生产,它们都通过蒙太奇的方法展开并取得成功。电影中的越南战争是一种技术和

想象的特殊效果,它甚至没有开始发动和打响之前,就已然是一部电影了。“在技术的试验场中战争消解了自身,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主要是一个试验的场所,一个用来试验它们的军备、手段和能量的广阔天地”^[34]。电影成为战争的延伸,而战争在电影的火爆场面中达到了高潮,二者在设计理念、情节展开、经济耗费和技术效果等方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在电影的创作者看来,“越南战争除了是一部电影之外,并无别的意义,这场战争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我们有必要相信这些:越南战争‘本身’事实上也许从未发生,它只是一个梦,一场由燃烧弹与热带雨林组成的巴洛克(baroque)之梦,一场既不是为了胜利也不是为了政治赌注的精神治疗之梦”^[35]。

超现实的战争剧场既掩盖了战争的非正义本质,又以新型方式侵占和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扣人心弦的肥皂剧,还是血腥疯狂的电影荧屏,战争场景正在不断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日常生活休闲和娱乐的一种调剂品,也成为人们放慢步调、愉悦身心的新方式。超现实战争在为观众生产一个情景剧的同时也完成了其社会控制的功能,“电视把人们黏在家里,以集体的迟钝,充分发挥其社会控制的任务:徒然地在原地打转……电视把人们吸得越牢,也就骗得越深,就像是一本烂侦探小说,我们无法相信它可以有多么无聊”^[36]。

三、海湾战争的真实性

评论家对于海湾战争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是全力支持战争,另一种则反对这场战争。然而无论何种观点,它们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即这是一场现实存在的战争,却从来没有质疑这个事件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如果我们不曾质问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及其真实性与可信度,那么不论支持或反对战争,都将是

愚蠢的”^[37]。在鲍德里亚看来,发生在海湾地区的这场军事对抗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它更像是一场“恶作剧”、“丑闻”,是“一场战争骗局,或是由电脑程式驱动的战场假象”^[38]。鲍德里亚的看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对美国军事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乔姆斯基(N. Chomsky)在对海湾战争的评论中,第一句话就是:“以我对‘战争’概念的理解……那不曾在波斯湾发生。”贝斯特(S. Best)和凯尔纳也指出:“海湾战争其实压根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依设计而驱动的超大场景演出”^[39]。如前所述,在鲍德里亚眼里,由于高科技和媒介的大量介入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并最终否定了战争的真实性。在笔者看来,鲍德里亚关于海湾战争的论述从三个方面质疑了其真实性。

首先,这是一场没有对立主体之间的战争。战争总是利益对立双方的一种对抗,是矛盾两极冲突的集中爆发。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却没有对等的利益主体。表面上看,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以萨达姆(Saddam)为领导人的伊拉克部队之间的战斗,是以正义之名对侵略者的一种打击。实际上,萨达姆的长期独裁统治和发动的两伊战争,都是在西方世界的扶持下进行的。美国政府长期为萨达姆所在的复兴党提供帮助,并为伊拉克军队提供各种军事武器。萨达姆政权是西方世界培植和驯化起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对抗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在萨达姆与西方国家之间爆发的对抗,根本不是一个平等的对立主体之间的战争,而是雇主与雇工、主人与背叛者之间的一种反目与复仇。“事实上,双方都是狼狈为奸的共谋者,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这就是为何这场战争仍旧无法被理解、被定义,所有的战略都让位给共谋了”^[40]。没有对等主体的战争事实上只是美伊双方完成的一次军事共谋和利益交易的游戏。

当人们盛赞海湾战争中美国对伊军的打击犹如外科手术般精确时,鲍德里亚也把这场战争比喻成通过试管授精而分娩的婴儿。因为它无需男女双方的性行为,无需对立的个体,“这场战争却是一种无性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一套电脑程式驱动战争处理过程,敌人只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个标靶,就像说性伴侣只是色情电子网路荧幕上的一个密码编号。假如那可以算做性爱,那么或许海湾战争也可以算是一场战争了”^[41]。这是一场针对假想敌的军事行动,敌人只是一种拟像,它存在于拟真的屏幕里,“敌我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遭遇过,其中一方消失在虚拟却预先赢得的战争里,另一方则掩覆在预先败落的传统战争下。他们甚至没见到彼此:当美国人最后在其弹幕之后出现时,伊拉克人早已在烟雾之中消失了”^[42]。

其次,由于高科技的拟真操纵使得战争的不确定性消失了。以往的战争充满各种悬念和无数的可能性,战争的结局也存在着变数。然而在高科技的领航下,天衣无缝的作战计划、准确无误的行进路线、万无一失的目标打击,一切战争进程都在掌握之中。在战争爆发之前,其结局就已经没有任何悬念,甚至在战争之前重建计划已经构想完成,这是西方世界“完美的售后服务”。这种不具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游戏,大大降低了战争的可信度。“无论如何,战争,就如同尼采所说的真相一般:我们不相信当真相脱去所有的面纱后它还会有真相。同理,我们不相信当战争去除所有的不确定性,成为全然裸露的操作时,我们还认为那是战争”^[43]。战争还未开始,胜负早有定数,谁还会相信那是一场战争?

最后,媒介的渗透增强了战争的不真实性。媒介对战争的直接参与就是把新闻记者和摄影器材当作了战争整体要素的一部分。在以往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新闻记者都力求准确、客观地描述战争进程,发挥传递信息、表征事

件的功能。尽管深入实际战场会面临种种生命威胁,但新闻人员仍然会尽量避免向观众展现这种危险的境地,尽量避免把新闻采集过程当作新闻事件本身。然而在伊拉克战场上,新闻记者紧随部队参与作战全过程,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新闻的一部分,信息传达者和传播进程本身就是信息。全世界数百万的民众通过电视等媒介获知战争的最新进展,并通过新闻报道的编辑、概括和标题来解读这场战争。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被强化了,战争一旦进入新闻,就“已经不再是一场实在的战争,而变成一场虚拟的战争”^[44]。在战争的媒介传播中,拟像原则开始支配了一切的新闻资讯,即便是那些最权威的报道也失去了现实的指涉和客观的基础。媒介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着战争的进程,并重塑着公众眼中的战争景象,最终使战争变得越来越不真实,“我们愈是以为接近真实(或真相),就越远离它们,因为它们都不存在。我们越是迫近事件的即时实况,就越陷入虚拟的假象之中”^[45]。媒介场景与战争进程融为一体,战争更像是一部连续剧,固定的演员,确定的结局,隐蔽的霸权原则,如此一来,战争还是真实的吗?

四、海湾战争与霸权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军队之间的这场战争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它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创伤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战争还未开始之前,鲍德里亚认为战争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而当军事行动真正展开并通过媒体和网络铺天盖地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时,他直接否认了由技术拟真和媒介舆论所呈现的“真实”战争,从而在根本上质疑了这场战争的真实性;当军事行动结束、敌对状态消失时,他宣称战争从未发生。鲍德里亚对海湾战争真实性的论述并非对常识的无知与违背,而是带着调侃、戏谑的口

吻,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嘲讽。他对于海湾战争的断言强调了当代社会高新技术和媒介力量对战争的影响和改变,并重新思考战争景观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这场战争“显示了大众媒体传播在建构‘真实’方面难以置信的力量。虽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了伊拉克人民,而且这样的环境再真实不过了,但它的真实暴行被媒介影像埋没阻塞了”^[46],媒介影像将战争编码成一场连续剧,并动员大众支持和参与战争。鲍德里亚以一种讽刺性的语言想要提醒人们,这种战争具有媒介拟真的蒙太奇式效果,它从眼睛、耳朵等感官向我们灌输战争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承认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并在无意识中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大国的霸权主义。因此,如果我们不去质问这场战争发生的真实性,那么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实际上都将在无形中形成这样的认知:相信这场战争为真,乃至于接受和信赖这场战争所贩卖的西方意识形态,并不自觉地成为战争的追随者和推动者。

康德在战争中感受到了“某种壮美”,黑格尔从战争中看到了“主权最光辉的时刻”。然而在这场由政治大国主宰的高科技战争中,鲍德里亚没有感受到战争的壮美,而是它的堕落、暧昧与无聊;他没有体会到主权的光辉,而是目睹了在新世界警察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主权的沦落。战争是西方世界剪除“他者”、重建霸权主义新秩序的途径。美国学者亨廷顿(H. Huntington)认为在冷战之后决定着全球秩序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国际冲突的基本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文化的差异。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这场战争无疑是两大文明碰撞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是西方文明在伊斯兰世界进行剪除异己、排斥他者的武装行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是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皈依者与传教士,得意洋洋地要将他

们的生活方式投射于整个世界。他们无法想象他异者……他们要的是,消减这种他异性,要么令其改宗皈信,若办不到(像印第安人),就将其消灭”^[47]。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传教士,而萨达姆控制的伊拉克军队只是他们的雇佣军。萨达姆政权先是西方世界对抗伊斯兰文明的急先锋,而后背叛主人成为西方势力的反对者。一旦雇佣军走到敌方阵营,幕后主人只好登上前台而成为霸权主义的新雇佣军,“如果他们要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警察,必须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威,以便增加他们的战争操作能力。于是,他们变成唯一纯粹的执行者,而其他所有的人,在这个共识一致、受警察保护的世界新秩序里,都是配合演出的龙套”^[48]。无论是在前台还是幕后,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战争的深层根源都在于利益的攫取和文明的碰撞。

最后,战争表象背后隐藏的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向全世界的扩张与渗透。在鲍德里亚看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政治的统治,也不是为了制止敌对力量的暴力,而是要通过武力威慑来推行和强化西方的民主政治。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暴力比武力压迫更为致命,“这种暴力早已在所有民主政权中成为运作逻辑,如今则在全球层次运作:一个庞大的民主政体,挟着联合国与人权之名,遂行同质秩序之统治”^[49]。美国人身上充满着传教士精神,希望将西方的民主观念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鲍德里亚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这就是美国人试图去做的,这个负有传教使命的民族,提着电击枪将全世界像羊群般驱赶向民主大道”^[50]。霸权主义正是通过战争和拟像传播而不断地向全世界范围渗透。不管高科技的战争如何精确神速,不管媒介的剧场如何惊险刺激,不管正义、解放、自由等口号如何冠冕堂皇,都掩盖不住其背后真正目的是为了西方霸权主义的垄断与扩张。战争的功能是试图把伊斯兰文明纳入

西方文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中,通过军事、经济、民主政治和人权等手段完成西方的霸权主义统治,“唯一(超政治的)目的就是将所有整齐列队在世界的最小公分母上,也就是民主的公分母(由于它的扩张,也就越来越趋近于政治的零度)”^[51]。

运用崭新的后现代概念,鲍德里亚想要揭示一个被技术和媒介等力量所掩盖的战争本质,并把批判的目标指向了西方的政治强权和霸权主义,然而这种视角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缺陷和弊端。诺里斯(C. Norris)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以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和权力谱系学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可以溯源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对应关系的消解。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观念未加批判地运用到文学理论、文化批判和历史观等领域,从而质疑传统哲学的真理、本质、历史等概念。而鲍德里亚的观点无非是这种思潮极端的一种表现,他把“现实”看作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它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符码、拟像和语言所构成。因此鲍德里亚把海湾战争理解为一种由媒介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虚构或幻象的表象”。诺里斯认为这是一种“贝克莱主义的超验唯心主义”的后现代变种,最终导致了一种“反现实主义”和“彻底的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52]。最为重要的是,鲍德里亚将战争的根源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西方的霸权主义,用观念形态解释当代战争和国际冲突,却也忽视了经济基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了隐蔽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出发考察人类社会中的冲突与战争,将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的掠夺与强占。因此,战争背后的根源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与价值观的碰撞,更是经济资源的强占与垄断。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不仅是支撑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强大动力,更是引发战争最本质的导火索。

瑞安·毕晓普等人高度肯定鲍德里亚的评析,他们认为“波德里亚针对 20 世纪后四分之一年代里诸多战争的回应是最具有预言性、最具分析性和最具有策略功效性的”^[53]。鲍德里亚所分析的那场海湾战争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然而围绕着资源、主权、宗教、恐怖主义等问题所产生的军事战争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未曾停歇。战争背后所隐藏的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渗透与抗争、经济利益博弈仍然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主题。从 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到 2003 年的美伊战争,再到近年来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军事冲突,西方国家仍然借助由高科技和媒介主导的拟真战争在推销着它们的民主政治梦想,并以此为幌子来实现其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在长达二十多年对中东事务的军事干预中,一直认为只要他们传输西方式的民主,展示未来美好之路,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就会接受西方的民主思维。然而,伊斯兰千年文明具有的坚强信仰和固有传统在努力构筑一道抵御文明侵略的防火墙,让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步履蹒跚、举步维艰。事实证明,时至今日这场围绕着资源、主权与民主政治的战争仍未结束。而战争背后的文明差异和宗教争端仍然影响着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一元政治体系受到了其他国际力量的强烈反抗,而 2001 年的“9·11”事件无疑是其中最为极端、最为猛烈的一种反抗方式。各种恐怖主义袭击、民族对抗、宗教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的阻力和抗争,鲍德里亚也提醒我们:“世界性共识的霸权愈趋巩固,那么危险就会愈大,或说它崩溃的机会也就更多”^[54]。因此,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共处,必须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相互认同、相互理解;建立起平等、公正的交换体系,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共享,这样才能实现各国独立而自主

地发展,实现平等而互惠的国际交往,最终建立起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

第三节 超现实的美国文化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概念不仅构造一个由符号和符码主宰的消费社会和媒介时代,而且也被运用于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在《拟像与拟真》一书中,他关注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等现象带来的文化效应,揭示了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美国》一书中,鲍德里亚将美国文化看成是一个“拟真的试验场”,描述了其超现实、无深度和沙漠化等特征。

一、超现实的美国

(一) 拟像的完美模型:迪斯尼乐园

鲍德里亚将迪斯尼乐园看作是拟像概念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版本,它是“所有交错复杂的拟像世界的完美模型”。深受其影响的詹姆逊认为迪斯尼乐园既是拟真的典范,也是后现代主义理念的完美呈现,“当代不断涌现的旅游者的假日聚所如旅游胜地、主题乐园,不断增加的、通过公开性展览提供知识的博物馆,就是一些对世界的仿真物(即拟真,笔者注),是对蒙太奇世界及超现实世界的接受”^[55]。在这些超现实的空间中,人们开始远离现实的生活与事物,通过拟真之物来感知外部的世界并重塑自己的现实生活。

迪斯尼乐园构造了一个完全脱离真实生活的超现实世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主题娱乐公园,迪斯尼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美国文化,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成长。迪斯尼创建了以各种卡通形象为

核心的一种影像文化,构造了一个梦境般的童话世界,给人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欢乐体验。在乐园里到处上演着幻想和虚构的游戏,人们可以模拟魔鬼、进入海盗船和未来世界。世界变成一个童趣的乐园,生活变成一种超现实,迪斯尼“并没有模拟真实世界里的任何事物,而恰恰是真实世界在模仿它,具有它的表面而不是实质的逻辑”^[56]。乐园内的狂欢唤起人们心底潜藏的童趣与纯真,让人们在短暂的幻境中远离现实而沉浸于拟真世界里。这种超现实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在乐园之内,而且它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模型和典范。美国的许多居民社区都是以迪斯尼为样本和模型建造起来的,而越来越多的电影也脱胎于迪斯尼的游艺项目,例如《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就完全取材于迪斯尼乐园中同名的游艺项目。由各种卡通形象和人造模型等影像组成的迪斯尼乐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美国社会的生活面貌,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形态,“迪斯尼世界的真正引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城市的替代品。迪斯尼世界对公共文化提出的观念性的挑战反映了一个事实:一个完全人造的空间,一个根本无法真正居住的空间,却能与社会愿望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57]。迪斯尼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缩影,从美国社会的客观面貌到个体的内在心灵,都在迪斯尼的各个角落里被完美地描述出来。不仅如此,这种超现实的生活正成为一种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形式,它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从美国本土扩散到全世界各地。

迪斯尼乐园既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拟真,同时也深刻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功能。与乐园内疯狂的娱乐形成鲜明对比,乐园外是静寂的汽车长龙。乐园内的欢快与狂热,乐园外的冷漠与黯淡,这种强烈的反差凸显了迪斯尼乐园的虚幻魔力,从中可以管窥美国式的生活形态。冷与热的对比显现了迪斯尼乐园对人们

的吸引力与控制力,它让人们忘掉真实的现实生活而沉湎于虚幻的世界里,“由于城市不再具有公共形象,迪斯尼的人造世界就成为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城市的虚拟现实”^[58]。在这里,一切都是被控制和设计的,路线是预定的,步骤是同一的,微笑是模式化的,甚至快乐也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置身于这种超现实世界,游客是被动而无助的,因为我们很难分辨虚幻的迪斯尼乐园与现实美国社会孰真孰假。在迪斯尼乐园虚幻的表演背后,深藏着所有游客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同和向往。在影像的狂欢中,生动地上演着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展现出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概括,美国式价值的颂扬,对充满矛盾的现实进行理想化的转换”^[59]。在鲍德里亚看来,迪斯尼乐园处于第三阶段上的拟像,它遮蔽了“真实的”美国,“迪斯尼的存在就是为了掩藏‘真实’的国家,所有的‘真实’的美国就是迪斯尼乐园”^[60]。永远的艳丽多彩、无处不在的欢笑愉悦,没有痛苦、没有忧伤,迪士尼乐园想要表达的就是真实的美国。当迪斯尼乐园被当作美国生活的符号,当美国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超现实的存在时,迪斯尼就是一个与现实无关的乐园,它隐藏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在乐园之外,社会生活中的压迫、异化和苦难的一面被遮蔽了;在繁荣的美国社会之外,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化正在不断被地蚕食和吞噬。

鲍德里亚把迪斯尼乐园看作美国社会的完美模型,它比真实世界中的美国更加真实,由此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拟真的模型主导着社会的面貌,包括高速公路、城市轻轨系统、时尚、媒介、建筑、房屋规划和购物中心等在内的各种生活设施和内容都是通过模型再生产出来的,它们是符码的具体范例和产品。在这样的超现实社会里,符码和模型决定着个体的身份,主导着商品的消费和使用,影响着政治的运作和文化的传播,它们成为了新

资本主义秩序的组织原则。如果迪斯尼乐园是拟像的完美模型，那么这种模型正在生成一种“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它影响和塑造了现实的生活面貌并引导和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理念。

（二）影像与速度中的美国

迪斯尼乐园是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运用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对美国文化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批判却是在《美国》一书中。在这一旅行见闻录里，美国社会和文化状况被描述成后现代理论的集中展现，“后现代的狂欢在美国上演它最为壮丽和展露无遗的一幕”^[61]。在书中鲍德里亚提醒人们要注意：镜子里的物体可能比实际存在的物体更接近真实。这就是现代高科技和媒介力量所形成的美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它是技术和影像所构成的超现实世界，但比实际事物更接近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美国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种超真实”^[62]。

鲍德里亚把美国看成一个依靠影像、符号和拟像而繁荣的社会，它是拟真最为发达的阶段。美国社会的超现实性体现在主宰世界的电影工业、领先的电子网络技术、发达的虚拟商业系统等方面，而其中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文化更是典型的拟真工厂。好莱坞是世界电影制作的中心，是影像生产的一个主要地点。在那里美国通过符号、影像和连续性画面，为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制作了一个星际的（astral）或“轨道的”场景，“印第安人、平地、峡谷、天空：电影已经吸收了一切。但这是世界上最令人震撼的景观……它既呈现出最动人的深度，同时也呈现出对这一深度的总体拟像”^[63]。社会发展进程在电影里不断地演化着，美国真正的历史已经被转换成一种拟像。美国的拟真文化呈现为空间、速度、科技和电影，“在美国，电影是真实的，因为被电影化的是整个空间，整

个生活方式。我们所哀叹的断裂和抽象化并不存在：生活就是电影”^[64]。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整个美国既不是虚构也不是真实，它是一个超现实的大型电影院(mega-cinema)，“整个国家都像是电影，这是美国最迷人的魅力之所在。你所穿越的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65]。美国的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中西部的小镇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电影的规律和特点，依照屏幕和影像而生产出来的，“大都市似乎是围绕着这种星形网络建立起来的。正如美国存在的事实先于屏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美国是根据屏幕建造起来的，它是某个巨大屏幕的折光……动力学和电影学的融合产生了一种精神结构，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整体知觉”^[66]。生活只是屏幕的一种折射，你穿过的城市、街道就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充满了“沙漠般平庸”的“电视化画面”。因此，“迪斯尼是真实的！电影和电视，这些都是现实！高速公路，西夫韦，天际线，速度，沙漠——这些才是美国，不是画廊，不是教堂，不是文化”^[67]。

美国的超现实特征一方面来自电影、摄像、屏幕等拟真工具的效应，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速度的“眩晕”感。空中穿梭、高速公路、汽车飞驰，在一定速度下的旅行使得眼中的景物“消除了参照点”，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速度导致客体在视觉中失去深度，仅仅留下表层的印迹。鲍德里亚认为“速度创造了纯粹的物体。它自身就是个纯粹物，因为它抹去了地面和地域的参照点，因为它溯时间之流而上而取消了时间自身”^[68]。在视觉、风景、城市、沙漠的层叠交错中，鲍德里亚在追求着一种“消失的美学”。在高速穿行中，沙漠、屏幕和景观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在一定的速度下旅行具有创造客体的效果，它‘消除了指涉点’，失去了视觉的深度，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产生了表相的胜利和颠倒的可能……在这样的一

种方式下,旅游者眼中的风景消失在速度的形而上学之中”^[69]。景物消失而成为凝固而空洞的影像;文化与历史消失而成为了空无的沙漠。我们只能在影像和符号的拟真中重新回味与再度体验,超现实成为体验真实生活的惟一选择。“所有东西都被仿真再现。风景被摄影再现,女人被性的场景再现,思想被文字再现,恐怖主义被时尚和媒体再现,事件被电视再现。……我们会怀疑,世界本身是否只作为广告存在,这个广告可能由另一个世界制作完成”^[70]。如同旅行过后所有的真实经历被转化为影像,它们既是风景和场面的记录,又是获取旅行体验的新方式。

二、地理与文化的沙漠

沙漠是鲍德里亚解读美国文本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他进行文化分析的一个重要隐喻。首先,美国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自然沙漠。在美国广袤的土地上最为醒目的地理特征就是沙漠,一望无尽绵延几千里,跨越中西部横穿整个版图。沙漠里浩瀚的空间、停滞的时间,以及单调、枯燥、荒凉、无生命,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还有偶尔产生虚幻的海市蜃楼,这些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沙漠这种与众不同的自然特性给人带来了特殊感受,“为什么沙漠如此迷人?因为一切深度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决——明亮的、移动的、表面的中立性,对意义和深度的挑战,对自然和文化的挑战,外部的超空间,从此以后不再有起源,不再有参照”^[71]。在这里沙漠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更是一个被掏空了意义和内容的空洞符号,是一个没有深度和指涉物的超现实空间。在鲍德里亚眼里,人类生活空间——大城市就是一个冷漠、平面而枯燥的大沙漠。洛杉矶城市就像沙漠一样是一个平坦的、无限延伸的表面,它“是纯粹的延展空间的力量,是我们在沙漠中遭遇的力量。沙漠形式的力

量：在沙漠中，是对一切痕迹的抹除，在城市中，是对符号所指的抹除，在身体中，是对一切心理状态的抹除”^[72]。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城市里，人类的符号和影像消失了，只留下了纯粹客体、中立性和死亡印迹，在这里，整个社会已经被水平化为一个沙漠，被还原为一个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没有感觉的平面，“这是一种星际的(siderereal)地方。这里仍然保留着(即便是在它最极限的边缘)拟真的感觉时，让一个人自由地飘浮。在那里之外的地方，自然和文化的问题不再出现了；我们超越了现实，然而在这里我们痛苦地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这里的一切事物似乎脱离了现实的原则”^[73]。沙漠般的美国就是社会、意义、真理、历史和真实的“消失之点”，它是一个没有原本、没有深度的超现实世界。

从自然的沙漠到虚洞的超现实空间，这种沙漠化或者沙漠状态就是当代美国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沙漠不过是对文化的沉醉和批评，是消失的沉醉形式”^[74]。鲍德里亚认为不仅美国的整个国土遍布着无垠的沙漠，而且其文化也具有沙漠荒芜、冷漠的特质，“文化、政治以及性都完全被沙漠视角统摄，沙漠在这里构成了一种原始场景”^[75]。在美国，文化与沙漠浑然天成，它们处于一种自发的、野生的原始状态之中，“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闪电般的结合，彻底的无文化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景的结合，自然奇迹和绝对拟像的结合”^[76]。这种沙漠文化“指出了每种人类制度背后的空虚和根本的赤裸。由此，它们将人类制度视作空虚的隐喻，将人类成果视作沙漠的连续性，将文化视作一种海市蜃楼，和拟像的永恒性”^[77]。在鲍德里亚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沙漠化。拉斯维加斯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它在日落之时沐浴着灯火闪闪而从沙漠中升起，清晨时分它在拂晓的微光中，消耗了表面的强大能量而又复归至沙漠

状态,而拉斯维加斯的赌博游戏本身就是一种沙漠的、野蛮的、没有文化的、神秘的形式。“文化自身在这里是一个沙漠,而且文化必须是一个沙漠,才能令一切事物取得平等地位,并在同一种超自然的形式中发出耀眼光芒”^[78]。沙漠被当作美国自身的一种形象,被当作风景、城市、高速公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隐喻。在这个“真实”转化为超现实的地方,展现了美国文化的极度肤浅,它就像一个缺乏任何审美意义的沙漠。

三、 欧洲现代性的超越

《美国》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把美国新大陆与传统欧洲进行对比。鲍德里亚“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建构了一种二元关系,这使他在时间和空间、自然和文化、野蛮和文明、表面和深层的差异中做出了一系列相当流行的评论”^[79]。美国与欧洲的对比不仅体现为地理位置不同、城市面貌和风格的迥然相异,更深层地表现为价值观念和现代性发展程度的差异。当欧洲在为确立现代主义价值观念而经历彷徨、论争和社会动荡时,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远离风暴中心,“美国人受海洋距离的保护,这保护类似某种时间上的隔绝,令其完好地保存了十八世纪人的乌托邦式的、道德的视野,甚至十七世纪清教徒宗派的视野”^[80]。欧洲进入现代化进程并确立了革命、真理、意识形态等观念时,美国人却还停留于前现代的观念之中,“社会的和哲学的十九世纪并没有跨越大西洋,而这里的事物始终生活在乌托邦和道德中,生活在对幸福和风俗习惯的具体观念中”^[81]。在地理位置与现代化的关系中,恩格斯的观点与鲍德里亚相反。恩格斯于1888年夏天到美国作过一个月的旅行,在《美国旅行印象》中他认为独特的自然条件加上没有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阻力,这些因素恰恰使美国迅速地成为了现代国

家。因此“美国一诞生就是现代的”，“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素”^[82]。可以看出，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欧洲大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的道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由此二者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状况也截然不同。欧洲与美国之间“显现了一种扭曲，一种不可逾越的断裂。分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时差，而是现代性的整个深渊”^[83]。

在与欧洲文化的强烈对比中，鲍德里亚提出了描述美国文化的三个命题。首先他指出美国社会是“现存惟一的原始社会”。美国展现出像“光韵”一样原始的文化沙漠，“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反映着原始社会的特征：技术、媒体、彻底的仿真（生物的、社会的、立体的、视频的）都以一种原始的、原初的状态发展着”^[84]。不仅地理面貌上是“原初的”和“自然状态的”，而且支撑美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也是不受束缚的、不受限制，甚至是未曾教化的。与欧洲渊远流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相比，美国显得肤浅而单薄，它是一个没有根基、没有本源的“原始文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鲍德里亚自己坦言美国和传统意义上的原始社会一样是没有过去的；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历史作为社会和政治理性的超验性，作为对社会的辩证、冲突的视角，这一观念不属于他们”^[85]。美国没有自古一脉传承、经久不变的祖先版图。换言之，美国无处寻根，只能远望未来。可以说从18世纪到20世纪，美国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复制和发扬了西欧的传统遗产，它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历史文化脉络，也缺乏具有原创性的文化生产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没有原本、没有过去、没有原始的时间累积，它的历史和文化只是一种拟像。但美国能够快速地进行文化“移植”，它借助先进的技术和媒介传播开始了符号、影像的生产和繁殖，“每样东西

都值得保护,值得进行防腐处理,值得复原。一切都可以再生,通过拟像实现的永恒的再生”^[86]。正因为这样,美国成为了当代拟像最发达的制造工厂,它由各种好莱坞影片来叙说自身的本源和发展历程,以永恒的超现实取代历史或文化的意义。

其次,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初版本。恩格斯对美国现代性的“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通常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87]。美国虽然远离革命的中心,却直接共享了革命的成果;虽然缺乏历史的积累和延续,却直接跨入了现代社会。与欧洲的深厚历史相比,美国没有自身的悠远历史,它不得不通过拟真的手段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美国“没有过去,也没有立国的真理。因为没有经历时间的原始积累,它就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中。因为没有经历真理法则缓慢的、数百年的积累,它就生活在永恒的仿真中,生活在符号永恒的当下性中”^[88]。没有革命的阵痛,没有真理的磨砺,更没有时间的沉淀,但美国却以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移植、占用和发扬了现代性的精神成果,并成为其最为出色的诠释者,“在革命和恐怖标志下在欧洲被英勇上演和摧毁的一切,都以最简单、最经验主义的形式(财富、权利、自由、社会契约、代表制的乌托邦),在大西洋另一边得到了实现。同样地,我们在反文化的、颠覆意义的、毁灭理性、终结表征的激进标志下所梦想的一切,这一曾在欧洲引发了如此多理论与政治、美学与社会动乱,而事实上从未实现(68年五月风暴是最后一个例子)的反乌托邦,这一切,都在这里,在美国,以最简单最彻底的方式得到了实现”^[89]。虽然美国的文化积淀贫瘠而历史短促,价值观念贫乏而单薄,然而他们的文化优势却在于善于利用和发挥西欧启

蒙理性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产品,并使这些优秀文化在美国本土、在缺乏自主文化的土地上不断地自我繁殖。

第三,美国又是一个“实现的乌托邦”。在鲍德里亚看来,欧洲还处于追寻乌托邦的阶段,而美国已然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的中心,它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对象,“鲍德里亚以漫画的手法区分出了欧洲的现代性和美国的后现代性。欧洲素有贵族传统,而美国则已经实现了公正、自由理想”^[90]。这种的优势与权力“与其说是建立在资源、技术和武器的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某个奇迹般的前提之下,这一前提认为乌托邦业已实现,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它是其他人一切梦想的实现,包括正义、富庶、法治、财产、自由”^[91]。欧洲的危机是理想主义的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而美国则是已实现了的乌托邦面对其持续和永久的危机。如果欧洲是现代性的典型代表,那么美国则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超越与反叛,代表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景象与思维。首先在行为方式上,欧洲人的习惯是把社会现实转化为理念或者意识形态,而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喜欢把现成的理念、价值、方法建造为现实。美国人相信事实,轻视超越现实之外的一切形而上学,“正因他们信仰事实,完全信任正在发生或所看到的事物,同时轻视一切被称之为表象或表象游戏的东西”^[92]。因此,欧洲具有批判和反思的理性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在美国被发展成为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在鲍德里亚看来,美国的一切事物都只是一种人为的拟真之物,因此对于现实事物的执迷只能是对拟真的崇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因其对既成事实的信仰,因其推理的幼稚性,因其对事物的邪灵的无知,因而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社会”^[93]。另一方面,欧洲人通过想象来预测现实,或者通过使现实理想化而逃离现实。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不

仅以现实为基础,而且也有着超现实和内在的虚构,“美国的生活方式则是一种自发的虚构,因为它是在现实中对想象的一种超越”^[94]。欧洲还处于现代性历史之中,它们的生活事物和理念还停留于封建制、贵族制、意识形态和革命等话语之中。而美国已经从古板的、旧式传统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在那里地理先于历史、构想优于经验、行动胜于深思。与追求真理、信仰等宏大叙事的欧洲人不同,美国人更崇尚拟像、速度与空间,“美国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种超真实。超真实是因为这是一个乌托邦,然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实用的,这里的一切都又让人陷入幻想”^[95]。在意义消失的超现实世界里,现代性实体如上帝、自然、产品、意识等都不存在了,只留下相互指涉的符号和没有原本的模型。鲍德里亚把美国看成现代主义理念消失的先天场所,因为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里不再有普遍的自然,不再有人类或自然的超验性,也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文化。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新大陆,消失的不仅仅是景物,也包括那些“宏大的现代性参照物——社会、政治、意义和真理等”,它是“现代性图景的消失之点”^[96]。

然而美国真的把乌托邦变为现实了吗?鲍德里亚也通过评析当时美国总统里根(R. Reagan)的政策来揭示这种乌托邦的虚假性。在里根“胜利的幻觉”中,真实与拟像之间的界限被消除,实现的乌托邦却无法消除现实的种种困境:

“如果乌托邦已被实现,那么不幸就不存在,穷人也不再可信。如果美国复活了,那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就不曾发生,越战也不曾发生。在频繁造访西部富裕的牧场主或制造商时,里根从不曾想到过会有穷人存在,甚至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只看到财富不争的事实,权力的同义反复,并将其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穷人注定被遗忘,被抛弃,消失殆尽。”^[97]

这就是“实现的乌托邦”的真实状况。在平等、自由的名义下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在繁华而富足的表面背后是城市角落里流浪人群露宿街头,在流动的人群中隐藏着种族的暴力冲突,在高楼丛林里还有资本在默默地蚕食着每一个人的劳动。这就是超现实形态所掩盖的真实美国,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在消解真实、价值等主题之后呈现出活生生的日常生活。鲍德里亚片面地强调了美国社会的诸多新式理念与生活方式,却忽视了普通民众真实而平凡的生活现状,忽视社会表面背后的剥削和不平等,在这一方面他集中体现了欧洲现代主义精英分子的地区中心主义以及强烈的傲慢与偏见。

四、文化批判的后现代视角

《美国》一书的英译本序言中将鲍德里亚称为“里根时代的桂冠诗人”,楚尔布拉格(N. Zurbrugg)认为,阅读这本书可以看到“一种闪烁着才华的对美国文化的描述”^[98],这些评价对鲍德里亚以崭新视角剖析美国文化给予了肯定。他的写作以后现代概念展现出典型的美国价值,“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观点,描述出了当下的主要潮流和现象,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勾勒了我们生活与死亡的社会领域,因而为社会理论做出了贡献”^[99]。

对美国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清晰地体现出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观念。首先,他强调没有原本、没有指涉的拟像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突出地彰显了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拒斥和消解。鲍德里亚认为迪斯尼乐园是脱离生活、失去原本的纯粹拟像,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底蕴、没有深度的文化沙漠,是一个缺乏意义、目的或价值的超现实世界。巴尔特曾经在《符号帝国》一书中把在日

本旅行见闻中的语言、饮食、游戏、城市建筑等看成一种符号的能指形式,其所指的对象是某种深层的文化含义,由此构建一个文化的符号系统。而在鲍德里亚的视野里,各种文化现象失去深度指涉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拟像和空洞的超现实世界。巴尔特在符号结构中探寻着东方文化的神秘内涵,而鲍德里亚则在超现实的虚无中看到了文化的空乏与贫瘠,看到了缺乏深度与底蕴的拟真“文化”。美国文化通过意义与真实的虚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了完美的拟像,对一切价值的内在性和物质转换的拟像。美国人完全体会不到仿真的意义。他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仿真形式”^[100]。从日本的符号世界到美国的超真实世界,展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转向。

其次,在对美国文化的剖析中,鲍德里亚消解了主体的中心地位而去寻找客体的优先性。鲍德里亚说:“在70年代末期,我一直试图超越理论,寻找一个客体,这个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幻觉的、奇迹般的。对我来说,这个客体就是美国——它就像一束光,它是纯粹形态的现代性,既不是梦想也不是现实,而是原始的超现实性,是一个实现的乌托邦”^[101]。相对于欧洲的主体地位,美国是一个遥远而新生的客体。美国文化是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的纯粹客体,而主体只是一种外来的入侵者,只有主体遭受失败后客体的力量才会真正地呈现出来。鲍德里亚在文化的沙漠中看到了客体的胜利,也看到了超现实社会的完美模型。这个凝固、空洞的沙漠风景见证了人类的剧变与灾难,在那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未来社会的影子,“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波德里亚把当代美国看作一种科幻小说、一种欧洲命运的未来景观、一种将会是欧洲以及所有地方的未来的现在”^[102]。

后现代概念和客体策略无疑是鲍德里亚观察世界、批判美国

文化一个新的出发点。然而他在描述社会文化现象时,过多地强调技术和媒介对现实形成的作用,从而使其理论显得脆弱和单一。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更像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无根虚构,也如同浪漫的科幻小说和故事。因此凯尔纳提醒我们,“最好把鲍德里亚自身的研究看成是对美国的虚构,是他对于美国幻想的一种形而上学构造”^[103]。在一次访谈当中,鲍德里亚自己也承认:“《美国》一书不应该被当作一部现实主义的文本来加以阅读。它的主题本身是一种虚构,我已经夸大了这种性质,而没有真正成为科学的幻想”^[104]。无论是符号学方法还是高科技的超现实世界,鲍德里亚都过度地停留于形而上学的虚构和幻想,而忽视超现实世界立足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基础。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物质基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被物化为文化产业的社会现实,那么鲍德里亚则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由媒介、符号、速度和空间组成的超现实世界,在那里现实正在隐退和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德里亚的《美国》再现出他那神志飞驰的符号学的想象力。这个法国游客将一切归结为符号,却看不到其物质的基础与影响、符号扎根其中的社会结构或形成符号及其结构的历史等”^[105]。超现实世界形成了一种平面的、无深度的、肤浅的视觉盛宴,它与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失去了一切关联。在这个“实现的乌托邦”里:

“没有移民的农场工人,没有芝加哥的贫民区,没有美国中心的难民,没有越南或亚洲其他地方的难民,甚至没有任何黑人。鲍德里亚听说了精神收容中心释放了一些病人,并看到了他们在街头流浪,然而他并没有看到那些无家可归、处于绝望之中的社会底层,在里根时代这是很明显的,他也没有提及这种特定的政治上的政策是服务于个别特定阶层利益的,从而产生了这种灾难。”^[106]

鲍德里亚过多地依赖于符号结构和技术话语,其理论越来越

远离现实的生活而只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剖析,最终无视社会现实的种种苦难和矛盾斗争,也无力揭示复杂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根源。在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批判中,鲍德里亚把政治和文化看作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的领域,因此未能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揭示政治和文化现象的内在本质。后现代批判理论虽然角度新颖却缺乏深度,不能把握当今社会深层次的运行规律,在对美国文化和民主政治的批判中也显得单薄狭隘且软弱无力。鲍德里亚从后现代概念展开批判理论,在这里他开始放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把批判的视域从物质生产和商品消费转向了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强调政治和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从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注 释

- [1] 周建漳:《存在与表现》,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4期。
- [2]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416—417页。
- [3] 罗斯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第137页。
- [4] 同上书,第146—147页。
- [5] 同上书,第148页。
- [6] 同上书,第152—153页。
- [7]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4页。
- [8] 同上书,第91页。
- [9] 同上书,第89页。
- [10] 同上书,第90—91页。
- [11]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136页。
- [12]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50页。
- [13]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91—92页。
- [14] 同上书,第91页。
- [15] 同上书,第95页。

- [16] 同上书,第 102 页。
- [17] 同上书,第 101 页。
- [18] 同上书,第 100 页。
- [19] 同上书,第 98 页。
- [20] 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论》,第 79 页。
- [21] 《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1 页。
- [22] 毕晓普:《波德里亚、死亡与冷战理论》,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43 页。
- [23] 鲍德里亚分析的海湾战争是指 1990 年 8 月至 1991 年 2 月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本文提及的两伊战争指 1980 年 9 月至 1988 年 8 月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之间发生长达 8 年的战争,又称第一次海湾战争。美伊战争是指 2003 年 3 月以美、英为主的联合部队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也有评论者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
- [24] 博加德:《波德里亚、时间与终结》,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447 页。
- [25] 毕晓普:《波德里亚、死亡与冷战理论》,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43 页。
- [26] 参见戴德里安:《仿真: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75 页。
- [27] 布希亚:《海湾战争不会发生》,邱德亮等译,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27 页。
- [28] 同上书,第 81—82 页。
- [29] 同上书,第 29 页。
- [30] Douglas Kellner(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1994, p. 200, 参见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74—275 页。
- [31]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 165 页。
- [32] 博加德:《波德里亚、时间与终结》,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449 页。
- [33]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 166 页。
- [34]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59.
- [35] Ibid.
- [36] 布希亚:《海湾战争不会发生》,第 63 页。
- [37] 同上书,第 81 页。

- [38] 同上书,第 71 页。
- [39] 转引自同上书,第 10 页。
- [40] 同上书,第 78 页。
- [41] 同上书,第 75 页。
- [42] 同上书,第 75—76 页。
- [43] 同上书,第 93 页。
- [44] 同上书,第 49 页。
- [45] 同上书,第 58—59 页。
- [46]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137 页。
- [47] 布希亚:《海湾战争不会发生》,第 43—44 页。
- [48] 同上书,第 65 页。
- [49] 同上书,第 101 页。
- [50] 同上书,第 102 页。
- [51] 同上。
- [52] 参见戴德里安:《仿真: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79 页。
- [53] 毕晓普等:《波德里亚和邪恶精神》,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13 页。
- [54] 布希亚:《海湾战争不会发生》,第 105 页。
- [55]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86—87 页。
- [56] 托尼·希:《拟真时代抵制意义:波德里亚的〈仿像与拟真〉》,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31 页。
- [57] 朱克英:《城市文化》,张廷佺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7 页。
- [58] 同上。
- [59]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12.
- [60] Ibid.
- [61]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168.
- [62] 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7 页。
- [63] Jean Baudrillard, *America*, Verso, 1988, pp. 69—70, 参见波德里亚:《美国》,第 118 页。
- [64] 波德里亚:《美国》,第 174 页。
- [65] 同上书,第 94 页。

- [66] 同上书,第 92—93 页。
- [67] 同上书,第 181 页。
- [68] 同上书,第 12 页。
- [69] Mike Gane, *Baudrillard: 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p. 183.
- [70] 波德里亚:《美国》,第 53 页。
- [71] 同上书,第 211 页。
- [72] 同上书,第 214—215 页。
- [73]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p. 131—132.
- [74] 波德里亚:《美国》,第 10—11 页。
- [75] 同上书,第 47 页。
- [76] 同上书,第 215 页。
- [77] 同上书,第 107 页。
- [78] 同上书,第 216 页。
- [79] 贝克:《亚利桑那自我中的东部时间:波德里亚论猿猴的行星》,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69 页。
- [80] 波德里亚:《美国》,第 155 页。
- [81] 同上。
- [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9 页。
- [83] 波德里亚:《美国》,第 124 页。
- [84] 同上书,第 106 页。
- [85] 同上书,第 138 页。
- [86] 同上书,第 69 页。
-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34 页。
- [88] 波德里亚:《美国》,第 131 页。
- [89] 同上书,第 168 页。
- [90] 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第 190—191 页。
- [91] 波德里亚:《美国》,第 132 页。
- [92] 同上书,第 146 页。
- [93] 同上书,第 147 页。
- [94] 同上书,第 164—165 页。
- [95] 同上书,第 47 页。
- [96]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168.

- [97] 波德里亚:《美国》,第 192 页。
- [98] 楚尔布拉格:《波德里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337 页。
- [99] 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545 页。
- [100] 波德里亚:《美国》,第 47 页。
- [101] 转引自 Mike Gane, *Baudrillard: 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p. 181.
- [102] 凯尔纳:《媒体文化》,第 536 页。
- [103]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170.
- [104] Gane Mike(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p. 132.
- [105] 凯尔纳:《媒体文化》,第 539—540 页。
- [106]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p. 171—172.

第六章

批判理论的溯源与转向： 从马克思到后现代主义

康德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谓之“真正的批判时代”，将著作冠之于“批判”来表明自己基本的哲学态度，从此“批判”成为哲学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康德认为批判意味着理性与知识的条件及局限，它是“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一切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1]。康德的批判对象是主体的一般认识能力，理性主体是否具有能力提供先天的知识，以便为一门“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康德而言，批判是理性必要的自我批判，是在理性自我规范基础上从辩证的幻相中解放出来”^[2]。黑格尔将辩证法带入到理性自我批判和反思之中，理性通过概念的自我运动而呈现自身的内在本质。在理性自我反思和改造的基础之上，才有理性主体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把批判局限于理性和思维的自我运动之中，而马克思把批判从理论转向了实践，从思维转向人类的现实生活，在社会批判和变革的基础之上实现思维和主体的自我变革。

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特质之一,也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体过程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对旧思想的批判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其思想的深度和活力也体现在科学的批判理论中。在马克思看来,批判活动不应停留于思维内部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应进一步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主体的命运和人类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创立的哲学使批判从天国回到了人间、从思维走向现实,实现了从抽象理性批判向社会现实批判的转变,而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到“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都在进行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的揭露、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开辟和发展的批判理论既体现着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范式,又带着辩证法和实践论的浓厚色调。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使之成为系统化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概念,并对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目标、使命、方法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他看来,“批判”是贯穿马克思著作的一条主线,马克思把许多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确定为“批判”,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理论。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并认为当代批判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

批判理论在此后的发展中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批判理论仅限于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对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维度的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广义的批判理论则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一系列思想流派,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背景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着反思和批判,其中涵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生态文明等多重理论领域。尽管视角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并具备批判理论的基本品格和理论旨趣。批判理论尽管在不同的思想潮流中生根发芽,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拓宽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审视和批判。

第一节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如果说传统理论是一种认知理论或解释性理论,那么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则是一种反思和改造的理论,因为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现实的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马克思的“批判”概念源自于黑格尔关于理念和思维的能动观念。黑格尔认为运动主体通过自我反思能够在意识层次上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改造,同时也完成了对客体的改造。批判理论正是思想在自我反思基础上,达到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批判性反思和革命性改造而实现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特征

(一) 辩证法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内在否定性原则表现为概念辩证法的抽象形式,它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来

设定和确证自身。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在扬弃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形式而把辩证法建立在社会现实和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从而使批判理论具备现实的基础和科学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3]。马克思继承和推进了这一内在“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自我否定原则,由此辩证法的否定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内在思维模式,它本身就是批判和革命的。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

与黑格尔停留于概念辩证法的抽象形式不同,马克思看到了思维辩证运动中隐藏着活生生的现实内容,绝对精神只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5]。马克思不满足于理性自身的辩证运动,而是走出思维活动和概念本身,将辩证法运用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6]。因此,马克思实现了辩证法的革命转换,将辩证法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从而使其从神秘形态转为合理形态,由思辨领域转向现实生活领域,从而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否定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深层根源,并最终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辩证法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批判理论一

直关注的核心任务。

（二）实践观

从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辩证法从天国降落到了人间,也从理性矛盾运动转向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然而要使理性活动与社会运动这二者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必定要依靠人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既不局限于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精神的活动”,也不仅仅指旧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它是一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是人们有意识的能动改变环境、改变世界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马克思眼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的实践不仅形成社会现实形态、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而且也揭露了社会现存的矛盾,通过革命活动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因此批判不仅仅是理论的内省与反思,更要超越现实存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真正的批判理论决不能停留于纯粹的、抽象的思辨主体,而是要深入到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中,通过实践不断地改变社会现状。科学的实践观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为正确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活动,也是现实生活得以发展的源泉、根据和基石。在各种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看成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批判理论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的分析之上,“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

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就是说,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8]。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的分析与批判出发,并追溯由此发展出来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才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的完整说明与科学批判,进而准确地把握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作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本质特征,辩证法和实践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辩证法的运动过程是建立在现实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由此辩证法获得了合理的形态;而实践本身又以辩证法为内在原则,由此实践得到了发展的动力并被赋予生机和活力。辩证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实践不断否定自身,改变自身的存在形态,因此实践的辩证发展是一种自我否定和扬弃,它推动着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实践活动以辩证法为原则,使其具有革命批判的本性,决定着它要不断地否定、变革现实世界并创造出新世界。实践内在地包含着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在本质上就是实践辩证法;而辩证法必须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展开,实践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本质与核心。

二、理性形而上学批判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将理性主体作为最高的原则,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成为征服世界的自足主体。主体的神圣魅力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最高峰,黑格尔把思维和概念看成是一切事物的主宰,无限膨胀的理性支配着人和自然,现实的存在被贬低为理性的附属物。理性霸权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沦落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成为绝对理念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抽象工

具。鲜活的欲望和感性存在被抽象为纯粹范畴,现实的人被转化为狭隘的理性概念。“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9]。理性被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把自然界、人类精神和精神世界全部囊括于绝对理性之中,由此理性成为主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哲学也被抽象化为包罗万象的、带有浓厚思辨性的理性形而上学体系。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抨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感性存在物,人的主体地位是通过感性活动而获得确证的。无人的、原始的自然界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感性世界,转化为现实活动的对象世界,“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0]。人类社会生活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马克思把感性活动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认为不仅仅人的理性、观念是感性活动即实践的结果,而且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都是实践的产物。

感性活动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的现实存在和全面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全面分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的异化,在那里人完全失去了丰富性和全面性,成为一种片面而贫乏的存在物,成为失去自我超越的单向度的人。要破解私有制的钳制并恢复人的感性存在,就必须消灭与人的生存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通过人类实践的变革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

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1]。在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命将从抽象理性的绝对掌握之中解放出来而实现总体性和丰富性,人的存在将是“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感性活动中,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2]。只有在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中,在否定私有制这种现存状况的革命实践中,理性对感性存在的压制才能解除,异化劳动才能转化为人的自由创造,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才具备现实条件。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既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又实现革命性的实践转向,即从概念和范畴的矛盾运动转向社会现实和生产关系的批判和革命性改造。

三、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研究活动的深入,马克思发现,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现代社会的考察,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核心原则上。换言之,资本乃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1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从最简单的商品出发,经过层层剖析最后揭示资本主义隐藏在社会表面背后的深层力量——资本的逻辑。资本是私有制社会能够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是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通过

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从而达到了社会批判的崭新高度。因此,对资本的分析是马克思批判理论中最具魅力和最深刻的内容。

(一) 资本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础概念

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总公式中,表现为货币—商品—货币($G—W—G'$),在这里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在第一个过程($G—W$)中,交换中的货币和商品是等值的,而后一个过程($W—G'$)中,最终从流通中获得的货币会比最初投入的更多。这个能生出货币的货币就是资本。如果把公式再简化一下,生息资本的运动就表现出“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即“ $G—G'$ ”。在这里,资本彻底抛开了其自身的社会历史底蕴,而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4]。资本家用一定量的货币换取工人一定量的劳动,这个交换过程似乎是自由和平等的。然而一旦进入生产过程中,工人就不得不从属于资本的运行,并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完成资本的增殖。资本家用货币换回的不仅是一一定量的劳动,而且包括工人全部的劳动能力及其支配权。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仅仅是他在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却无偿地占有了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资本能自己产生增殖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本质上的剥削关系。真实的过程是工人通过劳动养活了资本家,而表面上却是资本家给工人发放工资并养活工人;真实的过程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表面上却是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平等、自由的交换。资本能自行增殖的虚假表象使物化形式达到了极致的程度。这是一种“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是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5]。

在资本的支配下，现实生活的物品如原材料、机器、厂房等，开始褪掉了自然属性而被赋予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增殖彻底地以物的形态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被表面的物的关系所遮掩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6]。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它的物化形式支配着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在资本的统治下，人变成了商品，成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工人是劳动时间的人格化，资本家是增殖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活动，它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家成为追逐资本增殖的奴隶，工人成为价值生产的奴隶，人本质力量的丧失达到了极致，人受到了商品、货币的奴役程度也达到了顶端。

（二）资本逻辑推动着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

在研究西方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许多学者指出了理性和资本是其中两种最主要的推动力^[17]，而资本作为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经济权力，而且它更是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资本的运动和扩张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西方社会近几百年来现代

化进程的发展和完善,其内在深层的发展主线就是资本逻辑所主宰下的商品生产、消费和货币循环。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地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这促使它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从而提高生产力并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促进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的结构,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资本永不停歇地追逐利润使现代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8]。资本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客观的强制性力量迫使资本家将新增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资本,重新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面貌,促使现代性社会的生成和发展,“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9]。

(三) 经济哲学: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明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目标和主旨,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0]。

因此,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资本批判,其目的是要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事实上,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也通过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蒲鲁东把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范畴说成是一成不变、永恒的范畴,并由此证明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国民经济学家们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21]。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经济事实及其概念形成和理论建构只是某一阶段物质资料生产的必然反映,由于物质生产处于变化之中,这些范畴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经济领域所抽象出来的各种范畴和概念会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2]。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因此经济范畴等一切观念和理论都是由社会现实基础所决定的。因此社会观念及范畴都具有暂时的性质,它们会随着社会存在和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变化。

旧形而上学强调抽象概念是一种超越时间、穿越历史的先验存在，马克思以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批判永恒、僵死的绝对概念，试图从现实存在和历史情境出发来理解人们的生活，并以革命的实践来改变不合理的实现存在。

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留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专门著说，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经济关系的分析来不断地形成其哲学体系。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才日益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越深入……探索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规律。这一任务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建立而极其一般地被提出来的”^[23]。恩格斯也曾经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文献为哲学批判提供了自然线索，这些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现了某一社会阶段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哲学批判可以从它提供的“自然线索”中去发现丰富的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从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哲学批判提供最坚实的基础。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4]。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始终是双向度的：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历史可能性和潜能来测度这个社会。这种双向度深刻地体现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批判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路径被霍克海默理解为批判理论，“当唯物主义将自己的使用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

理解和变革社会的要求时,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对社会的分析中,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历史作用是唯物主义立场的标志”^[25]。可见,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主线,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其理论展开的平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是最终目的。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与经济学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内生于经济学,从而完成了哲学和经济学的嫁接与融合,实现了哲学和经济学双重革命。因此,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哲学理论。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批判理论”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传统理论区分开来。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主要是以旧式分工为前提、以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各种社会理论。传统理论由于缺乏超越和批判维度并与社会现实相互脱离,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理论”。由于预设了社会现象某种不变的、永恒的本质属性,传统理论实际上毫无批判地维护了社会现状,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批判理论是以超越传统分工为基础,其目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与超越,它从不为既存的现实服务,也不满足于为现实作解释和辩护,而是要揭露被社会现象所掩盖的内在秘密,尤其是揭露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的深层机制。可见,批判理论不是对社会现状的认同和肯定性的描述,而是一种特殊的反省和否定。

延续着马克思对辩证法内在否定原则的强调,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看成是一种内在于社会运动的否定性思维,“尽管它本身产

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26]。批判理论把社会本身作为剖析对象,强调科学和理论活动都只是社会现实运动的一个非独立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就它认为理性实际上决定着未来社会事件的方向而言,这种把逻各斯实体化为实在的活动也是一种经过伪装的乌托邦。可实际上,当代人的自我认识并不是一种自称为永恒的逻各斯的、关于自然的数学知识,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时时由对合理生活条件的关心支配着的理论”^[27]。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以社会本身为反思对象,以追求合理社会形态为理念旨趣,它本质上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一、从启蒙精神到工具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首先将矛头对准西方近代社会以来的启蒙精神。按照康德的理解,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能力运用自己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28]。换句话说,人类离开上帝的怀抱,独立地运用自身的理性和知识,克服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状态,从蒙昧走向科学,从依附走向独立,这就是启蒙。启蒙进程增强了人类控制外在世界的的能力,促进了物质的丰富和文明的发展。然而在从神性到人性的反转中,作为主体的人又成为了世界的新主宰。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主体都以统一的抽象理念作为理解和构造外部世界的原型,都试图以某种抽象而同一的尺度来统摄和支配无限多样的客观现实,从而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为世界

树立了新的统治权威，“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29]。启蒙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理性神话，最终的结果是“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

当启蒙演变成主体对自然进行认识和统治的一种知识形式时，它在现实中又退化为神话，并且导致了新的控制力量和异化现象。“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30]，即**启蒙精神变成了用来实现统治和操控的工具理性**。首先就方法论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蜕变为工具理性的深层根源就在于数学原则、形式逻辑的盛行，“形式逻辑成为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31]。事物在未知之前就已经通过数学等式和逻辑演算推导出来，思维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动的推导过程和客观的计算工具，以至于最后思维被机器所代替。借助数字和逻辑的方法，理性建立起纯形式或机械化的范畴体系，以量化、数字化、标准化的“科学态度”来确定和操控一切事物。工具理性成为神话统治世界万物的现代版本，而自然、社会和人只不过是它设计和运用的原材料。理性再次成为神圣的权威，主宰着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成了统治者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次，在思维的形式上，工具理性扩展了逻辑同一律的使用领域，同一性成为事物存在的新方式。无论是自我意识的同一，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都是以抽象概念、绝对理性的名义消除一切事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把具有差异性、非同一性的丰富多彩世界还原为可计算、可操控的抽象同一性，并形成了同一与多样、理念与

现实、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等级机制。工具理性主导的概念框架和叙事模式构成现实世界的中心,一切存在物都难以逃脱同一性思维的统摄和强制。阿多诺从物质生产过程中看到了同一性的根源,他认为思维同一性的根源在于经济活动,它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在思维层面的展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将人类的具体劳动抽象为普遍的平均劳动时间,同一性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运行规则和控制模式,并决定着思维和概念的同一性。面对同一性的泛滥和压制,阿多诺提出否定辩证法试图以非同一性取代同一性,以“绝对的否定”取代“否定之否定”,从而表明对传统哲学的彻底批判和对社会现存的否定与超越。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同一性思维模式的拒斥和否定既是批判理论的本质内容和内在要求,同时也影响着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路径选择并为其提供方法论基础。凯尔纳、贝斯特认为,阿多诺要比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更接近于后现代理论,因为他“与后现代理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始终不渝地捍卫着他异性、差异性和特殊性,其坚定性和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后现代理论家”^[32]。

二、大众文化批判

马克思把工业生产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法兰克福学派把这一视角融入到大众文化的批判之中,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用来表明当代社会文化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和影响。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工业生产,这是马克思商品分析路径的一种延续,也是商品生产原则普遍化的必然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电子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电视、电影、广播和杂志业的发展,马克思所描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现在转变为文化工业的盛行,文化作为一种商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文化产品

借助机械复制技术和流水线再生产被大规模地生产和传播,在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同时也开始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开始沦为非创造性的、无审美价值的工业商品。不仅生产过程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标准化、齐一化和程式化,而且文化本身也被当作一种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33]。这种趋势使艺术产品缺少独特的内容与风格,而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借助于工业技术的发展,文化实现了标准化和批量生产,其结果是语言、图像和音乐等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意义承载物,成为没有内容的空洞符号。

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和齐一化导致了主体的同一性。面对文化工业的渗透和挤压,大众已经不再主动地创造和接受这些产品,而是被文化工业体系所俘虏和控制,“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为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34]。文化融入到经济领域并不断地控制着人类的生活,它生产出具有同一性、毫无个性的主体。马克思在劳动过程中考察了私有制造成人的异化状况,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阐述了文化工业对人的奴役和统治。资本的统治通过文化产品而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被当作无差异的、齐一化的消费者,他们是一种可以相互替换的原子式的普遍个人,“文化工业把人变成了类成员,当成了一种实在。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完全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35]。面对不断重复、整齐划一、缺乏个性、流行一时的文化产品,人们不由

自主地消融到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模式化、程式化的大潮中而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丰富而本真意义上的生活。由文化工业塑造出来的个体同一性,表面上具有多样的自由和丰富的个性,而实际上是按照标准生产出来的一种虚假个性,“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皆是如此……自我的特性,就是由社会支配的垄断商品;它总是虚假地表现成自然的东西”^[36]。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一样,文化工业造成了人新的异化,主体失去了丰富多样的存在,而被赋予消费者这一同质的身份。文化工业所要实现的是“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和雇员。事实上,工业已经把整个人类,以至于每个人都变成了这种无所不包的公式”^[37]。

文化工业在实现对人的压抑和控制中,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监控机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已经由外在的政治统治转向内在的文化心理统治,而这一转变过程主要是通过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霍克海默、阿多诺把文化工业看成资本主义对大众进行驯服的社会机器,是构建资本主义统治的防护工事的“社会水泥”。一方面,文化产品不再追求思想的超越性,而是追求经济利润和资本增殖,并对大众进行欺骗和蒙蔽,“受制于人类消费行为的文化商品,都具有为他者存在的抽象性。但是,因为被迫迎合消费者的爱好,文化商品必然会欺骗消费者”^[38]。文化商品的普及不仅扼杀了个性、创造性,使人丧失了内在的自由和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且也使得文化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统治阶级新的控制模式和意识形态

工具。另一方面,由文化工业所形成的现代娱乐业为大众提供的是一些无脑子的消遣快乐,使大众在虚假的愉悦中逃避社会现实,从而失去了反抗和革命的能力。文化娱乐所提供的“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39]。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娱乐、流行艺术和休闲消遣实际上是一个有组织的施暴过程,它通过心理控制手段来制造出自动式的反应,从而麻痹和操纵大众的思想与观念,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志。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力量以十分隐蔽的方式形成社会意识的一致和认同,从而削弱个体的反抗精神和抵制力量,最终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三、技术理性批判

启蒙理性的目的是使人从自然和神的统治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由和独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关键在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然而在理性的扩张进程中,真理的职能并不在于展示事物的本质,而在于指导人们有效地操作和解决问题,知识的本质被简化为技术,启蒙理性被转化为以数学化、公式化、形式化和实用化的技术理性。理性与技术的结合体现在文化工业中,因为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就不可能有文化产品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技术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理性变成一种纯工具化的思维,启蒙精神在引导人类走向进步的同时,也开始了“自我摧毁”,“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40]。

霍克海默、阿多诺从文化工业的视角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而马尔库塞则重点分析技术对生产过程的变革和对人带来的新的

异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生产机械化的日益完善,劳动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专门的、合理的操作流程,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直接接触,他们“被纳入由受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不仅如此,在自动化最为成功的地区,某种技术共同体似乎在使工作中的人类原子一体化起来”^[41]。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使人的作用成为一种次要的因素,机器逐渐独立并且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主导因素,工人失去了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而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更重要的是,作为自动化技术体系的一部分,工人开始自愿地被整合到生产和技术体系中,他们不是作为生产体系的否定和反抗力量,而是成为其中肯定的、积极的组成部分。最终,工人丧失了否定性的维度,成为认同、肯定现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奴役程度的加深,“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他们“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42],工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人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

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从文化工业和生产过程考察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且更为关注科技对于资本主义合法统治和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加强了对人的奴役,而且还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和社会制度的辩护工具。“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43]。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工业的形成,并利用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媒介侵入到人们的闲

暇空间,弱化并消解人们的反抗;科学技术组织了高效率的生产体系,把工人固定为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使他们失去否定性和批判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直言“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当代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一种封闭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直接关联,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44]。其次,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工具。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控制自然、统治人类的力量,形成一种“虚假意识”,使人们无法得到自由和解放。传统的统治方式是一种“政治的统治”,而今天的统治方式是技术的统治,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合法性基础的统治,“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45]。与政治统治相比,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更为深刻和也更为隐秘,从而意味着对人造成更深的奴役和支配。

四、基于文化和技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批判理论追求对现存社会的改造,从而与马克思以实践改造世界的精神一脉相承。事实上,霍克海默、阿多诺也一再强调要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他们把“批判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并把自身理论的任务定位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被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继承着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所带来的灾难后果,并着重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运用和发展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立足于对经济领域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

析,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剥削与异化的本质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和技术的视角审视当代资本的运行机制,并考察新的统治方式给人带来的异化程度的加剧。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文化和技术,将社会批判的论域从经济基础转向了上层建筑,强调文化和科学技术对经济领域的渗透作用。尽管理论的立足点并不相同,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仍然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并在新的时代中考察了经济基础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霍克海默认为他们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批判,而是继承着马克思经济哲学分析的传统,批判理论的原则“是由政治经济学这门特殊学科确立起来的,它说明,在人的条件给定了的情况下(当然,这种条件在交换经济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交换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紧张关系的加剧,而这种紧张关系在当今历史时代里又必然导致战争和革命”^[46]。马克思以商品、价值、货币等概念展开的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范式。凯尔纳指出,法兰克福学派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成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政治学,他们的批判理论“使用诸如商品化、交换、物化以及拜物教等马克思主义范畴来分析广泛的社会现象,描绘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化趋势及其新的统治形式。在诸如大众文化这类被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视为只不过是娱乐消遣的地方,他们看到了统治的存在;在别人看来是新奇和现代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压迫的痕迹”^[47]。这种批判理论可以说是“以辩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理论。

在经济哲学分析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当代社会文化

和技术所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些社会现象最深层的根源——资本。首先,正是在资本的驱使下,文化和艺术才沦为一种交换和流通的商品。推动文化工业的动力不是艺术家们生机勃勃的灵感和由某种使命催生的创作欲望,而是市场的需要和资本的利润。文化工业体系之所以成功地制造出诸如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文化媒介,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能够服务于商品的流通和资本的增殖。其次,现代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同样与资本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才是推动技术革新的深层动力和最终目标。霍克海默、阿多诺就曾经指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48]。马尔库塞考察了技术在组织生产、提高资本利润率中的作用,机器的普及使得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死劳动与活劳动的配置方式显得越来越重要,“自动化似乎从根本上改变着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它造成了生产率‘为众多的机器而不是为个别产量’所决定的趋势”^[49]。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资本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必须从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去揭示资本的神秘力量,通过技术的批判才能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崭新的运行机制并揭示其中隐藏的内在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剖析也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引。在理论的发展脉络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经济哲学路径,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技术批判开辟了道路。这种批判理论“是一种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中间过渡批判形态,它

同时包含着‘现代’和‘后现代’批判原则的基本因素,也同时包含了两者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特征”^[50]。具体说来,它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积极影响表现为:第一,对同一性的拒斥成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先声。第二,对消费的分析 and 批判促成了后现代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理论的兴起。第三,对于媒介造成的社会后果的关注成为批判理论的新生领地。第四,对技术的批判也启发了后现代主义从多维角度研究社会的技术统治体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后现代主义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桥梁和中介。

第三节 何谓“后现代转向”

伴随着生物工程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媒介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结构、文化形态和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出现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形式。学者把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称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51],这一术语描述了一个超越现代性阶段的后现代时期(postmodern era),“它所表述的主要含义,是一种决定性而激进的社会转变——转向了以文化、文化消费、媒体与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后工业经济”^[52]。一些极端的后现代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断裂,他们将后现代性看成一个紧随现代时期而出现的新历史时代,而另一种温和的后现代理论则强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连续性,把后现代理解为现代的一种变化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詹姆逊、哈维(D. Harvey)等赞同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它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

受制于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

贝斯特、凯尔纳详尽地阐述“后现代转向”的内涵及重要意义，并强调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连续和继承关系。在他们看来，我们当前时代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时期的知识类型和理论话语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和跨学科视角来把握和分析当下的状况，要“与现代理论、文化或政治以及新的后现代思维、写作和生活方式实现一次彻底的决裂。……而代之以一种全新模式的后现代理论、后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学”^[53]。后现代不是与现代的断裂和非连续性，后现代转向也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和全新时代的到来。事实上，现代主义本身可以用多元、崭新的视角重新阐释，而后现代主义是其中最为激进、最为极端的一种形式。后现代转向表明了一种新的发展、延续和补充，也表明了后现代“保持了与现代性及现代理论的连续性，并保留其共有的假设、前提、思想和话语方式、经验、战略与眼光”，因此，“后现代是现代的一种激进化，它使一些现代现象如商品化、大众化、技术、传媒得到加强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与现代世界产生真正的中断和出现真正新的事物。这个立场的长处在于避免过于夸大非连续性和断裂，并强调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连续性的重要线索”^[54]。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不管是强调断裂，还是重视连续，实际都表明了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正在悄然兴起。与激进立场对现代主义的全面拒绝相比，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转向”的提法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从而也为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视角。

一、后现代社会面貌

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

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5]。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当代信息传播和生物工程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面貌,并引起了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新的技术革命塑造了新的社会面貌,理论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定义当代社会,并阐述其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带来的影响。尽管对当代社会的描述视角各不相同,但许多的理论家都指出了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形态正在悄然出现并日渐扩散开来。

(一) 技术动因

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后现代的社会面貌。受到微电子学飞速发展的启发,贝尔把后工业社会具体地指称为“信息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以知识的生产和处理为基础的,信息将成为社会运行主导的战略资源。贝尔预言,以微电子学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相互结合,将对经济的发展和交往方式、对知识的获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卡斯特(M. Castells)将新技术影响下的社会面貌概括为“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和“网络社会”,信息主义把知识和信息看成是社会各领域变迁和发展的支配性力量。信息技术成为现代社会之普遍范式的基础条件,是当代社会变迁发展的核心力量,“社会借由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并且完成运用信息技术所需的先决条件(主要是人力资源和通信基础设施),以知识为基础之生产力的极大化原则为核心将其生产系统组织起来”^[56]。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剧变,最终出现一种与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卡斯特称之为“网络社会”。伴随着互联网络的日渐普及和广泛运

用,人类自身的行动空间得到了延伸和拓展。在传统地域空间的基础上产生了基于互联网络的流动空间,新的空间是基于信息流动和网络技术形成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组织。互联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交往模式,不仅人的行为活动可以在其中展现,而且人的社会关系也据此形成和相互关联。不仅如此,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种旨在建立起机器与人类之间紧密关联,并力图最终消除二者隔阂的技术正在不断地兴起。1970年,美国研制出第一个功能较为齐全的头盔显示器。通过计算机和头盔显示器,人类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虚拟的、并不是物理上存在的但却与物理实体十分相似的物体。在虚拟现实系统中,人的感官被调动起来,可以获得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知,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似真感觉。虚拟技术的运用形成了人类新的存在形式——“赛博空间”(cyberspace)。赛博空间将计算机的数字化信息储存和处理能力与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和交流的空间。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虚拟现实使主体置身于一个新的数字化虚拟世界之中,它所展现的时空观大大改变了人的世界图景,改变了人类传统的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瑞泽尔把技术形成的社会新形态理解为鲍德里亚描述的“超现实”世界。“一旦我们有了更大的宽频,再加上虚拟的真实和网络空间结合之后,我们将可以看到网络具有更大的能力,能将人们放在几乎像真实一样的虚拟世界中。它们可能比真实的还要真实;换句话说,就是超真实”^[57]。这种超现实的后现代世界拓宽和延伸了人们接受、处理和发送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信息本身的产生和存在方式。新的技术世界既拓展人类交往的空间,也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

（二）经济基础的变化

从单一的技术视角来描述当代社会的面貌,可以看出后现代社会具有明显的技术特征,它们被分别冠之以“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不仅如此,后现代社会面貌也深刻地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之中。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继现代社会之后已经来临,贝尔将这个转变过程看成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在他看来,社会可以分成不同的领域:社会(或技术—经济)结构、政治以及文化。后工业社会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从以商品生产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为主导;职业领域以专业性和技术性工作占据主导优势;在文化领域中,理论性知识取代了非经验性知识而成为技术革新和政策制定的基础和源泉。如果说前工业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博弈,即人们的工作主要通过农业生产从自然界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工业社会是人与改造过的自然界之间的博弈,自然被打上了人的深刻烙印,社会被大机器支配,人们的工作主要是大规模对社会和自然的各种资源进行组织和调配;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博弈,主要的涉及理论性知识的差异,人们的工作主要是在协调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尽管贝尔本人并非后现代理论家,但他指出了后现代社会形成的技术条件和物质现实,并且讨论了时空变迁、文化中心缺失、视觉文化崛起、非理性和无理性等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议题,因而他对当代社会的描述也通常被看成是后现代社会的蓝图。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生产方式发生的深刻变化,由此产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被詹姆逊称为“晚期资本主义”。他援引曼德尔(E. Mandel)的观点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和统一国家市场的出现,这是马克思分析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第一个时期。第二阶段是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

阶段,第三个阶段即伴随着技术革新所产生的资本、商品向全球化扩张的“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表现为商品生产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过程,从而形成一种“跨国化资本主义”,它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兴起、生产和劳动的国际分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运用等等。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必然带来文化形式的转变,詹姆逊将现实主义文化与市场资本主义阶段相联系,现代主义文化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表现,而当前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则对应于后现代文化,“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后现代社会的基础”^[58]。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在那里文化符号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整个社会呈现出缺乏深度、历史意识丧失、新技术主导等特征。

哈维将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技术革新结合起来,用“时空压缩”来描述由资本主义“更加灵活的积累模式”所产生的时空体验方式。在他看来,从1945年到1973年,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刚性积累为特征的。但在1973年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更加灵活的积累过程。前一阶段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联系,而后一阶段则与后福特主义相关。后福特主义强调弹性生产和弹性积累,强调“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作为其特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效率”^[59]。从福特主义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从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这其中最重要的中介就是“时空压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实践的变化,其必然结果就是空间和时间表达的客观品质和意义也发生相应的改变。生产的加速和资产的扩张,使得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具有短暂性和即时性

的特征；媒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整个空间被连接成屏幕上的一系列形象；由于生产分工和组织机构的改进，创设场所和空间拓展成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在空间竞争方面的重要标志。这种资本对于空间障碍的消除，“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60]。哈维所描述的“时空压缩”将人们嵌入到一系列多维、不连续、不完全的现实之中，即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导致主体的紧迫感和危机体验。后现代时空压缩的强度大大增强，从而使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及文化生活都遭受了破坏性的影响，空间与时间的维度受到了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持续压力，最终导致空间经由时间消失。

同样立足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鲍德里亚明确提出以生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所取代。消费活动取代生产活动成为当代人们社会实践的主要方式，消费的对象也从商品转化为符号。拟像的盛行淹没了固有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指涉，最终呈现出一个没有深度、消解本质的拟真世界。“从生产性(productive)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reproductive)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技术与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的地位：在再生产性社会秩序里，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构建世界，因而消解了现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之间的区别”^[61]。尽管大多数的后现代理论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他们还是结合了经济、政治、文化、媒介等领域的新理论，在更为多元的视角里来把握当今时代的特征。

二、后现代主义范式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不仅影响和渗透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样

也深刻地改变着理论形态和价值观念。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建筑学、诗歌等领域出现背离和批判古典风格和传统样式,它们对传统的理论思潮的批判被迅速地移植和撒播到了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把这种与传统相对立的理论风格和立场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首先,它指的是一种拒绝接受现代主义符码的美学与艺术风格。它也包括源自于后结构主义的、摒弃现代主义思想教条的哲学与理论立场”^[62]。后现代主义不仅从不同视角揭示了社会面貌的种种特征,而且也阐述了一种理论风格和立场的转变。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桑列出了现代主义(modernism)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十几个方面,诸如“浪漫主义/荒诞玄学(paraphysics)”、“等级/无序”、“在场/缺场”、“中心/弥散”、“深层/表层”、“所指/能指”、“形而上学/反讽”、“确定性/不确定性”、“超越性/内在性”等等^[63]。然而哈桑在书中只是罗列了这些特征,并没有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展开详尽的阐述和界定。

为了更好地阐述“后现代转向”,贝斯特、凯尔纳借用了库恩(T. 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科学理论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一系统整体被库恩称为“范式”。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贝斯特、凯尔纳把“范式”从科学研究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认为理论、艺术和文化等领域的范式转换既包括着每一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特殊变化,同时也与更为抽象、更为宏观的世界观有关联,从而影响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我们希望把范式的改变置于一定的背景中,不仅置于思想史之中(如库恩及其他一些人),而且作为社会与习俗方面的因素发展的结果来加以研究,该发展受到工业、技术、经济、政治

以及常常是科学本身的变化所推动”^[64]。

范式理论认为每一次的科学革命都是由于全新的假设、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出现,从而引发了原先那些占支配地位的理论陷入危机,最终旧理论体系出现瓦解和断裂。贝斯特、凯尔纳认为,哲学、文学、科学与艺术等领域同样存在着范式的转换,即从**现代主义范式**转向**后现代主义范式**。(应该注意的是,在贝斯特、凯尔纳那里,范式的转换主要发生在思想、观念、方法当中,而不是发生了社会历史阶段的断裂,因此我们更为准确地表述为后现代主义范式,而不是后现代性范式。)现代主义范式主要形成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它伴随着从宗教世界向世俗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进程,并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而逐渐成形。这些革命运动包括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革命、政治上的民主革命、思想领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技术上的工业革命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革命等等。理性和启蒙的精神被视为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们被看成是知识和社会进步的源泉,是真理和科学体系的可靠基础。人们深信理性能够构建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规范,在此基础上,人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就会确立,而社会结构就会得到重建。因此,现代主义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人性和道德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在理论方法上,现代主义倡导理性、同一性、整体性、确定性和终极价值观,主要围绕着“机械论的隐喻、决定论逻辑、批判理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想、对普遍真理与价值的追求、建构统一的和综合性的知识模式之企图、还有对进步与指向一种人类解放状态的历史运动之乐观主义信念”^[65]。现代主义的兴起和盛行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此后,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以及语言学转向都促成了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形成。

20世纪中期,信息和媒介等技术的发展、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时代的来临、政治上激进的学生运动,这些使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范式开始逐渐形成。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至上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沦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新的困境,因而他们放弃了对绝对主体和确定性的追求,更倾向于差异性、边缘性、非确定性、多元化和动态性。作为对现代主义范式的拒绝和反叛,后现代主义范式“抨击现代方法和概念过分的总体化和还原论;攻击乌托邦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歹托邦(dystopian)和反人性;放弃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计划方案而支持模糊、偶然、自发和有机论的新原则;它向所有对基本原理、绝对、真理和客观性的信仰发起挑战,并常常拥抱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颠覆了所有一切界限”^[66]。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范式发端于现代主义范式,是对现代范式的一种推进、延展,直至激进地批判和反抗。范式转向表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断裂和截然相异,而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们的理论具有共同的假设、前提、话语和思维方式。同现代主义的发育进程相似,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形成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和物质生产变革的一个从属部分,“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从其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来看,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之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67]。

首先,后现代主义范式在批判的指向上将矛头对准了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揭露工具理性对于生活世界和人类主体

的统治和压迫。自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就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本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支柱。理性不仅在科学领域里取得了统治地位,也在社会领域里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随着理性中心主义的确立,它也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界、追求权力和控制一切的基础和工具。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范式给西方社会带来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的异化和个性的丧失,它成为对个体进行奴役、压迫和统治的根源。

当理性主义在科学的旗帜下达到顶峰时,叔本华宣称在思想的背后发现了欲望,在理性的背后发现了人的本能,从而吹响了反抗理性的号角。此后西方哲学对理性中心主义的解构就从未停止过,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再至巴爾特的“读者之死”,表明了绝对主体的终结和理性的死亡。后现代主义恢复非理性的存在意义以摧毁理性的绝对权威,强调个体具有情绪、感觉、直观、自主性、创造性、想象力等丰富特征。后现代主义不仅指责理性主义导致个体的残缺和人性的泯灭,同时也揭示了曾经带领人类脱离蒙昧状态的启蒙理性正在逐渐蜕变为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极权主义理性。由于理性主义假定了某种“最佳答案”和“唯一的解决方案”,追求效率、统治和强权,因此它贬低了差异、多元和宽容并排斥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放弃理性也就意味着摆脱对于权威、效率、层系、强权、技术、商业(商业伦理)、行政和社会工程的现代性偏见。它意味着不必有以下现代科学的关注:秩序、一致性、可预见性,以及‘由某个被公认的范式的权威所决定的制度化程序’”^[68]。反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压制人性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进而将人类从限制个性发挥的理性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些成为后现代主义范式所追求的

目标。

其次,后现代主义范式在思维方式上反对基础主义和总体性,强调了差异性和碎片化。西方哲学一直设定世界存在一个起始的、不变的、永恒的基础,它是万物的本源。作为先验设定的基础,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表现为一种“原子”,柏拉图则认为是“理念”,笛卡儿视之为“我思”,在现代分析哲学眼里则是“原子事实”,胡塞尔则称之为“先验自我”。虽然面目不同且形式多样,然而他们实际上都试图以一种还原论的方式把世界归结为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并将这种基础看成是人认知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和依据。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作为万物本源的抽象存在。在德里达(J. Derrida)看来,文本是互为基础的,而不是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基础,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将基础主义看成西方文化的一种形而上学积习,它必然导致一种话语的权威和垄断。如果世界万物具有同一的本源,必然导致一种普遍主义的总体性观点,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原为“物质”或“理念”,在历史观上则将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理解为一个静态的总体。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吞噬了一切异质性,从而掩盖了现实的差异性、断裂性和碎片性。福柯认为人类在追求总体性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性话语将不能纳入其中的他者(疯子、罪犯等)进行了系统化的排斥和控制。利奥塔认为总体性意味着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压迫。如果说黑格尔哲学代表了西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传统的最高成就,那么,这种总体性所表现出来的独裁本质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现代主义范式倡导差异性和碎片化来反对普遍标准和绝对基础。差异性思维认定基础论和总体性是一种无效的、断裂的观念,它们从未被经验所证实因而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虚构。德里达创造了“延

异”(différance)一词来延伸对“差异”的思考。“延异”概念试图说明“我们关于存在于世的认知(即感性的和智性的)经验从根本上说是作为区别(differentiation)的能动过程而得以产生的;而这种区别的不可还原的模式,是一种‘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二者是同一过程中相互依赖的双个方面”^[69]。福柯在对“知识型”谱系学的考察中,指出了不同知识型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间断性、差异性。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用“非连续性和异质性”摧毁了结构同一的总体主义,彰显了事物的多样性、碎片性。鲍德里亚也认为后现代“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70]。

其三,后现代主义范式在叙事逻辑上反对宏大叙事。在利奥塔看来,现代主义是指那些参照元话语(metadiscourse)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时,我们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71]。他认为19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及以效率原则为标准的系统论都是现代主义范式的思维方式。利奥塔提出了两种知识合法化的宏大叙事,一个是关于解放、实践和人文主义的叙事,另一个是关于思辨、认知和科学主义的叙事。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学科界线的崩塌,这两种叙事都失去了可靠性。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影响,利奥塔提出微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范式而取代宏大叙事。与宏大叙事强调连续性、统一性相反,微小叙事认为在意见一致的话语之内存在分歧,不同意见事实上也能达成共识,因此“不存在与科学相联系的宏大叙事,存在的仅仅是一系列包含着新思想的产生和需要证明的小型叙事。不存在大范围

的思想一致性,存在的只是有关一系列局部游戏规则的一致和有待进行的行动。因此,后现代科学是一系列具有异质性规则的局部语言游戏,它包含着对异议的寻求,其目标则是思想的创新”^[72]。后现代主义不仅以微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而且也使微小叙事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当宏大叙事丧失了可信性而小叙事却得以蓬勃兴起之时,便揭开了后现代主义的序幕”^[73]。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兴起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型学术范式的出现,它也表明了一场全新的社会文化运动。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和理论范式的更新,批判理论也必须在新的语境中进行拓宽和延伸。从马克思的理性形而上学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启蒙理性、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的批判,再到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形而上学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尽管身处不同的语境,然而批判理论的理论指向和精神特质是一脉相承的,“后现代主义者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下观点:现代科学是神话,启蒙的遗产是极权和统治。批判理论竭力怀疑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怀疑现代消费社会中媒体的作用,后现代主义者也采纳了这些观点”^[74]。

面对科技发展、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后现代主义同样在哲学层面上反思现代化过程的种种弊端,反思作为现代化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当代困境,进而去挖掘作为深层次因素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各种变化及其内在矛盾,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75]。

批判理论必须扎根于每一个时代的物质基础才能拥有稳固的理论基石,也必须结合新的学科流派、理论话语才能更具有解释力

和说服力,因此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恰恰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贝斯特、凯尔纳正是从批判理论出发来阐述后现代转向的意义、形态和结果。批判理论后现代转向的路径从马克思、尼采出发,经过韦伯、卢卡奇(C. Lukacs)和法兰克福学派,而通往以德波为代表的法国情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最后,通往鲍德里亚和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他们都有助于发展一种对现阶段的批判理论。……此路线描述从19世纪围绕生产组织的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到后来围绕消费、传媒、信息、新技术和新的支配与抽象形式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形式之变化,提供一种通往一些人所谓的后现代时代的转向”^[76]。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试图打破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而尝试将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在这种理论的结合中,鲍德里亚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为一个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符号、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的理论既精彩地描绘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以新的视角剖析着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同时也延续着批判理论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解构。透过对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的分析,既可以深入地理解和阐述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密关联,又能透视它们之间的结合可能存在的理论缺陷和不足。

注 释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 拉什:《批判理论》(英文版),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2 页。
- [5] 同上书,第 177 页。
- [6] 同上书,第 112 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5 页。
- [8] 同上书,第 92 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4 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7 页。
- [1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81 页。
- [12] 同上书,第 107 页。
- [13] 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载《哲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68 页。
- [15] 同上书,第 578—579 页。
- [16] 同上书,第 577 页。
- [17] 孙承叔:《资本与现代性——马克思的回答》,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5 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72 页。
- [20] 同上书,第 32—33 页。
-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7—138 页。
- [22] 同上书,第 142 页。
- [23] 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马经青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2—193 页。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7—618 页。
- [25]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7 页。
- [26]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8 页。
- [27] 同上书,第 191 页。
- [28]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71 页。
- [29] 同上书,第 6 页。
- [30] 同上书,第 23 页。
- [31] 同上书,第 4—5 页。
- [32]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300 页。
- [33]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121 页。

- [34] 同上书,第 114 页。
- [35] 同上书,第 131 页。
- [36] 同上书,第 140 页。
- [37] 同上书,第 132 页。
- [38] 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5 页。
- [39]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130 页。
- [40] 同上书,第 1 页。
- [41]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26 页。
- [42] 同上书,第 32 页。
- [43] 同上书,第 8 页。
- [44]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2 页。
- [45] 同上书,第 69 页。
- [46]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 215 页。
- [47]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282 页。
- [48]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 108 页。
- [49]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28 页。
- [50]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 页。
- [51] postmodernity 翻译成“后现代性”,它表明与现代性(modernity)相对应的一段历史时期。postmodernism 翻译成“后现代主义”,它主要指与现代主义(modernism)相对应的一种理论方法和叙事风格。
- [52] 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第 325 页。
- [53]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29—30 页。
- [54] 同上书,第 31 页。
-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84 页。
- [56]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0 页。
- [57] 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7 页。
- [58]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 254 页。
- [59]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91 页。
- [60] 同上书,第 370 页。

- [61]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4—5 页。
- [62] 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第 325 页。
- [63] 参见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第 58—59 页。
- [64]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7 页。
- [65] 同上书,第 20 页。
- [66] 同上书,第 21—22 页。
- [67] 罗斯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 2—3 页。
- [68] 同上书,第 191 页。
- [69]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122 页。
- [70] 转引自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65 页。
- [71]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第 4 页。
- [72]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 183—184 页。
- [73]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第 206 页。
- [74] 罗斯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 15—16 页。
- [75] 冯俊:《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载冯俊编:《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第 23 页。
- [76]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96—97 页。

第七章

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基于 鲍德里亚理论的一种阐述

后现代主义是作为现代主义的批判者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它广泛而迅速地“渗透所有的学术领域,对现代理论以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环境理论、教育学以及从人文学科到科学的每一个领域之可供选择的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批判”^[1]。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模式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对压制主体多样化个性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对具有话语霸权的宏大叙事以强烈的鞭挞。后现代主义尖锐地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并力图重构当代社会的实践和思维模式,从而形成一种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理论。不难看出,就对现代主义的批判而言,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精神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他们都批判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都攻击学术分工造成的各个社会现实领域之间的僵硬界限;都采用了超学科话语(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都对现代性及其社会统治形式和理性化形式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都将社会理论、哲学、文化批判、政治关怀结合到

他们的理论中；而且，和那些不切实际的学院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都包含了一些试图将理论导向实践、将话语导向政治的观点”^[2]。

第一节 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建立在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对象从经济转移到文化和技术，关注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个体的统治，后现代理论则在更加多元的视野中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马克思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理论构成了后现代主义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德里达认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此后的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3]。无论是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还是关注文化、心理、性别、种族等领域中资本统治与异化现象，批判精神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的共同属性。实际上，各种不同流派的后现代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批判理论的立场与话语模式，出版了大量的著述。尤其是鲍德里亚、杰姆逊等学者对后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批判，显示出批判理论在当代学术中的锐利锋芒。他们对全球化社会商品运作逻辑、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媒体图像世界等进行了剖析，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批

判丰富和发展了批判理论,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提供了多元而有益的视角。

理论旨趣的并行一致并不能掩盖性质的迥然相异。实际上,不同流派的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甚至是彼此冲突、不可调和的。如何在继承批判精神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代社会的具体境况和理论思潮结合起来,运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任何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思潮的相互结合而言,阿格尔(B. Agger)的分析路径值得我们借鉴。他把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综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强综合”(strong synthesis),即在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具有差异性的理论体系中,抽象、总结出一种一体化的理论。“强综合”力图使各种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崭新的、统一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方式却忽视了各种批判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另一种是“弱综合”(weak synthesis),它既强调综合和统一又尊重各种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弱综合”只是在各种批判理论之间寻找“一般的特点”,寻找它们的理论共性,强调它们之间的可转化性。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把各种具体批判理论视为一般批判理论的一个例子。^[5]从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弱综合”出发,我们选用了“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为基本的理论背景,以区别于当前理论界被广为关注和讨论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命题。

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E. Laclau)和墨菲(C. Mouffe)通过对“领导权”(hegemony)问题的谱系学考察,试图在抛弃“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之后重新建构多元、激进、民主的左翼政治理论,并正式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发展”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国内

研究者大多把由拉克劳和墨菲的左翼激进理论视为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后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民主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由詹姆逊所倡导的文化批评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哈贝马斯领衔的批判解释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隐含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相互融合的努力,即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打上后现代主义烙印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后现代’思潮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把后现代主义比喻为一根长长的瓜蔓,后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这根蔓上的其中一个瓜而已”^[6]。广义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强综合”,即努力使二者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从而产生新的、统一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强综合”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理论困难。一方面,这种综合势必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诸多的差异,把各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糅合到“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之中,结果可以造成这一概念内涵的矛盾与逻辑的混乱,从而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本质差别。因此,阿格认为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成“后马克思主义”范畴,就会使“后现代主义这一名词具有误导性:大多数人将此词当做一般思想范畴来使用,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处于一个这样的范畴内”^[7]。另一方面,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如果缺乏统一的理论标准和分析视角,就会把各种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具体特质上同一或相近的理论都通通塞入“后

马克思主义”概念之中,从而使这一概念的外延过于宽泛,成为一个什么都可以装填的“大口袋”。凯尔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多重视角的综合中,“可能由于不加区别地乱用不同的视角而失去效用,因为把相互矛盾的假设和逻辑结合到一起会使分析陷入混乱和漫无目的。因此,多视角分析不应该不加区分地把各种理论囫圇吞枣地‘综合’到一起”^[8]。这种做法最终将会削弱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色,淡化甚至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还存在“弱综合”的方式。以某一理论特质为中心线索,寻找两者之间一般的理论共性,并以此来探讨对它们进行综合的可能。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相同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批判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特定形态。尽管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理论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第一,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所形成的理性统治与暴力;第二,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统治及其导致的人性异化。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共同的理论立场和批判指向,它们都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批判理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评理论(即‘批判理论’,笔者注),本身就是一个范畴,其中可找到马克思的特定批判理论”^[9]。因此我们提出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向更多元的后现代主义敞开胸怀,要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和历史场景中与各种理论思潮展开对话与交流,从而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固步自封;通过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就是要更清晰地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实质和现实意义,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和学术关怀;同时透过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准确地把握当代

资本主义的发展脉搏,重新阐释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实践品格。

第二节 现代主义批判

20世纪60年代,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生产的发展导致文化、艺术、精神生产和生活方式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革促使思想家们反思西方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对人类生存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是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对西方近代哲学所形成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的质疑和内省,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与反思。后现代主义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批判精神对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进行着解构和反省,并倡导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思维范式和写作姿态,从而试图抛弃现代主义话语和实践并形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和理论观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一方面拒斥传统形而上学,通过多元话语对理性中心主义、宏大叙事和同一性等观念进行强烈的批评;另一方面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进行分析和批判,从中揭示资本统治的技术模式及其带来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压制,从而为理解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反本质主义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追求同一、寻找本质、探究基础和崇尚绝对的思维方式,这种传统成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固有模式。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些旧有哲学体系是以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绝对理念为理论特征。本质主义认为在多

样的、流变的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内在的、统一的本体,具体的事物和现实都是本质的一种体现和外显。作为世界存在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是“理念”,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笛卡儿认定是“我思”,黑格尔则构建了“绝对理念”。传统哲学的本质论为世界预设了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并把这种本质观念看作是主体认知和现实存在的绝对准则和依据。然而后现代思想家认为把本质认定为世界的本源和认识的终极目标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本质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个追求某种事物本质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追逐一个幻影。由此他们强烈地批判并试图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论、总体性、主体性和同一性,并倡导世界存在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从而恢复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人类主体的生存状况。

(一) 解构

传统哲学试图从感性具体的事物中去提炼出抽象本质,并把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设定为一种在场的东西和最高的原因。这种“客体/主体”二元分立导致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即认为一切存在物的表象背后必然有一种内在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本质或意义。这种本质主义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在他看来,要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就必须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质疑逻各斯的适用范围和界限。解构理论是“比批判性更批判性”的批判,它是“一种无条件提出批判性问题的权利,它针对的不仅仅是人的概念的历史,而且还包括批评概念的历史、提问的方式及其权威、思想的质疑形式”^[10]。解构主义从根本上质疑本质主义的范畴、秩序、规范和界限。

在德里达看来,从古希腊到现当代的西方哲学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也是一部言语与书写之间对立和分隔的历史,“言语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形式。按这种思维方式,言语是

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再现”^[11]。言语中心主义通过凸显语言的作用而贬抑书写,最终形成一种支配与从属的等级关系,在那里语言占据着主导和统治地位,而书写只是一种工具并发挥着次要作用。德里达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他把语言看成一种符号。在语音/书写的二元等级结构中,能指是书写,所指是语音。所指表达的是处于中心地位的逻各斯,而能指对应的书写是感性的、有限的,在符号的结构中所指独立于能指并具有统摄和驾驭的功能。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以诸如在场(presence)、本质、真理或实在等抽象理念来作为我们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并最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超验所指”——上帝、观念、自我、绝对精神等。

本质主义观念构建了诸如在场/不在场、语音/文字、主体/客体、真实/虚假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逻辑,以前者作为本质、中心、来源,而后者成为非本质、边缘和衍生物。这种二元结构是以符号的能指/所指之间对应和同一为基础的,它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强烈质疑。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表明语言自身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意义产生于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和关联,它形成于语言链中能指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为了表明与结构主义的“差异”概念的区别,德里达自创了“延异”(différance)一词。延异不仅指出了空间上的共时性之分,更表明了时间上的“延迟”,关注了历时性的维度。延异理论认为意义不是固定在某个符号上,而是产生于一系列的能指链条之中,由此任何符号都不可能具有固定的意义,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延异导致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多变性并瓦解了语音中心主义,颠覆了语音/书写之间的顺序,从而在根本上质疑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德里达以延异消解“结构”并试图颠覆那些建立在二元对立逻辑之上的、固定

的等级结构,以此达到摧毁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大厦的目的。

(二) 拟真

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构造了一个原本与摹本、中心与边缘、本质与表象的二元分立结构,从而导致了主体对客体的霸权统治。后现代主义立足于语言学的结构分析,将二元分立模式视为一种表征结构。人的理性如同一面映照客观世界的镜子,其主要任务就是用镜像式本质准确地映照周围的世界,哲学的任务是用一系列“映现现实的结构的概念”来提供“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12]。长期以来的西方知识论就是一种“表征式的传统思想形象”,它把一切具体事物都纳入到了表征(再现)体系之中。表征结构认为语词、图像、符号具有某种特定的所指,它们构成了意义形成的一套固定系统。然而对本质进行表征的观念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表征造就的是“语言学上的自我指涉”而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表征结构中的语言、符号同现实世界没有直接关系,在言语之外不存在着一个物理世界或现实世界。因此,符号不再表征任何事物,在现实中也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等价物,语言符号仅仅指向内部的差异并通过自我指涉而形成一个意义体系。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并非要否定语言之外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要表明文本世界本身是一个完全自足的世界,符号可以自主地构成一个自我指涉的意义世界。

鲍德里亚的拟真概念是对表征结构的一种批判和消解。在他看来,拟真与表征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术语,“在与表征相对立的意义上,这就是拟真”。知识论的表征结构假定:“一个符号可以指意义的深度,一个符号可以用来交换意义”,这里遵循着符号的同一性原则,“符号与现实是等价的,即使是在理想的意义上”^[13]。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指涉关系为表征体系提供了结构保证,“所有的西

方信仰和正道都陷于这种表征的游戏中：即符号能够指向意义的深度，符号可以取代意义，而且这种交换是由上帝来保证的”^[14]。然而随着符号“指涉性的衰落”，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指涉物之间稳定的关联被打破了。拟真概念表明符号结构中每一个指涉的断裂和消失，它是对价值、意义和所指的激进颠覆。拟真时代由于所有指涉物的消失而被开辟出来，符号的自我指涉可以再造出一种新的拟真世界。鲍德里亚的拟真概念是对具有同一性的表征逻辑的解构，它进一步否定了作为世界源泉的本质主义。由符号的自我指涉形成的拟真世界是一个没有终极原本和深度本质的超现实，“拟真也不再是一个疆界、一种指涉性的存在，或一个实体。它是由没有原本或现实的真实模型的创造物：一种超现实”^[15]。鲍德里亚拒斥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他认为世界既不是先验理念的现实展开，也不是物质实体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由缺乏原本、基础和本质的拟像所形成的超现实世界，“如果人们坚持寻找和揭示这一现实的话，那么可能会更明确地发现仿佛之下根本没有任何之物，仿佛本身就是现实——这一发现恐怕是人们难以应付的”^[16]。鲍德里亚把超现实看作是由技术的高度发达而形成的一个由数字化、控制论主宰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生成的拟真时代，“不再存在一种表征机制，只有一种仿真机制”^[17]。高科技领域内的二元数字“0”和“1”和 DNA 成为超现实世界生成的主导模型，“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脱氧核糖酸则是它的先知”^[18]。拟真建立在模型和可复制性的基础上，这种模型最终可以被还原为电脑读取的数字编码和生物工程的 DNA。本质主义预设的至高原则和中心概念被消解了，拟真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符码和模型所生成。

“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版本仅将首要动因从经济变为符号。一

种更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质疑任何本质主义和整体论的理论”^[19]。在拒斥本质主义的方式上,德里达与鲍德里亚都遵循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路径,通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来消除传统理论的二元结构。无论是德里达的“延异”,还是鲍德里亚的“拟真”,都表明了对本质、基础、本原的疏离和背叛。德里达立足于语言学内部的结构分析,并关注文本对于语言的重要作用,而鲍德里亚则走出语言符号的分析视角,着眼于新技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他们对本质主义的批判结束了传统思维的二元对立模式,推翻了绝对权威和至高原则的统治,为西方文化注入了丰富而多元的异质元素。然而后现代主义在对世界本源进行消解的同时,既否认理念或绝对精神的至上权力,同时也反对物质的客观存在,从而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消解本质主义的同时,也以文本或拟真取代本质概念,从而树立了新的理论权威,沦落为一种“非决定论和符码的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只是用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在消解中心的同时却树立了另一种中心。可见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仍然囿于旧式哲学的理论模式,表现出了批判的软弱和不彻底性。

二、消解主体

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近代西方哲学将人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主体的确立是人摆脱神性束缚、走出自然蒙昧状态的后果,同时也是人自身理性的觉醒和意志的张扬。由于理性所具有的无限认知能力,使人类能够去认识和把握无限的世界,并主导和规定自身和社会。绝对的、至上的、万能的理性促使人类成为世界的中心和宇宙的主宰,成为万物的准绳和至上的价值目标。

（一）技术统治下的主体

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现,是启蒙和理性主义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褪去宗教的神圣外衣,理性主体也取代了上帝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理性构筑了人的本质规定,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理性却反过来成为统治、奴役人的工具,主体再次处于被压制、被禁锢的状态。随着 20 世纪新知识类型的出现,精神分析、语言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对传统知识范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体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它不再只是一种理性的建构,也是欲望、无意识、非理性和语言的产物,由此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体概念开始走向消亡。在结构主义看来,主体只是语言系统中的一种意指关系,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物,其能动性和创造性遭到了否定,“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或者,像古代那样的情形,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虚构的基础之上”^[20]。后现代主义反对普遍而永恒的主体观念,而认为所谓主体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它是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观念。

按照福柯的考察,在 16 至 18 世纪的西方文化里,“人根本没有任何位置。这期间的文化为上帝、世界、相似的物和空间的法则所占据,当然也少不了肉体、情感和想象。然而人本身完全没有出现”^[21]。直到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既是认识客体又是认识主体的人,才伴随着现代时期的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的兴盛而逐步确立起来。人的主体地位是现代知识的基础,同时也是知识的一种想象和建构。由此福柯从知识型更新的视角论证了主体消亡的必然性,人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是色彩艳丽却转瞬即逝的东西,“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2]。在尼

采宣称“上帝之死”后,福柯断言随着知识类型的更新必然导致“人之死”。主体作为一种知识的建构必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走向消亡,“作为认识论之主体的人在新兴的后人本主义的、后现代的认知空间中的消失,主体在这里被当作语言、欲望以及无意识的产物,一劳永逸地被废黜了”^[23]。

福柯把主体的衰落看成是西方认识论转型的必然后果,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面貌、知识形态、信息模式和交流方式的变化同样影响并决定着主体的异化和消亡。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主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认知和交往的范围和领域,也导致了主体存在的样式和形态产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在模型和符码生成的拟真世界里,主体失去了肉身的存在和理性的本质。通过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美容手术等技术手段,人的肉体存在被转换成一种人与技术的新型综合体,“人也由于移植、手术、药品、遗传工程等变得技术化了,个人的本质被转换,而且产生了人与技术的新型综合”^[24]。主体的出现不仅是人种生育的结果,同样也是DNA符码的合成物、是克隆技术的创造物。借助于技术的合成,人类的繁衍将返回到上帝造人的传说之中,因为在那里主体的形成不需要生物的器官,也不依赖人类的生理功能和行为,“我们甚至不再提亚当的脐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必须装上一个逼真的脐,只要我们身上不再有会把我们与真实世界连结起来的脐带的任何痕迹。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还是妇女所生,但不久,我们就和试管婴儿这一代人一起返回到亚当的‘无脐’的状态: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有脐”^[25]。主体的诞生不仅仅是生物体功能的结果,而越来越多地成为人工合成、拟真和超现实的产物。“克隆是身体的历史和模型化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身体被还原为它的抽象和基因的程式,个体注定要成为系列化的繁

殖”^[26]。由此“主体消失了,因为同一的复制体使他自身的分裂走向了终结”^[27]。

其次,主体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波斯特从信息方式变革的视角出发,认为在传统的印刷文化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透明的、稳定而且具有固定身份的主体。而在信息网络和虚拟现实的时代里,“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28]。主体失去了知识中心的位置,成为技术操控下的一个漂浮的点,成为一堆失去指涉的、空洞的符码,“在这个世界上,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中。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29]。由理性建构的主体概念在信息和符码的世界中日益消散,就像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身份符号、信息代码、磁条数据、网络昵称等所取代,主体消失在网络连接和信息符码的世界里。

最终,人在拟真世界里被遮蔽了肉体的、感性的存在而变成一堆死寂的符码,人的社会属性遭到了不断地瓦解。因为我们无法分清主体是生活在真实的空间、电脑的屏幕还是智能控制的实验室里,这些超现实的空间“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30]。个体成为技术的俘虏,迷失在模型和符码的操控之中,被困于拟真的空间中无力自拔,“主体,这个现代哲学的宠儿,就在波德里亚形而上学的设想和客体的胜利中被打败了,对一向为现代哲学框架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终结”^[31]。

（二）客体的统治

鲍德里亚描述了高科技对于主体的统治和消除,进而他主张要完全放弃主体的立场,转向一种客体的策略。传统形而上学预设了主体对客体的优势和统治,然而随着技术的自律性发展,作为一种独立、自主力量的技术客体开始压倒并凌驾于人类之上,“作为一种限定性功能的技术功能是一种客体功能,这意味着——即使在最复杂的机制的情形中——它必须被人类现实化……自由促进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机器超过人类”^[32]。客体对主体不断增长的统治权力始终是鲍德里亚作品中的主题,他认为客体(大众、信息、媒介、技术、商品等等)已经超越了它们自身的界限并逃离了主体的控制,“客体通常倾向于比主体更为明智,更为反讽(cynical),更为巧妙……客体的变形(metamorphose)、狡计和策略,超越了主体的理解”^[33]。在消费社会的物品体系里,消费者被物品的符号体系所包围、迷幻并异化;在高科技的拟真世界里,主体被符码所生成并无限地复制,最终在客体世界中受到压制和解构。鲍德里亚在高科技的语境中努力想要结束自笛卡儿时代以来支配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观念。笛卡儿的主体概念有一种“邪恶的禀赋”,企图诱使自我去接受一些模糊不清的理念,而鲍德里亚认为“邪恶的禀赋”指的就是客体本身。如今,主体对客体的优先地位被反转了,优势已经从主体转向客体,尤其是超现实的客体、拟真而成的客体。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客体统治的时代,“今天的客体苏醒过来,做出回应,决定要使它的秘密保持活力。在客体与主体之间进行的这种争斗意味着主体的支配地位的丧失:客体变成了主体消失的地平线。很显然,这个崭新的场景,这个崭新的戏剧,这是与知识的传统理论相对立的”^[34]。客体取代主体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鲍德里亚由此建议主体要放弃控制、改造客

体的梦想,转而向客体臣服并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有意思的是,在《完美的罪行》中鲍德里亚引用的庄子与惠子关于河中的鱼是否快乐的讨论,似乎想要说明必须从客体本身出发对它进行理解、揣摩和限定,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越俎代庖。由此鲍德里亚试图颠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否定主体具有的至高无上的能动性。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物化世界及其形成的神秘拜物教,而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鲍德里亚却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客体世界的超级拜物教教徒。他忠实地实现着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颠倒主客体之间的地位”^[35]。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主体性的批判,对于反思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鲍德里亚描述了一个由符号、影像和符码构成的拟真世界,它决定着人们的经验和意识,重塑着生活的现实形态。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种延伸和扩展,拟真世界在人与自然之间构造了一道厚厚的屏障。人类越来越多地在实验室、控制台和模拟舱等环境下,通过屏幕、界面、数据、信号等来了解、观察甚至控制自然世界。自然的认识对象被拟真之物所取代,认知活动也被置换为人与技术系统的结合与互动,“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直接的自然,而是第二层次的、孤立的、抽象的、人工的自然,是机器和试验室中的自然”^[36]。在这个新的“人工自然”中,作为主体的人类扩展了认知的对象,提高主体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能力。然而,一旦过度地沉浸并依赖于拟真世界,必将造成人的认知能力的退化和主体性的缺失。拟真世界对于主体的消解明显地体现在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由克隆技术产生的超现实生命体,势必使人的丰富多样性被压缩成单一的符码,人的社会属性、生命特质被抹杀了。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灾难时,久居于拟真情境中的

人类显得无比的孱弱和迟钝。当消费停滞、金融泡沫破裂时,经济学家们这才意识到危机的来临,然而各种数据和分析报告终究阻挡不了资产缩水与市场恐慌。而当仪器操作失当(切尔诺贝利)和自然灾害(日本福岛)引发的核灾难降临时,人们只能在控制室里、在仪表盘里、在数据的自动分析中应对着放射性元素的扩散。面对天灾人祸,人类通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失去了能动的、积极的主导性地位。如今,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的厚厚混凝土(即“石棺”)下面仍然掩埋着 200 多吨放射性物质,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仍然在污染着附近海域,并经由太平洋的碧波将危险扩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主体在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面前变得脆弱而无助。拟真世界成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与缓冲带,同时也削弱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主体的消解伴随着客体世界的独立发展和日渐兴盛。技术的发展日益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并建构了一个脱离主体控制的、自主运行的客体世界。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工业流程、机器体系或技术环节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王国。这些体系越来越复杂,而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微小问题,都可能造成超乎设计者想象的重大失误,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科技活动的风险已经上升为一种会对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层出不穷的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气候灾害等)使得人的生活处于极端的不确定状况。鲍德里亚提醒我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已经反转,那些自主运行的客体由于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而开始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电脑病毒对于互联网世界的侵袭,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一旦被滥用可能带来的生命伦理危机,过度碳排放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高速列车系统控制存在的瑕疵已经造成了惨烈

的灾难,而核泄漏事件的不当处置也在侵害着人们的生活。由技术活动产生了客体世界正在不断地强大,并且向人类张开了狰狞的面孔。鲍德里亚的客体策略坚持要等待系统到达极致并自动反转,然而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在应对客体的强势和报复,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类应该协同整体社会的利益,以社会和集体为行动单位,共同来应对全球性的技术发展困境和危机。要反对将技术的发展用于谋取个体和局部利益,反对为满足资本的逐利本性而牺牲环境甚至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客体发展不能单一地以人类价值为核心,而是要充分遵循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倡一种适度的、合理的、自我节制的价值观。技术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进步的需要,又要保持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平衡。惟有如此,技术的进步才能既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充分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实现人与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发展。

事实上,主体的客体化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关注的重要话题。马克思考察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品作为对象化的、物化的客观力量,“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37],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人。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客体开始统治人类,主体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被一种异己的客体世界所奴役。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延续着马克思对主体异化的批判。在当代机器大生产中,主体自身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38],物成为主体本身的否定形式,主体被它所隶属于其中的生产关系所奴役,被商品生产所形成的物化所统治。后现代主义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看作是西方知识论的一种建构,把主体的消亡归因于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仅仅把主体性、理性与文化、知识、技术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由

此得出的只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抽象、片面的主体,表现出了哲学批判的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考察的并非抽象的主体,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来理解人的存在,而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39]。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考察主体的存在,进而把主体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看作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理性、思维方式内在的一种冲突,而应该在社会制度实践变革的基础上消解它们的二元对立。因此,主体与客体的紧张对立、异化和颠倒,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于资本的本性和力量造成的主体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束缚、压制主体发展的私有制,建立起适合“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主客体的紧张关系,从而彻底地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三、拒斥历史进步观

自启蒙时代以来,经过西方社会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和进步的观念逐渐成为人们理解和阐释历史的主导模式。哲学家们认为人的主体理性能够反抗蒙昧迷信、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从而人类历史就能不断向前发展。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体等概念的同时,也质疑了现代主义历史发展观。利奥塔认为现代主义历史观是线性展开的“宏大叙事”,它是关于历史的故事。这种叙事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基础或真理,而是现代话语为了论证自身合法性而诉诸人类进步与解放、历史或精神的辩证法等元叙事。因此,历史进步观只是多角度阐释历史中的一种,它不存在优先的话语权。由此,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了传统的历史,并

将其归为人类事务较大范围内的一个边缘角色的地位。他们赋予历史本身以无足轻重的作用”^[40]，他们否定了重要的历史论述，否定构成历史的所有的关键事件乃至历史的缘由。在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历史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41]。

鲍德里亚首先质疑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均匀的、线性的，也不是循序渐进并合乎目的的。历史进程是不连贯、非线性的、偶然的，它呈现出一种断裂分层、返回交织、即时而逝的状态。他曾引述卡内提(E. Canetti)的话：“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历史已经不再真实。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全人类就会突然脱离现实”^[42]。在鲍德里亚构造的超现实的世界里，历史就是一种拟真，人类的历史只是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可以接受的存在状况，“我们整个过去正在逐渐变为那过时的拟象，不过，是人类继承了上帝搞骗人把戏的聪明才华。虚拟地重现人类的起源是今天人类自己的使命，它即将成为我们过去和将来的虚拟实在”^[43]。如果历史是一种主观的、任意的过程，那么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就是一种纯粹人为的过程。如果时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事实序列，每一个事件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始终都可以意识到这种随意性的存在，或者说这种时间和历史的人为性特征”^[44]。于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超现实世界里，历史必然走向终结，“把历史问题看作是一种线性发展过程，现在已经被通讯、自动化打断，永远都无法恢复和挽回了”^[45]。偶然的、随意的时间观念带来了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感，与线性时间相关的历史进步观念也遭到了瓦解，它表明了人类对于未来的焦虑和恐惧，“历史事件的气氛已经通过 20 世纪媒介的重复和模仿消解掉了。由此鲍德里亚意指时间的历史正在通过生态再循环的文化、对法国革命

的怀旧(在 200 周年纪念中很明显)以及柏林墙倒塌之后自由主义的重生重回轨道。想要加强一个‘历史的终结’和当今对 20 世纪进行文化恢复的愿望展现了一种对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普遍的全球恐惧”^[46]。

“终结论”无疑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群体性术语,鲍德里亚大肆鼓吹“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社会性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鲍德里亚的“历史观也是建立在一种悲观的命定论(即宿命论,笔者注)的基础上的随机的、偶然的历史终结观。……鲍德里亚的历史观中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命定的悲观论;另一是偶然的、随机的、非决定性的观点。这两个特征都与现代技术的特征仿真和仿像有关”^[47]。在《终结的幻相》(*The Illusion of End*)一书中,鲍德里亚从科技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历史终结的三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随着宇宙膨胀速度的加快,每一个事件都变成是原子、核子进入太空的轨道中,在那里“任何一种人类的语言都不能够经受得住光的速度。任何事件都不能够经受得住整个卫星的直播。任何意义都不能够经受得住加速度。历史也不能经受得住事实的离心力作用和它们在真实时间中的短路现象”^[48],历史由于脱离了重力而产生加速度最终走向终结。第二种假说与此正好相反,按照物理学的观点,物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缓慢,更准确地说,在高密度物体表面上的时间看起来是缓慢的流动。与此类似,随着社会充斥着高密度的城市、商品、资讯和大众,历史的步伐就像光接近一个大密度的星体时一样,已经缓慢了下来。社会的发展由于过度的堆积、重量的无限放大而趋向平缓,甚至静止不动。第三种假说同样是一种类比,在音乐创作中由于过度依赖于高保真的立体声效果,使得真正的音乐终结了。在拟真的世界里,现实与超现实,媒介与生活、大众与社会之间的

界限内爆了,一切都是超现实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回到没有立体声效果的音乐;我们也不可能回到前(pre-)新闻和前媒介的历史。音乐的原初本质、历史的原初概念已经消失了,我们不可能把它们从完美的模型同时也是他们拟像的模型中孤立出来,通过被强加的假设模型而进入到消除了它们的超现实之中……我们留下了历史让它进入了拟真的王国,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历史本身一直(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巨大的拟真模型”^[49]。拟真的世界排除了进行发展、变革和更新的可能,从而历史走向了终结。反对进步的历史观,反对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对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建构进行攻击,这些都清楚是表明鲍德里亚属于后现代理论阵营,并且是其中激进而极端的中心人物之一。

福山(F. 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表明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历史的发展因此而终结。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无疑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一种呼应,“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历史批判正确性的否定掩盖了实质性的问题,即否定了历史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受尼采影响的左派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这‘历史的终结’观的合流趋同”^[50]。鲍德里亚的终结论与福山的论调互为呼应,因为“消解历史也就是消解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就此而言,鲍德里亚和福山一样都犯了企图变相地制造新的意识形态的毛病”^[51]。他从技术决定论出发,提出在高科技发达的超现实社会里,我们脱离了现实轨道而进入了拟真的空间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经验和价值。连续的、持久的现代性时间纯粹是一种人为的过程,而历史本质上就是一种拟真,在那里线性、进步而持续的时间观念遭到强烈的否定。这种凝固而永恒的状态使我们面对一个没有未来的未

来,“因为一切均已完成,已经都已完美了,并且注定只能去无限地重复:同样事件的无何止的重复,这就是西方的后现代命运”^[52]。时间消失了,我们被冻结在当下,一切犹如上天安排,人们无需变革与反抗。虽然理论的出发点不同,然而鲍德里亚的终结论同样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工具,只是更为隐蔽、更具有迷惑性,“这位一向激进的理论家,在提出历史终结观念时,却加入了保守主义者的行列,加入了为现实做消极辩解的保守主义传统,面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竟想象不出任何出路”^[53]。

第三节 经济哲学批判的后现代路径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停留于西方的形而上学,更把批判的目标指向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旨在成为一种整体社会理论,解释资本主义晚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发展的所有形式”^[54]。德里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解构思想不仅指向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解构不是,也不应该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55]。福柯在对主体概念的考察中,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主体的规训和压制。通过规范化的监控、检查、管理和规训,资本主义将统治的权力机制遍布于学校、医院、家庭等无所不在的社会载体,从而形成一种能够实施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德勒兹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台不断扩张的机器,这台机器在摧毁传统社会一切限制的同时,也变成了操纵情感、压制欲望的机器,通过心理操控完成对人的奴役。鲍德里亚认为拟真不仅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生活形态,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这也是

鲍德里亚批判理论的深刻之处。“通过预测、仿真、不确定的突变达到并通过代码管理的社会控制,取代一种通过目的达到的社会控制”,这是一种以模式生成作为存在基础的“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56]。从现代主义形而上学批判转向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后现代主义也在思考着资本统治所带来主体的异化状态,也在反思着社会制度的弊端和可能的变革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之所以深刻地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原因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57],从而把批判构筑于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基础论域,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牢固基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强调了对意识形态、文化和技术领域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这一点一般已经为人们所接受”^[58]。后现代主义尽管从政治、文化、技术、心理等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多维度的批判,但他们大多缺乏对经济活动的系统分析,忽视甚至拒斥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无论如何,作为上层建筑的本源与根基,经济基础仍然是后现代理论绕不开的领地,因此各式各样的后现代批判理论总是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从新理论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重新解读。在延续经济哲学批判路径的后现代思想家中,鲍德里亚也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在早期著作中,鲍

德里亚强调消费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以商品为基础的生产过程转向以符号为中心的消费活动,最终质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一种“生产之镜”,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谋。在鲍德里亚中后期的后现代理论中,他强调了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概念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对价值生产进行解构并试图构建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的经济哲学分析中,既展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多种理论形态,同时也清晰地看出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远离和背叛。

一、从生产过程到消费活动

生产活动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分析的具体场景,是其进行哲学批判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人和社会的历史性生存规定,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生产活动主导的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是生产过程的必要因素和条件。从商品生产过程出发,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剥削实质。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商品的极大丰富已然摆脱了过去物质匮乏的时代。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已经从生产社会走向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深刻地改变着 20 世纪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消费对于社会面貌的改变是建立在物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品所包围并以物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形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就十分精彩地描述了被物品所包围的当代社会: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

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59]。

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的转型,消费文化是后现代社会面貌的重要标志之一。贝尔指出:“大众消费意味着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变”^[60]。消费文化的兴起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我也相信,它的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61]。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里,由于符号和影像的大量生产,使得拟像与现实、艺术与生产、高雅与大众之间的界限消除,“随着社会生活的规律的消解,社会关系更趋多变、更少通过固定的规范来结构化,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种假设,即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逻辑,引申出了后现代主义”^[62]。消费文化不仅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紧密关联,而且它也是后现代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从消费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为消费的社会控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考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如何决定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一方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仅占有劳动力自身,从而产生了生产过程中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相互交往是通过消费活动和符号意义而形成的。当今

社会的物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系统,消费成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沟通体系和社会交换结构。通过消费活动,人们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一个相互关系的编码系统之中。消费行为已经从一种经济行为转化为一种文化活动,从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耗转向对社会意义的寻求。符号所代表的社会区分和差异的逻辑,推动着消费者不断地在商品体系中追求所谓的个性化差异,并通过融入符号体系而获得自身的社会认同,从而屈从于整个经济和政治整合机制。通过对消费的符号学分析,鲍德里亚“赋予‘代码’以一种权势,几乎要统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符号与代码给主体在等级制社会秩序中指定了位置,并将他们锁定在一套只能容许商品交换和符号交换的话语中”^[63]。消费由此成为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它是对人进行驯化、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新型机制,体现为“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64]。生产过程的剥削和异化现在转移到了消费活动中,在这里人们被整合到社会机制中,从而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接受着资本逻辑的统治。

消费不仅是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文化形式,更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詹姆逊指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65]。在消费主导的时代里,消费作为一种统治力量不仅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对大众道德、思想、观念进行着控制与主宰,“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

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66]。消费文化不仅仅是大众生活的日常伦理,也在履行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透过消费活动的现象分析,才能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新型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才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资本的本质和人的异化根源。

马克思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考察人的社会关系本质,鲍德里亚则试图在新的社会情境中重新阐述消费、符号在人的本质生成和异化中的重要作用。他通过对物品和符号操控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考察,审视消费、符号和符码对于阶级和社会阶层形成的意义和影响。由此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只有透过消费活动才能清晰地把握人的异化现象和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某种意义上,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中诠释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即走出单一的劳动生产过程去研究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生成,从而为理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二、从物化到拟像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足于社会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他在《资本论》的开头描述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67]。商品本来是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物品,然而现在它却具有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幽灵般本质,其原因就在于商品具有的抽象化奥秘——它将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性,人的本质被转化成物的社会属性。通过商品这一物化形

式,资本也具体化为抽象的货币,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都以物的属性呈现出来。由于普遍存在的商品抽象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普遍物化不仅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神秘发源地,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日常普遍观念。随着人的社会本质抽象化为物品,交换过程抽象化为货币,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客体统治笼罩着社会,“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当然不是商品本身,商品只是作为维持社会存在必要的简单交易对象,他批判的是在资本生产和交换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拜物教的渗透以至于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被吸入并被神秘化。在这里,抽象物占据了统治地位,随之而来会出现社会现实的本质被掩盖的危险以及统治的加深”^[68]。商品作为一种抽象物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石和起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第一个重申了马克思物化现象的重要意义,指出物化现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69]。在西方学者对于物化问题的研究中,抽象的客体不仅凝结在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而且也渗透到艺术、审美、文化和技术等日常生活领域。阿多诺认为当代艺术具有了“似物性”(thing-like)特征,艺术作品越来越被物的形式所取代。他认为艺术作品要想保持一种自律性,就无法摆脱被物化的命运,因为它总是要借助于物质载体来表现自己,所以在艺术的物化与社会关系的物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同谋关系。随着物化现象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世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伪美学”世界。海德格尔用“图像化”一词来阐明当代社会的物化现象,他认为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世界主体两个方面,世界万物不再是中世纪时期上帝的造物,而是

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世界进行构建与规划、控制与征服的过程。德波继续以物化概念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他描述了被消费、休闲、娱乐和媒介控制下的“景观社会”,这是商品统治达到极致的一种社会状态。马克思的“庞大的商品堆积”被转化为“景观的庞大堆聚”,景观的盛行表明了商品已经占领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于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商品转向景观,“景观是对物的生产的真实反映,是生产者的虚假对象化”^[70]。景观成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形成的新的抽象中介,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景观的抽象统治功能,贝斯特总结道:“景观的现实是:(1)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的刺激力量”^[71]。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被延伸到艺术化、图像化,被转化为一种景观,而在鲍德里亚那里则表现为一种拟像化。

马克思揭示了一个由商品、货币和资本等抽象力量统治的社会,德波描绘了经济统治秩序的视觉映像,而鲍德里亚则描述了一个从物化到拟像化的超现实世界。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并经由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批判和德波的景观理论而最终形成。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表明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以商品的表象呈现出来,因此要区别现象与本质、具体形式与真实形式就变成越来越困难。“正是这种物化(reification)的一般条件为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提供了理论渊源,在超现实中,复本超越了原本,二者之间内爆了”^[72]。在符号学的结构分析中,商品失去了深度指涉,需要不再指向人类的自然属性,交换价值失去了使用价值作为功用基础,价值的来源——人类抽象

劳动正在被机器和符码所取代,商品被消除了所有的原本和深度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拟像。由此鲍德里亚认为商品是一个失去指涉的拟像、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商品通过能指链条的自我指涉而产生意义和价值,“能指变成了它自己的指涉物,这样的自主化成了符号论统治的基础,商品形式被‘符号形式’所超越”^[73],由此成为一个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的纯粹拟像。

如果说现代社会把人的劳动和价值抽象为一个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那么后现代社会则意味着对商品更高层次、更为极端的一种抽象,即商品被演化为一种没有指涉物的符号和拟像。马克思在各种抽象化的幽灵中考察人的异化状态,而鲍德里亚则完全全消除了抽象符号背后的深度指涉——人的本质、劳动、价值等,从而丢弃了物化理论的现实基础,转向一个由信息、媒介与技术控制的超现实世界,并在其中考察人的异化和社会的抽象统治。在为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场景之后,鲍德里亚也离开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语境,走向了技术决定论与价值的虚无主义。

三、从生产方式到意指模式

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马克思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4]。生产活动不仅是人的社会本质形成的前提,更是整个社会结构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批判正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剖析了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资本的整

个循环过程,在此基础上透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本质。通过生产活动的分析,马克思构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75]。

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生产方式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它包含了生产资料和工具、生产过程的协作与分工,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结合。这里的生产方式主要指由自然条件、技术等因素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其次,生产方式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生产的整个社会组织形式,主要指决定并制约着生产的各种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马克思曾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76]。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解读中,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社会关系被忽视了,符号的结构成为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的主要来源。作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符号的意指模式(the mode of signification)成为后现代主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重构的一种重要工具。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商品”等概念进行着重新解读,在他们眼里,“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语言,那种影响语言符号、使这些符号丧失参照身份的突变也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77]。符号的意指模式成为后现代主义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把方法论钥匙,“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是一个简化。而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到波德里亚仿真的消费逻辑的转变,也同样是一个简化。……后现代的生活是无法摆脱指意和超真实事物的塑型逻辑的”^[78]。

语言学转向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语言和符号的

结构分析成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社会批判最为流行和有效的一种手段。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为客观世界提供一定的名称和概念,赋予其特定的内涵和意义。然而符号能指对所指对象的指称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因而会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这就使得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并非紧密的一一对应,而是遵循一种任意性原则,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松散和滑动。意指关系的任意性原则表明符号的意义不是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产生,而是永远在能指的链条上滑动、推延着。因此对传统哲学各种话语中所设定的“超验能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r)——上帝、理念、自然、意义和价值等的批判就成为可能了,因为这些能指并没有固定的所指,它们的意义是多变且充满歧义的。任何一种理论、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假定存在着一个决定整个话语系统的中心价值或核心概念,它主宰或支配着整体话语体系。然而在任意性原则的作用下,单一、固定而僵化的意指关系被打破了,那个主宰一切的“超验能指”也受到强烈的质疑。

后现代主义认为,批判理论已经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的生产模式之中,因为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产关系,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它们的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如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等,它们的出发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经济领域之外,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因此波斯特认为,“当20世纪的社会政治发展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轨迹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就受到了质疑。随着新的政治运动将生产模式的概念的线一丝丝地抽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也就散开了”^[79]。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无法解释当今时代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如宗

教对峙、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从而批判理论要在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结合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深受语言学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以符号的意指模式来分析当代社会,从而使批判理论从生产模式转向意指模式,“指意模式和生产模式对于批判理论一样有着同等的重要性……转变生产模式的问题必须同转变意义、文化和语言世界的问题一样得到批判的关注”^[80]。在今天,意指模式的分析被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学科广泛运用,成为了理解高科技社会运行的一种重要工具。

马克思将资本的积累过程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初始阶段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生产出剩余价值,而只有通过第二阶段的交换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剩余价值。由此交换与消费成为剩余价值最终实现的重要环节。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符号的意指模式是透视当代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工具。其中鲍德里亚所分析的物品体系和符号价值是意指模式分析的最佳范本,“鲍德里亚对后现代仿真世界的描述,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信息技术与商品生产的发展导致了后来扭转决定论方向的‘指意文化的胜利’(triumph of signifying culture)。这样,不断发生转换的文化记号(signs)便带入了社会关系之中”^[81]。意指模式的分析首先表现为用符号的内在结构来解读商品概念,符号成为分析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基础。在强调生产活动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二元结构。而在资本积累的第二个阶段即交换和消费活动中,由于消费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生产 and 消费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消费社会里,出现了“符号形式的普遍化和复杂化,是符号形式向整个文化和环境的扩张,是符号形式向符号——

交换价值的转变”^[82]。此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仍然是商品的构成要素,然而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商品的社会意义和符号价值成为决定性要素。物品转化为符号,成为脱离了需求系统的一种象征之物,鲍德里亚认为此时“符号的结构成为商品形式的核心,商品才能够直接成为意指(signification)——这种意指不是商品的一种附属产物,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或者一种内涵,因为商品的形式使其最终成为一种中介,一种交流体系,彰显出所有的社会交换”^[83],因此,商品如同符号一样成为一种操纵交换价值的符码。商品生产形成了一个新的语言结构和意指模式,并决定着当代社会人的社会关系的生成。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出发,把需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等看作是价值的深层指涉。而符号政治经济学“构建了某种意指关系的模式,其中所有围绕它的符号都在逻辑的可计算性之中充当一些简单的要素,在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框架中互相指认”^[84]。在鲍德里亚看来,意指模式的操控取代了人类的抽象劳动而成为商品(主要指信息、艺术品等)价值最主要的来源,“利用了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力来更为根本”^[85]。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意指模式中的符码秩序,消费受到了符号体系的制约,在流通中符号的运行成为主导法则。由此,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实现越来越离不开符号的意指模式,因此只有运用符号学的方法才能透视当代社会资本崭新的运行机制。

鲍德里亚对于意指模式的运用不仅将商品转化为符号,而且更激进地消解了符号的内在指涉,使符号演化成一个空洞的能指体系。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先锋人物都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运行机制依赖于一个指涉性的神话,不管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自我指涉,还是商品生产中的内在价值,它们都预设了一个稳固的、永

恒的、作为基础的固定指涉。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由于符号具有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指涉等特征,因此语言的意义不再是由能指与所指之间严密的逻辑关联而产生,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是语言系统内结构关系的产物。由此在意指模式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紧密关联被消除了,符号的意义可以完全脱离所指,并且与外部指涉物失去关联。因此,“在‘后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指涉性的消亡常常在资本扩张以及资本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生产、定价和流通环节发挥作用。语言学意义上的指涉性,哲学范畴的基础主义,以及工业社会的商品化现象,通过复杂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发生连结。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学意义上的自我指涉和哲学范畴的实用主义置于与后工业过程相关的各种关系中进行重新理解”^[86]。于是,运用意指模式的分析方法,鲍德里亚消解使用价值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的紧密关系,将商品内在的物质属性转化为表达社会意义的纯粹符号;商品价值与人的抽象劳动力之间的关联也被解构了,“价值的指涉失去作用,而让位于价值的结构运作。也就是说,随着指涉维度被消除,结构的维度开始自主运作,在指涉维度消失之后结构维度建立起来了”^[87];最终,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作为深度指涉的原本被抹去,无限复制和系列生产成为主导方式,生产被再生产所取代。

符号的意指模式为理解当代资本的运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成为批判理论新的分析工具。波斯特认为从生产方式到意指模式的转换使符号学和批判理论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与运用空间,“波德里亚的目标有两个:改变符号学,使得其形式主义和非历史性可以服从于批判理论的需要;改变马克思主义,使得其生产主义可以服从于文化批判的需要。其结果是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可以把握住技术和文化、生产和象征交换之间的

相互依赖性”^[88]。因此从商品的生产方式到符号的意指模式,鲍德里亚的理论视角远远超越了生产领域,并将批判理论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在提供新视角的同时,鲍德里亚局限于从技术和符号学对社会表面现象进行描述,否认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否定人类劳动是价值形成的根本源泉,因而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无法真正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四节 后现代批判理论的局限

鲍德里亚把符号学方法、消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在一起,对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物品和符号体系进行分析和批判。他的符号学视角使我们更清晰地透视当代社会商品如何形成一个符号体系,而这一体系反过来将个体整合到消费社会的需求体系中去。凯尔纳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波德里亚将符号学和文化维度加入到社会学理论中,研究社会中符号的生命,也研究了被他称之为符号价值的东西如何产生了一个广告、时尚和消费的新世界。他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视角”^[89],从而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增加了符号学维度。然而,后现代主义对批判理论的解读和发展也存在着天生的缺陷和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张力,具体体现为: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它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

性,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能直接影响并决定社会发展。当代社会被后现代主义描述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这些名称或多或少都表明了技术对于社会形态的重要作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其特点是新的技术、社会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90]。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科学术语,从天文学和物理学(黑洞、内爆),再到生物学(DNA,基因工程)。他描述的拟真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高科技社会,在那里生物技术的DNA和信息科学的0/1二元数字成为一切事物生成的本源。在拒绝了传统哲学的理念/物质的本体论诉求之后,鲍德里亚在超现实的世界中重新构造了一种“非决定论和符码的形而上学”。在新的时代里,模型控制系统(cybernetic)、生物工程技术、信息符码和媒介技术等取代了工业生产和价值交换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鲍德里亚“实际上提出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认为模型和符码成了社会经验的首要决定要素。在类象(拟像,笔者注)社会中,模型和符码构造着经验结构,并销蚀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别”^[91]。高科技的符码和模型不但规定着当代社会的本质,也重塑着社会生活现实本身。

技术成为鲍德里亚描述当下社会形态最重要的理论视角,然而鲍德里亚却对技术的发展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在技术日趋完美的进程中,技术的作用和地位被反转了。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相反技术控制了人;技术不是促进人类生活日趋完美,相反它引导人类走向拟真世界并最终消失。“技术的发挥就意味着人类已不再

信任其特有的生存,并给自己确定了一个虚拟的生存,一种间接的命运。于是,我们所有的臆象都变成了主体不存在的、希望不存在的场所”^[92]。技术愈是完美,它愈能自主运行并形成一個脱离人类控制的客体世界;技术在将世界塑造得更加精致和完美的同时,也在日益驱逐人类的主体空间。因此技术成为一种冒险,成为一种消失的艺术,它“不只是改变世界,其终极目的可能是一个自主的、完全实现的世界的终极目的。我们有可能最终从这样一个世界退出”^[93]。鲍德里亚引用克拉克(A. Clarke)的小说《神的九十亿名字》来说明人与技术的关系。故事讲述了西藏僧人请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专家来为他们计算神有多少个名字。专家的任务完成后,世界完成和终结的预言也就实现了。当专家们走下山谷,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颗颗地熄灭了。也许这就是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命运,技术的完善使人类的未来越来越灰暗。技术“将世界虚构化,这一直是我们安排给技术完成的工作之一,把所有的行为和事件变成信息和数据,通过这样的办法达到世界的现实,这种‘完美的罪行’只是一种走向灭绝的途径而已”^[94]。技术的发展在带给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奴役和异化,人类无法摆脱技术的操控。

不仅如此,技术也是鲍德里亚分析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关键力量,是其批判理论的主要线索。鲍德里亚认为“在西方社会,科学革命是社会文化整体转换的一部分,也是这种转换的标志,科学革命影响着社会所有的层面和所有的过程”^[95]。在消费社会里,鲍德里亚认为物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是由其技术层次和结构所决定的,“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essentiel),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inessentiel)……我们必须由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才能理解为何物

会被生产及消费、被拥有及被个性化”^[96]。在媒介批判理论中,互联网、电子媒体和数字化等技术是后现代超现实世界的形成基础。鲍德里亚把电视这一媒体技术看成是大众媒介最主要的拟真工具,或许在当下社会我们可以把互联网的虚拟世界看成是最典型的一种拟真,这些技术的拟真被赋予了构造超现实社会的重要功能。“鲍德里亚由此将媒介从社会系统中抽象出来,并将媒介技术看作是技术和符号制造术的一种附带现象……媒介与社会的辩证法则被简化为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97]。

马克思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技术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机所代表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技术的革新成为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推动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98]。必须看到,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最终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技术的分析被结合到物质生产过程中,由此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然而,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离开了生产过程来考察技术的作用,从而表现出了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倾向。贝尔把信息和知识看成后现代社会的核心,而鲍德里亚则强调了拟像、符码和模型等新技术的本源性作用。他们把技术看成是独立、自主的,认为技术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源。这一种单一的技术决定论忽视了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没有认识到技术只有借助于物质生产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影

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才能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鲍德里亚“表现为极端版本的后现代转向,虽然不乏追随者,但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抹去了文化生产与文化接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维度,推出了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和技术决定论,因而否认了文本解释、社会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可能性,最终不过是一种理论主义的胡言乱语”^[99]。鲍德里亚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必然抹煞了现象背后资本逻辑的奴役和统治,从而消解了任何变革和反抗的可能,最终以技术的话语来为社会制度进行合法性证明,从而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虚无主义

在尼采看来,西方文化是虚无主义的温床,它在为人类认识提供一个终极基础的同时,也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从而开启了本质理念和终极意义的虚无化。传统形而上学为意义和价值构建了一个稳固而坚实的基础或本体,使它们具有深度指涉和内在维度。而鲍德里亚提出的拟像概念是对真实的否定和意义的消解,从而在现代主义批判中陷入了虚无主义。在鲍德里亚看来,由物质形成的现实世界是在人类技术与理性范围内产生的结果,“物质的受约束、受限制的形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100]。在当代科学研究中,测不准或不确定性原理被看作一条自然规律,它不是人为的一种限制,而是自然界本身的内在规定。量子物理学的客体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这种无法消除的距离和不可能出现的同时性,因此人们不可能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就是物体及其不断活动产生的幻相(illusion)。在宏观层面上,由于星球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整个宇宙只是一个幻相。鲍

德里亚认为,宇宙中星球的光线要经过亿万光年才能到达地球,甚至有时候这个星球已经消失了,它所发射的光线才为人类的感官所捕捉。星球之间的距离和断裂,使得我们所感知到的是一种虚假的表象。“由于光的相对速度和散射,所有的东西都只能以录像的方式在一种难以表达的时间的紊乱中存在,它们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隔着一段距离”^[101]。鲍德里亚认为如果没有客体之间的“距离”和“延搁”,主体将感知不到一切,真实也将“可能是一种完全的混杂”,因此,“没有现实。没有某物。而有虚无。也就是一种难于理解的客体和认为已理解客体的主体的永恒的幻觉”^[102]。如果真实的世界只是一种幻相,那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就只是一种超现实。在拟真阶段形成的超现实无需原本或本质,而是通过符码和模型生产出现实,“今天的拟象确保了现实的延续,而它往后遮盖的并非真实,而是没有真实这件事,即虚无的延续”^[103]。这种拟像形成的超现实既不需要绝对理念的规划,也缺乏客观物质的根基,它“没有意义的存在;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论在虚空中漂浮,不依靠于任何安全的港湾或支柱……在后现代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可见、明晰、透明的,但又是高度不稳定的”^[104]。这个透明的超现实世界里,意义、价值、主体、社会等抽象概念都被隐藏并解构了,“一切都在消失中,以沙漠般的、偶然的、冷漠的形式在进行着,这里甚至不再有感伤,即虚无主义的感伤。这种感伤的神秘能量仍然来自于虚无主义的力量、激进的神性否定和热情的期待。……一切都只是在消失”^[105]。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并不仅仅留恋于那些形而上学终极悬设的消失,他同样质疑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生产模式,从而在经济哲学批判领域走向了价值的虚无主义。“如果虚无主义者不再被生产模式所困扰,而是被消失的模式困扰,那么我是一种虚无主义

者”^[106]。生产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过程,是人的自我意识、内在精神的一种实现,“‘生产’一词的最初意思其实并不是指物质的制造,而是指呈现出来,显示出来……让某种事物清楚地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可能是一个物体,可能是一个数字,也可能是一个概念”^[107]。随着拟真世界中主体的消失,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过渡到了当下符码统治的超现实时代。在鲍德里亚眼里,商品价值的深层指涉——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被符码的结构和组织所取代了,符码的结构价值比起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更为根本。“由于物化活动被拟象、仿真以及象征交换所代替,先前那种表现为‘表象消失’的虚无主义,已变成一种既非美学也非政治学意义上的‘透明的虚无主义’,是为意义荒漠化所无限诱惑的虚无主义”^[108]。对指涉、原本的消解也使鲍德里亚在生产过程中否定了人类劳动的本源性作用,否定消费对象中的物质实体,最终走向了价值的虚无主义。然而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后结构主义解读过分地关注当代社会的符号现象,片面地强调了拟真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夸大了后现代类象和超真实构成当代社会的程度,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抹煞则起到了使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神秘化的作用”^[109],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转向了一种悲观的虚无主义。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在不可逆转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毫无保留地拥抱虚无主义,皆因斗争的可能性早已荡然无存”^[110]。

在当代社会,尽管技术、文化、信息、服务等要素在价值的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多的要素以更为复杂的形态参与到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然而必须看到在层层表象遮蔽之下,仍然是人类的劳动在创造着商品的价值,物质生产和价值积累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最为根本的动力。与鲍德里亚努力消除价值的指涉对象不同,不少学者坚持认为价值来自生产过程,并强调当代“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111]，从而以后现代主义视角延续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哈维认为二战后以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和国家福利主义为特征的福特制生产正在逐渐被富有灵活性和弹性的生产体系所取代。他通过为生产概念赋予新的要素，将“弹性生产”、“时空压缩”等作为积极的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生产的崭新状况和价值的多重来源，努力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由此“提出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在后现代世界中开始的断裂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更新或重建的可能性”^[112]。凯尔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与技术的组合体，后现代主义认识到知识、信息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它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决定着什么样的媒体、信息、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和商品将被生产和分配”。因此，批判理论如果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批判割裂开来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消费社会、媒体、信息、计算机等现象时，马克思的范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113]。

三、宿命策略

在以各种新奇、极端的概念描述高科技世界之后，鲍德里亚开始对当代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新型关系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在技术高度自治的拟真世界里，鲍德里亚无奈地发现人类已然失去对技术的控制，主体的消亡标志着客体的胜利，“优先地位已经转移到客体，尤其是超现实的客体、拟真的客体身上。鲍德里亚提出了客体的逻辑以取代主体的逻辑，这就是他的‘宿

命策略’”^[114]。宿命策略(Fatal Strategy)首先体现为客体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客体的统治导致了主体的消解。不仅如此,随着主客体关系的反转,客体开始对人类主体进行着“水晶复仇”。在技术统治的时代,客体已经取代了主体的地位并反而控制了主体。因此,任何改造和利用客体的计划都是徒劳无益的,而放弃对客体的控制,转而向客体投降,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这是当代人类的宿命。

宿命策略也体现在客体系统发展到极端程度所产生的内爆和消解,即某种行动过程或发展轨迹被生长、加速并繁衍到极端的程度,会突破局限、超越自身的界限而消解。商品、信息、技术或社会等被发展到精密性和功能性的极端程度,被推向完美的极端程度,就会达到它的爆破点而内爆了。在鲍德里亚看来,这并不是依靠批判主体或颠覆力量而发生的,而是由客体在纯粹、单一的过度增长后出现的一种自动反转。这就是“客体的反讽”,通过极大地接近确定性,系统被自身所内爆并消解,“事物已找到了一条途径来逃避意义的辩证。它们所采取的方法是:无限的增殖,赋予它们自身更多的可能性;超越其本质,走极端”^[115]。宿命策略体现在哲学思维上就是要不断地去超越假设和极限,即使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思想和写作的唯一合法性证明就是它们加速了走向终点的进程”^[116]。在科学的层面上,客体越是被实验的分析所纠缠,它越是会产生一些伪造、逃避、掩盖和消失的策略。这就像一个病毒,它通过无休止地创造反策略来逃脱人类的控制。在大众媒介领域,由于过度的信息和技术的控制,人们已经不能区分真实的信息和事件,从而导致意义在媒介中内爆、社会在大众中内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社会、经济的系统越是朝向它们自身的完美,它们就越解构着自身”^[117]。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不再需要对社会矛盾的剖析,不再依靠无产阶级的批判和反抗,一旦社会发展饱和到了极点就进入了惰性和熵的状态,最终在自身的极限点上内爆而自动消解。

鲍德里亚的宿命策略带着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如果主动向客体投降,等待系统自身发展到极致而反转,那么主体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只是一味地顺从客体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毫无作为,那么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又有何异?宿命策略完全忽视和取消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客体从劳动过程中抽象出来,并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因而,其观点中那些具有潜在进步意义的批判——对主体受到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但却被神秘化和异化的客体之统治的批判,以及对表现在剥削动物、人类及自然生命等方面的主体之傲慢的批判——也就丧失殆尽了。鲍德里亚既然剔除了主体的灵魂,也就不可能去分析主体通过集体努力来改造当前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的责任和能力了”^[118]。

宿命策略把“系统自身的逻辑”是“反对系统的最好武器”,“倘若对极端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积极的政治策略的话,那就是一种宿命策略:加速虚无主义进程而不提出任何积极的社会与政治替代方案”^[119]。因此人们面对资本主义的统治,无能为力而只有消极地等待系统的自身内爆。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这种消极、无奈的反抗理念是1968年激进革命幻灭的症状体现,它无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阶级矛盾,无视资本统治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而要求革命主体放弃积极性的变革活动,从而排除了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变革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即全球化杀戮的抵制在当代已经受到高度质疑……在抵制之外,我们要去面对系统的宿命,这一宿命甚至是更加致命的”^[120]。

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一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出发来阐述其哲学沉思;另一方面也延续着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和技术的批判,从消费文化和拟真技术来描述当代社会。作为后现代理论的风云人物,鲍德里亚的思想同样带着明显的反传统、反现代主义的痕迹。以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概念为核心的后现代思想,既是鲍德里亚中后期理论的关键词,又是其展开批判理论的基础概念。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一方面指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消解主体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也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展开经济哲学批判,从生产转向消费,把物化推向拟像化,并以语言的意指模式来取代生产模式。然而在经济哲学批判中,由于过度地强调了符号学方法和技术的决定作用,使鲍德里亚最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走向了“符号学的唯心主义”。

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对批判理论进行补充和扩展的同时,也显示了批判理论的软弱与退化,“运用结构语言学也承担着某种代价:当语言学的形式主义被带进社会科学的时候,它就暗含着一种非历史化以及批判力量的消减”^[121]。后现代批判理论由于割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以技术的符码和模型重构了一个新的“超验能指”,将批判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在对文化、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最终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革命意义,未能在物质生产的剖析中透视资本运行的深刻逻辑,也就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理论高度。而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不仅离不开现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与唯物主义紧密相关,正如伍德(E. M. Wood)所言:“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文化现象的物质基础比后现代主义的物质基础更为显而易见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消费主义

的、移动式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恰恰就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地认识问题正是将文化从商品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第一步”^[122]。然而,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批判理论仅仅留恋于能指之间的游戏,仅仅关注拟像的幻影,并否认这些表象的背后存在着深层而真实的社会根源,从而无力去揭示符号和拟像之下所掩盖的本质逻辑,最终其理论只是一种肤浅的理论泡沫。人们只能“将波德里亚的作品当作科幻小说和荒诞玄学的一种形式来阅读,或者是当作严肃的社会理论和文化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来阅读”^[123]。

注 释

- [1]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22 页。
- [2]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279—280 页。
- [3]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2 页。
- [4] 王晓路等编:《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6 页。
- [5] 参见 Ben Agger: *Critical Social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West view press, 2006, p. 3.
- [6]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载《教学与研究》2003 年第 7 期。
- [7] 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第 143 页。
- [8]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346 页。
- [9] 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第 143 页。
- [10] 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8—109 页。
- [11]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 [12]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1 页。
- [13]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p. 5—6.
- [14] Ibid., p. 5.
- [15]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1.

- [16] 托尼·希:《拟真时代抵制意义:波德里亚的〈仿像与拟真〉》,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31 页。
- [17] 索查克:《符号学、控制论与市场营销交往的狂热》,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42 页。
- [18]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80 页。
- [19] 约翰·R·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86 页。
- [20] 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 页。
- [21] 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 页。
- [22]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506 页。
- [23]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55 页。
- [24] 凯尔纳:《媒体文化》,第 527 页。
- [25] 博德里亚尔:《完美罪行》,第 25 页。
- [26]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99.
- [27] Ibid., p. 97.
- [28]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 60 页。
- [29] 波斯特:《信息方式》,第 19—20 页。
- [30]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 497 页。
- [31]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22 页。
- [32] 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7 页。
- [33] Mark Poster,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 p. 98.
- [34] Jean Baudrillard, *The Vital Illusion*, pp. 76—77.
- [35]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70 页。
- [36] 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第 139 页。
- [37]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52 页。
- [3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47 页。
-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3 页。
- [40] 罗斯特:《后现主义与社会科学》,第 92 页。
- [41] 同上书,第 93 页。

- [42]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E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 [43] 鲍德里亚尔:《完美罪行》,第 24 页。
- [44]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End*, p. 8.
- [45] 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第 40 页。
- [46] 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王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6 页。
- [47] 孔明安:《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吗?》,载《现代哲学》2008 年第 6 期。
- [48]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End*, p. 2.
- [49] Ibid., pp. 6—7.
- [50] 福斯特:《保卫历史》,载伍德、福斯特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3 页。
- [51] 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王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 页。
- [52]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73 页。
- [53] 同上书,第 174 页。
- [54] 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第 145 页。
- [55]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 [56]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84 页。
-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6 页。
- [58]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 页。
- [59]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2 页。
- [60]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 67 页。
- [6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 418 页。
- [62]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21—22 页。
- [63] 转引自波斯特:《信息方式》,第 90 页。
- [64]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63 页。
- [65]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 29 页。
- [66]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 197 页。
-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4 页。
- [68] Douglas Kellner(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p. 44. 参见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62 页。
- [69]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 144 页。

- [70] 德波:《景观社会》,第 6 页。
- [71] 贝斯特:《现实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现实:波德里亚、德博尔和后现代理论》,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81 页。
- [72] Zeus Leonardo, “Resisting Capital: Simulationist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 *Critical Sociology*, 2003, Vol. 29(2), p. 225.
- [73]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125 页。
- [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8—79 页。
- [75] 仰海峰:《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 [7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 页。
- [77]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第 27 页。
- [78] 戈特迪纳:《客体系统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早期的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53 页。
- [79] 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97 页。
- [80] 同上书,第 116 页。
- [81]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 8—9 页。
- [82] 贝斯特:《现实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现实:波德里亚、德博尔和后现代理论》,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72 页。
- [83]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42 页。
- [84] 同上书,第 191 页。
- [85]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08 页。
- [86] 王逢振等:《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约翰·罗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1 年第 1 期。
- [87] Mark Poster(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 125.
- [88] 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05—106 页。
- [89]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7 页。
- [90]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381 页。
- [91] 同上书,第 153 页。
- [92] 博德里亚尔:《完美罪行》,第 42 页。
- [93] 同上。

- [94] 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第 80—81 页。
- [95] Mike Gane, *Jean Baudrillard: In Radical Uncertainty*, p. 49.
- [96] 布希亚:《物体系》,第 3 页。
- [97]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 74.
-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27 页。
- [99] 萧俊明:《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
- [100] Jean Baudrillard, *The Vital Illusion*, p. 73.
- [101] 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第 52 页。
- [102] 同上书,第 18 页。
- [103] 同上书,第 98—99 页。
- [104]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5—16 页。
- [105]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p. 162.
- [106] Ibid.
- [107] 鲍德里亚:《忘记福柯》,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8 页。
- [108] 邹诗鹏:《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课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 [109]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86 页。
- [110] 转引自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 236 页。
- [111]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第 161 页。
- [112]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 237 页。
- [113]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381—382 页。
- [114] Douglas Kellner(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1994, p. 82. 参见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 113 页。
- [115]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67 页。
- [116] Jean Baudrillard, *The Vital Illusion*, p. 83.
- [117] Ibid., p. 78.
- [118]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70—171 页。
- [119] 同上书,第 363 页。
- [120] 托尼·希:《拟真时代抵制意义:波德里亚的〈仿像与拟真〉》,载毕晓普、凯尔纳编:《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第 133 页。

- [121] 波斯特:《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105页。
- [122] 伍德:《何谓“后现代主义”》,载伍德、福斯特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第13页。
- [123] 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载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第24页。

结语

多元、激进而软弱的后现代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形而上学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猛烈的批判,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最重要的一种批判理论话语,其视角与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表面的相近并不代表实质的同一,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异。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却忽视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在批判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走向了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同时,却未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理论视角,从而不能提出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有益的思想框架;最终由于过多强调文化和技术的社会作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后现代主义无力破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从而沦为一种软弱无力的纯粹理论。

一、多元的视角

后现代主义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现代主义展开了攻击和解构。他们反对任何一成不变的“基础”、“中心”、“本质”等,拒斥“绝

对理念”、“纯粹理性”、“唯一中心”及“单一视角”，试图摧毁现代主义哲学那种封闭、单一而僵化的思维方式，打破理性、主体等概念的束缚和压制。德里达以解构的方法消除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义，利奥塔倡导微小叙事以反对宏大叙事和总体性话语，鲍德里亚以拟像与拟真消除传统表征体系的二元对立。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哲学的僵化、保守、教条化和机械化，充满了批判的意识和创新的激情。他们重视差异、多元和流动，强调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而进行综合分析，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并焕发出强大的阐释力，就不能成为一种单一的、封闭的话语，而应该实现多领域、多学科和多层次的理论结合，形成一个跨学科交叉、多视角融合的整体性理论视域，这样才能对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科学的回应，并成为当代人们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利器。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与批判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和政治方面，那么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则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种族、性别等各个方面，在每一个微观层面和日常生活领域中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和压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考察了现代社会制度、知识和话语体系如何将个体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运用权力和技术对个体进行的压迫和规训。德勒兹提出一种关于欲望的政治及社会理论，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压迫制度和社会控制。社会运用交换价值和货币等抽象体系对人的欲望进行“辖域化”（territorialize）和符码化，从而形成对人的欲望进行压制和管理的制度，这种制度表现为民族—国家、商品符号体系、信用体系、精神分析、法律等等。鲍德里亚描述了一个由符码和模型生成的超现

实世界,在那里社会失去了物质性和现实性,主体迷失在技术形成的拟真世界里。后现代主义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深层本质,这些多维而异质的研究方法包含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独到的剖析,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视角,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拓展、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判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为了打破抽象理性的樊篱,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扎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之中。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彻底地终结旧形而上学,为批判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攻击,表面上话语丰富、视角多元,实际上却仅仅是无原则、无目的、非理性的激情宣泄,更像一场虚张声势的文字游戏。后现代批判理论关注知识的客观性、语言结构的差异性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却忽视了它们立足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和物质基础,从而只是描绘了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阁楼。此外,后现代主义鼓励杂多甚至对立的各种话语,完全否认不同理论之间的因果、主次关联。他们对各种理论不分主次地进行并排罗列,使各种理论之间缺乏有效而坚实的支点,从而不能透过复杂的社会表象去揭示其中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基础。因此在凯尔纳看来,后现代批判理论最重要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对经济关系和资本制度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具有建构力的制度,因而像后现代理论那样明显地无视经济实在是一个错误,按照我们的观点,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不能与资本主义理论分离开来,不能与对资本主义不同层次之间的系统关系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分离开来……我们坚持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试图运用关于资本主义当

前阶段的理论来说明各种社会现象——仍然有其重要性”^[1]。

马克思在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并且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从而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排斥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仅仅停留于片面、浅薄而纯粹的理论建构,使得其批判理念变得空洞、抽象和盲目,最终无法对当今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做出恰当而准确的分析,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社会状况。

二、 激进的立场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 20 世纪西方激进政治的传统紧密相关。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后现代话语生来就带着 20 世纪 60 年代革命失败之印记,“一些早期的后现代理论家如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部分地是共产主义和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失败的产物”^[2]。哈维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发端于 1968 年的革命运动,“1968 年的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至少按它本身的条件来判断,却必须把它看成是后来朝着后现代主义转折的文化上的和政治上的预兆”^[3]。革命运动的挫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立场。这种激进立场强调后现代社会与先前社会形态之间的断裂,声称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从根本上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新时代。贝尔描述了一个以信息和知识为主导原则的新社会,詹姆逊认为我们处于一个以“跨国资本”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鲍德里亚则以技术主宰的“超现实”来指称新社会形态。新的社会状况必然要求我们抛弃现代主义的理论、政治、文化与思维方式,因此后现代的激进立场对传统形而上学、现代主义价值和旧社会形态持一种绝对否定的态度,它们倡导差异以反对同一、强调边缘而贬低中心、以非理性、不确定性来对抗理性和确定性、以拟像来消解原本;

它们号召用新的范畴、概念、思维方式和写作模式来取代现代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从而呈现出与传统理论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理论态势。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刻地反思西方社会现代性所造成的一切奴役和压迫,从而为哲学主题的转换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完全抛弃现代性形而上学,彻底地否定其基本预设和前提。然而在对理性、主体、总体性等现代主义观念展开猛烈批判的同时,却错误地把启蒙、民主和社会进步等革命成果不加区分地抛弃了,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也倒掉了婴儿。这种未加细致分析、全盘否定的做法被凯尔纳称之为“后综合症”,即“为了创造适合于据说是崭新社会情境的新话语和新理论而激进地拒斥先前的观点”^[4]。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立场在理论方法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建构和解构之间并非是一种绝对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取长补短、交互渗透的关系。在对旧形而上学扬弃的基础上,马克思将抽象理性和先验主体扎根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从而完成了对理性和主体的批判和重建。因此在对待现代主义观念上,批判理论要辩证地分析,吸收其中肯定的、有益的价值观念,克服那些僵化的、落后的概念体系,才能形成更为合理而科学的理论话语。辩证法的思维不仅可以正确地看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科学地分析两种话语形态之间的区别与关联。

与强调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前时代与过去时期、后现代阶段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继承性。新社会形态必然脱胎于旧社会,它继承了原有社会的各种特征和样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调整,在扬弃中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社

会面貌。可以说,我们正处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转型时期,消费、信息、媒介、技术等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形态。现代时期的价值、观念仍然在被积极地反思、矫正和重建,后现代主义观念也正在形成并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坚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框架,才能科学地分析各种观念、思维和理论的变化,并准确地把握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

三、软弱的批判

在对现代主义观念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后现代主义则缺少坚实的理论支点,沉迷于语言与文化的分析;在对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了辩证的分析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则从单一的、激进的视角出发,强调断裂、差异与冲突。不仅如此,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更显示出了理论上的贫乏和实践中的怯懦,最终成为一种软弱而虚伪的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拒斥总体与宏大叙事、偏好碎片与微小叙事,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样只侧重于某一个领域和局部,却缺乏分析和批判的整体视角和宏观把握。福柯偏重于从现代性制度和知识形态来分析主体受到压制和惩戒的具体形式;德勒兹关注当代社会人的欲望所受到的管制和压迫,由此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殖民化和霸权统治;鲍德里亚阐述了由媒介、技术等力量形成的“新资本主义控制论的秩序”,它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新型统治方式;利奥塔则批判了作为一种总体性、共识和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难看出,后现代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都集中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知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领域的分析,因而未能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政

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在批判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批判。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才能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整体面貌和本质特征,并从“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中找出社会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当然,要充分而全面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必须吸收更多的后现代因素,既要引入更多元的分析视角,又要坚持经济领域分析的决定作用。只有从经济、文化、技术、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整体视角出发,才能科学地阐述这些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才能准确地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及其带来的上层建筑的整体转型。

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主体概念的同时,也无法找出实现解放与变革的依靠力量。面对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将社会变革的力量寄托于边缘群体,将街头流浪汉、失业人员、同性恋者、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和亚裔人看成是进行革命的潜在群体。由于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分析人的社会关系,使后现代主义无法找出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力量。鲍德里亚将符号秩序中的符码看成是反抗的主体,因为每一个群体都在结构化和等级化的社会体系被符码化,由此“反抗就不再只是经济上的剥削问题,它很少指向剩余价值的掠夺,而是指向符码的强制问题,正是符码的强制形成了当下的社会支配策略”^[5]。各种社会群体都在通过符码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黑人的反抗只是作为符码的种族标志,妇女的反抗是要使女性不再成为受歧视的符码,青年人的反抗旨在不平等的阶层划分。鲍德里亚倡导的这种差异和边缘政治与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一脉相承。他们都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方式、话语、身体、性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未来的新社会提供先决

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政治主张不是将反抗和变革定位于阶级斗争、工厂车间和国家政治之中,而是寄希望于微观社会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除了进行城市涂鸦、日常生活的离经叛道之外,他们未能提出任何明确而具体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活动,“这样一来,他的微观政治就显得相当含糊和空洞。他当时的极左政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把他自己的理论标榜为‘超级革命’的口号而已。……他唯一能够推荐的实践方式就是全盘拒绝,全盘否定以及其他一切激进的乌托邦幻想”^[6]。

后现代批判理论不仅迷失了变革的主体力量,而且也未能提出一种科学的社会替代方案,从而使批判理论失去了革命的目标和使命感。后现代主义热衷于批判、否定、解构和颠覆,却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构想,他们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7]。面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鲍德里亚倡导以象征交换为主的社会情境,这种原始的、理想化的社会形态最终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崇尚犬儒主义,拒绝行动,并且“表明了一种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的心态,对解放性的社会变革可能性的绝望的拒绝。的确,根据这个立场,当群众陷入惰性和冷漠,当影像和技术战胜人类行为意志时,我们处在束手无策、瘫痪而僵化的历史的尽头。所以,以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以自我调节来适应为我们剩下的时间’”^[8]。后现代批判理论对任何政治及社会运动都不参与、不欢迎并采取超然和冷漠态度,只会一味地为现实辩护并悲观地投降,最终放弃了实现激进社会变革的希望,沦为一种乌托邦主义和政治悲观主义。

与此相反,马克思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性批判,提出了新社会的理论建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从而使批判理论从理论走向

现实,成为一种科学的思想原则。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分析,确立了无产阶级作为埋葬旧制度的主体力量,“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9],从而科学地指出了实现历史变革的主体力量。可见,后现代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剖析既缺乏真正的主体,又无法提出科学而可行的替代方案,而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关系的分析中确立了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在对资本主义生存、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中构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因此,要把握资本主义内在的运行规律和深层的发展逻辑,就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10],它仍然是当代社会各种思潮不可超越的理论视界。

注 释

- [1]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336 页。
- [2]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5 页。
- [3]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第 55 页。
- [4]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353 页。
- [5]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 121 页。
- [6]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 151 页。
- [7] 罗斯特:《后现主义与社会科学》,第 5 页。
- [8]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 362—363 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
- [10] 杰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6 页。

参考文献

一、马列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二、其他参考著作

1. 中文类

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巴尔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

- 博德里亚尔:《完美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 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布希亚:《拟仿物与拟像》,洪凌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 布希亚:《海湾战争不会发生》,邱德亮等译,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波德里亚:《冷记忆》(1—4),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毕晓普、凯尔纳:《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戴阿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蔡铮云:《另类哲学:现代社会的后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陈学明:《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
- 戴阿宝:《终结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 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 德鲁克:《管理的前沿》,许斌译,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
- 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 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 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
- 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三联书店,2001年。
-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三联书店,1989年。
-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 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
- 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 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
-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
-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金惠敏:《媒介的后果》,人民出版社,2005年。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凯尔纳:《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陈维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

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论》,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

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拉什、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李斯约翰、福斯:《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

罗钢等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张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罗斯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 纳托利:《后现代性导论》,杨道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 尼采:《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 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 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1997年。
-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 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王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刘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 朱克英:《城市文化》,张廷佺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 泰勒、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章燕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
- 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马经青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
- 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王治河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 王晓路等编:《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 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伍德、福斯特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希林、梅勒:《社会学何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王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夏光:《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颜岩:《批判的社会理论及其当代重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俞吾金、陈学明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

约翰·R·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虹、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商务印书馆,2009年。

张小金:《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拉什:《批判理论》(英文版),三联书店,2006年。

2. 英文类

Ben Agger, *Critical Social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West view press, 2006.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ouglas Kellner (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1994.

Gary Genosko, *Baudrillard and Sign: Signification Ablaze*, Routledge, 1994.

Gilles Deleuze, *Logic of S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Jean Baudrillard, *America*, Verso, 1988.

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 Verso, 1993.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E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Jean Baudrillard, *The Vital Illus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Jean Baudrillard, *Impossible Exchange*, Verso, 2001.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Semiotext, 2007.

Mike Gane, *Baudrillard: Critical and Fatal Theory*, Routledge, 1991.

Mike Gane (ed),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Routledge, 1993.

Mike Gane, *Jean Baudrillard: In Radical Uncertainty*, Pluto Press, 2000.

Mark Poster(e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Rex Butler, *Jean Baudrillard: The Defence of the Real*, Sage, 1999.

Tony Smith,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From Hegel to*

Analytical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三、参考论文

1. 中文类

陈嘉明:《消费社会、拟象世界与后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陈昕:《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读书》1999年第8期。

黄河:《资本逻辑与传统社会物品价值体系的解构》,《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黄河:《资本扩张的悖论及其解决路径》,《现代经济探讨》2009年第1期。

季桂保:《让·鲍德里亚的大众传媒理论述评》,《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

孔明安:《技术、虚像与形而上学的命运》,《哲学动态》2002年第10期。

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哲学动态》2004年第2期。

孔明安:《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吗?》,《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

鲁品越:《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鲁品越:《资本逻辑与金融风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

马钦荣:《逻辑与哲学——历史的回顾》,《学术界》1989年第6期。

马钦荣:《发展是硬道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还是社会发展理论》,《探索》2004年第3期。

孙承叔:《资本与现代性——马克思的回答》,《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王逢振等:《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约翰·罗访谈录》,《文艺研究》

2001年第1期。

萧俊明:《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徐琴:《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意义与局限》,《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杨耕:《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与多重逻辑》,《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

仰海峰:《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余源培:《评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俞吾金:《资本诠释学》,《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7期。

张劲松:《拟像概念的历史渊源与当代阐释》,《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张劲松:《媒介批判理论的语境转换:影像·景观·拟真》,《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8期。

张劲松:《消费社会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张劲松:《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后现代解读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

张劲松:《拟真世界与客体策略——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及启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期。

张劲松:《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话语》,《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张雄等:《拜物逻辑的批判:马克思与波德里亚》,《学术月刊》2007年第

12 期。

周建漳:《存在与表现》,《哲学研究》2010 年第 4 期。

邹诗鹏:《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课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2. 英文类

Ross Abbinnett, “The Spectre and the Simulacrum: History after Baudrillard”,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5(6), 2008.

William Merrin, “To play with phantoms: Jean Baudrillard and the evil demon of the simulacrum”,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0(1), 2001.

Zeus Leonardo, “Resisting Capital: Simulationist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 *Critical Sociology*, Vol. 29(2), 2003.

Gary Genosko, “Jean Baudrillard’s Contributions to Semiotic and Struc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udrillard Studies*, Vol. 4(3), 2007, <http://www.ubishops.ca/baudrillardstudies/>.

后 记

2005年在厦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聆听了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题为《物与时间》的讲座,启发了我从物品、符号等关键词去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由此我找到了鲍德里亚,开始了对消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从硕士到博士,从商品、符号到拟像,从人物思想研究到讨论后现代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关系,这大概是几年来我哲学之旅的行走路线。无论情境和话题如何变换,我的学术研究旨趣都在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对话与交流,阐述马克思经典理论在当代语境中的重要意义,这也许就是论文写作的初衷。

衷心感谢博士期间导师马钦荣教授的悉心关怀、严格要求和不断鞭策!从题目的选定到结构的搭建,从理论修养到方法训练,从段落陈述到细节推敲,论文完成的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导师的大量心血。在三年的学习生涯里,导师不仅关心着我们学业的进步,同时在学习、工作等各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每一次学术沙龙里,我们不仅体会到了学术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也深深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和感动。在这个大家庭里,导师以他渊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的处世品格,深深地

影响着我们、感染着我们。从导师那里,我不仅汲取了知识营养,而且开拓了学术眼界,端正了治学态度,这必将成为伴我终生成长的丰厚养分。

衷心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俞吾金教授的用心指点和热忱支持。在重返上海的短暂时光里,导师的博学、睿智和宽厚让我如沐春风。感谢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庄穆教授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著作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单位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开阔的学科视野。而立之年求学最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年迈的双亲和甘于付出的兄长,是他们为我撑起一把伞,遮挡住了生活的种种艰辛而安坐于书桌前。在此书修改出版期间,可爱的女儿降临人世,我的爱人颖萍承担起家里的重担,一心一意照顾着整个家庭的生活起居,让我专注于学业。此书也许是对女儿最好的祝福,也是给亲人、爱人最好的礼物。尽管读不懂这些古怪而晦涩的文字,然而在这厚厚文本背后是家人的默默奉献和浓浓爱意。

恍然之间,十年已逝。犹记那年为考研成绩失意、苦闷和狂喜,在 SARS 病毒肆虐的春天搭上了通往厦大的末班车,由此人生经历了巨大的断裂而开启了另一道风景。其后彷徨而昏沉的三年硕士、单调而奋进的两年办公室生涯。当生活又一次面临着安稳平淡与重新启程的艰难选择时,我毅然决然地再次告别过去,由此才有了此书的诞生。其间的艰辛苦涩、失意落魄、悲欢交错和苦尽甘来,世间诸相冷暖自知,这些文字也算是对过去十年经历的一种纪念!无论人生道路还是理论研究其实都是一种登山的历程。山间绿草如茵,溪水潺潺,我们无心留恋向山峰进发;及至半山腰,绿树成荫,山路陡峭,我们不愿就此驻足继续向最高峰挺进;终抵山顶,天地开阔美色尽览无余,无数人沉醉

于此。可是，山雾隐约中更高的山峰矗立眼前，它沉静而美丽，
似乎在向我轻轻招手。

山，就在那里，让我们收拾行囊，再次出发！

张劲松

2013·立春·福大怡园